

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十三

庆阳地区 中共党史人物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
中共华池县委员会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

主编 刘凤阁

编辑 陶兴范

王来才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
中共华池县委 编

序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及各县委党史办的同志，用了7年时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访问了曾在这里工作、战斗过的众多老同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编辑出版了《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十分高兴地祝贺这部资料丛书的出版，并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

庆阳地区亦称陇东老区，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1927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宁县支部，开始了“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三十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陇东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这里的山山川川。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拉开了陇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帷幕。“九·一八”事变，震撼全国。国土沦丧，民族危亡，陇东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兴起抗日救亡运动，西北反帝同盟军就在这里诞生。嗣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标志着在西北地区，正式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陇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为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证。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震惊了南京政府，蒋介石调遣陕、甘、宁、晋等数省国民党军队，先后对西北这块红色区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一大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同志面对屠刀宁死不屈，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谱写出可歌可泣的革命诗篇，捍卫了这块血染的土地。并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体，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解放斗争的总后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又在陇东进行了“山城堡战役”，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标志着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引自聂荣臻：《山城堡战斗》，载《三军大会师》上册445页）。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习仲勋、马文瑞、耿飚、王维舟、马锡五、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对陇东根据地的扩大、巩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八年抗战期间，陇东各级组织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使老区的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使政府机构更加精干扎实，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卓有成效

地建设和保卫了陕甘宁边区。陇东人民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竭尽全力支援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模范根据地的作用。就是在三年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陇东人民把革命战争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以坚强不屈、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战胜了一切困难，终于夺取了庆阳地区的全境解放，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庆阳地区这一光荣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伟大斗争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应该认真总结，发扬光大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部丛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其准确的历史资料，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陇东活动的主要内容、历史轮廓和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阐明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总结了陇东老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这部丛书的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学习陇东老区的革命历史，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和优良传统教材，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借鉴。它必然在弘扬先烈业绩，继承前辈遗志，从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资政育人，发扬传统，惠及后代，启迪

未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相信这部丛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

我愿借此机会，向庆阳地委党史办的同志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为广大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史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继续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努力！

王秉祥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各系统，都兴起了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党中央一贯重视这项工作，但象现在这样有组织、有领导，普遍的、系统的、全面的开展党史征研活动，还是前所未有的。它打破了过去党史研究中的某些“禁区”，使很多历史档案得以开放，一批批革命文物被发掘出来，从而使大量党史资料专辑、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以及用革命历史题材写成的各类文艺作品纷纷问世，这不能不说是新时期在党的建设方面开创的新局面。《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就是在这种形势推动下编纂的。

甘肃庆阳地区的大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陕甘（后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位居陇东的最东部，所以向以“陇东老区”见称。

陕甘根据地始创于土地革命中期。1929年夏，中共陕北特委开展了“兵运”活动，接着在陕甘边界首先拉起革命武装，逐渐形成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在反“围剿”斗争的基础上开始联合，到1935年夏达到了完全的统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这块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众多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成为

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革命的大本营；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年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立足延安，成功地推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巧妙地处理了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关系，团结了国内各抗日党派乃至海外友好力量，陕甘宁边区成为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同时，中共中央还立足于陕甘宁边区，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所以陕甘宁边区又是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区，是当时全中国民主政治的中心和模范，是中国光明与希望的所在。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离开陕北。此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人民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大后方，西北野战军从这里出发，开始大反攻，最后赢得了西北的彻底解放。

在整个陕甘宁根据地范围内，庆阳老解放区所占面积并不大，但它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

还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时期，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和重大事件，如刘志丹发动“太白起义”，首创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改编反帝同盟军，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领导并首创寺村原游击根据地等，都发生在庆阳地区境内。特别在1933年后季照金根据地失守以后，南梁（原属庆阳县，今属华池县）一带便发展成为陕甘边区革命的中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都设立在这里。这期间，陇东已建立起华池、庆北、新正、新宁4个县级苏区政权。以上可以看做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一个时期。

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可作为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陇东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首先是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长征相继过境，横穿东西；然后是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曲子、环县等广大地区；接着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的山城堡战役，以及稍后纵贯陇东的南下与回师后在陇东各地的驻防。这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庆阳地区发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曲子、环县及其周围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陇东的革命根据地成倍扩大，而且这些苏区既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南大门，又是进一步扩大陇东革命势力范围的后方和出发点。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在战斗、行军和驻扎休整过程中，所到之处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发展了统战关系，建立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这就为党在陇东广大腹地发展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到1937年8月，党已经在庆阳、合水、驿马关、西峰、镇原、三岔、宁县建立起了县委或工委，革命力量已基本与庆阳地区的南大门——新正、新宁（属关中特区）连成了一片。这种形势，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也只得将陇东6县（宁县、正宁、镇原、庆阳、合水、环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需要，中共中央和陕

甘宁边区党委又对庆阳地区的党、政建制也作了相应调整：撤销陕甘宁省（1936.5——1937.9），建立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庆环分区即专管陇东的华池、曲子、环县；另成立党的陇东特委（1937.7——1938.5），领导上述新成立的几个县委、工委及整个统战区的工作。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历史虽然只有两年多时间，却是个关键，陇东的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奠定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陇东的大局。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解放区可以说是陕甘宁边区的缩影，也可作为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三个时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人民创建的业绩是多方面的，总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立足大后方，艰苦卓绝，不怕牺牲，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竭尽全力支援抗日前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第二，有力地制止或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一系列分裂阴谋（特别是粉碎1939年4月、11月挑起的两次陇东摩擦事件），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第三，利用抗战后方相对和平的环境，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政令和决策，开展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教育的全面建设，实践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使陇东毫无愧色地成为模范根据地的一部分。

三年解放战争是陇东解放区最困难、人民经受最严峻考验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作为研究陇东党史的第四个时

期。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全部失陷，陇东分区大部失陷；6月，西北野战军出击陇东，失地虽曾一度收复，但野战军转移后，胡宗南与青、宁二马随即卷土重来。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无不采用烧、杀、抢、奸等最野蛮的手段，对解放区人民施行报复。在大敌压境、解放区大大缩小，物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陇东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地方部队和全体人民实行总动员，开展了全民游击战争。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着前线的口号下，一方面组织灵活机动的游击队、武工队，以地方独立部队为骨干，互相配合，就地打击敌人，保卫和收复解放区，一直斗争到庆阳全境解放；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支援前线，直到全西北大地的解放。这一时期，陇东人民既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也充分发扬了坚强不屈、团结一致的革命斗争传统。

综上所述，从1929年党在陕甘边区开始革命活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陇东老区已有整整20年历史；就是从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也有15年历史。这段历史既是庆阳人民无尚光荣的斗争历史，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便用庆阳人民的革命传统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而某些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可以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总结历史需要从整理研究资料入手。我们这部资料丛书，就是想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地区的历史提供一些方便。参与编纂这套资料的，是一些并无多少历史专

业知识，原来也不熟悉陇东地方党史，只是为着工作需要而走到一起来的地、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们自知做不出象样的“研究”，更无著书立说的水平，只是出于对党的历史的责任感和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便共同做了这点资料性的工作。

我们从1983年开始调查征集资料，到1987年底，资料基本收集齐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整理、筛选，从实际出发，或以特定历史时期断限，或按历史事件归类，不拘一格地酌情汇编成册。基本原则是，力求每一辑都能集中汇总陇东党史的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资料；综合全套则可囊括陇东党史各方面的资料，为广大读者或党史工作者了解陇东党史、研究陇东党史提供方便。经归类结果，计划共编13本，即：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25——1949）；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5.11——1937.8）；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

《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

《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

在编辑这些书稿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发挥集体力量。从开始的资料征集，到资料的整理归纳，我们始终坚持了分工负责、互相协作、群策群力的原则；进入编纂阶段，我们又采取了责任承包、集体审定的办法。为此成立了由刘凤阁、任愚公、李占年、李怀珍、贺长庆、王双位、陶兴范、祁学民、杨有升、苏惠民、曹清珂11人参加的编审组，由刘凤阁担任主编，集体负责审定把关。尽管如此，这套资料汇编，可能仍存在着体例不统一，各册之间的断限、归类不一定恰当，可读性不强等问题。好在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毕竟是“资料”，资料的价值在于真实，如果您能从其中得到您所需要的真实资料，这套丛书便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了，我们也就比较满意了！

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编审组

1992·6修订

说 明

一、本书为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十三。主要收录民主革命时期，在庆阳地区为革命英勇献身和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中共党史人物，以及有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代表人物。

二、本书所收人物分为传记、简介和名录三部分。上传的基本原则为：中共陇东党组织和苏区的创建者；全国解放前牺牲、病故的地、师级以上和解放前参加革命、1987年底以前牺牲、病故的省军级以上党政军领导人（个别人物传记因特殊情况打破了这个界限）；陕甘宁边区树立的甲等以上模范和著名战斗英雄；其他事迹突出、在全区或某县有重大影响之革命历史人物。作简介的人物为：土地革命时期县、区党组织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全国解放前牺牲的我军连级以上和赤卫军、自卫军、民兵营级以上著名烈士；边区树立的乙等和分区树立的甲等以上英雄；全国解放前已担任县团级职务、1987年底前牺牲、病故的老干部；其他对革命有贡献之知名人士。入革命英烈名录的人物为：民主革命时期参加我军、全国解放前在历次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名单顺序原则按人物生平先后排列。全书共收录1837人，其中立传56名、简介254名、名录1327名。

三、本书侧重介绍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在陇东老区活动的主要历史功绩以及他们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目的在于为大家学习、掌握和研究陇东老区党的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也为缅怀革命先辈、激励教育后人继承革命传统、发扬老区精神提供榜样。

四、本书由华池县委党史办陶兴范、王来才编辑，并由陶兴

范担任责任编辑。文稿除个别属转载或约请有关人员撰写外，其余均系我区地、县（市）委党史部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征集撰写而成。地委党史办李舍柏、李占年，华池县委党史办赵晓红五同志校阅修改了部分稿件。最后由地委党史办主任、副编审刘凤阁系统统修改审定。

五、书中人物事迹、史料都经过多次核对，其中几位党史人物的传记还参照吸收了党史界有关的著述和回忆资料的内容（不便一一注明，在此特向有关作者致谢）。尽管如此，但其中不少人物因留存于世的文字资料很少，熟悉他们情况的老同志或已逝世，或已年迈记忆不清，往事多已忘却，因此对他们的事迹很难写全、写准、写具体，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因而难免在史实事迹方面多有遗漏或错误，文字难免粗陋、编辑体例等也未必恰当，谨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93.3.

目 录

序	(1)
前言	(5)
说明	(1)

传记部分

刘志丹	(1)
谢子长	(24)
王泰吉	(34)
李青山	(39)
梅生贵	(42)
张静文	(46)
杨 琪	(48)
杨 森	(53)
惠子俊	(59)
乔连珠	(61)
马锡五	(65)
阎红彦	(74)
李 颉	(75)

郭宝珊	(80)
賈生秀	(84)
李培福	(88)
李生华	(98)
张振财	(103)
戴占魁	(109)
黄克秀	(114)
边金山	(118)
石秀山	(121)
何炳正	(125)
杜 宛	(129)
秦善秀	(133)
马全德、马全普、王世英	(136)
李长春	(142)
张进元	(145)
张清益	(147)
郭振海	(151)
代彦禄	(152)
高 平	(153)
王孝锡	(154)
任鼎昌	(164)
何万祥	(166)
雷敏之	(168)
刘志仁	(169)

李德禄	(177)
张仲良	(179)
王之经	(181)
毛振华	(182)
陈 雄	(186)
张月英	(188)
孙万福	(190)
马福吉	(197)
秦 明	(203)
王保民	(208)
李建堂	(210)
雅生华	(214)
王维舟	(215)
陆为公	(227)
刘仲鄯	(230)
贾联瑞	(236)
贾其昌	(240)
李义祥	(243)
王子厚	(250)

简介部分

赵明发	(257)
李生江	(258)

白阳珍	(259)
黄宗万	(262)
曹 澎	(264)
龙治祥	(264)
张有财	(265)
郝文明	(267)
马世明	(270)
何占胜	(271)
赵志喜	(273)
汪占祥	(274)
李兴玉	(275)
冯世祥	(276)
杨再宏	(279)
饶 俊	(280)
李培兰	(282)
张志德	(282)
崔凤鸣	(284)
倪克光	(285)
李志成	(286)
赵怀义	(287)
乔步英	(288)
韩文奎	(289)
张发信	(290)
杜培忠	(290)

孙占奎	(290)
赵怀玉	(291)
高贵发	(292)
高季贵	(293)
赵思功	(293)
张守珍	(295)
孙宽顺	(297)
陶贵耀	(299)
李兴高	(300)
高生荣	(301)
张建堂	(302)
高名山	(304)
张振东	(309)
贾生财	(309)
李 彦	(311)
殷云山	(311)
赵 生	(312)
杨树秀	(313)
何生祥	(313)
侯启万	(314)
高满贵	(314)
梁培和	(315)
何天贵	(316)
郭维翰	(316)

赵武臣	(317)
柳生枝	(322)
杨占清	(323)
辛俊珍	(323)
郑 振	(324)
高永信	(324)
程永新	(325)
姬世福	(325)
邵富堂	(326)
陈世英 徐占邦	(327)
石廷川 石道发	(328)
王三义	(329)
侯青山	(329)
朱向林	(330)
朱德良	(330)
刘秀贞	(332)
孙 泰	(332)
于廷吉	(333)
薛生华	(333)
彭 贵 彭振刚	(334)
杨爱成	(335)
齐占兴	(335)
冯克微	(337)
赵廷元	(338)

贾 义	(338)
李儒银	(339)
贾福禄	(339)
贾建成	(340)
段得喜	(341)
强占山	(341)
黄金贵	(342)
杨青山	(342)
杨培润	(343)
许尚贤	(344)
文炳衡	(345)
马思义	(346)
王桂兰	(347)
唐凤仪	(348)
杨正甲	(350)
焦怀兴	(353)
张嘉伯	(355)
卢永财	(355)
寇金财	(358)
屈则声	(360)
张治平	(362)
赵宏钧	(364)
郭存信	(367)
郭进亭	(369)

- 赵德荣 (372)
- 李银清 (374)
- 郭树庭 (375)
- 潘远志 (377)
- 王忠信 (379)
- 梁文汉 (382)
- 张有财 樊生奎 (383)
- 崔瑞山 (383)
- 王明堂 (384)
- 王占义 (384)
- 柴正祥 (385)
- 卜凤鸣 (385)
- 孟玉娃 (386)
- 刘玉宝 (386)
- 乔占财 (387)
- 刘玉财 (388)
- 杨宝堂 (388)
- 卢希宝 (388)
- 杨士义 (389)
- 王占奎 (389)
- 杨端印 (389)
- 孟爱桂 (390)
- 栗彦功 (390)
- 王积旺 (391)

付候群	(391)
王四宝	(391)
杨兴才	(392)
刘治兴	(392)
邵培田	(392)
田德奎	(394)
王玉兴	(394)
杨占奎	(394)
杨培义	(395)
陈德山	(395)
赵宗岐	(396)
宋继成	(396)
崔兆军	(397)
胡治德	(397)
贾生玉	(399)
崔连城	(400)
苏德荣	(400)
赵立贤 付得亮	(400)
王三绪	(401)
刘兆德	(401)
雷长有	(402)
贾得全	(403)
杨志清	(403)
雷德胜	(404)

王世祥	(404)
张树成	(404)
张登华	(405)
张 举	(405)
权楠强	(406)
何聚财	(408)
张荣德	(409)
王立成	(409)
付振琪	(411)
孙成林	(412)
李桐英	(412)
吕凤山	(413)
王宏宝	(414)
白富山	(414)
汪思学	(415)
张俊录	(415)
黄德堂	(416)
王生烈	(416)
杨贵生	(417)
高三德	(418)
王 佑	(418)
朱文寿	(419)
李嘉斌	(420)
黄秉治	(420)

田雨雷	(421)
张仲海	(422)
杨贵清	(422)
李向华	(423)
李建成	(423)
赵廷杰	(424)
秦应江	(425)
东治成	(425)
苟成福	(425)
赵儒恭 张宏斌	(426)
张德全	(426)
张广有	(427)
吴朝怀	(427)
崔世雄	(428)
苏近明	(429)
朱维汉	(429)
崔学仁	(430)
马宇民	(430)
吕文光	(431)
王正智	(432)
马万羽	(432)
常如斌	(433)
刘 怀	(433)
宁良全	(433)

常廷栋	(434)
吴生华	(434)
虎居堂	(435)
杨生荣	(435)
苏明升	(437)
苏玉梅	(438)
蔺桂兰	(438)
杨国秀	(439)
张 礼	(440)
徐 明	(441)
孙昆山	(442)
王德财	(443)
王俊财	(444)
强占山	(445)
张正明	(446)
黄 润	(447)
樊富根	(448)
王天林 徐万恩 陈三星 康希业	(448)
郑八娃	(450)
姚呈琪	(451)
陈耀祖 张三成	(452)
杨廷俭	(452)
李义海	(453)
白如贵	(453)

- 席正春 王宗义 (454)
- 虎殿元 (455)
- 段志富 (455)
- 许守仁 (456)
- 魏德荣 (457)
- 胡正明 (458)
- 周玉琢 (459)
- 焦树池 (459)
- 张希明 (460)
- 阎生甲 (460)
- 李玉清 (463)
- 张占明 (464)
- 孙久德 (465)
- 孙应邦 (466)
- 李宪章 (468)
- 李廷序 (469)
- 张彦儒 (471)
- 刘文山 (472)
- 杜云程 (473)
- 聂万财 (475)
- 顾登玺 (475)
- 祁正年 (476)
- 朱秉才 (477)

名录部分

- 华池县 (479)
- 合水县 (491)
- 正宁县 (507)
- 宁县 (518)
- 环县 (528)
- 庆阳县 (556)
- 镇原县 (567)
- 西峰市 (585)
- (591)
- (593)
- (595)
- (597)
- (599)
- (601)
- (603)
- (605)
- (607)
- (609)
- (611)
- (613)
- (615)
- (617)
- (619)
- (621)
- (623)
- (625)
- (627)
- (629)
- (631)
- (633)
- (635)
- (637)
- (639)
- (641)
- (643)
- (645)
- (647)
- (649)
- (651)
- (653)
- (655)
- (657)
- (659)
- (661)
- (663)
- (665)
- (667)
- (669)
- (671)
- (673)
- (675)
- (677)
- (679)
- (681)
- (683)
- (685)
- (687)
- (689)
- (691)
- (693)
- (695)
- (697)
- (699)
- (701)
- (703)
- (705)
- (707)
- (709)
- (711)
- (713)
- (715)
- (717)
- (719)
- (721)
- (723)
- (725)
- (727)
- (729)
- (731)
- (733)
- (735)
- (737)
- (739)
- (741)
- (743)
- (745)
- (747)
- (749)
- (751)
- (753)
- (755)
- (757)
- (759)
- (761)
- (763)
- (765)
- (767)
- (769)
- (771)
- (773)
- (775)
- (777)
- (779)
- (781)
- (783)
- (785)
- (787)
- (789)
- (791)
- (793)
- (795)
- (797)
- (799)
- (801)
- (803)
- (805)
- (807)
- (809)
- (811)
- (813)
- (815)
- (817)
- (819)
- (821)
- (823)
- (825)
- (827)
- (829)
- (831)
- (833)
- (835)
- (837)
- (839)
- (841)
- (843)
- (845)
- (847)
- (849)
- (851)
- (853)
- (855)
- (857)
- (859)
- (861)
- (863)
- (865)
- (867)
- (869)
- (871)
- (873)
- (875)
- (877)
- (879)
- (881)
- (883)
- (885)
- (887)
- (889)
- (891)
- (893)
- (895)
- (897)
- (899)
- (901)
- (903)
- (905)
- (907)
- (909)
- (911)
- (913)
- (915)
- (917)
- (919)
- (921)
- (923)
- (925)
- (927)
- (929)
- (931)
- (933)
- (935)
- (937)
- (939)
- (941)
- (943)
- (945)
- (947)
- (949)
- (951)
- (953)
- (955)
- (957)
- (959)
- (961)
- (963)
- (965)
- (967)
- (969)
- (971)
- (973)
- (975)
- (977)
- (979)
- (981)
- (983)
- (985)
- (987)
- (989)
- (991)
- (993)
- (995)
- (997)
- (999)

刘 志 丹

(1903——1936)

(一)

刘志丹，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1903年4月10日生于金汤镇；乳名奎生，学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为了表示自己立志愿为国家民族献身，遂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义，改“子丹”为“志丹”。

祖父刘士杰，清同治年间拔贡，性格刚正，疏财仗义，曾参与当地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后又是当地第一批剪去辫子的新党，深受乡里敬重。父亲刘培基，先在金汤镇教书，后从商，曾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刘志丹6岁随母离开金汤镇，迁回棣子沟祖父身边，学文务农，度过童年和少年。保安县地处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陕北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传统。隋朝农民领袖刘加伦曾率众10万起义于延安；米脂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清末，在保安县也曾发生过“硬肚”农民起义，建立过18天政权。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刘志丹自幼养成了勤奋、坚毅、纯朴、正直、见义勇为的性格。1919年刘志丹15岁，离家赴永宁山（保安县城所在地）县立高小插班就读一年半，接触到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1922年考入陕北榆林中学，奠定了他一生的革命道路。

榆林中学是陕北23县联合举办的一所中学。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杜斌丞，他力主振兴教育，延请名师来学校任教，引进“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还办了图书馆，订阅《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刘志丹入学不久，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便先后从北京来这里任教，宣传马克思主

义。刘志丹在魏野畴、李子洲及其他进步老师启发指导下，如饥似渴地经常阅读上述进步刊物，还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及其他一些革命著作，迅速成长为一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写了一首《爱国歌》，很能说明他当时的思想境界和革命激情：“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也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

刘志丹的才学和进步活动，很快赢得了全体进步师生的信赖。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他被选为主席；后来做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他立即又成为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他发动和领导学生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还开办了平民夜校，发动过“非基督教运动”和旨在反对封建军阀井岳秀的学潮。刘志丹这时就已经学会了社会调查和社会宣传。一次学校放假，他和几个同学回保安取粮，沿途一路向民众讲演，受到百姓的欢迎，气坏了地主老财；他还曾在与榆林接壤的内蒙古市旗编歌唱到：“同种兄弟心相连，军阀列强内外患，汉蒙携手斗凶顽，灭敌除奸争人权。”这是最早在当地宣传民族团结的声音。

在榆林中学，1924年前还没有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此时刘志丹也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在学习和斗争实践中，他已体会到组织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他曾对好友王子宜说：现在井岳秀这个大军阀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光办学生会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你想，阎王的百万大军还没成个气候，是什么原因？我盘算咱中国非有个能串联全国工农商学兵的组织才行，就象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①1924年秋，他成为榆林中学第

①见王子宜《回忆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原载《星火燎原》第一期）。转引自延安地委党史办编《延安英雄刘志丹》一书。

一批共青团员，1925年春又第一批转为共产党员。他表示：加入了党团，就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从此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履行自己的职责奋斗不息。这年7月，刘志丹被选为榆林的代表，去三原出席了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会议。他给大会的题词是：“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他还向大会报告了榆林中学学生运动的情况。他的题词和报告，受到大会热烈欢迎，会后他又被邀请赴西安介绍榆中学生运动的经验，引起各学校和社会强烈反响。这时他已成为名噪陕西、蜚声平津的学生界领袖。

刘志丹的才华和学识，本来完全有希望使他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学者或社会活动家，但他把自己的现状和前途完全融汇在了党的事业之中。“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党号召青年到黄埔军校去学习军事，他便毅然响应号召，于1925年秋报考了广州黄埔军校。他说：“古人云：‘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对付军阀没有军队怎么行？我服从党的决定，今后就当一名革命军人”。赴黄埔军校不仅决定了刘志丹一生的道路，而且对他又是最严峻的现实考验。因为他过惯了北国山区生活，从天津一上船就受不住海浪的颠簸，而闹肠刮肚地呕吐，到广州后又不服水土，几经重病折磨，险些丧命。但他毫不退缩，坚持“走最艰难的路，挑最重的担子，过最热烈紧张的生活”。这是他给自己订立的准则。因此他顽强地与死神搏斗，终于把学习坚持了下来。在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杰出的共产党人直接教诲下，他于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

毕业后，他带病立即参加了东路军督师北伐，沿途冒酷暑坚持作政治宣传，随军直达江西吉安。不久，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暂驻讨吴（佩孚），急需我党派干部援助。刘志丹即奉命返回广

州，然后被派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部，任组织科长，旋被冯任命为少将特使，赴宁夏收编马鸿逵部队。马鸿逵此时任吴佩孚的军长，本不愿收编，并扬言要在军前斩来使以定军心。刘志丹听说后并不畏惧，他要人捎话给马鸿逵，马最后还亲自备马迎接刘志丹。马鸿逵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任命刘志丹为党代表兼政治处长。这支军队长期实行家长制的封建统治，军队素质极差，没有多大战斗力。刘志丹用其在黄埔之所学，对这支乌合之众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不久便发生明显变化。11月下旬参加了解救西安之围的战斗，受到冯玉祥的嘉奖。马鸿逵不得不说：“还是冯帅派来的刘志丹治军有方，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少将军！”

（二）

1927年“四·一二”之前，冯玉祥又利用刘志丹前往豫西收编刘镇华，因为刘被赶出陕西后，又窜到豫西作乱，冯玉祥深感后门不安。可惜就在刘志丹收编刘镇华过程中，冯玉祥追随蒋介石，也在北方开始了“清党”活动。

7月，冯玉祥以“集训”为名，解除了国民联军所有政工人员的武装，把刘志丹等23名共产党员监禁于开封，随后押往武汉。火车开到武胜关时，刘志丹他们乘乱逃出，徒步到武汉找到党的组织。党组织即派刘志丹去安徽省阜阳地区，协助魏野畴发动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的兵变；他急到阜阳，起义已经失败，魏野畴壮烈牺牲。刘志丹怀着十分沉痛悲愤的心情再赴上海找党；1928年初，根据组织指示，他又日夜兼程返回故里陕西。从此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运”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对付新军阀的血腥镇压，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根

据“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在我党控制的新编第三旅许汉中（中共党员）部发动起义。刘志丹归陕后即化名刘金美，与唐澍、谢子长等先后被派往该部，在该部成立了旅党委，刘志丹任书记，许汉中、唐澍为委员。旅党委一面在部队做起义的思想发动和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在洛南三要司周围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军，开展反霸斗争。3月份渭华地区发生“宜化事件”，中共陕西省委即决定在这一带发动起义。4月下旬，刘志丹等奉命将部队开往华县高塘，5月1日在渭南崇凝镇与已经爆发的农民暴动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8日，在高塘镇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宣布将起义军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下分4个大队，1个赤卫队和1个骑兵分队，共千人。刘志丹在会上通俗地讲解了社会贫富不均的原因，号召：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起义之后，在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至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是，渭华地区乃豫陕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军阀是决不允许床前卧虎的。因此，他们从6月上旬开始，先后3次派出重兵向起义军发动进攻。起义军虽顽强反击，终因孤立无援，众寡悬殊，坚持战斗到6月底而失败。唐澍等一批共产党员壮烈牺牲，部队所剩不足200人进入终南山。刘志丹、谢子长等仍回省委。刘志丹在最后一次军委会上沉痛指出，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光杆斗争，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烧杀政策。

刘志丹领导的渭华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北方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影响和深远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7月，刘志丹化装潜入西安，向省委作了汇报。中共陕西省

委即派他回陕北特委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继续开展军运活动。他先回家乡保安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党的支部，并利用师生、同学关系在该县教育局当了一段“督学”，把一些革命失败后回来的共产党员安插到各学校。安顿就绪，刘志丹到陕北特委驻地榆林。在他的推动下，1929年初陕北特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和谢子长向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开展军运斗争的指示，提出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利用各种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起义。当时的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白色恐怖，反对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主张，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刘志丹批评了这种右倾思想，在特委多数委员支持下，做出了开展军运活动的决定。刘志丹还提出，不仅要搞军运，还要开展“匪运”。因为当时在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里，有很多股土匪，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由于受不了封建剥削压迫，生活无着才被迫上山为匪的，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刘志丹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仍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从1929年秋到1930年秋，刘志丹与谢子长曾先后派人到陕北高志清、杨庚武等部以及黄河岸边商販保运武装杨琪、杨鼎、师储杰等部做过收编工作，1929年秋刘志丹还二次回到保安，在党支部配合支持下，利用该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政界的矛盾，挤走路仰之，取得了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合法身份，把民团改造成成为党所掌握的一支武装。1930年春，他与谢子长先后亲往宁夏苏雨生的骑兵第四师挂名建军，谢子长任苏部十一旅旅长，刘志丹任第九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他们利用公开身份在苏部安插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其第八旅十五团（团长张东蛟，共产党员）成立“学兵队”，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为以后的靖远

兵变打下了基础。1930年夏，苏雨生失败南下投靠了杨虎城，刘志丹又到甘肃庆阳谭世麟的民团军中活动。谭世麟答应给一个团的编制，问刘志丹谁任团长好，是谢子长还是张廷芝？刘答：张廷芝嫌谁的碗砸谁的锅，还是谢子长任团长好。于是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第六营营长，驻在庆阳北部的三道川，另外还临时组建两个营，一个是从宜川杨庚武部拉来的周维琦，一个是土匪张廷芝。结果张廷芝乘刘志丹不在，收买周维琦叛变，军运又遭失败。

1930年8月，刘志丹回陕北特委参加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会后不久刘志丹请求辞去特委军委主席的职务，亲自去陕北边界组织武装起义。9月他再次回到保安，与党支部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等共同策划，集合各地分散回来的同志和搞到的几支枪，又从保安县民团中抽出10多人、枪，经过短期训练和准备，仍然打着谭世麟陇东民团军第六营的旗号，于10月1日开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与驻该镇的谭世麟二十四营举行兵对兵、官对官的“联欢”。席间刘志丹与姜兆澧亲手打死该营正、副营长，收缴了该营的枪支、马匹，正式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游击队。“太白起义”是刘志丹开展军运以来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所建立起来的游击队是陕甘边区最早的革命队伍，在这一地区从此开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历史。

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刘志丹为巩固和发展这支队伍又走过一段十分艰难的路程。“太白起义”之后，他为了减小目标，迅速发展，投给赵连璧（即赵二娃），同守孝少数人、枪，让他们分头在太白地区和南梁地区活动，他自己则带领60来人开往保安，安照边界打土豪，开展游击活动。他带的队伍很快发展到150多人，古历年底（约1931年元月底或2月初），军阔高双城的队伍

前来“围剿”，刘志丹便带领游击队转移到合水县的固城川，通知赵连璧、同守孝前来会合，这时贾生财、唐青山闻讯也带领小股民团投奔而来。刘志丹即在驻地麻峪村对几股队伍进行统一整编，共计400多人，编为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别任连长，刘志丹任总指挥。整编后部队在固城川与宁县的盘克原一带打土豪、筹备粮饷。一次在盘克原的张皮家村被陈珪璋的部队包围，一场激战，一连长卢仲祥阵亡，赵连璧、贾生财冲出包围，带少数队伍重新钻入山林；刘志丹带领一部分人转移到陕西省宜君县小石崖，在罗连城民团暂时栖身。随即，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又派人与苏雨生（时任杨虎城的警备骑兵旅旅长，驻陕西彬县）再次谈判联合，以便休养生息，伺机再把队伍拉出去。谈判结果，游击队暂编为苏旅的“补充团”，驻防陕西省旬邑县取田镇。刘志丹这一时期，一方面指挥游击队加强学习和军事操练，提高自身素质；一方面与附近驻防的苗团积极发展统战关系，不仅他自己亲到该团做工作，还教育身边的干部多与该团的下层军官接触，搞好关系，争取该团与游击队合作；再则，他还不时派人进山与贾生财、赵连璧联络，指示他们在山里召集旧部，积极发展队伍。同时赵连璧也出山主动到取田镇向刘志丹请示过工作。刘志丹领导游击队在取田镇开展的革命活动，触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次在打土豪筹粮中，一名土豪抗粮自杀，陕西省政府便指示苏雨生惩办刘志丹；苏雨生也正欲借机吃掉刘志丹的游击队，便以开会为名诱捕了刘志丹，并派骑兵包围游击队。游击队一部分突围重入东山，一部分被迫缴械，编为运输队。刘志丹被押20多天，经党组织通过杜斌丞等营救出狱。一出狱，他就根据陕西省委计划去甘肃平凉，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从事军运活动。陈任命刘志丹为十一旅旅长，驻宁县旱胜镇，收编李培青的饥民武装。刘志丹到陇东后，羁留于彬县的游击队员也都陆续来到他这里。8月，由于军阀内部矛盾分

堡，刘志丹被高广仁裹挟到合水，不仅军逃计划落空而且险遭暗算。一天夜晚他乘大雨脱险离开合水逃进子午岭。在此之前，赵连璧、贾生财、杨塔胜都又各自拉起了一支武装。再加上从职田镇突围出来的几十人，共约400来人。刘志丹进山不久，便在合水县平定川一个叫侧水湾的地方，把他们集合起来进行了第二次整编。至此，刘志丹在“太白起义”中创建起来的南梁游击队，几经挫折终于重新振兴起来。

（三）

组建于吕梁山区的晋西游击队，因遭受敌人进剿，过黄河到陕北，并与杨琪、杨鼎、师健杰等保运武装联合，于1931年10月来到陕甘边区南梁一带。刘志丹得到消息后即派刘景范前往东华池迎接，下旬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与刘志丹共同领导会合后的队伍。这一带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且已时属隆冬，队伍会合后共700多人，吃饭和过冬棉衣发生困难。为度过暂时困难，决定与陈珪璋谈判暂时联合，仍用刘志丹在陈部采用过的番号，将部队编为十一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驻扎在庆阳北部新堡，进行整训。整训中提出了部队到何处落脚以及解决队伍成份不纯等问题。刘志丹提出了部队应坚持在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以及采用以教育改造为主、逐步清洗部队中的土匪成份的正确主张。

12月底，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部队脱离陈珪璋南下，1932年元月初到达甘肃正宁县东北部的柴桥子村，在这里正式宣布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同盟军党委会，刘志丹任同盟军副总指挥、党委委员，兼第二支队队长。3月初同盟军内发生“三边事件”，不久刘志丹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4月下旬，刘志丹回陕甘边区，开始任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5月上旬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他又任总指挥。这时正遇敌人开始“围

剿”，刘志丹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指挥游击队在陕西富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县之间转战半个月，历经9次战斗，8胜1负，至5月底便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共消灭敌人1400多人，缴枪1200余支。这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陕甘游击队的干扰越来越严重，省委忽而指示游击队放弃山区到平原去建立“新苏区”，忽而不顾环境，要求游击队限期完成分配土地的任务；忽而指责游击队领导是“机会主义”，撤开游击队党委另成立“秘密党委”。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刘志丹与阎红彦、谢子长等游击队的领导人紧密配合，并肩战斗，从革命大局出发，一方面与错误路线进行了原则斗争，一方面领导游击队与敌人开展无数次的战斗，战胜一次次困难和险情，终于打开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局围，使陕甘游击队经受了锻炼，站稳了脚跟。

1932年12月24日，陕西省委代表杜衡（即勋君，后叛变）在宜君县转角镇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编为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政委。刘志丹与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游击队领导人都被杜衡无端排挤出二十六军。只是在王世泰等全体官兵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勉强把刘志丹留下来，但不委任何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毫不计较个人身份，仍认真负责地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帮助拟定作战计划。因此，广大官兵仍然把他视为部队实际的领导人与指挥者。

红二团一成立就着手开拓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照金位于陕西旬邑、淳化、三原、泾县、宜君五县之间，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这里曾是陕甘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从1932年春天开始，习仲勋、李妙斋等就着手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工作。红二团成立后，这里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革命正处于高潮。但杜衡坚持推行极“左”路线，他既

不懂军事又不懂政治，一意孤行，只讲斗争不讲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缩越小，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给，好端端的革命局面几乎被他们断送。到了这种程度，杜衡仍执迷不悟，他一方面谈过于人，把打败仗归罪于参谋长邓毅，撤了邓毅的职，不得不任命刘志丹为团参谋长；另一方面他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于1933年5月下旬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提出放弃照金、南下渭华的逃跑主义主张。刘志丹对此坚决反对，他从各方面分析红军不宜于南下渭华的理由，指出红军离开根据地就等于自己毁灭自己。但是杜衡不容他把话说完，就指责他“一贯右倾”，强行通过南下的决定。这个怕死鬼把部队带到渭河边，他却借口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溜之大吉，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他便当了可耻的叛徒。果不出刘志丹所料，红二十六军南下至终南山一带后，孤悬于根据地之外，被敌重兵“围剿”，得不到接济，得不到休息，进退两难，最后在兰田县的张家坪一仗惨遭失败。

就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最艰难的日日夜夜，刘志丹始终是全体官兵的主心骨，是他们的力量和希望所在。当部队渡过渭河进入临潼即遭敌人重兵前后堵截，大家预感前途渺茫，情绪低落，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在这关键时刻，刘志丹表现出了他的持重和远见。他指出，进亦险恶，退亦险恶，进尚可与敌周旋，退只有与敌作一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返国，胜败都难以分清曲直。党委会议根据他的意见，决定宁败于进而不能败于退，会后说服大家，统一了认识。部队进至张家坪，团党委正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向，突被敌人包围，王世泰亲带100多人掩护，刘志丹、汪锋分别带部分人突围。刘志丹由兰桥上山，辗转于深山密林之中，他牵挂失散的同志，每天都派人外出联络，但因部队每天流动，深出去的人对地理生疏，所以联络人员有去无回。就这

样过了20多天，他决定让大家分散出山，他自己留下来继续寻找部队。他对战士们说：“看来，一时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现在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山，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大家都不愿意离开他，表示死也要死在一起，活也要活在一起；经他反复讲清道理，大家才理了长枪，带短枪分散出山，留在他身边的只有七、八个人。又过了好几天，他们正准备出山找地下党，突然遭到民团袭击，有的牺牲，有的失散，刘志丹又只身躲进深山。后来与少年先锋队副队长雷永胜相遇，两人结伴在山中继续寻找部队。王世泰带队伍从张家坪突围后，也一直在寻找他和汪锋。那时王世泰和他身边的同志都抱定一个思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刘志丹，宁可自己牺牲也要保刘志丹安全返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刘志丹，陕甘边区人民需要刘志丹！最后终于在石头峪的后山发现了他和雷永胜。大家见他患病身体十分虚弱，都十分难过，他却鼓励大家说：“革命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失败了再来！”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重返照金，扩大根据地，恢复二十六军！正是在这种信念支持下，他和王世泰等4人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化装成货郎，带着4支驳壳枪，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了根据地。

（四）

刘志丹返回照金，正遇敌人开始“围剿”，他未及休息就被任命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①参谋长，投入了反“围剿”斗争。刘

^①红二十六军南下时，在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王慕吉率陕军特务团于7月21日发动“照金起义”，起义军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转入照金根据地。在此前后，根据地还成立有照金三支队，红军第四团（由西北游击队编成）。为了统一红军领导，8月间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陈家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慕吉任总指挥。

志丹一贯善于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外线挫败敌人。这次反“围剿”依然采取了这一战术，除留少数游击队保卫后方机关、牵制敌人外，刘志丹、王泰吉率主力北上。乘敌不备，首先于10月17日晚袭击合水县城，不到一个小时，即全歼守敌一个连及该县保安队；接着又在庆阳县的城壕川、井里铺、毛沟门连败谭世麟及陇东驻军杨子恒部赵文治团。特别是毛沟门一战，红军反败为胜，打得赵文治一蹶不振，再未能恢复团的建制。

红军主力转移外线后，照金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于10月16日失守。

从1931年陕甘边区游击战争开始以来，围绕在那里建立红军后方根据地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和实际探索。由于陕西省委“左”的干扰，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未能被采纳。红军南下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后，正确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同时刘志丹通过实践的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成熟。他在毛沟门战斗后，及时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会上根据他的建议，决定划分三个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三路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主力红军居中策应，向南北发展，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巩固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决定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并成立四十二师机构，组建红三团，改四团为骑兵团。会后在附近的莲花寺正式对红军进行整编，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参谋长（翌年2月接王泰吉任师长）。包家寨子会议在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历史上，是一次决定红军后方转移的重要会议，它表明刘志丹关于陕甘边区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思想已经成熟。此后，刘志丹便根据会议精神亲自领导和指挥了创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的斗争。

南梁，泛指陕甘两省的保安县、甘泉县、庆阳县（今华池

县)、合水县相邻的桥山山脉中段大片地方,方圆数百里内分布着数十条山川沟岔,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中心区域在庆阳县(今华池县)境内的南梁堡、荔园堡。这里地广人稀,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距离陕甘两省的反动统治中心较远,反动军阀鞭长莫及,因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刘志丹从开展“军运”时期起就常在这一带活动,他最早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也正是在这一带建立壮大起来的;他走遍了桥山的沟岔山岭,被称为“活地图”。包家寨子会议后,红四十二师首先派出部分主力很快扫清了南梁周围的梁邦栋等反动土匪、民团。随后师党委派出刘均三与吴岱峰等带领后方机关来到豹子川,派张策以特派员身份来到南梁堡附近(春节前习仲勋也来到这里)开辟群众工作。11月下旬至12月,先后组建起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在此基础上又正式成立了二路游击指挥部;至1934年春,在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附近各川道里到处都成立了赤卫军、农民联合会以及儿童团、妇女联合会等,还在白马庙建立了中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蓬勃兴起的基础上,1934年2月25日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主席。鉴于照金失守及原陕甘边区特委组织不健全,几个月的工作一直由四十二师党委代替,恢复特委的组织和工作已刻不容缓。四十二师党委于1934年5月28日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机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张秀山为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上述种种重大决策和行动,都是在刘志丹直接部署和领导下进行的。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参与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各项筹备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7月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与其他同志一起作了两个月的

筹备工作，具体拟定了工农兵代表名额的分配和选举办法，为大会起草了各项决议案以及各委员会和群众组织的条例和简章，其中《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是他亲手起草的。代表大会开始后，他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选举结果，并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他以新当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检阅了部队，受到全体红军、游击队以及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拥戴。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又协助和指导政府贯彻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分配了土地，发行了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实行粮食购销制度，开办牧场，创立了列宁小学，着手扫除文盲，为了培养干部还办起了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可以说是在蒋介石忙于解决“福建事变”和“围剿”中央红军的间隙中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是没有残酷斗争，相反西北军阀为了捣毁根据地、扼杀工农兵政权，对红军和根据地的进攻一直未断，仅1934年对南梁根据地大的“围剿”就有3次：第一次2至4月、第二次5至7月、第三次10至11月。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数倍于陕甘边区的正规红军和游击队。但3次“围剿”都被刘志丹指挥红军，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在粉碎敌人进攻中，刘志丹创造了不少光辉战例，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天才和指挥艺术。在2至4月份的反“围剿”中，他率领红军主力部队从陕西耀县出发，沿子午岭东侧北上，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相机攻打姚曲、石板、五里镇、店头、蔺家砭、崖窑之敌，然后进入甘肃境内，又在元城、赵良子、西华池进行战斗，取得了九战九捷的光辉战绩。特别是4月2日西华池战斗，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还创造了四十二师歼敌的新纪录。西华池是一个东西两面临沟、南北狭长的小城镇。战前刘志丹先牵着骄横的敌人兜圈子，待敌人精力疲

危、士气已懈之后，红军突然进入西华池，敌人求战心切也随即跟进；刘志丹乃乘敌人未站住脚，抓住战机，指挥红军杀出“回马枪”。结果敌人还未及展开，便被旋风般冲上来的红军压入沟底，马踏人踩，鬼哭狼嚎，乱作一团，不是一小时便结束了战斗，全歼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直属机枪连共300余人，缴获八二炮两门，炮弹数十箱，步枪、短枪500余支，骡马50余匹；红军只有4人牺牲。

由于刘志丹坚决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疯狂报复。敌人除了对南梁地区烧杀抢掠之外，把复仇的凶焰集中在刘志丹及其家属身上，1934年2月军阀土匪谭世麟“围剿”南梁期间，带兵到保安县抄刘志丹的家。幸得乡亲报讯，家属提前逃出，谭匪抓不住刘志丹的家属竟将他的一位同族弟弟和妹夫拉去杀了，还烧了他家的房，抢掠毁坏了一切东西，挖了他家祖坟，焚骨扬灰！刘志丹的父母、妻女及全家人分散躲进深山老林里，后来习仲勋得知，才派人把他们接到南梁。刘志丹是位感情丰富的血性男儿，他对自己父母、亲人怀着深沉的爱，但为了革命，他早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当见到亲人，得悉抄家掘坟的事后，他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

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与牺牲后，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了发展，陕甘边区的红军得到了壮大。到1934年“十月革命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已达2.3万多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500余人，发展到5个团1千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合计近3000人。同样，也就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刘志丹作为陕

甘红军的天然指挥员和这一地区群众领袖的地位，自然形成了。

(五)

陕甘边和陕北，由于敌人的分割，一直存在着两块根据地、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在发展和斗争中，两地之间虽互有帮助，但各自活动。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刘志丹、谢子长对于两地的统一问题，早在1934年8月初国家社子联席会议期间已有考虑。在这次会议上已决定由谢子长任四十二师政委，陕甘边派四十二师主力团第三团随谢子长赴陕北反“围剿”，并拨出100多支枪和一批经费支援陕北雷击队。不久，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1934年12月底，刘志丹即亲率四十二师第二团、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赴安定；1935年1月，到水晶沟、柳沟和灯盏湾等地，多次探望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正式商定了意见。2月5日，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岭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正式完成了两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2月21日谢子长逝世，领导陕甘人民、指挥陕甘红军的重任便全落在了刘志丹的肩上。

敌人对陕甘的第一次“围剿”失败以后，不仅地方军西惶惶不安，就连蒋介石也坐不住了。他亲自飞抵太原和西安，联合陕甘宁晋4省军阀，动用5个师20个团4万余人的兵力，采用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开始了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还设置神府、米佳吴、三洋耀、安靖靖、南梁等5个“围剿”区，分别担任钳制、缓冲、监视、战略中心、进攻重点的任务，并派以亲信毛炳文为头子的参谋团驻绥德督战。其具体部署是北面为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5个团由北而南，对神木、府谷、佳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等县“清剿”，东面的晋军七十一师陈兵黄河东岸，其二〇六旅于1935年4月西渡黄

河，占据了吴堡、绥德一线，南面是敌四十二师两个团由南向北，“清剿”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地区；西面是马鸿宾的三十五师7个团，“清剿”甘肃的合水、华池、庆阳地区；刚从河南调来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负责“清剿”绥德、清涧、安定、延长、延川、延安等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区。此时，根据地武装虽有迅速发展，但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还不足4000人，游击队也只有3000多人，因此敌情是相当严重的。刘志丹根据周家峪会议精神，亲自拟定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动员令》，并于2月18日以西北军委的名义发布全军。他在《动员令》中科学地分析了形势，着重说明：敌人此次“围剿”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间矛盾重重，行动不一，弱点很多。根据各个军阀的态度和兵力部署情况，《动员令》决定置胡、马、杨于不顾，集中兵力打击高桂滋与井岳秀。鉴于井虽为弱敌，但如先攻井，高必来援助；高虽为强敌，但攻高，井不会对他援助，故决定首先消灭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将陕甘边与陕北联成一片。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动员令》还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具体兵力部署是：红四十二师主力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机动作战；四十二师第一团进到耀县柳林地区，监视钳制胡宗南第六十一师，同时开展三淳耀宜地区的游击战争；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完成阻击马鸿宾三十五师任务后进到顺宁开辟定边环县新区，骑兵团进至黑水寺地区相机东进开辟宜川新区；四十二师主力转移外线后，地方游击队坚持南线内线斗争，陕甘边区后方机关转移到洛河川，神府独立团在原地坚持斗争。《动员令》还对建立供应、补给、修械和医院等方面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决定在清涧和下寺湾两地建立军委办事处，负责战争勤务。《动员

令》展示了刘志丹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战争的精深造诣，这是他多年来实践的结晶。他所提出的这套反“围剿”部署，不仅把军事上集中兵力与政治上利用矛盾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且把粉碎敌人“围剿”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为战争的胜利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反“围剿”正式开始后，红二十七军主动东进，首先在安定地区连败敌人，掩护了主力部队集结。4月22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义勇军在横山寺凡畔首战告捷，歼灭并俘虏一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举行了万人联欢祝捷大会。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纷纷赶来，都想看一看刘志丹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鼓励大家说：“现在这些胜利仅仅是开始，就象大家常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哩’！”他还特别强调，两支红军会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互相学习，搞好团结，齐心协力，在党的领导下，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更新的局面。会后，刘志丹即率部转移至魏家岔、蜜蜂峪一带隐蔽，准备攻打杨家院子。他慎重出战，亲临前线侦察地形，发现守敌城垣加高，又果断改修计划。结果于5月7日至9日，三天内分别在吴家寨和马家坪两战皆捷，消灭敌八十四师两个营又1个连，毙敌近百，生俘千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红军得到了壮大，加强了装备。这一仗打痛了高桂滋，迫使驻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水坪镇之敌撤回瓦窑堡。10日解放安定，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5月10日，西北工委召开王家湾子会议，刘志丹作了关于军事形势和作战任务的报告。会议决定主力红军挥师南下转入外线，在运动中歼敌，争取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为打延长县城，刘志丹先给敌人制造红军要攻打绥德、榆林的假象，然后急行军隐蔽延长城下，再设计诱敌出城。30日一举解放延长，全歼守敌400余人，吓得附近甘谷驿民团自动投诚，延川守

敌弃城而逃，延川不战而获解放。随后，6月中旬又攻克安塞县城，歼敌200人，生俘新旧两任县长，解放了安塞全境；下旬，刘志丹又率胜辉师北上，攻克靖边县城，吓退保安守敌。接着，乘敌撤退之际，又东向至清涧，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在老君庙高家峪歼高部1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至此，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总计缴获长枪2000支，轻重机枪2000余挺，俘敌20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联成了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根据地范围北起长城脚下，南至淳化、耀县，西接庆环，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共约6万平方公里。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达4000多人。

第二次反“围剿”不仅表现了刘志丹在战术上灵活机动，还显示了他远大的战略眼光。他主张向南发展而否定了红军北上与神府苏区联通的不正确意见，结果连破6座县城，使陕北与陕甘边区相连，从而为以后的陕甘宁边区划出了雏型，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奠定了基础。在胜利面前，刘志丹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冷静、政治头脑。他把胜利的原因归结为西北工委和军委会的统一领导，归结为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而且强调，“最重要的是学习和运用了中央红军和其他兄弟地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在胜利面前，他否定了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提出的“全线出击”攻取大城市，把陕北与陕南以及川、甘、青、新等省连接起来，与敌作“伟大的阶级决斗”的指示。他指出，这种主张“不过是寡妇梦见男人，空想，不实际，别无其他新黄色。”

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8月间发动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

令部”，亲任总司令。除纠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部队外，还增调东北军及嫡系三十七军毛炳文部进入陕甘，共约10万之众，超过红军和游击队10倍。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但敌各路动作不一，完成部署兵力展开时间有先有后等实际情况，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机，主动出击，先法制人。8月下旬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首先打垮了刚渡河的阎锡山两个旅，迫其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之敌。

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转战到达陕北。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他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两军会合的动员，要求大家有好饭要给老大哥吃，有好房要让老大哥住，打仗要主动配合，战利品要主动相让，一切都要照顾大局。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17日，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并将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刘志丹被排斥在新成立的省委和军委之外，任命为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无端指责他“右倾机会主义”。为了顾全大局，他不为个人进行任何表白和中辩，一如既往地工作，与徐海东等其他军团领导人共同制定作战计划，并前指指挥，于10月2日取得了著名的劳山战役的重大胜利。在劳山战斗中，他同以往一样，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哪里吃紧就出现在哪里。正当八十一师被东、西两山头上敌人的火力压在川道里，造成重大伤亡的时候，他来到师长贺晋年身边，并让七十八师师长杨森亲带一个排前来支援。侦察后他把贺晋年、杨森叫到一起商量决定，七十八师由西山向下打，八十一师从侧面进攻敌阵地，务必把敌人消灭在延安、甘泉之间，保证了整个战役的全胜。是役消灭东北军一个师，师长何立中被打死，3700多人就

俘，拔除了瓦窑堡周围原安定县政人全部据点。

正当反“围剿”斗争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在陕北恶性发展，开始了“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肃反”运动的主持者采取欺骗手段，把刘志丹从前线调回。当他行至安塞县真武洞，恰遇送信的通讯员，原来通讯员送的正是逮捕他和其他人员的密令。为了不使党分裂、红军分裂，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径往瓦窑堡，打算说服错误路线的执行人。但一到那里即被投入监狱，后来他的妻子同桂荣带着5岁的女儿也被打入劳改队。刘志丹在狱中，面对死亡，始终泰然处之，坚贞不屈。他对狱中的同伴们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乌云总归遮不住太阳。”表现了对党的极大忠贞和信赖。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刘志丹于11月获释。毛泽东与周恩来接见了。他见周恩来时第一句话就是：“周副主席，我是黄埔4期的，你的学生。”当毛泽东、周恩来安慰他时，他没有一句怨言，立即代表被释放人员对党中央表示感谢，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后来，他还多次向受冤的同志做工作，让大家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他以身作则，敬重中央领导，继续忘我地工作。天冷了他看见毛泽东还没穿棉鞋，就让爱人给毛泽东赶做棉窝窝。

党中央到陕北后，刘志丹先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1936年2月上旬奉命率二十八军出师东征，沿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红军回来了，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他的宿营地经常挤满慰问的群众。一次在神木县境内，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拄着拐杖老远赶来看望“老刘”，人们问他你双目失明怎能看见老刘？她表示看不见也要摸一摸。刘志丹站到老人面前，老人把他从上到下摸个遍，激动得泪流满

面，不住的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老百姓的好人哪！”刘志丹过黄河后，接连取得胜利，4月14日在指挥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他由于过度疲劳，眼里充满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却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当他得知一团攻击不顺利时，立即让宋任穷政委留指挥所，自己亲临一团指挥战斗。当日午后，正当他在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及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告诉身边的同志：“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说完即停止了呼吸！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34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人民军队的卓越将领和无产阶级军事家。他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地位、不图享受，公而忘私，公而忘家，他时刻将自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他爱护战士、热爱人民，经常与战士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是当之无愧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红军模范”、“共产党员的模范”。

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1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修建志丹陵；1943年5月2日延安各界1万多人举行了刘志丹公祭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致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的所有党、政、军领导人都为志丹陵题词盛赞他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周恩来的题词是：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凤阁 陶兴范）

谢 子 长

(1896.1—1935.2)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枣树坪人。

子长小时在家放羊，14岁起读冬学，17岁转入县城小学读书，23岁考入西安省立一中，次年转入陕北榆林中学。因受“五四”运动影响，产生“教育救国”思想，未及毕业即回乡创办小学。实践证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他又于1921年夏赴山西太原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毕业。为反对陕西军阀势力，于1925年赴北平联络陕西旅京军界、学界人士。不久结识了魏野畴等陕西籍的早期共产党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年在北平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受党的派遣，他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取得联系，在家乡安定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组织了安定县民团，自任团总。嗣后，通过友人、共产党员李象久的关系将民团编为石谦（井岳秀的部下，原为团长，后部队扩大为一个旅）的第十二连，任连长，李亦任石谦的连长。谢子长在任团总和连长期间，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和条件，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还在安定县亲自领导建立了14个区的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在此基础上主持召开了全县农协代表大会，制定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细则》以及《农民协会章程》，还组织了县工会、学联。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后，向土豪劣绅开展了算帐斗争，拘禁并审判了全县最大的恶霸地主，撵走了

高利贷者，焚毁了帐簿，宣布农民所欠债务作废，还禁止军队拉差，不准官府放赌，提倡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一时间在安定县封建势力威风扫地，广大农民扬眉吐气。谢子长被农民称为“谢青天”。

谢子长还特别注重在士兵中开展革命运动，上级党组织也十分注意争取掌握这支军队。1925年冬至1926年春，中共绥德地委先后派李瑞阳、杜振廷等共产党员到石炭协助谢子长。李象久工作，在石炭建立了中共特支，后改为军支，直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谢任军支委员。至1927年，军支下又有好几个营建立了党的组织，有100多名官兵加入了共产党，石炭本人也倾向于革命。这就为后来的“清涧起义”创造了条件。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逐步笼罩陕西各地。8月间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到清涧，指示谢子长、李象久继续留在石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作好武装反抗军阀的准备，并留唐澍、白乐亭同谢、李一起工作。8月下旬，井岳秀暗杀了石炭，并令李象久营开赴延安，令谢子长连从安定开到宜川，企图分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谢子长与李象久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统一领导起义的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谢子长与李象久、白乐亭任军委委员。在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下，10月12日晚爆发了中共在陕西领导的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起义部队撤离清涧，南下宜川。谢子长率领十二连途经延长县城时，歼灭驻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20日，清涧、延川的起义部队迅速赶往宜川，与宜川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李象久任旅长，谢子长任营长。会师后由于军事指挥上犹豫不决，起义部队未及时转移，遭到强敌围攻，谢子长带领一部分人马冲出重围，转战到韩城，并按照省委指示，重组军委，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由唐澍、谢

子長分任正、副指揮。游擊支隊在韓城近月，后又轉回宜川、安塞、保安一帶開展游擊活動；至1928年1月，部隊被打散，起義失敗。

“清澗起義”失敗後，謝子長奉中共陝西省委命令又到洛南三要司許叔中旅工作，任營特派員兼副營長，參加了著名的“渭華起義”。起義部隊組成“西北工農革命軍”並成立軍委，他任軍委委員兼第三大隊隊長，率部英勇作戰。6月初的一個夜晚，陝東赤衛軍同敵渭南縣保安團在該縣的塔山腳下發生激戰，謝子長率部增援，大敗保安團；起義部隊遭受敵人三次大舉“圍剿”，終因眾寡懸殊，被迫搬進南山。撤退時，謝子長奉命防守，他率部奮勇阻擊敵人。起義失敗後，他離開部隊回到省委，又接受了新的任務。

這時，中共陝西省委又決定派謝子長與劉志丹同到陝北去開展“軍運”工作。劉志丹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謝子長任委員。1929年初，陝北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利用陝甘寧各地軍閥擴充實力的機會，動員黨團員和革命青年打入軍閥部隊，爭取士兵群眾，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作上層工作，爭取掌握兵權，準備起義。會後，謝子長曾到宜川鳳凰山作爭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隊工作，同年秋與劉志丹共同在寧夏蘇雨生部進行兵運活動。蘇曾任命謝子長為其第十旅旅長，劉志丹為第九旅十六團團長。他們利用公開身份，派遣大批黨、團員和青年學生進入蘇部，還在其下屬的第八旅王子元部組成拳兵隊，為以後的“靖遠兵變”、“西華池起義”埋下了種子。1930年上半年，蘇雨生投靠楊虎城，離開寧夏移防陝西彬縣一帶，謝子長與劉志丹又先後到甘肅慶陽的小軍閥譚世鵬的陝東民團軍中挂名建軍。謝子長取得譚世鵬民團軍“直轄三團”的番号，駐在慶陽北部的三道川（今屬陝西省吳旗縣），劉志丹為其一營營長；謝子長又派人從宜川把周維琦的人馬招來，編為第三營。不意周維琦被土匪張廷芝收買，

被张敬了械，然后张廷芝又突然袭击谢子长的团部和第一营，使谢子长和刘志丹在陕甘宁边界的兵运工作遭受失败。

谢子长在三道川脱险之后回到陕北，不久奉命调赴上海特科受训，1931年春结业回陕北家乡，从事地下活动，白天隐蔽在山里，夜晚回村开展工作。在此期间，他曾派人到黄河岸边，做争取师储杰等商販保运武装的工作；同年8月亲赴山西了解晋西游击队的情况，因晋西游击队已转移未遇，旋经汾阳绕道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工作。省委即派他到甘肃平凉了解党在陈珪璋部的兵运情况。他在平凉20来天，听取了党在陈珪璋部地下组织的情况汇报，指示共产党员要到士兵群众中去，加强抗日宣传。他说，共产党员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群众，帮助群众，说服和提高群众；要帮助士兵识字、写信、操练，注意抓改善士兵生活待遇的斗争，以此取得士兵的拥护和信赖。一次一位国民党要员在平凉召集军民大会讲话，谢子长化装成商人，衣兜里装着花生、瓜子，一边嗑瓜子一边在全场溜达。张秀山等地下党员发现后都大为吃惊，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若无其事地边听“讲话”，边观察周围人的动向和反映。这实际是在开展社会调查活动。

晋西游击队联合师储杰、杨琪、杨鼎等几股商販保运队，于1931年10月下旬在甘肃庆阳县的南梁、林锦庙（今属华池县），合水的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1月下旬，谢子长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由平凉到庆阳南梁，与刘志丹共同领导会师后的部队。因这年前季刘志丹在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时，曾持有该部十一旅的番号，此时为解决队伍冬装、粮饷等困难，经与陈珪璋谈判，即将会师的部队仍暂编为陈部十一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驻防甘肃庆阳新堡（今华池县境内）一带。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陕西省委于12月中旬派人来到新堡，指示部队脱离陈珪璋南下。谢子长即主持会议，决定

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月底脱离陈部，沿子午岭东侧南下，1932年元月初到达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反帝同盟军党委，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柴子卿等为委员。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部队断绝吃穿无着，为求生息机会，谢子长曾试图与杨虎城谈判，结果杨要以同盟军向他缴械为条件，于是谢子长只好放弃这个计划。也就在这种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同盟军内部发生了“三嘉原事件”，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于1932年2月12日在三嘉原细嘴子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还设有党支部。这次改编，是一次转折性的变化，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公开了这支游击队的性质和国目。

陕甘游击队一成立，谢子长就指挥这支队伍初试锋芒，奇袭陕西旬邑县城职田镇，设伏阳坡头，大获全胜。然后率领游击队在陕西旬邑、宜君、耀县转战一个多月，打了不少胜仗。又曾两次攻打甘肃正宁县城——山河镇，震动了陕甘大小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游击战争一开始，谢子长就十分注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游击根据地。当得知正宁县南原农民为抗粮抗款而自发组织起民团的消息后，他便带领游击队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用20来天时间，在正宁县寺村原发动农民成立农会，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团改建为赤卫军，斗争并处决了豪绅地主，分配了他们的粮食、财产，尤其在寺村原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在陕甘边界开辟根据地和建立工农政权最早的一次尝试。

正当谢子长领导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指

责谢子长和游击队其他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的错误，谢子长被撤职。他以大局为重，一无怨言地接受了新的任务——赴甘肃靖远王子元部队开展“兵运”活动。王子元陕北定边人，1929年底和石子俊、谷连防等带队伍到宁夏平罗镇投靠苏雨生，1930年脱离苏雨生为甘肃的雷平田所收编，1931年投靠陕军孙蔚如，时任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驻靖远一带。还在宁夏时，该部就是党开展兵运工作的重点。王子元和石子俊原在一起，党在两部的统一地下组织称“军委”，后两部分裂（石子俊此时驻陇东），党在两部又分别组成“团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特委也过问这里的工作）。王子元旅各营、连都有党的活动，各级军官中不少是中共党员。4月下旬，谢子长化名张友三，与焦唯炽一起，沿西（安）兰（州）公路到达靖远，与党的地下负责人张东蛟（时任副旅长）取得联系，召集了“团委”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陕西省委决定该部马上发动兵变的指示，并讲述了在该部发动起义的重要意义，与“团委”成员共同讨论起义时间和行动方案。正在策划准备阶段，不意事发，5月5日晚王子元扣押了张东蛟和王汝林（共产党员、二团一营营长），6日晨，谢子长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当晚必须举事。他要求把能带出的部队全部带出打游击。6日晚由吕振华、张秀山分别带出五连和一连共200多人，到打拉油正式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委。因联系失误，雷、焦此时未能随部队同行，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这支起义队伍，后来在甘肃定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孤军苦战一个多月而失败。谢子长与焦唯炽在5月8日晚因向导迷路未能追上起义部队，只得由靖远去了兰州；张东蛟、王汝林由党组织营救也来到兰州。恰在此时，王子元派其机枪连连长杜洪范（杜斌丞之子，时为党外进步青年）带人去兰州领取枪支、子弹、服装；谢子长便

与张东蛟、王汝林商量，并征得杜洪范同意，利用这个机会，于5月25日在兰州组织了第二次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70多人，携带大批枪支、服装，由兰州登筏顺流而下，行至河口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八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斌任政委。整编后，一边打游击，一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一时不少回、汉农民前来参加游击队，在靖远、海原一带坚持战斗到7月中旬而失败，优秀共产党员张东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第二次起义后，谢子长回陕西省委，行至隆德遇见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堂等党团员，他又亲自写信介绍他们到院东驻军石子俊的十一旅，找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让在院东再次发动兵变。在他的指导与陕甘游击队的支持配合下，7月份高鹏飞、李树林等在合水县的西华池发动起又一举成功。

由谢子长直接组织领导的两次靖远兵暴（谢走后，是年冬孙作宾、王汝林等又发动过第三次起义）和在杨指导下发动的西华池起义，沉重打击了王子元、石子俊两股军阀势力，震惊了陕甘两省国民党反动派，有力地支援了陕甘边界的革命游击战争。

4月下旬谢子长离开陕甘游击队后，游击队总指挥部曾一度被撤销，设三、五两个支队。5月中旬敌人开始围剿，才又恢复总指挥部，由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他们都曾指挥游击队打过很多漂亮仗。特别是刘志丹在5月份的反“围剿”中，率领游击队转战于富县、洛川、中部（黄陵）、宜君等地，半个月内经3战，八胜一负，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但由于陕西省委“左”倾路线的领导和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省委特派员在游击队中干扰，所以游击队终未能得到发展。于1932年8月底，谢子长又被派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9月20日，敌人分三路再次前来“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照金地区，情况十分严重。子长与志丹互相协商，紧密配合，采取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战术，接连在照金镇北山等地打了两个胜仗，

粉碎了富（平）、铜（川）、照（县）三县民团及何高仗部的“围剿”。但由于部队多次受强敌围攻，得不到休整，消耗过大，不得不北上。9月下旬两次袭击保安失利，部队只得潜入豹子川、平定川一带山林里。天气渐渐寒冷，缺吃少穿，遇到了严重困难。在此情况下，谢子长毫不悲观。他和刘志丹以及队委会的同志开会，决定化整为零，分三路游击，度过难关。其他指挥员率队伍出外打游击走后，他与吴岱峰留守平定川，照顾伤病员和少先队的孩子们。他对伤员和少先队员亲如兄弟，白天带他们操练、砍柴、晒太阳，和他们一起放哨、出山找粮，亲自给伤员擦洗伤口；晚上把地面烧热，和大家挤在一起睡。他给大家讲故事，教育大家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失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二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就这样，他和战士们在严寒的森林里度过了一个多月。

1932年12月，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再次来到陕甘游击队。12月22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及战士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编为二十六军第二团。同时决定开除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的队籍，还给谢子长留党察看3个月处分（后经中央查明处分取消）。在全队干部、战士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勉强同意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了下来，谢子长、阎红彦终被送往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受训”期间，被派往北方工作，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先是让他到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协助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他到北平，又被任命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兼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于1934年1月22日回到陕北安定。当时陕北游击队正处于困难时期，谢子长找到地下党组织，首先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他带领游击队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等作战方式，连打了几次胜仗，壮大了斗争声势，又相继成立了陕北游击

队第四、五支队。6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使各游击区连成一片。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杨道岸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17日他率领一、二、五支队一举袭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后来，陕北军阀井岳秀都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向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苏区发动“围剿”。为了粉碎这次“围剿”，谢子长率部于7月23日到达陕甘边区南梁闻洼子（今华池县境内），28日参加了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为使两支红军更好地协同作战，扩大苏区，会上决定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并派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的“围剿”。闻家洼子联席会后，谢子长即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赶回安定，开展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在他直接指挥下，接连取得了安定县景武家塌、绥德张家疙台等数次战斗的胜利，士气大振。不意在8月26日攻打清涧河口的战斗中，谢子长负伤。当鲜血从他的胸前流出时，他还命令身边的警卫员不要管他，快去抢救别的伤员，他自己用衣襟把伤口掩盖住继续指挥战斗。这次战斗后，他仍带伤回师北上，继续指挥了攻打安定董家寺和安定城的战斗，消灭了安定民团，领导了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的组建，并亲自主持了授旗仪式。

由于他坚持战斗，得不到休息，也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到1934年10月底，伤势加重，实在支持不住，他才不得不离队到枣树坪附近的杨道岸养伤。在养伤期间，他还时刻惦记着陕北的反

“围剿”斗争，情念着陕北的老百姓，他抱恨地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当得悉老战友刘志丹直接带队伍到了陕北，他高兴地说：“志丹来了就好了！”刘志丹几次去看望他，两人共同商议决策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两支红军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彻底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原则问题。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怀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丢下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在他的家乡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只有39岁。

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是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陕北人民热爱的领袖。他逝世后，党和人民给予很高评价。1935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称子长县，以示永久纪念。1939年毛泽东两次为谢子长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自为子长墓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他重新修建了陵园，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彭真及西北局领导人都为他题词，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军队和人民群众永远学习他、纪念他。

（刘凤阁 王来才）

王泰吉^①

(1906——1934)

王泰吉，字升祥，陕西省乾县北田镇尖角村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知名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一直在政界、军界和教育界任职。王泰吉6岁随父至陕西省城西安，入西安东学院同志小学，毕业后转入一家私塾学习。在此期间，“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了西安古城，王泰吉也受到深刻影响。他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头脑里开始萌发了科学、民主和革命的种子。

1921年，王泰吉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这是一所进步力量比较强的学校。1924年，共产党员魏野畴到省立三中执教，在学生中广泛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王泰吉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接受党的派遣，于1924年6月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入黄埔军校后，他努力钻研军事技术，刻苦攻读革命理论书籍，受到革命的培养，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王泰吉已经确立了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凌云壮志。是年冬，受共产党派遣去开封，到国民党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主办的学兵营任排长。在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的领导下，在连队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1926年受党派遣，泰吉又转入陕军甄寿珩政治部工作，后任该部教导团一营（学兵营）营长。1927年底，王泰吉率领的学兵营，驻防陕西省麟游县。1928年春，在国民党蒋介石、冯玉祥进行反共“清党”活动之时，王泰吉积极响应共产党关于武装起义的号召，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共约300人，起义后打死了恩

^①据王述中、张守臣《王泰吉》（《中国共产党人物传》第一卷）一文增补。

反动的学生队队长张烈，然后在王泰吉率领下趁夜晚离开麟游县城，向东北进发，意在建立陕甘边游击根据地。但因遭受国民党甄寿瓚部镇压，起义宣告失败。

麟游起义失败后，王泰吉回到渭华，参加了由刘志丹、唐澍等领导的渭华起义，任许权中旅改编的西北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后，国民党十分震惊，急调3个师围追堵截。起义武装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月余，因寡不敌众，终遭失败。王泰吉只身离开渭华，与党失去了联系，到河南省南召县。开始暂居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后给一富户打长工掩护，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国民党于1929年逮捕解押南京。身陷囹圄的王泰吉，写下一首咏志诗，表达他坚贞不屈，极端鄙视国民党的刑讯折磨，并要“翻身消灭尔丑类”的革命抱负。由于反动派没有掌握王泰吉任何证据，又审不出任何口供，后经他的父亲转请杨虎城将军具保，他们只得把他放了。杨虎城素知王泰吉骁勇善战，博学多才，所以王泰吉出狱后被留在他的十七师补充二旅任副旅长。1930年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后新兵训练处改为骑兵团，继任骑兵团团长。

1932年秋，王泰吉的骑兵团由西安移驻三原县，整年夏又移驻耀县，进行“剿共”。这时候他虽然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但却遭到一些反动军官的攻讦与排挤，使他处于欲留不愿，欲去不能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王泰吉更加思念已经失掉关系近五年的共产党。当骑兵团移驻耀县以后，王泰吉一次到三原中学找到了他的老同学何寓璣，决心要何为他寻找党的组织。当关系接通后，王泰吉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意图，并在省委领导下经过一番准备，于1933年7月下旬率领骑兵团果断地举行了耀县起义。起义部队的名称叫“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遭到了敌人的残酷镇压，7月30在糖镜把被打散。王泰吉毅然重聚余部百余人，进入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照金根据地。当

他与前来迎接他的陕甘边特委领导人见面时，激动地说：“今天，我们总算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里了！”

王泰吉自投身革命以来，先后参加和领导了麟游、渭华、郿县起义，虽屡遭挫折，倍受险阻，但他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仍然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终于在红二十六军南下蓝田失败，国民党集中大股兵力“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关键时刻，领导和发动了郿县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打击了国民党，推动了共产党的西北革命活动。

郿县起义不久，郿县游击队、渭华游击队相继来到照金。为统一指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陕西省照金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被任命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同年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返回照金后，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参谋长。

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成立，解决了集中统一领导红军的问题，使照金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并引来了敌人对照金苏区的“围剿”。王泰吉率部转入外线作战，于9月21日奇袭国民党旬邑县城张洪镇，打死了团总朱洪璋，缴枪百余支。10月中旬，王泰吉、刘志丹又指挥长途奔袭了国民党合水城，结果大获全胜，消灭守城敌人200多人，缴获步枪100多支。这时照金失守，王泰吉、刘志丹便率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转战于陇东合水、庆阳一带，先后在州里铺、城壕川、毛沟门获胜，打击了当地民团和国民党驻陇东的反动武装，特别是1933年10月下旬在庆阳县毛沟门（今属华池县）一战，红军本来处于劣势，但在危急时刻王泰吉跃起大喊一声“跟我来！”带头从山坡冲向敌人，结果红军反败为胜，以少胜多，把赵文治一个团彻底打垮，击毙100多、俘虏100多，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一仗打出了红军游击队的声威，震慑了敌人，也充分显示了王泰吉的指挥才能和胆

略。

固金失守后，向红军提出了一个在何处建立后方根据地的问题。在陡东所取得的胜利，打开了新局面，使这个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明确了。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又显示了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必要性。为了讨论决定这些重大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原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会后于11月8日，王泰吉在甘肃合水县葫芦河的莲花寺，召开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全体军人大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1934年1月上旬，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队的王泰吉、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返回合水县连家砭。这时，王泰吉向四十二师党委正式提出了一个在他胸中酝酿已久的问题：为了增强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势力，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去说服在那儿率领山东人民武装近万人的刘桂堂举旗抗日。党组织接受了他的请求，同意他辞去四十二师师长职务，改由刘志丹担任这一职务。2月15日，王泰吉改装易服，秘密从师部出发，去完成这一艰巨使命。不幸的是，王泰吉一进入白区，行至淳化县的通镇镇，便被他的“旧友”国民党团总马云从所出卖，将他押解交给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不小的共产党干部，如获至宝。但是王泰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绝不学杜洪（荷）之被擒自首，遭社会之唾骂，及遭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正如他本人的意料，国民党反动派是绝不会放过他的。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国民党西安军法处英勇就义。

王泰吉不但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军人，他还是一位

才华横溢的革命诗人。他时常用诗歌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政治抱负和激情，因此他的诗都有真情实感，是枪战斗的武器。这些诗已收入《烈士王泰吉革命文献》，成为烈士留给后人学习的重要遗产。

（赵晓红）

李 青 山

(1900——1954.5)

李青山，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因家穷生计渺茫，14岁起就出外学艺，以做铁活苦度日月。

1920年，河南孟津闹灾荒，加之酷吏横征暴敛，青山不堪忍受，只身一人背袋离乡，千里迢迢逃荒到甘肃庆阳南梁（今属华池县）一带。当时，这里会做铁活的人很少，农户居住又非常分散，于是他便挑起工具箱，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给当地农民打制农具，为猎户修枪做“炮”。南梁一带的老百姓习惯地叫他“李炮匠”。

青山性情耿直，为人厚道。有些穷人请他打制农具或修猎枪，一时手头不便，工钱可分文不收，在穷人中颇很有威信。几年后，他略有积蓄，在几个穷弟兄的帮助下，与南梁九眼泉村贫苦农民的女儿史春秀成了家，在这偏僻的山沟沟安了家。

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店（今林镇）、荔园堡一带活动。刘志丹得知九眼泉村有个善修枪械的“李炮匠”时，便在一个夜晚来找他。志丹详细询问了他的家世，给他讲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富济贫，为穷苦人谋利益、打天下的许多道理。青山早闻志丹和红军游击队的威名，当亲耳聆听了志丹讲的革命道理后，这个苦水里泡大的硬汉子落泪了……

“老刘，我会修枪、会制火药炮，会打铁……”

志丹笑了笑，说：“这些我都知道了。还知道你比我大3岁吧。”

“游击队的枪，以后需要修配，就找我吧，只要你们放心。”

青山说。

“咱们是一家人，怎不放心。青山，你不仅要用自己的手艺为咱红军做事，还要经常多注意观察敌情，为咱们的队伍通报消息，当个秘密联络员。”

听了志丹的这番话，青山异常激动。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在刘志丹的领导下，青山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秘密联络员。

同年夏，他受游击队指示，以给阎洼子赵富奎民团修理枪支为名，打探该民团的情况。他不仅机智地摸清了赵团的活动情况及堡子内的设防，还将一些修制好的枪件转送出去，连同军事情报一起送给了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根据青山送的情报，乘一个雨夜摸进堡子，活捉了赵家15口人，缴获54支枪，拔掉了南梁的这个“钉子”，充实了游击队的装备。

1933年初冬，红军游击队打下了荔园堡，消灭张廷芝的一个新兵营，革命的势力日益扩大。李青山便公开地为红军修理起枪支来。次年夏，红军游击队在陕北吴旗三道川缴获到张廷芝机炮营（兵工厂）的器材，在林镇小河沟创办起了南梁军械修理所，青山是军械所唯一的技术人员。为给红军多修制枪炮，白天干不完，他就利用晚上修。青山这种对革命工作热忱积极的态度，多次受到志丹等红军领导人的赞扬。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迅速发展，极大地震动了陕甘两省的反动军阀。1934年5月，盘踞在陕甘边界的非岳秀、张廷芝、谭世麟等反动势力纠集在一起，发动了对南梁的第一次“围剿”。红军主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术主动从南梁地区撤离。青山奉上级指示，留下来积极组织群众坚壁物资，侦察敌情，给游击队传递消息。

一日，李青山在自家院畔上望见转咀子川台上过来谭世麟部

3个骑兵，他以为是红军回来了，高兴地跑出院子，准备接应。当他走近时，发现3个骑马的人衣冠不整，面带凶相，才知道不是自己人，转身就走。3个人喊了声“站住！”随即向他猛扑过来，把他围在中间搜身。青山与红军联络的信条被搜了出来。他们将李青山五花大绑，拉到南梁的阎洼子村。

匪徒为了从李青山口中掏出红军的去向和坚壁起来的枪弹、物资，他们对青山采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烙等酷刑。青山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一字不吐！

恼羞成怒的匪徒，从李青山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便大发淫威。一天晚上将李青山和其他10多名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拉到阎洼子台地里。那里早已挖好了埋人坑。敌人在深坑前再次逼讯，并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坑去。面对死亡，李青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不仅拒绝回答敌人的任何审问，还用头撞、用脚踢，同敌人作殊死搏斗。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发出一声冷笑道：“这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军，留着他再用刑！”

敌人企图最后从青山口中得到情报，又把他拉回来，软硬兼施，折腾了半个晚上，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面对这个钢铁汉子，匪徒无可奈何，于次日凌晨撤离时，把青山杀害在阎洼子村半山坡上。

李青山牺牲那年34岁。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保住了坚壁的物资枪弹，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情操。如今，他的英名铭刻在高耸的南梁革命纪念碑上，他的英雄事迹已成为革命后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

（王秉才）

梅 生 贵

(1903——1935)

梅生贵，华池县山庄乡算帐沟人，世代代代以农为业。在他幼年时期，祖上留下的土地已全被庆阳大地主“裕茂盛”、“恒义兴”所占有，父亲沦为“恒义兴”的佃户，他本人从20岁开始，也成了“恒义兴”家的挑羊工。一家人长年累月的劳动，辛辛苦苦的干活，仍然摆脱不了饥寒交迫的命运，因为农民的血汗都被地主老财的地租和高利贷榨干了。

民国11年，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父母相继去世。从此，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梅生贵身上。他除了拼死拼活为地主苦干，还要给弟弟妹妹做饭、补衣裳……

梅生贵的阶级地位和实际生活的磨炼，使他养成了一种对旧社会、对地主豪绅强烈不满和强烈不屈的反抗性格，以及行侠仗义的家爽心肠。闲下来时，他常常和本村一些穷弟兄聚在一起，说古道今，模仿古代豪杰义士的样子舞棒弄棍；穷弟兄们之间谁家有难处，他们便互相帮助，共同排解，遇到这种情况，梅生贵总是走在前边。1928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未收，第二年南梁一带饿殍遍野，陕北来人以“说书匠”、“皮货商”的名义，在南梁一带鼓动“吃大户”，闹翻身（后来据说是刘志丹、霍维德在这里宣传革命），这使梅生贵心中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欲望。1933年10月，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在荔园堡歼灭陕西警备骑兵二团张廷芝新兵营，打下了南梁一带9个民团寨子，组建了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就在这时梅生贵怀着翻身求解放的心情，主动报名参加红军。刘志丹、张策分配他和李生华、边金山等人一起做地方工作，他们在山庄的周园子、高湾、小河沟建

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开展打土豪斗争。不久，梅生贵又在二将川组织起了赤卫军大队，他亲自担任大队长。赤卫军中有不少就是他青少年时期要好的穷兄弟，所以斗争积极，团结一心。他们自己制作长矛、大刀、梭标，还自己筹款买了几支步枪，起来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小股土匪，没收土地财产分给受苦农民。

1934年2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四合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在南梁一带还建立起陕甘边5个赤卫军大队，其中二将川一带为第四大队，梅生贵任四大队队长，下辖5个中队，主要负责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监视土豪、捕捉叛探、转送伤病员等工作。期间，为了进一步壮大赤卫军力量，梅生贵率先垂范，首先动员他的两个弟弟梅生奎、梅生荣都参加了赤卫军，为此多次受到刘志丹、习仲勋的表扬。由于梅生贵工作十分出色，而且军事才能提高很快，因此，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张策、蔡子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34年开展的反“围剿”斗争中，梅生贵带领赤卫军陕甘边区特委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打击袭扰索犯之敌，一方面积极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坚壁清野，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也协助党政机关及后方人员得以安全转移。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陕甘边区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这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梅生贵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统管南梁根据地18个赤卫军大队，负责保卫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安全工作。他亲身参加了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时的阅兵大会，受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检阅。

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后，梅生贵与朱子清、郑德明等一起制定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明确规定了赤卫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按照《军律》规定，他们对赤卫军进行严格训练和加

强思想教育，除经常执行任务外，还带领赤卫军帮助老百姓种地、收割庄稼，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送子、送夫参军的积极性更高了，陕甘边区的赤卫军本身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提高，1935年初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这时候梅生贵已经成为南梁根据地地方武装的优秀指挥员。

1935年初，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等省军阀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布置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只留游击队和赤卫军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南梁根据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掩护党政机关转移。国民党宁夏马家部队兵分两路，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向南梁进逼。在大敌当前，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梅生贵和其他游击队、赤卫军负责人一起，采取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组成若干游击小组，在老爷岭的山头上搭起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竖起很多红旗。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游动，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伺机出击袭扰敌人，使之夜晚不得安睡。就这样，迫使敌人在老爷岭以西滞留一月之余。

4月14日，马鸿宾部队抢占老爷岭，进驻二将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委所在地荔园堡、寨子湾失守。敌人还派出500余人的兵力四处追寻陕甘边区政府机关。4月16日，习仲勋带领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登岭被马家军及由合水方面来的100余名便衣队包围。梅生贵奉命阻击，掩护习仲勋等转移。他率领赤卫军用大刀、长矛和土枪土炮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习仲勋带领的机关工作人员得以转移到白沙川；不料在白沙川又遭敌人三面包围，形势更加险恶。在这极端严峻的时刻，梅生贵把生死置之度外，沉着指挥赤卫军抗击强大的国民党正规军。经过激烈战斗，赤卫军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了梅生贵一个人。他占在有利的山头上继续阻击敌人不得进前，使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终于脱离了危险；这时梅生贵不幸右腿中弹负伤，倒在了

地上。当敌人发现山崖上只剩一个人并且只能爬行时，立即从四面冲上来。此时此刻，梅生贵忍着巨大的疼痛，双手端枪，当敌人临近时，他射出了最后的5颗子弹，击倒3个敌人，自己昏倒在地！

敌人抓到梅生贵如获至宝，以为一定可以从他嘴里获得他们要得到的情况。他们张牙舞爪要梅生贵招供。岂知梅生贵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慷慨激昂痛斥敌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这些家伙被骂得无地自容，恼羞成怒，最后将梅生贵杀害在杏树湾，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固国堡城门上示众。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他们还在城门上贴出告示：“敢于劫头者，诛其全家。”赤卫军和乡亲们，为了减少牺牲，只好强忍悲痛与怒火，用木头仿雕一颗英雄的头像，收尸安葬。

梅生贵走完了33个春秋，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位为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而献身的战士。他的尸骨和那颗木雕的头颅早已化为泥土，但他的精神和英雄形象是不朽的！

（赵晓红）

张 静 文

(1906——1935)

张静文，陕西省兰田县人，生于1906年。1932年4月，张静文在西安女师学习，任学生队长，当时戴季陶来西安进行反共卖国活动，党领导西安各校学生掀起了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反动政客的斗争，张静文带领同学积极参加斗争，痛斥国民党极右分子，后被学校开除。

1933年10月，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后，许多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南梁参加革命。1934年春，张静文偕同丈夫徐国连，秘密携带为红军撰写的枪文，离家别子，徒步跋涉，来到南梁。她是一位很有才学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双手挥毫，还擅长绘画。她到南梁后，积极组织宣传队到街头村落演出，向群众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成立（即南梁政府），张静文被选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她在大会上代表妇女同志讲了话，并参加了阅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陕甘边区办起了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张静文和另一名同志担任了教员。学校初创，条件极差，她就自己动手垒土台当凳子，架木板当桌子，自己编教材，还经常给学生缝补浆洗衣服，深受学生和群众的爱戴。

1935年3月，张静文同志的爱人徐国连奉命回西安搞武器，不幸在途中被反动民团杀害。静文悲痛万分，但她化悲痛为力量，以更高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1935年4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南梁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列宁小学被迫停办，静文同志随政府东迁洛河川，继续做妇女工作。

1935年九、十月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根据地内部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许多领导人和党政军干部被投入监狱，有的惨遭杀害，革命受到严重威胁，静文同志也被误定为“奸细”，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之前遇害，时年29岁。

张静文同志是第一个从敌人统治的大城市投奔南梁根据地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和女党员，至今南梁一带的人民群众还怀念她。

（李占年）

杨 琪^①

(1895.12——1936.3)

杨琪，字建亭，陕西省延川县北原村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就给地主放牛，稍大随二哥杨工下地劳动，精通各种农活，人称“务农状元”。杨琪不仅在劳动上是一把好手，而且从小就性格倔强，富有正义感，敢打抱不平，在本村威信很高。

1925年，年仅30岁的杨琪毅然离开母亲和妻子儿女，奔赴河北参加了国民军郑恩斌团王子谋（延川人）的骑兵营，不久转入河南省高桂滋部，被提拔为排长。1926年初，杨琪联络军中的几名陕北士兵，搞到100多支步枪，装在两口棺材里以运死亡官兵为名，由河南经山西运往陕北延川县延水关，准备杀富济贫，武装反抗陕北军阀井岳秀。可是途中被阎锡山发觉，告诉了井岳秀，井岳秀派兵在延川县南塬家川将枪支弹药劫去。同行多数人牺牲，杨琪负重伤逃出，到清涧县高杰村亲戚家。未等伤口痊愈，他又返回家乡继续活动人员和武器，准备东山再起。不久，遭井岳秀部逮捕，威逼交出枪支。杨琪怒斥匪兵：“老子的枪支全被你们抢去啦！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后经亲友营救出狱。

当年4月出狱后，杨琪到西安入国民三军杨虎城部任排长，参加反对直系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城的斗争。西安城解围后，他回到陕北宜川，利用当时武装护送山西烟客的关系，搞到一些枪支，建立起一支20余人的反抗地主、土豪、军阀的队伍。

1928年，杨琪回到家乡参加“保运武装”，奔走于晋、陕之

^①据李维五、张守宪《杨琪》（《革命英雄》1984年第4期）一文增补。

间，替官僚、富商武装运送鸦片、皮货，以此取得报酬维持生活。保运武装的成员多系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他们一方面受官僚富商的压迫、剥削与利用，另一方面一些人 also 乘机抢劫群众的财物。杨琪对这种状况既不满又无法改变，他热切盼望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党对杨琪的保运武装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冬，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派杨琪的侄儿杨可镜到杨部工作。共产党员杨可镜按陕北特委军委的指示，让保运武装在黄河两岸打游击，消灭反动武装，壮大自己。按照党的指示，杨琪带着队伍在黄河两岸开展小规模游击活动，坚持两年之久。

1931年秋，拓克宽、杨重远率领晋西游击队30余人渡过黄河，来到陕北。10月上旬，杨琪得知消息后，当即联合保运武装的其他领导人杨鼎、杨桐、张福才、肖永胜、贺德胜等人给游击队去信，希望和游击队联合行动，共同反对阎锡山和井岳秀。游击队党组织提出3个条件：一、听从游击队队委领导；二、不抢穷人的东西；三、不强奸妇女。杨琪等表示完全同意在3个条件基础上联合行动。他们与晋西游击队汇合后，先后在安定县的曾盘山、王家湾和保安县（今志丹县）的顺宁川、野鸡岔等地与敌作战，歼敌百余人，缴获枪百余支，使部队发展壮大到300余人。通过与党所领导的这支游击队的接触和联合行动，使杨琪更加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革命的领路人。

1931年10月26日，这支联合后的队伍转移到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不久谢子长也来到南梁。杨琪见到谢子长、刘志丹后兴奋地说：你们二位都是共产党员，我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在苦难中乱闯了半辈子，没闯出什么名堂，现在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前途，今后一切听党的话，努力争取做一名共产党员。子长、志丹对杨琪进行了热情地鼓励，希望共同努力，带好部队，为革命作出贡献。由于杨琪年长，又很谦虚，子长、志丹都以老杨哥相称。从此杨琪便在谢子

长、刘志丹的领导下，参加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1932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从陕甘游击队成立到当年底成立红二十六军这一年时间里，杨琪协助于长、志丹、红彦指挥作战，带领骑兵队冲锋陷阵，先后取得了阳坡头、旬邑县城、马栏、凤凰山、英旺镇、照金等重要战斗的胜利，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打开了游击战争的局面。

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杨琪任骑兵连连长。他协助团长王世泰指挥作战，扩大游击战争，着手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可惜正当革命形势高涨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被敌人的“围剿”吓破了胆，硬逼二团于5月底南下渭华。杨琪率领的骑兵连担任南下渭华的前卫，他巧妙地消灭了长安县霸桥民团40余人，使大部队顺利地进入临潼县的骊山。部队由骊山出发时，杨琪又率部担任后卫掩护，边打边走，进入深山密林，骑兵难以发挥作用。部队从张家坪突围时，杨琪和汪锋率领一部分战士深入秦岭，在敌重兵包围下坚持月余，以野果、野菜充饥，加之盛夏多雨，病员剧增。最后为了躲过敌人搜山，他们不得不分散化装突围。杨琪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只身一人化装成长工，头戴大草帽，肩上扛着锄头，沿途给人干活换些吃的东西，有时无活干就沿门讨饭，忍饥挨饿，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走了1个多月，终于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在1933年11月3日至5日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上，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恢复红四十二师，成立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杨琪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作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他要领导合水、保安、庆阳、安塞等4支游击队。他认真研究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紧密配合四十二师主力部队作战，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6月，他率部出生入死，转战陕甘，参加了几十次的战斗，歼敌数百人，为胜利地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红军的

“围剿”，发展壮大南梁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7月下旬，杨琪出席了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北游击队在阎家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为使两支红军更好地协同作战，扩大苏区，决定红四十二师主力一部去陕北配合游击队和群众粉碎军阀井岳秀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会议选举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杨琪被任命为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谋长。

8月，杨琪受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派遣，和红三团团长王世泰率部去陕北参加反“围剿”斗争。8月15日，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在谢子长的率领下由南梁到达安定县西区。17日，由红三团担任主攻，在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有力配合下，在武家塬一举全歼前来进剿的敌八十六师一个连，缴获长短枪100多支，俘敌七、八十名，鼓舞了军心民心，发展了陕北的大好形势。安定县的8个区，除几个点被敌人占据外，大部分都成了革命根据地。

为适应斗争的需要，陕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35年1月30日在子长县白庙岔将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一、二、三团，杨琪担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新成立的八十四师在杨琪、张达志率领下，在一个月时间内接连在安定县南沟岔和清涧县的高杰村、何家湾打了3次胜仗，消灭了高桂澄部3个连，使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迅速发展至千余人，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十几个县的红色政权先后成立。

在粉碎蒋介石亲自部署的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杨琪坚决支持刘志丹提出的红军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联成一片的主张。5月1日，他和张达志率领红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与刘志丹率领的四十二师第三团和义勇军900余人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杨

琪和张达志也参与了前总的领导工作。这次反“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志丹统一指挥下，历时四个月，转战800里，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3000余，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红军扩大了2000多人，把陕北和陕甘边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杨琪在陕北安定、延川一带本来就很有威望，经过这次反“围剿”斗争，他的名字在群众中更传开了，到处都传说“杨琪骑的白马，打的红旗”。

1935年9月，正当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陕北根据地内发生了错误肃反。杨琪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了起来，他被五花大绑，脚上钉了一副大铁镣，关在瓦窑堡汇川通客栈东房。直到12月初，直罗镇战斗结束后，党中央移驻瓦窑堡后，他才与其他被关押的100多人一起被救出狱。当时杨琪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今后要更好地为党工作。

杨琪出狱后，被任命为三边地委领导的独立营营长，志丹之弟刘志丹被任命为三边地委军事部长。他们一同离开瓦窑堡前往三边地委报到。恰在此时，三边地委遭到敌人破坏，地委书记谢唯俊惨遭杀害。因无法与独立营取得联系，杨琪回到瓦窑堡。正值红二十八军组建，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杨琪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宋任穷指挥下，于1936年2月奉命东征。杨琪率领红三团一路斩关夺隘，浴血奋战；不幸于1936年3月9日，在指挥攻占绥德县份王庙战斗中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41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凤阁）

杨 森

(? ——1936)

杨森，原名杨宗楷，陕西省乾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26年进入陕西省职业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陕西大旱，又逢蒋冯战争之祸，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除饿死者外，大群人四处逃荒谋生，当时跑到西安求吃舍饭的饥民就有数千人。杨森扮作饥民混在中间进行革命活动。晚间他同饥民一块围坐在街头卖饭的锅炉旁，或在城隍庙的房檐下露宿，乘机向饥民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扩大内战的罪行，鼓动和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抗粮抗款抗征兵，以求自救。他还组织领导饥民搞互助合作，向西安的救济社会、粮店及大商号给饥民要来了不少食物和破烂衣服。在这期间，杨森对于教育饥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解决饥民生活，对于宣传革命，团结贫困难民作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工作。

蒋冯混战结果，冯玉祥失败了，杨虎城进入西安，成了陕西的军政统治者。蒋介石对杨素有怀疑，认为杨非他的嫡系，不可靠，尤其认为陕西剿共不力，于是增派了他的几个亲信要员来陕了解发动反共的情况。1930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共特务头子戴季陶来到西安就破口大骂共产党，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谩骂陕西人是蛮夷之人，没有开化等等。戴的无耻谰言激起了学生和饥民的极大愤慨，在西安地下党的发动、领导下，掀起以学生为主力的强烈的反戴斗争，他们向戴扔石头、砖头，烧毁了戴乘坐的汽车。杨森是参加这场斗争的成员之一，在革命斗争中他和西安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1年底党组织派杨森去陕甘边

参加了谢子长和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即改编为陕甘游击队，开始他当战士，时间不长就当连长。1932年12月这支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1933年6月二十六军组建四团，杨森任四团政委，并于1934年1月接任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1936年初成立红二十八军，杨森任副军长兼参谋长。

1932年秋天，陕甘游击队派杨森和张黑（代名）拉两头骡子到敌占区卖，一是探一下敌情，二是把卖骡子钱送给陕西省委作为活动经费。他们刚到泾川县就被当地土豪抓住，说他们是土匪，是抢来的骡子，把他们送到了伪县政府进行审问。县长当即判处他二人死刑，命警察拉出去枪毙！这时杨森从容不迫地说：“县长，你真混蛋！还没问清楚就杀人，我们不是土匪，是红军战士，红军打土豪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和骡子，我们出来把骡子卖了，买些子弹再回到部队去打土匪！”县长说：“啊！你们是共产党！”便命令把他二人押了起来。

杨森和张黑在泾川县坐监时和地方党的秘密组织泾阳县委取得了联系，地方党组织经常派人来看望他们，送些吃食点心，在吃食里有时夹带有文件和信，信中告诉他们：监狱的后墙是土的，很容易挖开跑出来。外面的墙不高，能爬过去。点心盒里装有一把小锤，没有人时他们就磨脚镣，用炉钩子捅墙，把捅下来的土压在铺草底下。为了不让看守人发现，他们还在墙上挂了个单子。地方党组织还告诉他们，街上有警察，一定要化装成给小孩送鬼的模样。于是他们到了半夜，磨开脚镣，逃了出来。然后端着碗，拿着香表、纸，过了街，爬上城墙，顺着烂的破口处滑了下去，就这样脱了险，回到了部队①。

1933年的三、四月间，旬邑县保安团的一个连，在去三原途经淳化县十里滩时，被红二团包围在一个皮场上，场边有不高的

①西安青山同志回忆。

围墙，敌据以顽抗。当时我方的武器多是老的破烂步枪和梭标，没有敌人的火力强，战斗持续一小时多，不能消灭敌人。杨森十分着急，把上衣一脱，拿上手榴弹和马刀，率领七八个战士趁暗冲入敌指挥所，他胸部负了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杀死4个敌人。敌连长仓惶跳入一丈多深的沟内，杨森也随同跳下，和敌连长进行白刃肉搏，打死了这个匪首，缴了一把短枪，就这样迅速消灭了全部敌人，获步枪一百多支。

杨森胸部的弹片未能取出，用担架抬着行动。结束战斗只隔两天多，驻甘肃省平凉的敌军阳讯回兵，治成章带了骑兵一旅赶来追剿，我军星夜兼程奔赴正宁县的耿头。拂晓时正在吃饭，敌迫至，我军急向东山转移，敌分路堵截我军退路，在这紧急关头，受伤躺在担架上的杨森同志一跃而起，跳下担架，又把上衣脱去，喊住骑兵团一连：“不要跑，随我来！压住五顷堰堰坝！”他沉着机智，指挥得当，阻击敌人，掩护大军撤退，使我军在这紧急情况下未受多大损失，顺利地转移了阵地。

1933年10月合水战斗后，红四团北上，在庆阳一带游击。一天上午，在城壕川道里行军，杨森政委带一连一班作尖兵，他们快到川口时，突然发现四五百敌人，正在城壕川的阳岔台上吃午饭。杨森考虑到，我们一班只有12人，但都是骑兵，敌人虽有四五百人，却都是步兵，且毫无防备，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便果断命令一班长宋飞率领战士向敌群猛冲，12名骑兵战士如弓箭离弦，向敌群边射击边冲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立即四散逃命。骑兵一直追杀二、三里路，敌人发现追兵只有10余人，便组织反攻，一时一班战士被压回来。正在这时，红军后续部队从川道里赶到，合兵一处，再反冲过去，敌人大败而逃。这次战斗俘敌10余名，缴获一匹栗色大马。战后才知，这股敌人是谭世麟亲率的庆阳民团军，出来配合正规军“围剿”红军的。所获的那匹栗色大马，正是谭世麟本人的坐骑。

城壕川战斗后，红四团骑兵又奔袭了葛园堡，打开葛园堡土寨子，解决了张廷芝“招兵营”的20多人，处决了招兵营副营长梁哲栋。

1934年冬，敌人对陕甘边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为了打乱敌人部署，杨森决定搞一次突然袭击。他带领骑兵团（当时骑兵团只有两个连，人马不足二百）由富县子午岭下，夜行约二百里奔袭长武县城之敌。拂晓时到了长武附近，把大批人马隐蔽在一个小胡同里。杨森亲自领8个战斗突击手，埋伏在长武城壕里，等到城门一开，就勇猛地冲了进去，未打一枪就让城楼上一排人缴了械。敌保安队虽作了抵抗，仍归失败。红军没费多大气力，就把敌人几乎全部消灭，只有敌县长因上了炮楼，有少数武装保护，再加不允许长时间在那里停留，未能俘获。袭击完毕，我军向泾川、董志塬一带退去，途中打了4个土豪，当天深夜赶回苏区。这次战斗局面虽不大，只消灭敌保安队百余人，获步枪60余支，但震慑了在苏区新宁、新正、赤水等地据点进行清剿的敌人，他们纷纷退窜，龟缩其老巢。

由于杨师长经常率领骑兵团于子午岭地区冲杀，扫除顽敌，英勇作战，打击消灭了大量敌军和土豪劣绅，因此，周围敌军团队，一听到杨森领导的骑兵团，就胆颤心惊。

1935年8月间，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北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杨森仍是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的师长。这年8月间，进到陕北红军的张学良东北军何立中师，在开向延安途中于甘泉县的劳山被我军截击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敌军大部被红军消灭了，而何立中带了一部分人固守在一个山岭上不投降。杨森即脱下上衣，手提轻机枪，率领士兵，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前赴后继冲向敌指挥所，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使这次战斗以消灭敌两个团和师部四千多人的辉煌战果得以全胜。

1935年10月，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

迅速制止了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苏区“肃反”运动，把关押在狱中的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军政干部释放出来。杨森也同时得到解放。陕甘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喜庆若狂，乌云被扫除了，革命有希望了。党中央派刘志丹、杨森等同志把活动在各地的游击部队整编起来，成立了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杨森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杨森同志协同刘志丹为中国革命继续奋斗。

1936年初，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刘志丹、杨森也是参加者。东渡黄河后，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同志不幸壮烈牺牲。遂后二十八军就由宋任穷、杨森等同志率领继续前进。

在完成东征任务返回陕北途中，中央决定二十八军作后卫部队，阻击优势敌人的追击，掩护带领红军主力的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因敌大力追赶，二十八军将要渡河时，黄河上的渡口被敌人占领，红军被包围。在这非常严重的形势下，杨森同志镇定沉着，毫不畏惧。他又一次脱掉上衣，站在队伍前面对战士说：“我们要有勇气，一定要把敌人打垮！”他号召同志们和他一起，反复冲杀了3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不少战士伤亡，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杨森同志指挥的二十八军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使大部主力红军胜利地渡河回到苏区。杨森同志为党、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前后负伤7次，在他牺牲时脑部的子弹还未取出。

杨森在他的革命历程中，在各种不同的对敌斗争中，时时处处是带头人。他有崇高的品质，刚直不阿，坦率直爽，平易近人，与战士亲如兄弟。他经常与战士、群众同吃同住。在敌追剿紧急时，夜晚宿在山林中，和战士背靠背的过夜。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常常冲杀在前退却在后，对自己的安危毫不顾及。他艰苦朴素，无私无畏，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不辞辛苦，从未另吃好饭，另

穿好衣，处处和普通士兵一个模样，自己打草喂马，和战士一样轮流做饭，在情况紧急时，亲身带战士放哨查岗。他革命精神坚强，每到一处未曾休息，首先查看地形、哨所，召集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教育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动员扩展红军打游击。

杨森同志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他终生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崇高品质。他是红军指战员的楷模，是陕北革命中一个负有众望的领导者，他对陕甘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曹向阁）

惠 子 俊

(1911——1944)

惠子俊，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一个产业工人家庭，在西安兵工厂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秋天，在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终南山遭到惨重失败的情况下，惠子俊带领西安兵工厂的10余名工人，毅然来到照金根据地参加了红军。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很快在照金创办了红军修械所。这年10月间，他随军转移陇东，参加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34年2月，惠子俊接替习仲勋任庆阳游击队政委，为创建陕北根据地（今华池县柔远、乔河、五蛟、悦乐、城壕等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又接替张秀山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1935年2月，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今陕北子长县境内）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为加强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被推举担任了西北工委书记的重要领导职务。

1935年7月，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打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招牌，给惠子俊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他的西北工委书记职务，派往米脂西区任区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果断纠正了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惠子俊为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1937年，惠子俊回到西安，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后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党中央调他回延安工作。1943年，他担任了绥德分区物资局长兼贸易公司副经理。

1944年10月13日，我们党的这位优秀党员，因患胃癌，医治无效，长辞了人间，时年仅34岁。他病逝的噩耗传来，各界人士

乔 连 珠

(1896——1959)

1943年11月26日下午2时，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到会的200多名劳动英雄身着崭新冬装，个个精神抖擞。其中有一位中等个儿的中年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幸福的光采。当劳动英雄在喧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走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前时，那位满面笑容的中年汉子神情激动，眼中立时充满了晶莹的泪花。他就是庙巷乡妇孺皆知的劳动模范——乔连珠。

乔连珠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原大滩一个农民家庭。父母终年勤苦劳作，连幼小的乔连珠也帮助父母照看弟妹，参加拾柴扯猪草、放猪放牛等劳动，但一家人仍过着有上顿无下顿的日子。乔连珠6岁那年，家乡遭灾，粮食歉收。高额地租及繁重的苛捐杂税几乎夺去了他们全部的劳动果实，饥荒威胁着全家人的性命，父亲只得带领一家人背井离乡，流落至华池县庙巷乡、乔河乡一带。流离颠沛、饥寒交加的折磨，使母亲病，饿死在乞讨途中，接着父亲也在给人做土活时被塌死。从此抚养4个弟妹的重担就落在了乔连珠肩头。他没明没夜的给人扛活，以微薄的收入将年幼的弟、妹们都养活成人且能独立生活。

乔连珠23岁时，到陕西省吴旗县三道川崔荣贵家当了站年汉（招门女婿）。年汉期满后，带着妻儿，赶着岳父送的几只羊，先后居住于陕西省清凉寺、华池县庙巷乡等地，以租种地主土地和给人扛工为生。常年累月漂泊无定的苦难生活无边无尽，这使乔连珠从心灵深处渴望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1935年初，庙巷一带成为解放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

翻了身，过上了新生活，乔连珠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他欢天喜地的带着妻儿精耕细作，养羊养猪，生活很快变了样。乔连珠翻身不忘共产党，他不但辛勤劳动，还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与妻子二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长。乔连珠积极带领村民进行生产劳动，经常给乡亲们解决实际困难，成了大伙信赖的主心骨。此间，他家粮食连获丰收，便主动接济村中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家，就连方圆几十里外的穷困百姓有灾有难，他都无偿支援，有求必应。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背信弃义，一方面调集数十万大军重重包围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使抗日战争在1941、1942年间进入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援抗日前线，华池县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进行生产自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华池县地广人稀，根据这一具体特点，政府提供大量开荒，努力增加粮食生产。乔连珠一方面动员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荒生产，一方面亲身带领全家一齐出动，赶着牲畜耕，扛着镢头挖，连夜奋战，1943年开荒90多亩，当年产粮70多石，达到了“耕一余三”（即种一年可吃三年），喜获特大丰收是他勤耕细作的结果，更可贵的是他善于总结经验并积极向村民推广，如他指导群众种小麦一定要坚持“四要”，即一要坚持多耕，二要多施肥料，三要按时播种，四要精心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指导群众生产劳动的同时，他还注重引导青年后生走正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时，乔连珠看到村里有许多人家不是无劳力，就是无畜力，这些人家在农忙季节，生产无法进行。对于穷兄弟们的这些具体困难，乔连珠把它当成自己的困难，急得心急火燎，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大家解决这些困难呢？正当这时，乔连

珠听到了政府变工互助的号召，如梦方醒，茅塞顿开。于是，他东家说、西家劝，动员组织大家进行互助合作，组织起了变工组，解决了群众的具体困难，提高了劳动效率。心中装着全村人，时刻不忘穷苦百姓，毫不保留地为大伙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乔连珠于1943年春被华池县树立为劳动模范，11月初，出席了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大会，11月下旬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的首届劳动英雄大会。

昔日的乔连珠家乡遭灾，呼天不灵，叫地不应，全家流离失所，父母双亡；今日的乔连珠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成了新生活的主人、光荣的劳动模范。今昔相比，他感慨不已，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逢人便说：“只要是共产党的政策都是没磨达的！”而且他总是身体力行，带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1944年元城一带遭灾，当时任庙巷乡一村村长的乔连珠与三村村长高天福发起了捐粮支援灾区的抗战。之后，乔连珠不辞劳苦，翻山越岭，给元城灾区群众送粮5石（一说12石）。他这种急人所急、替别人危的高贵品质，在乡亲们中赢得了颇高威望，不久，又被群众推选为村农会副主席。

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乔连珠，在他那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垦下功夫，年年产量都超过一般农户。1944年他家粮食又获丰收，产粮80多石。12月，他再次出席边区劳模大会，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接见，获赠锦旗一面，甲等奖金20000元（边币）。在边区劳模会上，通过各位英雄的经验介绍，尤其是聆听了中央首长们的亲切教诲后，乔连珠深受教育，鼓舞很大。此后，他更加积极生产、努力劳动，带头向政府缴纳公粮，每年都在10石以上（小麦），以此支援革命，支援前线。

1945年，华池县纺织织布、织毛裤、手套等手工业生产进入高潮，村庄、城镇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但是当

时还有许多农民无钱打制纺车。乔连珠看到这种情况，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在边区劳模会上所得奖金全部拿出来，打制了10把纺车，借给群众使用，给贫困户解决了暂时困难。在努力搞好粮食、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他还以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开展拥军参战活动。这年冬他将自家一头重200多斤的猪，都献给了军队。

乔连珠虽然是地道的庄稼汉，但很有经济头脑。他除注意发展农业外，还注意发展畜牧业，他家曾养羊近百只、驴7头、骡子4匹。农闲时，他将群众组织起来到定边驮盐，既解决了政府和群众吃盐问题，又获利增加了收入。乔连珠见兴办合作社能加强物资交流，方便群众生产，便一次向合作社入20多股，带动群众推动当地合作事业的发展。由于乔连珠时时处处给群众起带头作用，1946年2月，被选为华池县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1947年陇东战争爆发后，乔连珠积极领导乡民支援前线，组织担架运输队，并主动将自家一头毛驴，贡献给担架运输队。1955年农村转合作社时，他将自己的土地、牲畜全部入社，还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乔连珠年高体弱时，仍然公而忘私，一心为集体事业尽力，从不叫苦叫累。“大跃进”中修“北干”渠时，华池人力缺少，乔连珠送自己14岁的孙子乔登川参加，自己也跑到工地上运茶运水。后来，他主动要求给生产队放羊。1959年腊月的一天，为给集体的羊群寻找好牧场，乔连珠不慎滑倒在一个陡峭的山崖边，后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享年66岁。他虽已故去30载，但他那为人民无私奉献、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赵晓红）

马 锡 五

(1898——1962)

马锡五，陕西省志丹县（原保安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上过两三年私塾。1930年追随刘志丹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长期在陇东从事革命斗争并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建国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是陇东人民所熟悉和爱戴的领导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锡五是刘志丹的得力助手，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区武装做过很多工作。1930年春夏，他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在谭世麟民国中的军运活动，“三道川事件”中和陶尔曼一起在白豹川被张廷芝匪部抓去，押了3个月，后只身逃出又参加了刘志丹组织的“太白起义”。“太白起义”拉起革命武装（即“南梁游击队”）后，马锡五任游击队军需，负责打土豪筹备粮饷、服装、枪支弹药等后勤供应工作。自1931年初至当年10月，南梁游击队在与晋西游击队会师之前，曾在宁县盘克原张皮村及旬邑县职田镇先后两次遭谢中旅、苏雨生旅袭击而失败，后又发生宁县早胜镇刘志丹被绑架事件，其间游击队忽聚忽散，进行过两次整编。而在这极端困难与复杂的情况下，频繁奔波于刘志丹与赵连璧（赵二娃）、阿守孝、贾生财、杨培盛等各部之间，以及刘志丹与永宁山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之间，负责联络工作的就是马锡五；他还直接参与了游击队与罗连城、苏雨生的统战活动。1932年初，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合编为反帝同盟军，马锡五又担任第二支队军需；而且，在以后红二十六军的整个战斗历程中，他一直都从事着军需供应和对外联

络工作。1934年5月，陕甘边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马锡五任军委供给部长；这年11月郭宝珊起义时，他曾受刘志丹派遣亲自迎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于11月重新划分陕甘晋省为陕甘省、陕北区与神府特区、关中特区。马锡五初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国民经济部长，后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4月陕甘宁省成立，马锡五改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实际是战争的一部分。主要任务是组建基层政权，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红军，支援红军，搞好战勤供应。当时条件十分困难，粮食尤为匮乏。而马锡五与政府其他成员一面克服种种困难，一面剿匪反霸，组织人民政权，一面进行战勤动员，有力地支援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的东征与西征。

在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任上，马锡五还为争取实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确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决议》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时陇东以及整个陕甘宁边界的社会特点之一是哥老会组织普遍，会员众多，影响广泛。这种旧帮会组织既可能被敌人利用，通过争取教育也有可能参加或同情革命，因为其中的广大会员都是劳苦群众。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对哥老会宣言》。中共陕甘宁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哥老会宣言，于1936年8月29日召开了一次哥老会大爷会议。

马锡五以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和哥老会中的威望和影响，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环县、庆阳、西峰、三岔等地的哥老会大爷80多人。马锡五在会上组织传达了《对哥老会宣言》，介绍了目前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各地会众以实际行动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他的主持下，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代表们发言表示要发扬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抗日。会议最后提出“打日本救中国”、“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等10个问题，作为开山堂会的讨论中心；决定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并成立陕甘宁省哥老会招待所，作为各地龙头大爷、江湖好汉前来聚会，共议抗日救国的联络中心。这次会议对陕甘宁省及其周围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日运动起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庆环分区于1937年9月正式成立后，马锡五任分区专员公署专员；1940年7月庆环分区专署与陇东分区专署合并为陇东分区专署，马锡五先任副专员，后又任专员，直至1948年。在这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内，马锡五为建设巩固的陇东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与陇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锡五一贯的立场和作风。当时，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很清苦。庆环分区专署驻曲子时，一开始是借用当地群众房屋办公和住宿的。时间一长，马锡五挺着脊，觉得这样给群众带来不方便，会影响党群关系。于是，他召集专署机关干部开会，决定自己动手建窑洞。他虽然政务繁忙，但以身作则，处处走在前面。每天天刚麻麻亮，他就起床吹口哨带大家去工地，一直干到擦黑才收工。他不仅是工地的指挥员，也是普通劳动者和技术多面手。他既能挖窑，还能旋窑、刮窑面、打土坯、油门窗，样样活他都在行，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土匠头”。这样，经过两个多

月苦干，分区各机关干部共挖窑洞100多孔，基本上解决了办公和住宿问题。在此期间，马锡五发现这里的农民对积肥不重视，由于街道上到处抛撒着粪便，农民家庭里大量牛羊粪被烧掉。他为了诱导群众养成积肥讲卫生的习惯，不仅逢人就宣传积肥、打扫院落的好处，而且他首先做出样子，一有空就提上粪筐到大街上去拾粪，每天天刚亮他就出现在曲子的大街小巷里。在他的带动下，农民和干部参加拾粪的越来越多，曲子的街巷院落渐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平易近人，谦虚朴素，善于接近群众也乐于接近群众，时常走村串户，和农民谈天说地，一起劳动，了解群众疾苦。一天专署开会，人都到齐了，却不见主持会议的马锡五专员，工作人员到处找他，后来才发现他正在附近给一户农民抓粪种洋芋。这是最脏最累的话。只见他赤着脚，怀抱粪斗，一根毛带吊在脖子里，满脸的汗水和着粪土，与当地的老农民没有二样。离开曲子到庆阳城工作以后，他仍然是这样。除经常向县、区干部了解情况外，爱到附近的西河湾、五里坡、驢山湾找农民谈心，在那里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他下乡常随身带一件工具，走到哪里就与那里的农民一边劳动一边闲聊。生产上有什么困难，工作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愿意向他谈。有时这些农民朋友也直接找上门来向他反映情况，陇东分区专署机关的干部，就经常看到一个个农民群众来专署找马锡五。时至今日，一提起当年的“马专员”，这里的老年人还纷纷交口称赞。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马锡五总是认真地去解决。有一次，他到镇原马渠去，碰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拦路喊冤。他很快扶起老人，看了状子。原来，这老太婆所告系因婆媳矛盾引起的家务纠纷。马锡五决定采用调解的办法解决纠纷。第二天开完乡民会，他便找了当地10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把状子念给他们听，让他们评论这件事，并且说：“咱们这里风俗，大小事老年人最明了。我办啥事都要依靠群众，请大家帮这个忙吧！”老人

们纷纷提供情况，很快理清了是非曲直，解决了家庭不和。对机关干部，马锡五也是非常关心爱护的。陇东分区专署驻庆阳城的最初几年，由于条件差，机关干部大都是几个人一间房屋冷地铺。为了增强体质，马锡五每天天麻亮就带领机关干部跑步、上早操，并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青年人要从早锻炼，不要以为现在身体好，将来身体不好了，要锻炼就迟了。”1941年，边区银行陇东分行行长病了几个月还不见好，马锡五常把这个同志的病挂在心上，一有空就去探望，还派人去请三八五旅的军医来诊治。马锡五更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严格要求和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本色。1946年以后，由于顽固派的封锁，边区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但当时社会上出现一股讲排场比阔气的歪风，少数有钱人时兴戴墨镜，穿二毛皮袄，个别政府工作人员看了眼红也去摹仿。他抓住这个苗头，就在大会上提出严肃批评说：“我最讨厌一些人讲穿戴讲排场。如今戴墨镜穿二毛皮袄的，有哪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有啥值得学的？”他的批评是有力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担任领导工作多年，始终穿着家乡庄稼汉穿的那种又厚又硬的土布鞋，有人劝他换种软点的鞋，他始终不肯。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专署机关的大生产运动搞得很好。他带领机关干部到庆阳城西的席芨沟去开荒，经将近两年苦战，在席芨沟的几道山梁上开荒种粮种菜数百亩，年产粮100多石，做到了自给有余。他们还把那时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传给下一代。

由于马锡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遇事便能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和维护党的政策与原则。1943年冬季，马锡五从延安开会返回路过新堡区时，听到一位干部反映农村整风出现的偏差：有的地方采取逼供诱供，在一个村竟搞出几十个所谓的“三青团”。

“兰衣社”、“CC团”分子，闹得人心惶惶不安。听到这种情况，马锡五又向区委负责人询问和核实了情况，然后提出严肃批评，指示“凡是一般农民群众，都要放回去！”根据新区的情况，马锡五回到专署没几天就到各县去检查整风工作。到曲子县时，他得知由于县委、县政府搞了坦白运动，没有问题的干部只剩下三、四个人了，便严肃、耐心地对负责运动的县长说：“你们在干部中搞了这么多人，都是坏人？现在好人只剩下三、四个人了，你这个县长能坐得住吗？这么多干部都有问题了，你们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呀？”于是曲子县很快进行了复查甄别，绝大多数干部得到了解脱。1940年春，在土匪头子赵老五的策动下，环县35个区、乡自卫队哗变，制造了“环县事变”。叛乱平息后，马锡五率命去做善后工作，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散匪暗杀的危险，走访群众，调查叛乱经过。经过调查，他了解到反革命分子只是少数，参加哗变的大部分是不明真象、被胁迫的群众。于是，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懲匪首，教育协从，释放了不明真象的群众。同时，他还指示当地政府向人民讲明，不许歧视受胁群众，并安排给一部分生活困难者发放了救济。这样一来，当地群众非常感激，更加信任民主政权，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接见了马锡五，并赞扬他善于结合实际，正确执行党的政策。1941年，为了完成陇东分区8万驮运盐任务，马锡五不仅到曲子、环县督运，还亲赴三边考察沿路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使这一艰苦任务能够完成，而所发生的问题又很少。

马锡五所长期坚持的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与作风，以及他的卓越政绩，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和党的高度重视。在1943年元月结束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全边区共推选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显著、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威信的22名领导干部，马锡五是其中之一，受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

表彰与奖励。毛主席在给他的奖状上亲笔题词是：“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1943年3月以后，马锡五开始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此后便长期从事司法工作。他所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对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而且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司法工作都有突出贡献。

体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突出案例，是他在1943年审理的“封芝琴婚姻案”。抗日民主政府早在1940年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但在个别农村包办买卖婚姻仍然严重存在。华池县温台区西乡农民封彦贵将女儿封芝琴自幼包办许与张金财之子张柏为妻。但他为贪财礼，后又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并又二次倒卖女儿；女儿芝琴从小与张柏相识，并互相爱慕，他俩都表示愿意维持婚约站为夫妻。不久张家得知封彦贵已将封芝琴第三次许人，便纠集亲邻乘夜抢回封芝琴与张柏成亲。封彦贵告到县司法处除判处违法抢人主谋张金财6个月徒刑外，还判处张柏与封芝琴婚姻无效。封芝琴不服，乘马锡五赴华池检查工作，便拦路告状。马锡五首先在乡村干部和群众中调查了实际情况和舆论趋向，又征求封芝琴的意见。芝琴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马锡五最后会同县司法处就在县政府所在地悦乐街举行公开审判，临判决前再次征求了到场群众意见，询问了各方要求。判决结果，维护了这对青年的婚姻，反复倒卖女儿者和非法抢人者按照法律受到了应得的处罚。这样的判决，入情入理，胜诉者心满意足，群众拍手叫好，就连受罚者也心服口服。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全国解放后还拍成电影上映。影响所及，几乎是家喻户晓。不过文艺作品为了宣传的需要，把主题人物变成了刘巧儿，主题思想变成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真

实案件的主导者其实是人民的好干部马锡五，案件的本质体现了抗日人民政府真心维护人民利益，支持婚姻自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法律、合情合理办案的思想。

在兼任陇东分庭庭长期间，马锡五还通过调查研究，大走群众路线，审理平反了曲子县所谓的苏发云3兄弟“谋财杀人案”，释放了错押的苏发云3兄弟，惩办了真正的杀人犯杜老五。以后，合水县五区六乡又有两起土地纠纷案，县判不服，上诉分庭。马锡五派分庭推事石静山深入实地调查，伴以调解，合理的解决了这两起有影响的土地纠纷案。这样，边区司法战线上便正式总结形成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也被陇东人民称为“马青天”。“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一是深入调查。就是在司法工作上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通过深入开展全面的调查而弄清案情事实，不轻信呈状；二是合理调查。就是在坚持政策法令的原则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合理的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三是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便于群众。一句话，“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马锡五审判方式”从1943年开始形成，到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推广后，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司法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马锡五的名字这时也正式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司法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46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政会上，马锡五被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49年2月任边区人民法院院长。全国解放后，马锡五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马锡五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同年，撰写法制史论文《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1955年，他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

委员会委员。1961年9月，马锡五来陕甘检查法院工作时，特意重返陇东。在庆阳城详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又到环县城北的二十里沟口同群众一起劳动，收割了一下午糜子。临离开庆阳时，他对县委负责人说：“这里是老区，你们一定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好作风坚持下来，发扬广大，扎扎实实地把老区的革命和建设搞好。”

1962年4月10日3时10分，为革命和人民司法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马锡五在北京病逝，享年64岁。4月15日上午，首都各界在北京嘉兴寺举行公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公祭大会。在他逝世的第二天，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下了这样一首挽诗：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同舟十二年。
未及病床谈片语，只瞻遗像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刘风阁 李含颢）

阎 红 彦

(1902——1987)

阎红彦，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率队在吕梁山区和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冬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支队长。1932年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支队长，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1934年入国际列宁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35年回国。1936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第三十军军长，率部参加东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团团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参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邯郸、定陶等战役和进军大别山，后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川东人民政府公署主任兼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87年1月8日在昆明逝世。

(陶兴范)

李 湖

(1897.10——1968.8)

李湖，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曾任华池县第一届参议会议长、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委员等职。

旧社会，李湖一家是庆阳大地主“恒义和”的佃户，在高额地租的盘剥下，全家终年辛劳，却过着吃糠咽菜、食不饱腹的生活。为寻找一条出路，李湖只得出门拜师学做木活，农忙在家干活，农闲奔走他乡，糊口在外。

1933年，陕甘边党把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放在南梁地区，使庆北的革命斗争迅即得到发展。李湖积极支持侄子培福、培堂参加革命，投入开创庆北苏区的伟大斗争。当地反动民团和地主豪绅得知此事后，视李家如眼中钉、肉中刺，扬言：“抓不到李培福，就杀掉他们全家！”李湖被迫领着家族老幼，经常藏在榆林沟壑里。有时敌人搜捕得紧，他们两三天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在困难面前李湖总是安慰全家人：“革命会成功的，以后咱们就不用再遭这份罪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终于成功了。李湖一家分得了土地和牛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风愿。从此，他躬耕田亩，努力生产，积极给政府交送公粮，带头优待军烈属，支持革命战争，成了村里的带头人。

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农民纷纷迁居华池解放区，为妥善安置移难民，支持边区建设，李湖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安置工作。1939年华池受灾，他把自家的12石糜子全部调剂给赵改仓等10多户无籽种、无口粮的困难户，及时把解放区人民的温暖送给移难民。李湖这种主动为政府

排忧解难的可贵精神，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政府的表扬。在1939年华池县第一届参议会上，李潮当选为华池县第一届参议会议长，代表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为克服边区经济财政困难，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2年华池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李潮带头在悦乐上堡子村组织起有80人、11对牛、500多亩地的变工队，实行贫富互助、普遍变工、开荒扩耕，发展生产，解决了长期以来在生产大忙季节村里一些有劳力无耕地、有耕地缺劳力、无畜户耕种难等困难，提高了劳动效率，推进了生产发展。年底，他领导的变工队实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可吃两年），给全县树立了榜样。

当时，棉花和棉布是边区军民生活中奇缺的物资，国民党封锁外面运不来，当地又无种棉的习惯。为了解棉花供给困难，1943年李潮在华池县首次试种棉花，并获得成功。在种植时，他精耕细作，注意摸索和总结经验，当年产棉11.3斤，打破了“华池种棉不结花”的说法。这年，李潮先后出席了华池县和陇东分区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被分别树立为华池县和陇东分区劳动英雄。11月26日，李潮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又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受到了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人的接见。尤其是亲耳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组织起来》的讲话，更使他心明眼亮。会后李潮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把各户的当家人召集在一起，商定来年互助合作的生产计划，并把自己参加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所见、所闻、所感告诉大家，把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和边区政府的指示传达给村村户户，使上堡子村全部农户都参加了他的变工互助组。

在广泛实行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李潮在上堡子村发起了讲卫

生运动，并制订了上堡子村《卫生公约》，要求：一、每户要有厕所和粪便堆放处；二、每天打扫一次室内外卫生；三、妇女要勤剪指甲，勤淘洗水缸，禁止缠脚；四、禁止求神治病，有病要请医生诊治。这些措施，使全村卫生状况明显好转，对当时在农村普及卫生常识，减少疾病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领导的上堡子村和张振财领导的城壕村以及白马庙村，成了华池县有名的卫生模范村。

李潮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也是热心办学育人的有识之士。他带领上堡子村群众，发挥互助合作的力量修建了上堡子小学，并任校董。学校初建设有桌凳，他收集各家废旧桌凳十余套，亲自维修后供学校使用；孩子们墨笔纸张缺乏，他用自家的木料，亲手制作土盘31个，送给学生习字；教员薪金来源有困难，他领上变工队开荒50亩，又筹地一晌，分种小麦和棉花，使教师每年供给有余；学校没有办公费，他组织群众向合作社入股，以利集资，获10万余元（边币），用于教学开支。李潮就是这样，一心扑在办学上，把上堡子小学办成了当时华池第一个经费充足，向学生实行“全免”的学校。华池县政府在全县教联会上推广了李潮的办学经验，上堡子小学亦成为华池民办小学的一面旗帜。

1944年12月22日，李潮再次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又一次受到了党和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倾听了毛主席《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树立为甲等劳动英雄。大会奖给他锦旗一面，奖金两万元，耕牛一头，毛毯两块。边区政府的隆重奖励，给李潮以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他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带领全村人尽快富起来，李潮把自己的两万元奖金全部借给本村的经济困难户，让他们用这些钱去购置农具，发展生产。变工队的徐克敏，是套不起牛犁的生产困难户，李潮干脆把政府奖给白

己的耕牛送给了他，并与他促膝交谈，商定整年的生产计划，鼓励其努力生产，为边区建设做贡献，力争一年下来，全家“丰衣足食”。徐克敏一家深为李潮的行为所感动。老徐激动地说：“老英雄算是把我这一家子带到家啦！”

1946年2月，华池县第三届参议会隆重召开。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深受众望的老英雄李潮，被选为华池县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和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委员。大会还奖给他书有“植相模范”的锦旗一面。

全国解放后，李潮虽是两鬓染霜的老人了，但仍和年青人一样起早贪黑，辛勤耕耘，在平凡的农业生产中，默默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华池享有盛誉，可从不居功自傲或要求组织照顾，对自己和家里人一直要求很严，对群众的痛苦，他则时时装在心头。

1956年，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一些人在生产上搞“黄土搬家”，瞒哄上级，有的干部工作上虚报浮夸，致使社员每日只能吃到一两粮食。李潮面对这种不实事求是，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日趋表面化的作风深恶痛绝。于是，他请人代笔，上书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要求政府尽快制止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他的信受到了省政府有关负责人的重视，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年，李潮的侄子李培福（当时任副省长）要从省城回家探亲。当地群众和干部听说“老县长”过两天要回来，非常高兴。他们发现村边有一段路不能行车，便自发组织起来修路。李潮得知情由，赶忙前去婉言劝止。他对修路的群众说，“培福回家探亲是私事，车开不过来，他就走着回来嘛，怎能为他动用劳力呢。”培福回来后，他语重心长地给侄子说：“咱们都是劳动人家出身，凡属个人的事，务必不要打扰群众。不然就会脱离群众，失去自己的威信，失去党和政府的威信。”培福深为叔父的

言行所感动，高兴地说：“三大问题看得深，有您严以律家，我们在外工作，就不用为家里事分心了。”

李潮就是这样，为革命贡献颇多，却从不考虑自己要得到什么，更不以“英雄”自诩。直到晚年，还参加队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倍受人们敬重。1969年8月8日，他因病逝世，享年73岁。附近群众得悉后无不悲痛，许多村邻人还自发前去为他送葬，以寄托对这位老英雄的深切哀思。

（王来才）

郭 宝 珊

(1905——1970)

郭宝珊，是一位威名赫赫的传奇人物，是为创建西北根据地立下累累战功的红军将领。

他，原名郭宝，1905年1月19日生于河北省南洛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随父逃荒来到陕西洛川县谢家岭村。全家三代7口人，靠父辈们拉长工、下煤窑、苦度日月。后来，他家略有积蓄，购置了田产，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小康生活。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他家最终也难逃反动官府和军阀、土匪的残害，几经折腾，终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郭宝珊被迫闯荡江湖，立志报仇雪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联络一批热血男儿，拉上黄龙山，当了“山大王”。此后，在黄龙山势力最大的匪首贾德功、梁占奎的诱骗胁迫下，郭宝珊率部入伙，在梁占奎部下任营长之职。

早在1931年前后，郭宝珊就受到陕甘边界蓬勃兴起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他开始向往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并让部属效仿红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穷苦出身和侠义行为后，曾多次给他捎话、写信，争取这位“绿林好汉”弃暗投明。郭宝珊深为感动，便与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不仅从未伤害红军，而且还掩护红军伤病员。1933年，郭宝珊还将所部自称为“义勇军”。1934年7月间，刘志丹又派黄罗斌前往黄龙山，积极争取郭宝珊率部起义。经过长达月余的接触、交谈，郭宝珊逐步坚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只是由于有匪首贾德功、梁占奎掣肘，起义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没有采取行动。这年9月间，国民党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纠集重兵，向黄龙山大举进剿。贾德

功、梁占奎和郭宝珊自知力不能敌，便率部转移陇东。这时，贾德功、梁占奎合谋投靠国民党十七路军杨子恒部，郭宝珊则欲趁机投入红军。郭宝珊率部途经合水太白，越关时，刘志丹、习仲勋及时派出黄罗斌、马锡五等送去慰问信和羊、马等慰劳品，积极争取郭宝珊起义。在共产党和红军的感召下，郭宝珊遂于10月20日在新堡毅然宣布起义，率领所属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11月10日，南梁根据地党政军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将这支起义武装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员，派任浪花为政委。此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还选派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到义勇军工作，并陆续动员翻身农民参加义勇军，使这支部队很快扩大到300余人，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

从此，在郭宝珊率领下，西北抗日义勇军驰骋陇东、陕北广大地区，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屡立战功。1934年冬，郭宝珊率部与红三团、庆北游击队并肩战斗，先后摧毁了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盘踞的五蛟堡、刘堡等反动据点，解放了元城川、悦乐川及环县八珠原等地，使庆北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扩展。1935年春，在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5万余兵力，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形势下，郭宝珊率领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协同作战，先后参加了黄大原、柳村原等战斗，沉重打击了进攻南梁根据地的蒋马匪军。柳村原战斗后，郭宝珊率部转战陕北。在他和政委黄罗斌的指挥下，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先后与敌激战10余次，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实现将陕甘边、陕北苏区联成一片的战略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后，西北抗日义勇军即被整编为红二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四二团，郭宝珊任团长。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又为反“围剿”立下了战功。10月间，在反“围

剿”的硝烟战火中，郭宝珊由团政委马佩勋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正当这位威震敌胆的红军战将在反“围剿”前线浴血杀敌的时候，王明“左”倾路线在西北的推行者，发动了错误的“肃反”，他们罗织种种罪名，将郭宝珊和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一大批陕甘苏区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入狱。在那身陷囹圄的日子里，郭宝珊面对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正气凛然，坚持原则，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高贵品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果断纠正了这次错误“肃反”，郭宝珊和刘志丹、习仲勋等一起获释出狱。1936年1月成立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郭宝珊被任命为二十八军一团团长。他毫无怨言，又无反顾地走上了巩固和扩大陕甘宁边区的战场。依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陇东、陕北的土地上，继续创造着克敌制胜的英雄业绩。

“西安事变”后，郭宝珊的部队被扩编为陕北独立第一师，他在这个师里担任团长职务。但郭宝珊毫不计较个人声誉的得失和地位的升降。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甘泉独立营大队长，甘泉独立营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八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延陵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二师师长。在那戎马倥偬的艰苦岁月里，郭宝珊率部南征北战、东荡西杀，为西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全国解放后，郭宝珊曾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二十师师长，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1970年，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在西安病逝，享年67岁。如今，他的英名镌刻在巍巍高耸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塔上，与他曾经战斗过的南梁山水交相生辉。

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至今仍在陇东和西北人民中广泛流传，在千万人的心中铸起了不朽的丰碑！

（高 文）

人生如梦，转眼即逝。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在革命战争年代，我曾在郭宝珊同志身边工作和生活过，他那种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同志的无限热爱，对工作的无限负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性的人。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从不搞小圈子，也不搞个人恩怨。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同志宽厚待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宝珊同志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本色，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他都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的前线。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不仅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还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宝珊同志曾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从不向困难低头。他始终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性的人。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从不搞小圈子，也不搞个人恩怨。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同志宽厚待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宝珊同志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本色，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他都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的前线。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不仅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还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宝珊同志曾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从不向困难低头。他始终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性的人。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从不搞小圈子，也不搞个人恩怨。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同志宽厚待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宝珊同志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本色，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他都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的前线。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不仅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还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宝珊同志曾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从不向困难低头。他始终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郭宝珊同志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

贾 生 秀

(1902——1979)

贾生秀，陕西省横山县人。1929年逃荒到华池县林镇乡小河沟居住。

贾生秀定居小河沟以后，便遇上刘志丹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开始“闹红”。当地的贫苦农民抱成一团，把他这个外来的穷小伙子也看成亲兄弟一般。他和大家一起白天劳动，晚上经常秘密地聚在一块开会，商量如何组织起来抗粮、抗租，如何抵制官府压迫、地主剥削等等。就此，贾生秀受到很大教育，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在历次抗粮、抗租的群众运动中，他都踊跃参加，并且表现得积极勇敢，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

1933年后季，张策、习仲勋先后来到南梁白马庙川、玉泉庙川、高园堡川和小河沟一带，组织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及赤卫军大队。贾生秀参加了郑德明领导的赤卫军第一大队，同其他队员一起积极地参与了维护社会治安、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由于他积极勇敢，精明强干，工作认真，各项任务完成得特别出色，1934年初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正式成立，贾生秀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肃反委员长。上任后，他通过大小各种会议，反复向群众宣传边区政府的“肃反政策”。“肃反政策”要求贫苦农民团结起来，积极勇敢地同一切敌人作无情的斗争。尤其对一些证据确凿的敌探、反动豪绅、地主，一经发现，要就地正法；对一般的豪绅、地主，只要能拥护政府，愿意为革命捐粮捐款，可以宽大处理。贾生秀在会上号召各群众团体，广大贫

苦农民，积极贯彻执行“肃反政策”，自觉地搞好反奸、防奸工作。“肃反政策”的公布和宣传，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一些民团头子狼狽逃命，不敢在当地活动，一些地主顿时改变了已往的狰狞嘴脸，变得老老实实。贾生秀在就任肃反委员长期间，为保卫苏区安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了不懈的努力。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当选为副主席。在边区政府成立的同时，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贾生秀又被选为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土生土长的贾生秀身居要职以后，革命的决心更大了，工作劲头更足了。他常常是白天徒步几十里，到荔园堡（今林镇）、玉皇庙、荔园堡、二将川等4个区的村村户户，向群众宣传政府政策、法令，帮助区、乡发展和巩固已建立的革命政权；晚上在灯下读书学习到四更天左右。他说：“思想不坚定，不能干革命；没有文化干不好革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政府法令政策。凡是他向群众讲的政策，都是自己事先将条文背熟，再把意思弄通弄懂才讲，这样看起来费劲，但按他的话说：“不能当歪嘴和尚把经念错。”另一方面虚心向习仲勋等领导人求教，他说习主席对部下非常关心，一有时间就叫他们学习，不但教他们识字、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而且教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凡是习主席召开的会，会议内容总有一条，要汇报自己的学习。就这样，在艰苦的岁月中，贾生秀通过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工作中学习工作，思想水平、文化程度等提高很快，工作也很出色。如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亲自参与和领导建立健全了13个乡的党支部和乡政府，还动员了上百名青壮年参加了赤卫军。

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南梁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

“围剿”，华油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随边区政府撤至洛河川。同年10月，我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边区政府决定将华油县恢复为华池战区，战区机关亦迁回原地。当时贾生秀因病被党组织安排在甘泉县搞党的地下工作。以后他就落户到甘泉县高哨区油粉村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贾生秀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坚持战斗和工作在农村。开始还担任基层干部，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条件越来越差，便辞去了干部职务。但他不论在不在干部岗位上，革命责任心却始终不减，思想从来不脱离组织。群众说：“贾生秀从骨子里相信共产党”。抗战开始以后，甘泉一带流落很多长征红军伤病员，他们多是南方人，不服水土，生活不习惯，安置任务很重很复杂。但贾生秀觉得这些伤病员都是革命的功臣，应该尽一切力量安置好。他主动要求负责本乡的安置工作。他一方面带病走村串户，宣传动员群众按照党的政策积极接受和完成安置任务；另一方面自己带头做出样子，他和妻子商量腾出自己的两孔窑洞让给红军和伤病员住，还时常上山下沟挖中草药，让妻子熬了给伤病员治伤治病。伤病员衣服破了让老伴给补，脏了给洗；伤病员心情不好，他时常和他们促膝谈心；生活不便，有时间他就上山打“野味”给他们调剂。在他的带动下，油粉村乡的红军伤病员安置工作在全县搞得最好，不至一次受到表扬。在大生产运动和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的各项活动中，贾生秀也处处走在前面，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贡献。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贾生秀的家乡沦陷了，甘泉有很多基层党支部被破坏，有17名党支部书记或党员投敌自首，贾生秀也被抓去受刑。贾生秀把保守党的机密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尽管受尽折磨，但他没有暴露任何一点党的机密。最后敌人只得把他放掉。在他出狱不久，老伴去世了。敌人从肉体上、精神上给他摧残，再加老伴去世带来的刺激，使他多半年神

志不清，话不成句。

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和群众帮助下，贾生秀神经和身体渐渐恢复正常，合作化时期又第二次成了家。他的革命热情也又旺盛起来。他虽然早已不当干部了，但他对村上的事件件都关心过问，村干部们也尊重他，乐于向他请教，因此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编外干部”。“编外干部”贾生秀从来坐享清福，不要组织照顾，他一直坚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亲自参加劳动。一次他到北京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战友习仲勋，习副总理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要不要什么照顾，他回答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只是欠革命的债太多了，还敢再要照顾？”

1979年9月，为革命事业积劳成疾的贾生秀，病情加重，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77岁。甘泉县民政局为他开了追悼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发来了唁电，甘泉县委、县政府以及各部门送了花圈，参加追悼会的甘泉县各级领导，还有好多老红军、老干部以及各界人士共1000多人挥泪向贾生秀遗体告别。

（陶兴范）

李 培 福

(1912——1983)

李培福，出生于华池县悦乐镇上堡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李海，兄弟4人，都是庄稼行的好把式，且各会一门手工艺。但在当地大地主“恒义和”的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下，仍然过着吃糠咽菜的贫困生活。

为了生计，培福7岁出家给地主当长信，缺衣少吃，折磨得他瘦骨嶙峋。9岁那年，在三叔父的支持下，父亲咬着牙送他上私塾，苦撑了4年，终因家境贫寒而被迫辍学。培福退学后，家里因交不起租，还不清债，地主抽回了他家的地，搬了他家的锅，全家人被赶出家门。

无奈，培福一家来到温台乡的田套，找了个破窑洞住下后，没明没夜的开了几十亩荒地，种上糜子。刚有点收成，不料地主“恒义和”的伙计又找上门来，说这荒山野林也是“恒义和”的，开荒也要交租。算盘一响，打下的粮食又被地主抢了个光。一气之下，他家又租种另一地主的土地。但天下乌鸦一般黑，一次培福正在耕地，讨账的狗腿子来到地头，不由分说硬把耕牛赶走了。不得已，培福只好出山拉“梦圈”，经过几个月的奔忙，还是不能养家糊口，他又回家种地。山里不仅地主心黑，土匪也多，他们还经常出来抢掠。有一个时期，培福家连续三次遭劫，连脚上穿的鞋子都被抢去了；还有一次，土匪把他父亲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为避土匪，打下的粮食不敢往家里拿，晚上不敢在家里睡。

有一年夏天，粮食刚上场，地主狗腿子又来要帐。血气方刚的李培福，眼见辛勤劳动又要落空，便抄起扁担拦住他们：“要

命有一条，要租子没有！”狗腿子见不是对手，边退边骂道，“要想不还帐，除非当土匪，除非当红军。”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年来埋在培福心中反抗斗争的种子萌发了。他想，当土匪伤天良，不能干；当红军可以不交租子，这条道儿倒走得！自打1930年以来，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便先后开始在南梁一带“闹红”，还拉起了红军游击队，专门打土豪，救济穷人。这一点李培福早有耳闻，但真要去当红军，他难免又有些怕红军。为了证实红军真的和旧军队、和土匪不一样，他曾两次暗中跟踪观察游击队的活动。1933年春天，一支游击队来到他们村上，老百姓都跑了，培福悄悄躲进草垛里，当他看清游击队真的不乱拿老百姓一草一木时，便主动走出来要求参加游击队。同年秋季，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更加频繁，打土豪没收了不少财产，有皮货、布匹、铺盖、白洋等，游击队便让培福当经济员，保管这些财物。培福尽心尽力保管得分毫不差，得到游击队领导的信任。

参加革命后，在党的培养下，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进步很快。1934年6月，经庆阳游击队指导员王宝珊介绍，他同何兴发等6人一起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1934年是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高潮时期。6月间在杜家河召开了庆北工农兵代表联席会议，成立红色政权——庆北办事处。李培福被选为庆北办事处的土地委员，办事处就设在也家里。

9月间，培福又接受党代表马仰西的派遣到田河一带筹备成立了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他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就任后，他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影响很大，深得人心。悦乐镇对面山头上有个寨堡叫悦乐堡，地势非常险要。堡子内驻着谭世麟的一个连，连长外号“狗腿子”经常出来欺压百姓。1934年8月，庆阳游击队在队长王宝珊率领下攻打悦乐堡，一连3天未能

攻下，只好撤出战斗。这时李培福找到王家珊共同商订了一个疑兵之计：把游击队撤出战斗，先在四面山上到处插起红旗，黄昏后又在堡子后坎先放一阵子冷枪；接着再让人吆起几群羊在山后来回奔跑，扬起漫天尘土，同时在铁桶里燃起鞭炮，乒乓作响。培福还挑选几名赤卫队员轮番在堡子下面挖地道。夜间堡子内的敌人吓得乱作一团，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杀来了回马枪，要端他们的老巢，便在拂晓前仓惶逃跑了。悦乐堡子打开后，李培福奉上级指示，发动群众，一举分配了地主“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囤积的2000余石粮食，700多头牛、驴和800多只羊，以及1000多斤烟叶。分粮的人来来往往，一连忙乎了10多天才分完。通过攻打悦乐堡子和分粮斗争，解决了群众困难，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庆北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同年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培福当选为县政府委员。

1935年2月，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庆北苏区被马鸿宾部占领成章寨占领。上级决定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暂时撤离，留部分同志就地坚持斗争，培福被留了下来。敌人占领庆北苏区后，疯狂地烧、杀、掠、抢，同时强迫百姓“搬圈子”（并村），逐村挨户地搜捕红军积极分子，残害红军家属，形成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是十分困难和严酷的。李培福开始住在五蛟的夏家沟李德贵家，曾两次险遭不测，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回到杜河一带。这里曾是庆北苏区中心区域，敌人盘查很紧，山里的住户都被并到大村去了，他不敢进村。没有吃的，只好弄些未成熟的洋芋和南瓜，又怕点火暴露目标，只能生着吃。晚上住在荒庄山洞里，怕留下痕迹，连草也不敢铺。有时，为了及时发现敌人，干脆就睡在山崖上。他为了早日与上级取得联系，便逐步向洛河川方向转移。一次他意外地在柔远的老爷岭遇

到了家里人。原来敌人抓不到李培福就抓他的家属，因而堂弟遭到杀害，全家人逃难流落到这里。李培福借千眼泪，带上全家来到合水杨兴庄一位老朋友家里。他把家安顿下来后，继续寻找组织。不几天在附近他找到了李树林、田生弟等游击队员。他们商量决定回庆北重建游击队。培福让二弟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头马，他们回到庆北，又挖出了埋在马鞍沟的3支枪，就这样由李培福、李树林、田生弟、黄兴仁等12人组成的一支庆北游击队又诞生了。

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北上临近陇东时，驻守在悦乐一带的马家军撤离。李培福带领游击队消灭了李万义、田生孝等民团和土匪，收复了苏区，壮大了游击队。经过一个月来的活动，重建庆北革命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根据李培福提议，于9月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庆北办事处。李培福被推选为办事处主席。办事处下设秘书和特务班。办事处成立后，柔远田河等区政府也相继恢复。11月，李培福到洛川找到陕甘省委，汇报了庆北的全面情况。陕甘省委充分肯定了庆北一年来的工作，对进一步全面恢复庆北苏区，作了重要指示。

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李培福逐渐成长为一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他不但觉悟高，胆量大，而且跑得快，枪法准。尤其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他总能随机应变，猛冲猛打，以少胜多，化险为夷，因此被人们称为“李疯子”。庆北办事处成立不久，敌人便施偷袭诡计，千方百计扼杀革命政权。一次，敌人蒙骗游击队外出，包围了办事处驻地杨寺岔。当时李培福一人在家写标语，待发现敌人，已相距很近了。他拔腿跑进了一个拐沟。敌人边追边喊抓活的。他们曾出过一千大洋赏金捉李培福，此时哪能错过良机。培福在跑的过程中鞋掉了，在练鞋时他灵机一动将鞋扔向敌群，吓得敌人连忙爬倒地上，等醒悟过来再追时，培福已经跑远了。还有一次，培福单人出外，正坐在百姓炕

上吃饭，忽然被几个敌人堵住门口，培福见状急中生智，将盛饭的黑碗扔出门外，大声喊叫“炸弹！”敌人被这雷鸣般的喊声和飞来的异物吓懵了，慌忙卧倒。培福顺手摸了根烧火棍窜出门外，其中一个抢先追来，被躲在暗处的培福一棍打倒，夺了枪就跑，一转眼工夫钻进了梢林。其余敌人见他如此勇敢，又有枪在手，往梢林放了几枪，再没敢追。这时培福又出现在对面山头，晃动着刚缴来的枪大喊：“有种的取枪来！”敌人望而生畏，无可奈何。还有一次李培福带领40多名游击队员去悦乐镇抓团总朱孝，朱孝连跑带躲钻进了马家兵防区赵洼子，引来马家兵200多人和游击队接了火。游击队边打边退，天明退到中庄原。前面一条深峡谷挡住了去路，后面马家军的骑兵已逼到跟前。这时处境非常危险。培福果断地下令，大部分队员攀过峡谷，他带少数敌人阻击。敌人一面喊看“抓活的！”一面发起两次疯狂冲击，但两次都被李培福他们打退了。待敌人发起第三次冲锋时，李培福他们扔出几颗手榴弹，也冲过了峡谷。待敌人一窝蜂似的滑下峡谷时，李培福命令游击队集中火力一齐射击。敌人不但没抓住活的，反而扔下一些尸体逃跑了。这一仗彻底打掉了敌人的威风。不久，这股敌人撤走了，地方民团再没敢轻举妄动。庆北苏区相对安定了许多。

1938年2月，李陕甘省委指示，庆北办事处迁往孟远刘沟，同时健全了机构，统一了游击队领导。李培福任庆北游击队总指挥。为了向西扩大根据地，他率部首先挺进元城，消灭了驻在元城川刘堡子的民团，然后到八律原。八律原属环县管，过去没有革命活动，百姓对红军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宣传影响，一听游击队来了，百姓全跑光了。面对这种情况，培福要求游击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游击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凡在老百姓家吃、住、用东西都按价付款并写下条子说明情况，在走之前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同时遇到群众就宣传红军

的性质，解除老百姓的顾虑。游击队更通过打土豪的实际斗争很快教育发动了群众。他们先后在八珠原打散了国民党杜成章民团，打了任三麻子和白马一个姓黄的土豪，在乔川贺廷抄了民团总贺廷炎的家，抄获银子100多两，银元100多个，“连珠炮”子弹100多排。通过耐心工作和艰苦的斗争，半月后，这一带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游击队声威大振，老百姓很快的赶着牲口牛羊重返家园。有许多群众自动为游击队送粮送草，不少青年人争相要求参军。

李培福带游击队在八珠原活动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元城修整。这年5月下旬在元城迎接了四征红军，并配合红军西进至曲子。6月初，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省委通知他任曲子县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省委、省政府也设曲子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白区工作部长耿飚就住在县政府隔壁。这一时期，他得到了李富春同志多方面的关怀与培养，受益非浅。从此他们之间建立起了长期的革命情谊。在省委和李富春的具体领导下，培福克服困难，很快建立健全了县政府各职能部门，配齐了干部，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还搞起了一个合作社。他还和同志们一起发动群众，建立起了曲子、合道、木钵等6个区、20多个乡的苏维埃政权。“西安事变”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全国逐步形成，国民党军队虽然解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正面进攻，但曲子县一带政治土匪很多，经常骚扰区、乡政府和革命工作人员。为了进一步巩固曲子县革命政权，李培福于1937年初亲赴合道区开展剿匪工作，并在区政府驻地磨台子亲自平息了该区游击队勾结土匪，企图暴乱的事件，公审处决了4名匪首，进一步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自觉与土匪开展斗争，使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1937年9月，李培福被庆环分区党委调回华池工作。11月，他被选为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这个岗位上他整整干了6

年。他一贯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真心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被誉为模范县长。特别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和县委、县政府的其他同志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全县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1938年到1940年全县开荒增加耕地面积12万2千6百多亩，对革命的贡献逐年增加，1938年交公粮720石，1941年3963石，1942年5930石。在组织群众大生产的同时，李培福以身作则，规定从县长到一般办事员，每人一把镢头，农忙季节上午劳动下午办公成为制度。要求县上干部每人每年生产粮食两石、区干部1石、乡干部6斗；脱产干部每年捻毛线5斤。据统计，1940年至1942年，全县机关于部共收入细粮296.6石；做到了机关经费和伙食全部自给。培福还要求并帮助自己的家庭争当村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他家不仅开荒多，他的叔父李潮还是全县率先种植棉花的带头人。在工作作风上他一贯雷厉风行。1941年边区政府一次下达华池县征兵任务300名，征粮任务1000石。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连夜从延安出发，6天路程只用了两天半就赶回县上；回来后紧急动员，仅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当年华池县被评为全边区征粮乙等模范县。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所以那些年华池的各项工作如举办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大搞卫生，以及民兵建设等等，样样都赶在前面。在工作方法上，他善于发现和培养典型，在全县树立了象张振财、乔连珠、高隆清、李潮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也教育改造了一大批“二流”子。培福还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1940年秋天，一次县政府通讯员因乘马受惊踏坏了一位农民的西瓜，培福得知后领着通讯员亲自到地边去向这位农民道歉，用自己的津贴赔了西瓜钱。这位农民感动得连声称颂他是“清官”，并要将此事报告毛主席。从此“县长赔瓜”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李培福和华池县的工作受到了党和上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不断受到表彰和在报纸上宣传报道。在1943年2月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上，李培福受到了西北局的表彰和奖励。在送给他的奖状上，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面向群众”四个大字。这年8月，党组织送他到中央党校进一步培养深造。1945年也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出席了“七大”。

1945年11月，李培福从中央党校毕业后重回陇东，担任陇东分区专署第一科科长。次年4月，到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他联合12位参议员提出了关于增产粮食提高农业技术的提案，经大会审议通过。8月，参与了陇东分区迎接慰问中原突围回边区的三五九旅的组织领导工作。11月，培福升任陇东分区副专员。

1947年，在陇东战役中，培福同地委、分区的领导一起，一面组织干部、家属安全转移；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搞好战勤服务和支前活动。同时他还亲自带领武工队深入敌战区，协助群众一边生产，一边开展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1948年2月，李培福任陇东分区专员。作为陇东地区的行政最高领导人，此时，他提出了许多对全区有影响的决策性的意见。在陇东地委召开的环县八寨原土改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纠正土改工作中“左”的偏差，确定了“枪补调补”的正确方针；在保安工作中，培福提出必须在肃反问题上纠正“左”比右好的思想；在战争中为了做到群众的合理负担，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战勤制度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强调实行“劳财共负，勤劳结合与计工算帐的战勤动员制度”；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他又提出了厉行节约、采摘野菜、多吃伙饭稀饭、计口下粮、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他发布了禁宰耕牛和母羊的命令。

1948年10月19日，李培福与黎光一起增补为中共甘肃工委委员，多次参加甘工委召开的重要会议，直接参与了解放前夕党在甘肃活动的重大决策问题。培福在任陇东专员期间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表现出高度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1949年春，他到华池县检查工作，发现县上积压有8起人命案，其中悦乐区六乡虐待致死媳妇案，群众强烈要求查处。培福听了情况后，对县法院的工作提出了严肃批评，责成立即查处。他还在《群众日报》上发表《对人民生命应严肃负责》的文章，要求陇东各县吸取教训，并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县近期司法工作作了一次认真检查，受到广大干部一致好评。

解放战争后期，驻守平凉一带的马继援八十二师，临覆灭前时刻伺机对解放区人民进行报复。1949年1月18日，马家骑兵对陇东分区首脑机关驻地元城进行了一次偷袭。在这次事件中，从侦察分析敌情到制定应变措施，再到指挥机关转移，培福都是首要指挥者，并亲自负责到底，表现了他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丰富的实际经验和果断精神。正因为如此，才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和人员无一伤亡，使分区机关得以安全转移，打破了马继援匪帮妄图一口吃掉陇东分区首脑机关的美梦。

1949年7月29日，正当迎接陇东解放之际，培福接中共西北局通知，接受了支援西路十九兵团解放兰州的新任务。从此，李培福离开了陇东。

全国解放后，李培福任兰州市军管会民政处长、甘肃省民政厅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副省长、省景泰电灌工程总指挥兼党组书记、省革委会河西农业工作组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以来，先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常委。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李培福一直保持着“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

員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83年4月30日凌晨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70岁。

（刘凤翔 陶兴范）

李 生 华

(1914——1987)

李生华，原籍陕西省榆林县，后逃荒定居甘肃省华池县。三十年代初即投身革命，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陇东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生华出生在榆林边缘山区，从小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7岁便随父母兄弟背井离乡，流落至陕西靖边，一家5口靠租田打工糊口度日。1928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不收，生华一家又从靖边逃往南梁白马庙，在当地一些热心的穷苦农民兄弟帮助下定居下来。父母租种了地主几亩薄田，兄长给人当了站年汉（招门女婿），生华成了冯姓地主的放羊娃。谁知天下地主心毒如蝎，原来冯家平时就总找岔欺负当地农民李五、李六两兄弟，生华在给冯家放羊期间，冯家硬诬陷李五、李六偷了他家的羊，并告到官府，还非要生华到官府为他作伪证。当时生华年纪虽小，可他坚决不干这昧良心的事。他不去作证，地主就接连毒打他几次，14岁的生华不堪虐待，便愤然离开了冯家。

出走后为谋生活出路，生华与二李结伴，去投奔有广大农民参加的帮会组织“哥老会”。途中得到父亲含恨死去的消息，生华又连忙星夜奔丧回家。家里除了一孔破窑洞，一无所有，他只得与悲痛欲绝的母亲一起用柳枝梢把父亲的尸体裹起来，草草安葬。

1930年，生华被张廷芝民团抓去当差。民团土匪成性，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做，生华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便多次寻机逃跑。谁知第二年刚逃出张廷芝民团，又被刘宝堂民团抓去当

兵。1933年他再次逃出，在南梁李姓木匠家挑分子干活。

这时，共产党在南梁一带“闹红”消息已经传开，李生华开始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0月，王泰吉、刘志丹回陕南游，奔关子墓园领张廷芝的招兵营和几股土国民团，为创建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障碍。立时南梁一带掀起了革命高潮。生华与李木匠便串联村里的进步青年，踊跃参加农会、雇工会，进行抗粮、抗款活动。1934年初，南梁一带最早的共产党员张惠福了解到生华的苦难身世及其思想表现后，就经常带着他走村串户，向贫苦农民兄弟宣传革命道理；还经常领他夜晚走10多里山路去开会，“商量穷人的事”。在吴旗三道川的官庙房，生华多次见到了刘志丹，还有习仲勋、蔡子伟等人。他们都把生华看成亲兄弟一样，生华也把他們当亲人，他们叫干啥他就干啥。这年5月，李生华由张惠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蔡子湾恢复。生华主动与陕甘边特委有关同志联系，积极筹备成立了白马区农民联合会，他被群众推选为会长。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李生华又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他按照边区政府制定颁布的《土地决议案》，在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及蔡子伟指导下，领导南梁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亲自指导各区、乡成立土地委员会，选拔土地委员长，亲自宣传土地政策，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丈量核实土地，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35年元月，生华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兼警卫连指导员。5月又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开始对南梁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生华随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政府转移到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生华表现坚决勇敢，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从1935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到1937年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李生华先后担任过瓦窑堡5区区委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管理科科长等职，为恢复和建设苏维埃政权，解决后勤保障供应问题出了力。

李生华始终能够坚持原则，服从革命需要。组织分配他干啥就干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又回到他原来战斗过的华池县，开始主要协助县委在四区宣传教育群众，查禁烟土（鸦片），不久担任华池县政府副主席，又改任县委组织部长，还曾担任庆环分区地委巡视员、曲子县三岔区委书记兼区长等职。他的一贯工作作风是坚持原则，雷厉风行，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李冒子”。

1940年，生华经组织派往延安行政学院学习。在这里使他这个放羊娃出身的革命干部学到了文化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头脑。1942年学习期满后，于3月回到陇东任庆阳市市长，翌年调任延属分区志丹县县长。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人民驱逐日本侵略者最困难的时期，解放区的财政经济 and 敌后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生华坚决执行党的“十大政策”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指导思想，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开荒种地，兴办合作社，组织运输队，种棉纺织，增加粮食生产和经济收入，在大生产运动中做出了突出成绩。他还发扬那种“冒子”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经常翻山越岭，深入乡村指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一次生华与一位同志外出工作，路遇5个土匪拦截，搏斗中生华被土匪抓住。这时他情急生智，见不远处有一个一两丈高的土崖，便不露声色地将土匪全诱到崖边，先使那位同志脱险，然后他猛然甩掉长袍，迅速跳下陡崖，继续赶路。

1946年2月中旬，经华池县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李生华又回到华池县任县长。他上任后，注重调查研究，根据新时期新任务，具体安排部署全县的经济工作，特别为迎接甘肃省和大西北人民的解放，在战勤动员和支前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在他和

县委、县政府其他负责同志共同努力下，华池县多次被评为模范县，受到党中央的嘉奖。特别在1947年5月西北野战军发起的陇东战役中，李生华与县委书记贺建山亲自带领华池县游击队及全县干部、群众积极配合支援发生在华池县境内的悦乐、将台战斗，很好地保障了后勤供应和战勤服务，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的赞扬。

1948年2月，生华调任陇东地委组织部长，兼任陇东分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7月任陇东分区专员；1951年10月，担任庆阳地委书记。在这一时期，他同庆阳地区的广大干部与群众一起，为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以及为完成庆阳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为适应从战争环境走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需要，1955年4月党送生华进入西北党校学习两年。毕业后于1957年7月调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61年1月任中共定西地委书记，1962年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当时，正是甘肃3年严重困难时期，他虽然患有严重胃病，仍不顾病痛折磨，深入静宁、定西等地，体察民情，听取群众的呼声，帮助当地群众生产救灾，把党的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头。

李生华一贯爱护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而对自己和子女却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谋私利。他虽是高级干部，但他的大女儿却一直在华池县农村当农民，而且体弱多病，家庭生活很困难。很多亲友、同事劝他把女儿带出去找个工作，他不肯，还开导女儿说：“到哪儿都是为社会做贡献，你应该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好好锻炼，并且照顾好你公、婆，使她们安度晚年。”那年他到女儿家，一进门看见女儿积劳成疾，身体更加瘦弱，那条本来病残的腿走路更不方便。他看在眼里，疼在心头，赶忙忍着胃疼吆

张 振 财

(1904——1988)

张振财，中等个头，敦敦实实，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始终显露出忠厚、刚毅和不断进取的性格。

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当年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出席过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现在这位被人们尊重的老英雄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那对于党、对于人民的耿耿忠心 and 奋斗不息的精神，至今仍被人们所怀念、所赞颂！

张振财出生在华池县城壕村，3岁丧母，靠父亲抚养成人。14岁开始上私塾4年，17岁结婚，24岁丧偶，留下一个吃奶的婴儿。从此，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就卷进人生的漩涡，开始了艰难的挣扎。

解放前的城壕村同其他地方一样，饥荒连年，民不聊生。好多百姓背井离乡，远奔他乡。张振财家里本来说不富裕，又家破妻亡，拖着不到周岁的孩子，日子更难熬。他白天同兄长给别人扛活，换来畜力给自家耕地，晚上怀抱婴儿喂面糊糊，时常彻夜不眠。还要时时提防土匪掠抢，躲避官府拉丁摊款。

1934年夏季，其堂兄张振兴受南梁赤卫军营长杨作高指示，在城壕一带搜集敌方情报，发展革命力量。张振兴知道张振财为人忠厚可靠，便首先找他商量；早有反抗意识，向往革命的张振财马上答应与堂兄一起干。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仍以作小生意为名，跑到敌区庆阳城了解情报，又从庆阳城买了两担柿子，担着赶到南梁。经杨作高引见，他俩见到了习仲勋和好多赤卫军战士。当他们把打探到的敌情汇报后，得到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表

扬和鼓励。习仲勋还询问了城壕川的各方面情况，向他们布置了工作任务，交待了注意事项。通过这次谈话，使张振财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党就派张秀山、夏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来到城壕一带发展党员，开辟庆北苏区。年底，城壕建立乡党支部、乡政府。至此张振财正式承担起了乡上的通讯联络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把幼小的孩子寄养在亲戚家里。在此期间，他们仍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每隔5天，跑一趟庆阳、驿马等地搜集情报，又将重要情报不失时机地送往南梁、二将川等地党组织。

1937年，一次他到庆阳城打探消息，被国民党抓去关押起来，坐了几十天监狱，他始终守口如瓶，未暴露身份。同时，在狱中他结识了难友——庆阳地下党员温大军，经温给他出主意想办法，蒙哄过敌人数次审讯，终于出狱了。经过这次考验，出狱后他更加谨慎小心，通讯联络工作再未发生任何问题。

1939年，城壕人民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生活有了改善，张振财已和哥哥分了家，他分得30亩地、2头牲口。不久，续娶了妻室，又生了孩子，寄养的孩子也领了回来。由于家务、孩子有人管理，再加上他起早贪黑劳动，没明没夜地干活，日子逐渐富裕起来。

1942年，党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张振财首先站出来积极响应。为了增加耕地面积，他抓住春雨季节，早上赶牲口开荒，下午扛镢头挖地，不到10天时间，开荒25亩，加上历年开的荒地，他一人种地98亩。收麦季节，龙口夺食。他白天割晚上背，一连6天6夜未睡觉，别人麦刚收一半，他家麦已全部归场。从此人们送了他个“张快人”的雅号。他家当年收获粮食27石（折合8100斤），人均2025斤，除过公粮、籽种和杂支外，人均口粮标准1800斤；他还利用农闲时间，从盐池运盐两驮，发动

村上人办起合作社，自己入股4100元（边币），并帮合作社到附近的志丹县做了两次生意，赚钱50000元（边币），他本人分红15000元。此外，又给政府种菜3亩，不要报酬。还经常给村上困难户借粮、借工具、借牲畜，帮助他们种地干活，受到全村群众的称赞。县政府为了表彰和奖励张振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年奖给他耕牛一头，县委书记高伯祥还在《解放日报》上以《开荒英雄——张振财》为题，撰文介绍了他的事迹。

张振财不但想到自己翻身，而且更多的是想到大家致富。他所在的城壕村，当时共9户，50口人，男女劳力18个，耕地面积772亩。有的缺牲畜，有的缺劳力，生活、生产上还有不少困难。张振财为使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1943年3月响应政府的号召，带头在村上组织起了变工队（下分两个扎工组），群众推选他任队长。上任后，他首先组织大家讨论制定了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计划；又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勤劳致富。他说：“革命前，我家6口人，每年要出40多元税款，折合10石粮食，一年苦死苦活，所剩粮食不能维持一家人生活。现在穷人翻了身，苛捐杂税都免了，去年，咱全村收粮167石，仅交公粮8石3斗，这全靠共产党政策好。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努力生产，能对起谁呢？我们是庄稼汉，只要多打粮食，就是支援前线，支援革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粮食生产上当年就抓了三条措施：一是扩大面积、广种多收。春季组织群众，牛耕人挖，新开荒地200多亩；二是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凡变工队经营的土地，除广施肥料、加强管理外，熟地耕两次下种，大秋作物锄草3次，谷类作物锄草4次；三是节约劳力，提高效率。根据活路多，劳力少的特点，各扎工组巧妙安排生产，千方百计地节约劳力。如第一扎工组5户人，变工前送粪时，每户赶一条驴，占5个劳力。变工后，赶5条驴只占两个劳力，节省3个劳力。又如种秋田时，原来4对牛占2个劳力，变工后4

对牛可以换班种，即上午两对牛耕，占4个劳力，下午另两对牛耕，原占4个劳力，这样换牛不换人，实际上种一天地，只占4个劳力。单就种地一项，这组全年节省牛工140多个，人工380个，提高效率25%左右。张振财领导生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无论生产与工作，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干好的自己先干好。群众经常赞扬说：“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张振财出现，哪里活苦活累，哪里就有‘铁人’在大干。”在他的领导下，变工队各户第一年就共收粮食280石，比上年增加113石，除过总支出，余粮81石，做到了“耕二余一”。其他副业收入也有所增加，各项工作如植树造林，优待抗、工属，支前，通讯，站哨防奸等都干得相当出色。他还帮助改造教育好了本村二流子×××，其他几个原来劳动不好的人，在他的感召帮助下，也树立了“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思想。

张振财由于组织变工队共同致富，成绩突出，1943年3月被评为县劳动英雄；11月初，被评为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参加了“分区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获奖彩色木匾一块，地委书记马文瑞亲书“劳动英雄”四个大字，还有水红毛呢布一匹，花毛毯一条，毡鞋一双。在万余军民参加的授奖大会上，张振财代表分区54名劳动英雄发了言，他用亲身经历感动大家“好好生产，爱护我们的八路军”。11月，他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他所在的城壕村亦被选为边区模范村。张振财以个人和模范村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他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李富春、杨清、徐向前、王震、周扬等领导人坐在一起，他和吴锦有（后叛变）、申长林等劳动英雄的肖像，被悬挂在主席台上。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与会英雄。宴会发言中，张振财第二个走上主席台，全面介

绍了他领导变工队的经验和成绩，得到了领导重视、全体代表的好评。之后，毛主席又专门找17位劳动英雄讲话，其中和张振财主要谈变工扎工问题，谈话从下午一直到深夜。通过聆听毛主席等领导人讲话，听取各位代表经验介绍，张振财受到深刻教育和极大鼓舞。会议中间，他积极响应大会通过的《劳动英雄公约》《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的号召，主动向大会递交了《创造模范行政村的计划》，决心将城壕乡第一行政村（10个自然村，34户，城壕村是其中之一）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做到“耕三余一”，力争实现“耕二余一”。这次会上，张振财获毛泽东亲笔题词和特等奖奖金3万元（边币），城壕村获锦旗一面，耕牛一头。

1944年，城壕行政村组织成11个变工小组，全年实行变工。在张振财的带领下，全村新开荒地375亩，修水地100亩，并且通过改良耕作技术，加强农作物管理等具体措施，当年全村增加细粮93石（合27900斤）实现了“耕一余一”。同时在种植棉花，运盐，发动妇女纺织，发展牛羊养猪，栽桑喂蚕以及防奸自卫，通讯，拥军拥政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12月，张振财第二次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仍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受到大会奖励。

1946年，他入党后，任中共城壕区国乡副支书。1954年到1956年，任城壕村城壕高级农业社社长。1963年，任城壕大队党支部书记。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张振财被“造反派”当“走资派”乱斗、夺权。此时此刻，他再没有权力带领群众搞大生产运动、搞社会主义建设。可是他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光明的，他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经过苦苦思索，他选准了植树造林的目标。当时，他虽然是60多岁的人了，但干起活来，英勇不减当年。他总是天不

明背上树苗（种），扛上饭头，带着干粮水壶上山栽树，晚上迟回家休息。小树成活后，为防止牛羊啃树，他在山上挖了窑洞，带上被褥，黑明昼夜看树，常常是几天，乃至几十天都不下山。

从那年起，他年年上山栽树。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动，精心抚育，如今他在白杨树山栽的杨、槐树，在驴尾巴梁种的桃杏树，早已联片成林，花果飘香。他在川地经营的苹果园和核桃园，现虽已承包给农户，收益归群众，但老英雄的功勋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张振财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参加了“甘肃省劳动模范和先进代表会议”。

张振财的儿子两个在外面工作，一个在家劳动。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我一辈子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今后，你们无论干啥，都要记住：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干事不要干损害党和人民的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张振财就是实践了这一人生道路和普通农民。他普通，又不普通。

（陶兴范）

戴 占 魁

(1915——1988)

戴占魁，原名王幼儿，曾化名戴彪，甘肃省华池县林镇乡豹子川王街子村人。

王家祖籍四川云安。不知哪一年，占魁的爷爷领着全家逃荒到甘肃省合水县的木瓜岭，以伐薪烧炭为生。爷爷去世后，父母经人介绍，给豹子川王街子村一位老太婆作养子、养媳。后来父亲染病去世，母亲只得又领着年幼的占魁去太白川崖寨村给地主白兴田家做雇工。一次放牛时突发山洪，一头小牛被淹死，地主便将占魁毒打一顿，并扣去全部工钱，还把母子赶出门。母子俩过了一年的乞讨生活后又回到豹子川落下脚。

1931年，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开始在豹子川一带活动，宣传“穷人联合起来，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分田分财产”、“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还常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服分给穷人。这给了占魁以深刻的影响，思想上萌发了参加革命的念头。

1933年秋冬，陕甘边红军在桥山山脉中段掀起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高潮。在戴占魁的家乡王街子村成立了“庆阳游击队”，当年占魁积极报名当了红军；不久又由游击队政委张秀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侄子王凤鸣也参加了革命。参加游击队后，为了免遭反动民团和土匪迫害家属，他才改换姓名叫戴占魁。

庆阳游击队成立后，配合主力红军曾先后在华池、合水一带活动，还曾开赴陇东正宁一带打了不少胜仗。戴占魁在打仗中表现很勇敢，一次，游击队和红军与七八百名马鸿宾的部队以及民

团相遇，他仅凭一支长剑杀敌一名，缴获步枪一支，战刀一把，受到队长杨培盛的表扬。在每次战斗中，戴占魁都表现很出色，不久被任命为庆阳游击队一支队一大队队长，为开辟庆北根据地和整个南梁根据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34年夏“阎家洼子会议”以后，庆阳游击队随主力红三团一起开赴陕北反“围剿”。回师后戴占魁带领庆阳游击队一个连在南梁阎洼子参加了组建红四十二师二团的整编。整编后，他任二团二连一排排长。旋即，他随部队一起光荣地参加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接受了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的检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周家硷联席会议精神，红四十二师主力开赴陕北，与陕北红军一起，粉碎敌人对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戴占魁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普通指挥员，随主力一起历时两个月，转战八百里，先后参加了吴家寨、马家坪、延长县、高桥镇、兴隆寨、李家坝、靖边县城等战斗。1935年初，一次戴占魁随红二团一少部分驻守安定县谢家沟，突遭几股民团和国民党正规军数百人的联合袭击。他奉命带领一排战士和少数游击队员从南面阻敌，一举歼敌20余人，获战马10多匹，并在夜间配合主力，乘胜袭击了安定榆树岭驻敌一个正规连和反动民团。整个夜袭战斗不足一小时，红军两战皆胜。紧接着戴占魁又在安定西区白庙岔一带开展斗争，保卫苏区人民过好春节。在随红二团转战陕北八个多月的时间内，戴占魁参加过大小战斗20余次。在解放靖边城（今张家畔）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到底。战后，刘志丹亲自看望他。陕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合改编后，他随二团编入七十八师，又参加过直罗镇战斗。1935年秋，戴占魁任七十八师特务连指导员。

“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新局面逐步形成。1936年年底，戴占魁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编入红大第八中

队。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离开红大，又回到陇东，任合水县独立营营长，不久任陇东分区特务连指导员。后来特务连调赴延安，编为中央保卫营第三连，他任连指导员。1938年9月参加中央军委组建的“千锤团”，深入华北敌后，扩大抗日武装，整整工作了4年。先任冀南军区教导队中队长，后任八路军七座十九团三营副营长。1941年夏，调任南宮县子弟营营长。他协助南宮县委和政府打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打开了新局面。一次戴占魁带领子弟营全营战士和千余群众在大马村、杜村切断日伪军的电话线，破坏公路，截击敌人，保卫麦收。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继续指挥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保住了群众的生命财产。戴占魁伤好后，又改任垂阳子弟营营长，带领部队活动于十八关村、新马庄、西双庙一带。

1943年后季，戴占魁调回陕甘宁边区的抗大总校（当时在陕北绥德），编入一大队学习两年。日本投降后，戴占魁由抗大总校抽调到干部团，在林枫、张秀山带领下奔赴东北。途中他被留在热河省，不久被分配到热东的凌源县，负责组建凌原支队的工作。

凌原位于冀东边区以北，北宁县以西，锦承县中间地带。我党或于部和部队挺进东北从喜峰口出关，都要经过这里，所以开辟凌原地区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戴占魁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于是他只身带着一支手枪，9粒子弹很快到凌源县报到。在县委和政府的帮助下，从县政府警卫队抽出一个连3门小炮，戴占魁化名戴彪，指挥这支部队，以凌源县卫戍司令部的名义很快活动起来。首先接管了伪满凌原县政府的布匹、粮食、大烟土等物资，救济贫苦市民，安定社会秩序。接着他又改造收编了当地赵九州、“满天飞”两支土匪武装，清剿了伪警察、特务豪绅反动武装。不到一月时间，便开辟了凌南地区，打通了青（龙）、兴（隆）到凌原的线路，为关内干部和部队挺进

东北打开了通路。当年11月末，戴占魁与县委书记刘维舟带150余人在凌原县东大城子一带剿匪。一次夜间突被数倍于己的土匪包围。战斗中他第三次负伤。但他忍疼一方面指挥突围，一方面联络增援部队。最后待两个连的增援部队赶到，戴占魁指挥部队发起冲锋，与增援部队分两路追歼敌人，大获全胜，毙敌100余，俘敌50多，缴获长短枪100余支，重机枪两挺，迫击炮4门，骡马50多匹，大车10余辆。

1946年6月，喀喇沁左翼一部分蒙古族进步青年为反抗国民党地方军和土匪势力的压迫，拉起了一支由30多人、10支枪组成的武装——蒙古支队。热东地委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派戴占魁去担任副支队长。戴占魁和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狠抓这支队伍的团结教育和发展壮大，因而政治素质和军事战斗力提高很快，到1947年便发展成为威震一时的蒙汉联军三十二团。1948年秋，戴占魁亲自指挥该团进行了绥中县明水塘门战斗，打死敌人50余，俘敌500余人，缴获轻机枪4挺，六〇炮6门，迫击炮两门以及大批美式步枪、弹药，受到了热东军区首长的表扬，一致称赞“犛子（戴占魁当时耳朵已聋——编者）团长能打胜仗！”

辽沈战役打响后，戴占魁随蒙汉联军三十二团往山海关参与阻击青皇岛、山海关方面增援锦州之敌，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出了力。战役结束后，蒙汉联军三十二团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四十一军，戴占魁任该军独立师十五团团长沙。1949年3月，独立师改编为四野南下干部团，戴占魁任大队长，随团南下到达武汉。不久又派他赴原国民党陈明仁部起义部队担任党代表。12月，起义部队改编为四野二十一兵团五十三军，戴占魁先后担任该军供给部、卫生部政委。1951年五十三军缩编为师，他担任师后勤部政委，在广西参加了“剿匪”斗争。1952年该师编入五十五军，戴占魁被留在武汉承担了向朝鲜接送兵员的任务。

1953年组织送他到桂林文化学校学习，1955年全军授衔时，他被授予上校军衔，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55年3月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舞阳县兵役局任第二政委。1959年调河南省军区工作。1964年，他带着革命战争年月留下的一身残疾，离开工作岗位休养。

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戴占魁从大西北转战到华北，又到中南、西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参加大小战斗无数，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战斗岗位变换不定，职务忽上忽下。但他始终牢记自己是讨饭花子出身，是穷苦人民的儿子，是党培养起来的一名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所以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始终信守党的“干部能上能下”的原则，遵守纪律，服从调动和分配，坚决完成党和部队交给的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不愧是老区人民的好儿子，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1988年3月27日戴占魁因病在河南省郑州市逝世，享年74岁，结束了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和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南梁。

（王来才）

黄 克 秀

(1910——1937)

黄克秀出生于安徽省黟县中阳乡一个家贫如洗的农民家里。乳名“锁儿”，寄托着父母祈求儿子“金锁扣魂，大福大贵”的美好愿望。

1916年春夏之交，黟县暴洪成灾，田园被淹，房舍倒塌，灾民死伤惨重，满目一片凄凉。入夏，虫害迭起，飞蝗蔽日，食禾殆尽，颗粒无收。为了活命，父母带着6岁的黄克秀和他的哥哥，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千里漂零，于翌年春来到合水县辖的大风川（今属华池县）。未久，能迁葫芦河的黄家沟门定居，靠租佃富裕户的几亩薄田苦度时光。克秀八、九岁上，就给当地财主放牛牧马、背柴挑水。因受生活磨练，他自幼练出了一付好身体和坚强不屈的性格。因他上树攀松鼠，爬山快如飞，伙伴们由此又送他一个雅号“黄猴子”。他机警灵敏，幼时就喜欢使枪弄棒，排兵布阵。用木头做的手枪，雕琢精细，染色考究，配上牛皮套子，酷似真的一样。在同龄孩子中，他很自然地被视为首领，连比他大的孩子都听他的命令。他虽个头不高，穿着蓝裤，却常带领同龄孩子做游戏，深受邻里们的喜爱。

他又很懂礼貌，和蔼谦逊。对于年长者，不是称大哥、大嫂，就是称大伯、大婶；碰上白发苍苍者，通称大爷、奶奶。即是见了同龄人，也不白搭话，不是称兄道弟，就是呼姐唤妹。别看小小年纪，却很富于阶级同情心和助人为乐的精神。遇到老弱妇孺有事，他都竭力相助；碰上穷家赤户，他也设法周济。谁家没水吃，他自告奋勇的争着挑；谁家没烧的，他就抽空背捆柴；谁家断了炊，他也毫不吝嗇地挤出自家口粮去救济。遇着富

家豪户，欺压穷人，他敢出来抱打不平。一天，他同几个伙伴上山放牛，摔跤玩得正起劲。不料，牛群冲进了一家富户的庄稼地里，这下可闯下了大祸。狠毒的户主，遂用木棒将一同伴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克秀见状，火冒三丈，当即联合起七八个同龄后生，直到将那个户主驯服方休。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太白收枪”震撼了子午岭山埃，也拨开了笼罩在桥山山脉中段的乌云。消息传入黄克秀的耳际，使他一下子高兴得跳了起来。他逢人就说，见人就讲，连连称赞，“干得好，干得好！”

1932年暮春，刘志丹派共产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筹建乡农会，创立赤卫军，进而发展党组织。黄德明来到葫芦河不久，就了解到黄克秀有胆有谋，办事豁达利落。遂物色他为重点发展对象，并很快与他结拜为“金兰”之谊。6月，正式成立了石马坪乡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担任了乡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3年3月，在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此时1933年正开辟照金根据地，5月份南下鄂华，在包家寨会议以前没有机会到合水发展游击战争——编者）和黄德明的协助下，葫芦河赤卫队扩建为东华池赤卫军大队，黄克秀担任大队长。同年6月，由黄德明单独发展黄克秀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共发展党员15名，遂于龚湾门罗家洼小学成立了葫芦河党支部，由黄克秀任第一任支部书记。赤卫军的活动与壮大，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合水地方当局的注视与不安。9月合水县保安队有10余名士兵秘密潜入葫芦河，侦探情报，当即被黄克秀率队缴械。从此，一般小股敌人再不敢轻易冒犯。

1934年2月，开辟南梁根据地的斗争如火如荼，黄克秀领导的游击队也活跃起来。4月他率领东华池赤卫军大队配合红四十二师主力作战，先后9战9捷，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初露锋芒。

芒。11月7日，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东华池赤卫军大队奉命改编为华池县政府保卫队，黄克秀任队长。1935年春改编为华池县政府保卫大队，黄仍任大队长，刘培清任政委，下辖3个中队。

1935年4月，国民党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冶成章旅（外号野骡子）和胡宗南六十一师杨步飞旅，相继进犯南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主力红军已经转移。黄克秀因熟悉地理环境，就地坚持游击活动，打击敌人。他神出鬼没对付敌人，敌人进村他上山，敌人上山他窜林，敌人追赶他迂回，敌人驻扎他扰乱。战斗中他率领的保卫大队共获战马5匹，驳壳枪13枝。

9月下旬，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陕北、陕甘边同时开始了“肃反”运动。一次一个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要黄克秀揭发刘志丹的所谓反革命罪行，黄克秀义正辞严地说：“全边区人民都唱‘刘志丹，是清官’……我也认为他是个清官。如果刘志丹成了反革命，那全边区的老百姓不就都成了反革命吗？”

11月初，国民党东北军一〇六师、一〇九师进驻合水太白一带。一天，有10多个散兵窜乡扰民，黄克秀得知事不宜迟，便单身一人上前堵截，并急中生智的呼喊：“一连追赶，二连殿后，三连在前边隐蔽；红军优待俘虏，只要缴枪决不伤人。”他突如其来的叫喊，使敌人信以为真，一个个被吓得呆若木鸡，乖乖放下枪弹，徒手而去。黄克秀单身一人，缴枪10支。

1936年7月，红军陕甘独立师在曲子县（今属环县）花旗村成立，隶属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领导，下辖4个团，黄克秀任红四团团长。

1937年7月18日，陕北土匪张廷芝妄图垂死挣扎，再次进犯陇东解放区。黄克秀奉命率红四团截剿，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二将川一仗，旗开得胜，毙张部团长李向银。7月20日，张部退逃华池县老爷岭，凭借天然屏障，据险顽抗，适值大雨倾盆，黄

克秀命令部队冒雨冲锋，一连突破敌人4道防线，当攻击第5道防线时，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红四团屡次冲锋仍不奏效，此时黄克秀脱掉上衣，用红布条束紧腹部，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他一手执旗，一手握枪，奋不顾身，拼命冲杀。正当他回头下令同志们：“誓与阵地共存亡！”的一刹那，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脐部，顷刻倒在血泊之中！卒时，年仅27岁。

黄克秀从1932年担任葫芦河赤卫队队长到1936年7月任陕甘独立师红四团团长及至1937年7月牺牲，在这短短5年内，他率领指战员，转战于桥山山脉的陕西富县、保安、志丹、吴旗、张家湾、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套简原，平泉和甘肃的环县、曲子、庆阳、华池、合水、宁县的王乐等地，与土匪、反动民团、国民党军队激战不知多少次，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亲手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李根娃、冉老九、沈安福等。他的事迹至今被合水人民传颂着。

（曹清珂 任守彦）

边 金 山

(1898——1935)

边金山，合水县太白乡王茂庄人，祖籍陕西省横山县固城涧。自小务农，识字不多，为人耿直，处事利落。早年跟随刘志丹为创建南梁红色革命根据地英勇战斗，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在保卫南梁苏区及合水县建党建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横山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固城涧更是山大沟深、地瘠民贫。旧社会在军阀、土豪的盘剥下，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困生活。1910年金山刚满13岁父亲就去世了，家境更加贫困。尚未成年的金山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官绅富豪的欺压，苦难生活的逼迫，使金山从小就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仇恨地主豪绅，向往革命。

1926年，横山大旱，夏、秋无收，饿殍载道，哭声盈野，苦难情状不堪目睹。边金山全家背井离乡，逃荒讨饭，流落到合水县的二将川（今属华池县所辖），垦种荒地，在此安家。

1928年，陇东大旱，颗粒无收，于午岭山区饥民在郑德明、朱子清、赵连壁等正义农民的组织领导下，为求生存起来和土豪劣绅对抗，打富济贫，开仓放粮，闹得官府豪绅胆颤心惊，惶恐不安。边金山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同年秋，这场自发的饥民斗争，得到了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兼军委书记刘志丹的热切关注和及时指导，使这些并无主见的农民受到了革命真理的教育，逐步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边金山也同时受到启蒙，心灵深处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0年10月，刘志丹创建南梁武装，边金山积极响应。一次

他受刘志丹委托，秘密护送游击队一名伤员去葫芦河川崖寨石窟养伤，工作做得十分周密，使敌人毫无察觉，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从此，组织上经常给他布置侦察敌情的任务，任务完成的都很出色。1933年，他正式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边金山当选为军事委员长。同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刘志丹）。是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华池县、淳安县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边金山当选为淳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为创建南梁红色政权，做出了贡献。

1935年3月，国民党军队马鸿宾部“围剿”南梁根据地，战斗相当残酷，边金山随南梁政府迁往洛河川下寺湾。9、10月间，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与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相继到达陕北。直罗镇一战，消灭了敌东北军牛元峰一个师并一〇六师一个团。边金山于同年底随边区政府重返南梁根据地。

1936年3月，边金山任陕北办事处主任。同年4月，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加强地方骨干力量，边金山调任华池县林镇区政府主席。是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谈判将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5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边金山随八路军民运工作团来合水县二区八乡搞民运工作（此时政权属国民党）。工作中他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为合水建党建政作了一定工作。

1937年3月，边金山调任合水县太白区抗敌后方援助委员会（简称后援会）主任（实为区委书记）。他与秘书万青山劝降了国民党太白镇联保主任黄有发，缴获步枪32枝，手枪1枝及全部弹药。中共合水县委书记朱敏超称边金山、万青山二人为镇守太白的“两架山”。

1940年3月，合水县正式建立民主政权，边金山调任太白区

委书记兼区长。1941年5月至1946年6月，任西华池市长。西华池为边区通往国统区贸易集散之地，繁荣非凡，他为市政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47年4月又调任太白区委书记。

1949年7月，陇东全区解放。8月，边金山调任庆阳专区合作办事处主任。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庆阳地区供销合作事业工作，直至1955年2月病逝于任上，终年58岁。边金山逝世后，中央领导同志、甘肃省委、省政府发来唁电，庆阳地区及各县党政机关都敬献了花圈，在西峰市举行隆重追悼会，《陇东报》刊登了他的生平事迹，党和人民给了他高度的评价。

（李成章）

石 秀 山

(1911——1968)

石秀山，甘肃省合水县肖嘴乡枣卜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

石秀山自幼聪颖而且性格刚直，心胸开朗，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由于他自幼就遭受封建地主剥削和官僚豪绅的压榨，目睹当地人民群众贫困悲惨的生活现实，所以少年时期的石秀山萌发了仇恨旧的社会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13岁入私塾读书，老师徐立忠是位思想比较进步且具有正义感的农村知识分子，石秀山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陇东民间流传的阶级压迫和反压迫斗争的故事，学到了一些新的文化知识，于是头脑里的反封建斗争意识更加明确和坚定。1927年陇东大旱，饥荒进一步威胁着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命，也威胁着石秀山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就没有进过学校门。

1930年6月初，保长刘兴汉带着狗腿子到石家逼要粮款，打伤了秀山的父亲，还要拉走耕牛，刚满19岁的石秀山悲愤至极，便顺手操起一把铁锨，将刘兴汉打倒在地，刘见势不妙，爬起来带着人溜走了。石秀山的这一勇敢行动在肖嘴一带震动很大，得到了乡亲们赞扬和支持，但也招来了大祸，他不得不离家躲藏。此后，刘兴汉带着狗腿子接二连三闯进石家，搜捕秀山，搜不到就用枣条抽打他的父亲，又打伤了他的老奶奶，抢走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

为了报仇，石秀山于1933年进了当地石恒才的民团。在民团里干了两年，他练了一手好枪法，但他也看清了民团并不是农民的保护者，而只不过是土军阀谭世麟的看家工具，于是便愤然离

开民团，重又回家种地。这时土豪刘兴汉仍不放 过他。1935 年秋，刘兴汉再一次因索要苛捐杂税，又把石秀山的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卧床不起。

正当石秀山急于进行反复斗争而又无路可走的时候，肖嘴一带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他很快结识了地下共产党员王启州。1936 年，地下党组织指示他联络当地上层人士赵建义、顾金海，到杨定藩民团进行策反活动，不久就做通了陈宗耀、肖文芝、傅生龙等7名团丁的工作，于中秋节夜晚，里应外合缴获了这个反动民团的枪支弹药，处决了反动团头杨定藩。这年9月底他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任命为新宁县三支队中队长。1938 年石秀山所在部队北上，行军途中他顺便请假探亲，为 留 家 照顾病中的父母未能归队，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0年2月，合水县政府成立，肖嘴区由宁县划归合水县管辖，称为五区，石秀山任五区五乡自卫军连长。他很快发展了石道发、石道智、石廷川、石恒荣、肖国璋、李得胜等30多名自卫军队员。同年4月，他又任五区自卫军营长。1942年9月，经区委书记康显荣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但带领自卫军积极开展军事训练，还响应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1943年他带领五区自卫军开荒300多亩，产粮50多石，还养猪70口，牛驴5头，骡马3匹，购置大车一辆。

从1945年1月起，石秀山开始任五区区长，1947年1月又改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指导员；当年8月被任命为合水县游击大队队长（县委书记李科兼任政委，唐凤仪、李正良任副大队长）。石秀山在领导游击队从事游击战争中，一贯沉着机智、英勇果断，对同志、对下级在纪律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备至；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解放战争刚开始，当敌人进攻赤城时，他曾7昼夜不睡觉，来回查哨，监视敌人。他所领导的游击队纪律严明，团结一致，能打善战，被称为“石家父子兵”，深受群众拥

护，因此敌人轻易不敢进犯合水五区，有力的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和生命安全。

1947年3月西华池战斗后，段家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5月初敌马步芳部队向合水五区梅家寨子进逼。搜索解放军警三旅五团和游击队去向。石秀山获悉情报后，连夜把游击队从梅家寨子撤出，隐蔽到肖嘴土堡子里。然后他一方面派出工作人员，装成外地人，四处放风说来了解放军大部队，并动员老百姓送粮送草；同时让游击队在城墙上架起很多木梯，用白布裹起来，伪装成大炮，还在城内外挖了几百处炉灶，生起炉火。当敌人窜到离肖嘴约二里远的老爷庙时，发现肖嘴堡子内外炊烟四起，城墙上枪弹林立，堡子里传出歌声，还有老百姓向堡子里送粮送草，便以为真的遇了解放军大部队，吓得立刻调转头退往南义城。石秀山利用疑兵计，没伤一兵一卒，阻止了敌人进犯。

不久（5月中旬），敌胡宗南的新一旅又进犯宁县、合水。其一营窜到子午岭午亭子一带被解放军警三旅五团一举歼灭，其二营前往增援已来不及，便驻守在距段家集10多里的郝家湾堡子里，三营盘踞在沟对面徐家窑。这时国民党宁县保安队也有恃无恐，蠢蠢而动，从南义向段家集方向去援助敌二营。石秀山探清敌情后，便带领游击队首先在梅家寨子阻截击溃了敌宁县保安队；又经请示上级批准，设计袭击郝家堡子里的敌人。他命令石道智、杨云山带领二排诱敌出城，其余队员埋伏城东西两面。敌人被诱出城后，游击队便从东西两面夹击，敌人向北逃窜遇到悬崖挡道，只好向南窜到沟底。这样，沟对面的敌三营果然误以为是解放军游击队向他们进攻来了，便向沟底的敌二营猛烈开火，他们自相残杀，伤亡惨重。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石秀山有勇有谋，且善于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的军事才能。战后他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传令嘉奖，荣获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陇东正规野战军转入外线

作战，合水县境内只有游击大队坚持就地斗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一时甚嚣尘上，敌县谍报队长何有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并四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合水县长胡宗彦和游击大队长石秀山。石秀山根据县委指示，为了除掉这个恶棍，经过反复侦察，得知何有将于12月16日要前往柳沟崖退粮款，他便带领游击队事先埋伏到华严寺，一举歼灭何部30多人，何有被当场击毙，为民除了大害。1949年2月，石秀山又带领游击大队，协同二区武工队，在西华池消灭了敌合水县的最后一股反动武装——张胜维的自卫队。至此国民党在合水县的反动势力便基本土崩瓦解，为最后彻底解放合水扫清了道路。

1949年8月，随着解放大西北胜利形势的发展，石秀山调离合水，任隆德县县长，1952年改任该县县委书记。1957年4月调任平凉专区运输公司党委书记；庆、平两专区分设后，又调任庆阳专区运输公司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于1968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时年56岁！

石秀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无限热爱；对敌人斗争勇敢坚决，指挥作战灵活机动。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是合水人民学习的榜样。

（李成章）

何 炳 正

(1910——1935)

1933年深秋，正宁县榆林子文乐村，发生了一起一次杀死5名团丁的重大事件，惊动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四处缉拿“囚犯”。这次事件的为首者就是“平子游击队”的创始人何炳正。

何炳正家住文乐村，世代以农为本。父亲何虎臣青年时期身体雄健、力气超群，曾考取过武秀才，他为人正派，处事公道，乐为人办事。远亲近邻，凡遇婚丧嫁娶，或发生田户纠纷、家事不和等，都承意请他说公断直，颇有声望。年过半百之后，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便把家务重担交给儿子，自己则更多的为他人帮忙管些“闲事”。那年国民党正宁县长乐区选“绅士”，便被乡邻们选为绅士。但由于他刚直不阿，敢向地方上百姓说话而不向官府献殷勤，不久就被国民党民团申通官府“革”了“职”。不知因啥事惹了民团，革职后仍不得安宁，民团还常借机给何家找岔子。为躲民团，炳正的父亲便常到合水固城川老友赵凤鸣处居住。赵凤鸣是哥老会，何虎臣早年也加入过哥老会。

炳正乳名宝成，弟兄五人，他排行老四。炳正生性刚烈，胆量过人，且时常出门在外，见多识广，有勇有谋。一家人和和睦睦，人强劳壮，勤劳节俭，除种地外还在村上开了个中药铺，办了个染坊，日子虽不算十分富裕，倒也红红火火。炳正弟兄平时与亲邻之间相处友好，鱼水相帮，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则时时表现出愤愤不平。一次长乐王堡子民团张维西带两个团丁到文乐催款，炳正的侄子何满棵没来得及躲避被团丁抓住。满棵刚说了句“投的交”，就被捆绑索绑，拳打足踢。当时炳正兄弟正在家干

活。闻讯赶去，和村里十几名青年小伙将张维西3人围住讲理。张维西见众怒难犯，怕吃眼前亏，只得将满襟放了。因这些民团经常下乡作威作福，敲诈勒索，炳正他们一伙血气方刚的青年早已恨之入骨，所以这次便起了杀掉这3个坏蛋之意。只是乡邻们怕惹出祸来，连累大家，劝阻了炳正他们的行动。这件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但苛捐杂税和差役却比以前更重了。三天两头有人上何家的门，捎信带话警告他们：“小心着”、“造反当红军是要杀头的！”炳正一家越来越感觉即将有灾祸临头的一天；同样，复仇反抗的种子在何炳正心中也一天天开始发芽了。

1932年后季，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在宜君、耀县等地打土豪，其后又到了合水，刘志丹从拓儿原下到小墰子赵凤鸣家里。刘志丹与赵凤鸣也很熟悉，他早就把赵凤鸣作为统战对象，常对赵进行革命宣传，赵对红军游击队也有过不少帮助。这次刘志丹到赵家来，适逢何炳正的父亲何虎臣也在这里。何虎臣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大名和陕甘游击队的事，经赵凤鸣介绍，两人相识以后，虎臣便向刘志丹诉说了正宁县国民党和地方衙门、民间欺压百姓，连他这个“绅士”都被欺负得有家难归的种种情况。刘志丹告诉他，国民党的腐败已成不治之症，不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老百姓就永无出头之日。共产党就是领导红军为劳苦群众打天下的，红军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不起来不行了，象你这样家大业大都还受气，更何况穷苦人家呢？再不能坐以待毙，要团结起来斗争才有生路。又说：你儿孙一大群，都已长大成人，让他们出来一起跟我们干吧。刘志丹一席话说得何虎臣心里亮堂堂，他因自己不识几个字，提不起笔，便当即请刘志丹给儿子何炳正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决定自己的路。过了几天，一个孙子来看他，便把这封信捎给了炳正。

何炳正读了刘志丹的信，心里顿时象点起了一盏灯，激动得彻夜不眠。他想再不能象上次那样冒冒失失蛮干，应该组织起来

投红军，找共产党。他心里有了主张后，便把家里的刀矛磨得闪闪发亮。串通周围10多名要好青年，在他家的水围台习枪练棒，准备待机行事。练了一阵，他想和拿枪的敌人斗争，只靠几杆大刀长矛不行，得想办法弄枪。1933年农历8月的一天夜晚，何炳正与伙伴商量，准备去习件夺取保甲的枪。正在这时，有人说本村李维祥家来了5名团丁，正吃肉喝酒。原来李维祥被迫在民团当团丁，本人不愿干前几天偷跑了，今天5名团丁是来抓维祥的。他们没抓到维祥，便将维祥的两个叔父抓起来，绑在圈架上，逼他们交出维祥，交不出人就要几百块大洋。一家人没办法，只得杀鸡打酒招待，求情宽恕。何炳正听到这个情况后，便当机立断，先去拾掇了这几个人再去习件夺枪。趁天黑，炳正带着20多名青年，操起家伙，从水围台上原来到李家，见整个村子一片漆黑，只有李家闪着灯光。他们在暗里探清情况后，蹑两人把定大门，炳正带其他人一拥而进。团丁们正在炕上抽大烟，这时吓得把烟枪一摔，爬起来摸枪反抗，但因炳正他们抢先一步，夺枪在手，稍经搏斗，5名团丁便成了刀下鬼。因搏斗中炳正左臂受伤，便放弃了去习件的计划，摸黑返回水围台。

“暴动”发生后，正宁县民团惊恐万状，查封了何家的门，搜捕何家的人，把个文乐村闹得鸡飞狗跳墙，连坐月子婆娘都吓得离家躲藏起来。何炳正带领参加了暴动的伙伴，还有他十二、三岁的侄儿何南福，扛起夺来的5支枪，先后在乎子原和合水县固城川活动，边打土豪边打听刘志丹游击队的下落。他自己还亲自到赵风鸣处询问刘志丹的消息，为了隐身方便还在赵风鸣那里加入了哥老会。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刘志丹及其游击队。刘志丹对何炳正及其同伴大加称赞，认为他们干得好，鼓励他们加强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提高军政素质，发展队伍，锻炼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在跟随刘志丹队伍共同活动的日子里，刘志丹还给何炳正不断讲革命道理，使他阶级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他的暴动队伍也正式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红军游击队。刘志丹让他担任队长，派张策（一说殷云山）担任指导员，让他们把队伍带回去打游击。因他们经常活动在平子一带，就命名为“平子游击队”。很快由20来人，发展到40多人，分为两个分队。

平子游击队成立后，震动很大，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凶相有所收敛，贫苦农民受到了鼓舞，看到了榜样。在平子游击队的支持下，刘永培领导了丰城暴动，拉起了又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平子游击队除发展地方武装力量，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外，还多次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建立了不少功绩。

经过战斗洗礼，平子游击队茁壮成长，人员从40余名发展到100多人，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素质好，战斗力很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1934年春被编入第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是三路指挥部的主力支队之一。后来又从其中抽调骨干，相继组建了新正县第八支队、新正县武工队。1934年9月，平子游击队即第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编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何炳正担任了一连连长。

在共产党的培养下，经过战斗生活的艰苦磨练，何炳正从开始指挥一支40余人的小小游击队，到带领100多人的正规连队，神出鬼没，攻坚夺险，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立过不少战功。他打仗勇敢，身先士卒，指挥灵活，随机应变，深受同志们的爱戴。

1935年元月，何炳正带领的一连在豹子川遭国民党马家军冶成章部包围。激战中，他左腿被机枪打断，血流如注，仍坚持指挥部队突围，后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何炳正的侄子何满福后来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苏惠民 彭晓东）

杜 宛

(? ——1935)

杜宛，陕西省兰田县人，中共早期党员，正宁地区革命创始人之一。

杜宛在北大上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萌发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抱负。毕业后，他回到渭南中学任教，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传播进步思想。在学生中组织进步团体，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1933年2月，受中共渭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他和杜林治、李尚勤三人来到正宁耿头原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到耿头后，首先在五顷原子、西荆、孟家河、龙咀子等靠近山边地带开展群众工作。

杜宛知识渊博，富于表达能力，讲起革命道理来总是一套一套的，句句都说出了穷苦人们的心里话。他以各种身份为掩护，深入群众，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讲井冈山斗争的情况，讲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是带着穷人闹翻身的队伍，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引导大家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平易近人，说话和气，穷苦人都喜欢听他讲述革命。不长时间，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郭廷藩、郭存信、卢永财、左怀玉、郭自发、郭洪超等都成为他的忠实助手。经过半年时间的宣传教育，先后接收了郭廷藩、郭存信、左怀玉、郭自发等4人为正宁地区首批中共党员。7月下旬，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在杜宛的领导下，利用党员人地熟悉，亲戚联系广的特点，深入到各家各户，串连鼓动，进一步拓宽了宣传的范围。为时不久，在五顷原子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赤卫军、贫农团等革命群众

组织。同时，涑头原向东的十多个村庄的穷苦人民也活动起来了，村与村之间互通消息，配合行动。在杜宛的领导下，一面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开展对敌斗争。当时群众手中还没有武器，可涑头、寺村、涑池沟等地都驻有国民党的民团和正规军。为了打击敌人，杜宛召集青年积极分子，买来绿红纸，白天写好宣传标语，晚上分头去贴，天亮后，敌人据点村庄四周的墙上、树上，到处都贴着：“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穷苦人民起来闹革命！”等标语。敌人一看惊慌极了，到处打听看：“是不是红军游击队夜间来过了？”这种办法使国民党民团及部队摸不着头脑，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更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扩大革命活动范围，杜宛以这些党员为骨干，经常利用晚上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布置任务，分头开展工作。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将活动区域分为三片。他和段老六在涑头，杜林治在三寨，李尚勤在阳坡头，分片活动，统一部署，逐步把革命向南推进。在他们的紧张工作下，到10月，已发展了25名中共党员，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与此同时，杜宛还在涑头原大力组织贫农团、赤卫军，建立游击队等，并参与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使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33年11月，盘踞在宁县春荣的国民党庞明胜民团经常在桃树庄一带骚扰行劫，残害百姓。杜宛和郭廷藩等人研究，决定给敌以打击。中旬一天，他们带回民游击队配合耀县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击溃了反动民团的进犯，打死打伤敌七、八人，俘虏10人，余敌分头逃窜。接着又攻克麻子掌，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没收了其财产，平毁了土围子，扫除了红军游击队行动上的障碍，打通了桃树庄通往上珍子的道路。为开辟宁县活动区域，杜宛及时派李进荣、郭自发留此地进行群众工作。

1934年2月，杜宛和郭廷藩率正宁县游击队返回正宁五顷原。

盘踞猴头之国民党部队闻讯仓惶撤退，猴头广大地区又回到人民的怀抱。根据群众反映，国民党部队占据猴头后，一些反革命分子勾结民团，横行乡里，对游击队活动不利，于是杜宛和郭延藩指挥，及时除掉了首恶分子郭章升等3人，为民除了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同年9月，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在宜君县小石崖成立了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杜宛当选为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

在陕甘边南区党委的领导下，杜宛继续在正宁，并派出李连荣、秦善秀、赵红钧等一批骨干分子向宁县、旬邑、淳化、彬县等地发展，为进一步建立全县党政组织创造了条件。

1935年5月，杜宛协助正宁县办事处筹备新正县党的组织。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8月中共新正县委员会和正、旬、彬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新正县的革命斗争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正县委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中心内容的土改运动。首先在阳坡头的南岭村进行土改试点后，在一、二、三乡开始土地分配。土改一开始，杜宛便带10多名党员骨干组成一个工作组，每天深入到群众之中，查看地形，倾听群众意见，晚上开会商量，制订方案，工作十分紧张，有时一连几夜不能合眼。方案一定，他们就组织贫农团定等丈量，插上木牌子，地就成了穷苦人自己的地了。

土地改革的进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穷苦农民的积极性，可是一些地主恶霸肆意煽动破坏，杜宛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巩固革命成果，及时发动群众，打击了守旧顽固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姚基，没收了他家的财产，使周围的土豪劣绅受到了教育。

正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日益发展壮大之际，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到陕甘苏区。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

派鲁寅任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主持“肃反”，鲁寅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在关中党内实行逼、供、信，乱抓人，乱杀人。在这场错误的肃反中，时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组织部长的杜宛及其他5名共产党员被活埋在新正二区贾连坡。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及时制止了左倾路线的蔓延。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彻底纠正了朱理智、郭洪涛等人在陕甘边苏区主持的这场错误肃反，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杜宛和所有在“肃反”中蒙难受害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平反昭雪。

杜宛（1904—1942），原名杜仲，字子衡，陕西渭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渭南县委宣传部长、渭南县委组织部长、渭南县委代书记、渭南县委第一书记、渭南县委第二书记、渭南县委第三书记、渭南县委第四书记、渭南县委第五书记、渭南县委第六书记、渭南县委第七书记、渭南县委第八书记、渭南县委第九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二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三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四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五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六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七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八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一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二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三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四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五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六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七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八书记、渭南县委第九十九书记、渭南县委第一百书记。

秦善秀

(1906——1936)

秦善秀是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原回民乡西头村人，正宁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在反“围剿”斗争中，一腔热血洒在康家原上，为建立和保卫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秦善秀的家乡正宁县五顷原开辟游击根据地，在那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虽然那次斗争由于李良执行“左”倾路线，导致了陕甘游击队的失败，但陕甘游击队英勇战斗，全心全意为穷人打天下的行动，对秦善秀影响很大，这时在他思想里已经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4年初，张仲良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来到这里，不久党的地下工作者杜宛、李尚勤等也来到这一带，重新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杜宛、李尚勤与游击队互相配合，进行秘密串连，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秦善秀与其他一些青年农民，因早已受到刘志丹部队的影响，心中埋下的革命种子这时便萌发了。不久，秦善秀经李尚勤等介绍，在五顷原西头村与其他几个青年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湫头一带成立中共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秦善秀担任宣传委员。

秦善秀入党后，受组织委派，在底庙一带发动群众，准备组建一支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他走村串户，了解情况，进行革命宣传，把一些出身贫寒、思想进步的青年团结起来，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很快在群众中扎下了根，为组建革命武装打下了基础。一次群众告诉他，产杨村有个外号叫“七先生”的，在旬邑县民团亲戚那里搞回了7支步枪要办保甲。秦善秀考虑这是个难

得的好机会，一定要把这几支枪搞到手。但是“七先生”住的寨子三面临沟，地势险要，要采取硬攻的办法是攻不下来的；于是秦善秀便做通其内部人员的思想工作，然后通过内线，里应外合，未动一枪一刀把7支枪搞了出来。用这几支枪装备了一支游击队，闹红了底庙区。

1934年底，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国民党旬邑县民团团总万盈山带着民团来到底庙镇，要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天正逢集日，他下令四门封锁戒严，对赶集群众挨个搜身检查，杀害无辜。他还派出大批团丁下乡催粮要款，就象阎王逼命一样。秦善秀与赵德荣（赵快娃）的游击队配合，决心除掉这股散人。一次万盈山手下几个团丁又来产场催粮，村长是地下共产党员，便把情况报告给秦善秀。秦善秀当即立断，带游击队迅速赶到产场抓住这几个团丁。他向团丁交待政策说：“只要你们改邪归正，将功补过，可以宽大处理。”几个团丁一听有活路，连忙表示只要不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秦善秀和游击队员都装扮成抗粮不交的老百姓，腰里插着短枪，押着团丁叫他们走在前面，向底庙走去，并吩咐团丁到了城下要照他说的办，谁如果不老实小心脑袋。来到城下，城门紧闭，城楼上站着荷枪的哨兵。哨兵老远就喊：“站住，干什么的？”团丁按秦善秀交待的忙答：“那是些抗粮不交的老百姓，交万团总看咋办哩。”哨兵看是自己人下乡抓回了一些抗粮的老百姓，便打开了城门。游击队员乘势一拥而上，下了哨兵的枪，冲进城内活捉了万盈山，缴了团丁的武器，释放了被捉来的壮丁和抗粮抗款的群众。事后处决了万盈山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劣绅。

处决万盈山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底庙周围几十里，那些有劣迹的豪绅丧了胆，穷苦百姓心里乐开了花。秦善秀和他领导的底庙游击队也名声大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陕甘边南区党

委决定以底庙为中心向外发展，将新正六区（即底庙）改为永红县。秦善秀负责筹建，于1935年10月正式完成永红县的建制。

1936年初，秦善秀被任命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张邦英为副主席。后来国民党的东北军向关中发动进攻，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奉命向北转移，秦善秀留下就地坚持斗争。他立场坚定，斗争顽强，战胜了许多困难。不久，中共新宁县委书记焦怀兴在乐兴战斗中牺牲，秦善秀又被调新宁县接替焦怀兴的职务。当时新宁县共7个乡，除平道川一个乡外，其余全部被国民党占领。县委、县政府和游击队只得化整为零，沿子午岭山区与敌人兜圈子，坚持游击战争，环境十分艰难和危险。秦善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他带领游击队结山林，经常吃不上饭，只能以刚脱雷的山杏充饥，仍顽强不屈的打击敌人。

这年夏初，一天秦善秀和老崔一起外出，夜宿康家原一群众家里。第二天早晨被鹿明胜民团发现，他和老崔急忙下到山沟，躲在一只烂窑洞里。敌人跟踪追至，秦善秀和老崔便以半截山墙为掩护，与敌人死拼，打得敌人不敢前进，最后弹尽无援，仍拒绝投降。二人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野兽般的敌人为了邀功请赏，临走时还割下了他们的耳朵。

（苏惠民 彭晓东）

马全德 马全普 王世英

马全德（1905——1948）、马全普（1910——1948）、王世英（1906——1948），他们3人同是回民，同是清末民初逃难到正宁县五顷原回民乡龙咀子村定居，同是新正县回民游击队的优秀代表。

1932年，陕甘游击队来到新正一带活动，试图建立革命根据地。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又在这里以子午岭为依托，发展党员、组织赤卫军、建立农会，逐步开辟南区根据地。在张仲良、杜宛、李尚勤等人的启发下，马全德、马全普、王世英等10多名回民青年积极联合起来，建立了西北第一支回民游击队。王世英任指导员。回民游击队建立后，首先和汉民同胞紧密配合，团结战斗，共同对付豪绅恶霸、地主民团。其次是在正铜、郃铜公路一带，以子午岭为天然屏障，配合正规军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袭击和消灭敌人。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王世英与王世平一起带领回民游击队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白天站岗放哨，晚上和地主豪绅、恶霸、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他们先后镇压了王世乾、石万财等10多名罪大恶极、破坏革命的恶霸地主，有力地发动和支持了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

1934年，回民游击队改编为陕甘红军三路游击队第十六支队（亦称回民支队）。王世英继续任指导员，全队发展到20多人，有步枪10多支。成为三路游击队战斗力较强的骨干力量。同年10月，在宜君县小石崖召开中共陕甘边南区代表大会和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王世英奉命带领十六支队担负大会警卫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1935年夏季的一天，王世英得到报告：“有一股国民党败兵7人，带一挺轻机枪正向山河方向逃奔。”王世英、马全德、马全普商量后，带领十六支队绕道急行军赶在败兵前面的庙梁设伏。庙梁是打伏击仗的好地方，长约5里，东接乔原，西临于木沟，南北两面是陡峭的深沟，全梁周围是柏林。支队埋伏下来，待敌一到，发起猛攻，7个败兵全被活捉，缴获步枪6支，轻机枪1挺，子弹500余发，手榴弹20多枚。

1936年，国民党东北军对西北根据地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地处关中分区的新正县正面受敌，首当其冲。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为避敌之锐，奉命到外线作战，只留下回民支队就地坚持斗争。进犯中，敌军一部闯入龙咀子村，抢掠粮食70余石，残杀耕畜30多头，羊70多只。王世英等面对强敌，带领支队组织群众，整顿清野，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声东击西，虚实就虚，忽进忽退，弄得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撤离龙咀子村。一天，东北军一部乘隙窜进五顷原横行无忌，他们仗着人多，装备齐全，明目张胆地打家劫舍，无恶不作，闹得鸡犬不宁。正在这时，隐藏在柏林中的马全普和游击队员突然冲来，一梭子弹射出去，行抢的敌军接连栽倒几个，其它敌兵见状惊若木鸡，扭头转向，抛下手中的猎物狼狈逃窜了。马全普的行动，使敌深受惊恐。从此，一年多时间虽国民党军不敢轻易入侵五顷原。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解放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十六支队在王世英的带领下，保持高度警惕，不分日夜地守卫着已得的胜利果实。可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自食其言，破坏团结，驻新正的国民党政府军属部奉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有意挑起事端，制造摩擦，逐渐蚕食新正地区，王世英等带领十六支队又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不久，国民党调集优势兵力“围剿”陕甘宁边区，全面实行经济封锁。当时岷头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军的一个重要目标。岷头若被敌占领，不仅直接威胁新正后方，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关中分区马兰通往新宁的邮路，形势严峻。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边区政府派出干部在龙咀子成立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协会关中分会，并将十六支队改编为关中回民支队，马全德任队长，卢文秀任指导员（后叛变，由郑一担任，郑调离后由马全普担任），加强了领导力量，隶属关中分区司令部和新正县委双重领导，装备由分区供给。

王世英因战斗负伤转入地方，后任一区九乡民兵连长，带领民兵坚持地方斗争，保卫地方安全。1945年又兼任一区民兵营长。同年腊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四十八旅8日向一区岷头镇发动全面进攻。得知情报后，王世英即派民兵日夜兼程，翻山越岭，把情报送给关中地委，关中军分区遂派警一旅二十一团，于4日奔抵岷头镇，后经分析，鉴于国民党重兵“围剿”，不宜抗击，随即决定迅速组织群众疏散撤离，避敌之锋芒，暂放弃岷头。由于情报及时、准确、安排得当，胡宗南部扑来时，新正县党政机关和群众已安全转移新宁一带山区，使人民群众免遭一场劫难。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四旅警一旅、警三旅、骑兵师在九顷西洼与国民党政府军新编八二师马德援部发生激战，双方伤亡惨重，警三旅南下休整，途中将120多名伤病员交给新正县，安置在龙咀子、西原、孟家河一带治疗休养。王世英带领一区民兵日夜警戒巡逻，保卫安全。由于他安排周密，马家军曾两次来这里企图包围搜查，均未得逞。

王世英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奋勇杀敌屡建战功，不论在前线或在地方，都是顽强不屈，英勇斗敌，成了敌人的眼中钉。1948年11月，在龙咀子被叛徒杀害，年仅42岁。

关中回民支队成立后，由于形势变化，不久马全普担任了支

队指导员。马全德、马全普两个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硬汉子，在革命斗争中很快锻炼成长为中共党员和军事指挥员。他们志同道合，同舟共济，带领回民支队英勇战斗，屡建功绩。

1947年2月，关中回民支队改编为新正县独立营八连，马全德任连长，马全普任指导员。

同年7月，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兵围约2000余众向关中方向移动，企图乘机偷袭关中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马全德、马全普率领八连战士日夜守卫在新正县和国民党正宁县的交界处，把敌人死死地牵制在雕翎关，使敌进退维谷。4月5日，八连得到敌军派偵探来五原探听消息的情报后，马全德、马全普经过分析敌情，制定了伏击敌人的方案。他们在壕堑设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马全德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迅速出击，当场毙敌3人，俘虏11人，获短枪1支，长枪13支。在马全德、马全普的指挥下，八连主动出击，连连获胜，使国民党雕翎关驻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轻举妄动。7月间，雕翎关驻敌因粮草不济、军心涣散，为了应急，欲谋抄小路向西突围，要求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在半路予以接应。情报被八连截获，马全德、马全普立即决定在敌必经之地——皮房店伏击。第二天，敌倾巢出动，沿山道探索行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狠狠打击敌人，马全德、马全普商定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首先占据有利地形，当敌先头部队（的一个营的兵力）进入埋伏区后，马全德怒喝一声“同志们，打——”霎时间，枪声大作，弹如飞蝗，恐慌的敌军不明真象，顿时乱作一团，狼狽逃命，又退向了雕翎关。这场战斗打死打伤敌20余名，缴获步枪50余支，机枪3挺，子弹万余发，八连战士无一伤亡，从此，八连声威大震，马全德、马全普也受到上级表扬。

1948年2月，新正独立营八连归编二十一团二营六连，马全德任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马全普任指导员。六连下辖3个排，200多人，有步枪200多支，机枪6挺，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

装。

马全德、马全普经过多次战斗的锻炼，使他们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不仅英勇果断，而且善于分析研究，他们每遇情况，能紧密配合，制定可行的计划、方案。正由于这样，他们所带领的六连从小到大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解家川是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交界处的一个要塞，从1940年被国民党盘踞，在这里修筑了碉堡等军事设施，以此作为窥视和侵袭我边区的主要据点，派30多人把守，装备精良，由于战略位置的关系，国民党西北行辕三七总部还在这里住有五、六名高级特务，国民党政府要员经常来往于此。对我新正根据地威胁极大。关中分区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任务交给六连。马全德、马全普在关中情报人员的配合下，经多次侦察，发现国民党据点地势特殊，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不易接近，于是他们经过周密的分析最后决定智取。在地下人员的协助下，头天将部分战士疏散在周围群众家中，利用第二天农历二月二敌哨长去山河赶庙会的机会，派十数名战士和当地百姓带了慰问品以农村过二月二节为名，慰问当地驻敌，在敌堡内设酒摆宴，行令猜拳，此时混在看戏群众中的六连战士趁机分布在周围，中午时分，路上人稀了，堡内驻敌已吃饱喝足，麻痹至极，六连迅速拿下哨兵，冲进敌堡，周围呐喊助战，使敌如梦初醒，乖乖举手就擒。为免敌援兵赶来，马全德下令一把火点燃了敌堡，押着俘虏回了新正一区。

这次行动未发一枪，俘敌30余名，缴机枪1挺，步枪30余支，子弹数千发，手榴弹20多箱及文件等其它物资。

解家川据点被摧毁，使敌恼羞成怒，多次扬言要血洗南区，收复失地，增布重兵，但那都成了泄愤的空话，解家川再也没有敌兵的影子了。

同年冬，马全德、马全普带领六连配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耀县一带活动。四纵队奉命转移时，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部从

平凉调来一骑兵团，企图骚扰四纵安全转移，马全德、马全普带领六连担任掩护工作。他们分析敌人道路不熟，一定要从口子峡这个地方经过。于是就在这里设好埋伏，把主力部队报废了的13门大炮横七竖八地乱摆在大路上，又在多处布满地雷、炸药包，昼夜坚守，待敌上钩。第三天敌军来了，一见此状，误以为是四纵仓惶败退，便得意忘形，一窝蜂冲上去抢大炮、捞枪支。顿时，地雷、炸药包一齐开花，火光四起，响声震天，硝烟弥漫，接着六连发起猛攻，骄横的敌人连人带马葬身于山谷之中，幸存者狼狽逃命去了。从而保证了四纵安全转移。此役共缴获长短枪40余支，八二炮9门。

同年11月，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党的统战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旬邑县县长郝登阁欲谋弃暗投明，率部起义。23日，马全德、马全普奉命率六连配合警一旅二十一团前往接应。部队行至张洪镇，不料中了国民党政府军八二师的埋伏，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六连指战员奋勇冲杀，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过大，多次突围未能奏效，除少数指战员突出重围外，马全德、马全普等大部分同志均壮烈牺牲。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马全德、马全普、王世英等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回民游击队从一个十几人的小武装发展成为200余人的正规军队，在陕甘边一带，打破汉、回民族的界线，团结一致，并肩战斗，以就地坚持游击战为主，并配合正规部队转战陕甘边各地，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为保卫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创下了不朽的业绩，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民族解放的壮歌，用生命迎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黎明！

（苏惠民）

李 长 春

(1903—1958)

李长春，新正县五区四乡（今永正）人，1933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40里长乐原上党的早期组织者和活动者之一。

李长春兄弟6个，他排行老三。由于家境贫寒，他10多岁就和兄长跟随父亲给人扛长工，打短工。后来，在亲戚帮助下租种了永正徐家头徐某的一份土地，他家就从上官庄迁到徐家头居住，弟兄们继续外出扛长工补充生活。

1932年秋，正在给人卖苦力干活的李长春听说南原（歇头原）来了红军游击队，在五顷原一带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是专门为穷苦百姓办事的队伍。他一心想去看个究竟。次年初，他瞒着父母兄弟，偷偷跑到歇头，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红军游击队里，李长春积极勇敢，斗争坚决，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二十六军二团某连任班长。

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部队被打散。撤退中李长春失足落崖，历尽艰辛，后来化装出山回到家中。因伤势过重行走不便，他以后再未能归随部队，在当地继续坚持革命。他首先和早期曾在这一带活动的范勤发、李彦清等取得联系，然后分头串亲访友，秘密宣传，物色培养积极分子，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上官庄支部，李长春任支部书记。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聂家店、里塔、东龙头、白草洼等10多个村庄，发展党员20多名，领导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8年，国民党政府东北军某部驻官河、南庄一带。一天，十四、五个骑兵从官河赶往永正，在马家洼和东龙头催收粮草，

李长春得知消息后，立即召集党员进行研究，一方面派人与新正三支队联系，一方面布置力量，埋伏在袁某家的院子四周。然后派人将敌诱进院内进行酒肉款待。酒至半酣，李长春指挥把这家座背上的柴草撮点着，连推带搡，抛向院内。正在大吃二喝的东北军忽见大火从天而降，又听枪声、呐喊声从四周响起，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乖乖就擒，使李长春等夺得战马11匹，步枪7支。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为了减少冲突，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划界，李长春所在的新正五区划归国民党正宁县管辖。从此，李长春所领导的上官庄支部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但上官庄党支部的活动最终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在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摩擦”事件时，永正镇公所镇长李自林将李长春抓去，采用“压杠子”、“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逼他供出共产党的活动和共产党员名单，引诱他自首。可是不论顽固派怎样软硬兼施，李长春始终大义凛然，不供一词。最后顽固派没捞到任何油水，又抓不住任何证据，只得把他放回。李长春被摧残得几个月不能站立行走，造成终身残废，步履艰难。

李长春被放回后，身残志不残，把自己家里当作联络点和指挥中心继续领导着上官庄党支部坚持地下斗争。他时常派出荔步玉等人以卖牲口、赶集为掩护，到南区（底庙）和朱彪（新正六区区委书记）、吕世玉（新正县委统战部长）等人联系，汇报情况，请示工作。

1945年，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李长春奉上级指示，领导支部全体党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地下活动，他们采用各种方法，打进了国民党的各级政府，以争取中间分子，分化顽固势力，打击反动分子，及时了解和掌握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向。他们支部的11名党员中，到国民党自卫队当战士1人、队长1人，当保长1人，甲长1人，国民党正宁县参议员1人，代表1人。这些人到国民党政府任职后，不但保护了群众利益，而且为革命积蓄了力量。

1947年，九嵕西注战斗失利，关中分区八一团团的箱俱被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抢去，正宁县用这些箱俱办起了剧团。10月的一天，国民党正宁县剧团来到永正镇唱戏。李长春安排上官庄支部与新政县一区区干队配合，趁晚上戏毕人散之际，一轰而上，又全部夺回了这些箱俱，连夜送回徽头镇。

解放后，李长春虽身残不能出门，仍任中共永正区委副书记。1958年病故，终年55岁。他的一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一生。

（苏惠民 彭晓东）

张 进 元

(1905—1962)

在正宁县的寺村原，提及陕甘边的革命历程，人们就会记起那个泼辣、强悍的穷汉子，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副主席——张进元。

张进元，正宁县锹头乡车家沟人。弟兄5个，他排行老大。在万恶的旧社会，父亲被折磨得病魔缠身，母亲又过早去世，只有未成年的他和多病的父亲常年给永和一家范姓扛长工维持生活。

1932年，三嘉原来了红军，帮助穷人闹革命。二十七、八岁的张进元早就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他日夜都想着要参加红军游击队，打倒地主老财，长长穷苦人的志气。不几天，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谢治儒的率领下，从三嘉原来到寺村原，住在新庄子、苟仁一带，在这里组织赤卫军、贫农团，打土豪、分田产，同时，处决了永和原大豪绅赵元亨和其走狗龚得功。广大穷苦人民拍手称快。张进元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毅然放弃了长工活，参加了赤卫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活动，寺村原上至五顷原，下至南坡头的上五社、下五社、北八社70多个村庄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从此，着手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张进元一家光棍父子6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日子穷得精光，是方圆数得上的穷家。可他走上革命道路后，认识明确，意志坚决，在开展革命活动中积极勇敢，无所畏惧。加之他身强体壮，胆大会说，声音宏亮，说起话好像敲钟一样，大小场合不快。因此，当时他被物色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候选人。

3月22日，广润的寺村原数十个村庄的上千名群众潮水般地涌向新庄子参加“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张进元当选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并代表穷苦人讲了话。他号召广大穷苦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坚定地走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他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他的讲话虽然简短几句，可是热情洋溢，精神振奋，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群众高兴地说“穷苦人真的当家做主了。”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在五原开展了土地革命。张进元带领广大赤卫军和穷苦人民全面开始进行土地分配运动，一时形成声势，斗争进行得热火朝天，使广大缺地或少地的穷苦农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第一次尝到了革命的甜头。

同年8月下旬，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使初次创立的寺村原革命根据地受到挫折，在国民党正宁县派兵围攻下，革命部队不得不撤出五原到石底子、转角一带。部队撤走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不久，年幼的革命根据地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国民党军队占领寺村原后，到处搜捕革命积极分子，残害革命家属，张进元无奈携带父兄离开家乡，在三嘉原桃花山种地栖身。翌年2月，红二十六军返回寺村原，开展苏区的收复工作，张进元趁机也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后又参加了正宁县八支队，配合红军进行地方游击活动。

在张进元的影响下，他兄弟5人都参加了革命活动，老二一直没有离开家乡，配合群众活动，老三被胡宗南部拉去，偷跑回家，二次遭胡捕后死于西安集中营，老四在五原、王家河一带开展地方工作，老五后来编入支前大队跟随部队转战南北，支援战争。

1934年张进元因病回家，1962年病故。

（苏惠民 彭晓东）

张 清 益

(1903——1966)

张清益，新正县三区一乡（雷庄）人，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受尽生活的磨难，他尝了人间的辛酸。他10岁丧父，母亲带他和一个小妹妹，寄居在一个堂兄家里。母亲给人家上粥做饭，他成了一名小童工，苦熬苦挨3年，14岁时离开堂兄家，张清益自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他在生活中磨炼出了一个坚强不屈的性格，不甘心看别人的白眼，坚持独立生活。开始他挑担卖青果，后来又瞅准了开荒种地的门路。白天卖青果，晚上到附近的尚家塔荒山去开荒，生活渐渐有了着落。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他家乡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张清益除自己开出的7亩荒地外，又分得山地30亩。他和其他农民一样，把红军分给他的土地当成命根子，终日勤勤恳恳地劳动，决心务好庄稼，多打粮食，过上好日子，挺挺腰杆，为穷人争口气。由于他有力气，又拼命干，不几年就翻了身，不仅有足够的粮食吃，而且还有了些积蓄，在雷庄村成为人们看得起的种田能手和红火户。

1935年，雷庄成立乡苏维埃政府，张清益被选为乡主席；同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又动员群众，组织开荒队，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1936年初，国民党政府东北军发动对关中特区进攻，新正县被敌人占领。在敌人“围剿”清乡中，张清益为了有利于坚持就地斗争，在村里办起了一所保立小学，选派一名可靠的同志当教员，他自己在学校当管理员。两人把学校作为地方党、游击队秘

密活动的联络点，他们掩护革命同志，搜集和传送情报，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同年10月以后，关中苏区相继收复，区、乡政权重新建立，张清益又担任一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过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新正县供销社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边区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号召，1940年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一伟大运动中，张清益首创了开义田、办义仓的经验和先进事迹，传遍了整个关中和陕甘宁边区。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张清益就满腔热情，积极响应，因为他就是从开荒种地中走过来的，翻身后他又曾组织过开荒队，亲身体会到这是一条发展生产的好路子。他一方面自己没黑没明苦干，做出样子，走在前面，另一方面组织群众开展劳动竞赛，争取多开荒地。当年全新正县开荒地3300亩，他们所在的三区名列全县前茅，受到表扬。1941年在生产发展，粮食增收，人民生活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张清益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设想。他想：丰收之年应该依靠和组织大家积蓄一点粮食，一个乡集中起来，有收有支，逐渐积累，既可防灾备荒，又能支援抗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经过反复琢磨，他的思想成熟了，如果发动大家投工开出一份公共的荒地，公地产的粮食归大家所有，统一储存使用，逐年积累起来不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他把自己的想法提出后，立刻得到本村群众的一致拥护，又经过大家讨论补充，一套方案完成了。在他的堂兄帮助下，把这个方法叫办“义仓”，集体开的公田叫“义田”，义田打的粮食叫“义仓粮”。1942年初春，全县开会安排大生产运动计划时，张清益把他的想法和群众讨论的办法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史梓铭听后大加赞赏，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鼓励他回去后组织群众大胆试办。张清益回乡后，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首先在一个乡实行，并在群众大会上

作了动员。提出第一年先在雷庄开义田20亩，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动力，每人给义田出工25天。这个计划到3月底实际完成义田32亩，当年净收义仓粮1600斤。翌年春，用这些义仓粮解决了部分缺粮农户的春荒，保证了生产的顺利发展。

雷庄创办义仓的经验，在新正三区整个传开了，都说这是为穷人办了一件大好事，对开展大生产运动是一个推动。反过来张清益又被这种热情支持所感动，他决心扩大试办范围，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办好。他利用集日，在长舌头街上进行了3次公开讲演，介绍雷庄办义仓的好处和经验，号召各乡群众都能挤出一点时间，开义田，办义仓，防备荒年，支援前线。在他的倡导下，1943年三区共办起义仓23处；二区共31个行政村，其中26个就办起了义仓。这一年雷庄乡的义仓进一步巩固发展，共办起5处，开荒地65亩，收义仓粮5000多斤。

义仓办起来以后，积累的粮食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办好这一公益事业，领导种好义田，管好用好义仓粮，张清益又在雷庄组织了一个义仓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管理办法：

一、义仓粮统一管理，动用须经义仓管理委员会通过，村民委员会批准；

二、义仓粮救济贫苦群众，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时，经申请借出；

三、参加开义田者1斗收利1升，未参加者1斗收利3升；

四、半年借粮，秋后本利归清，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收；

五、不务正业，抽烟玩赌，不参加生产者拒绝借粮。

这样，义仓既使生活困难的群众生活有了依托，也大大激发了群众生产热情。1943年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号召进一步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张清益开义田，建义仓的创举在全关中分区推开，各县普遍开展起“向张清益学习，建立义仓，防备荒年，支

援战争”的群众运动。从4月10日到5月1日,短短的22天时间里,关中金分区开义仓田16000多亩。新正县共4434户,有劳力6900多个,其中5576名劳力都参加了办义仓活动,占劳动力总数的80%。这年开义仓田1100多亩,收获义仓粮218000余斤。

张清益的创举也赢得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解放日报》、《群众日报》都多次连续登载他和雷庄义仓的经验和先进事迹;他本人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先后出席了1943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张清益仍然保持了他劳动英雄的本色,发扬当年创办义仓的那股革命干劲,那股创业精神。在合作化运动中他担任支部书记,老当益壮,带领广大群众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中共陕西省旬邑县树立为“十面红旗”之一。之后他被多次选为人民代表,先后光荣地出席县、省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交给的神圣权利。

1966年1月,这位深受人民尊敬的劳动英雄,因病与世长辞。

(苏惠民 彭晓东)

郭 振 海

(1915——1979)

郭振海，出生在正宁县蒲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他懂事时起，就挑起羊鞭给地主放羊，维持生活。

1932年，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的五顷原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郭振海家同许许多多贫苦农民一样，高高兴兴地分得了一份土地，从此摆脱了地主的剥削压迫，生活有了着落。郭振海从内心感谢红军，感谢共产党。他每天一有空就去找游击队员聊天、攀谈。通过接触和了解，郭振海深深认识到红军才是人民的军队，贫苦百姓的真正救星。他决心参加游击队，誓为穷人打天下。为了不受父母阻拦，郭振海趁红军开拔的机会，偷偷跟着部队走了。

1933年，红二十六军南下在富平失利，突围中郭振海与部队失去联系，一度流落当地，一边打工，一边打探红军消息，几经周折，于年底重返部队。1935年在红二十六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振海在历次战斗中，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不止一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和战士们的赞誉。因此，很快被提任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之职。1937年后，又调任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参谋、警一旅三团二营营长。在此期间，他率部驰骋疆场，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做出了一定贡献。

全国解放后，组织选派他到南京军事学校进修。期满后，于1952年奉命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副师长，赴朝鲜作战。抗美援朝结束，郭振海归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军区副司令员。1979年5月因病逝世。（苏惠民 彭晓东）

代 彦 禄

(1918——1981)

代彦禄，甘肃省正宁县罗川乡代家店村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解放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教导员、团长、副师长、三九一一部队党委常委、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军级）等职。

代彦禄在他4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曾参加和参与指挥过淮海、济南、渡江等重大战役，是一名勇敢的人民战士，优秀的指挥员。

(苏惠民 彭晓东)

高 平

(1916——1985)

高平，甘肃省正宁县永和于家庄人，1932年参加陕甘红军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高平一直在陕甘苏区和陕甘宁边区骑兵部队工作。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连长、教导队长、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并在“红大”、“抗大”、中央党校参加过学习。

高平曾参加过陕甘苏区、陕甘宁边区的多次反围剿和反摩擦斗争，他5次受伤，多次受到表扬奖励。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派到少数民族地区做民族部队的领导工作。历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东线指挥部副指挥、伊盟蒙汉支队副支队长、伊盟支队副司令员、伊盟军区党委书记、副司令员。解放初期，高平又先后担任伊盟、榆林两区联防剿匪前线副指挥，继续主持伊盟的军事工作。在剿匪、肃反、改造旧军队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中，立了新功。1955年高平从军事学院毕业后调华北部队工作，历任野战部队师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1985年10月6日病逝于北京。

高平是久经考验的红军老战士，长期的革命斗争铸成了他优良的品格。作为战士，他执行命令坚决，杀敌勇敢，无私无畏；作为指挥员，他机智果敢，多谋善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有坚强的党性，很强的革命事业心。他克己奉公，不计较个人得失，磊落诚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逝世后，中央军委追认他为副兵团级干部。

(苏惠民 彭晓东)

王 孝 锡

(1903——1928)

王孝锡，又名存身，字晓五，甘肃省宁县太昌人。他是陇东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中共陇东第一个党组织创建人之一，党在甘肃省早期的革命活动家。

(一)

王孝锡3岁进入家乡太昌镇小学读书，1913年赴平凉考入省立第二中学，开始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逐步树立起反封建的观点和斗争意志。1921年5月，因反对学校参加当局为封建遗老魏宝山举行的“地方特别纪念”会，并当场发表演说，被校方开除；他只得徒步跋涉到兰州，入国语讲习所就读。次年省立二中校长易人后，他才又返回原校学习至毕业。

1923年底，王孝锡考入西北国立大学。在西北上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上的文章，并开始与著名共产党员刘含初、魏野畴等接触，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任西北大学学生会主任。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后，王孝锡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學生罢课游行。这年暑期回家途经陕西永寿县时正逢集日，他不顾疲劳，在街头向赶集的群众发表演说，揭露“五卅”惨案真相，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及反动军阀卖国媚外的丑恶面目。回到家乡后，他与任鼎昌（宜之）、王晓时（彦圣）等组织了甘肃省第一个青年革命团体——“青年社”，发展社员苟一轩、赵灵渊、于心甫、于纳言、王教图、王九元、于紫琪、赵秉仁等二三十人，开过两次社员会，还利用集日组织社员上街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动员男人剪辫，女子放足。

1925年冬，王孝锡又在西北大学组织了“旅陕青年会”，号召甘、宁、青同学参加，当时参加本组织的陇东籍学生十多人，并起草发表了“告陇东十七县父老兄弟书”，以此唤醒民众，启迪人民的觉悟。这一时期，王孝锡受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开展平民教育活动的影响，也于1925年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在西北大学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平民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失学失业青年和劳苦群众。王孝锡不仅是平民学校的热心筹办者，也是其中最认真负责的义务教师。他热情的帮助学生提高文化，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

由于王孝锡积极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刊物，接近党的组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实际革命活动，便逐渐由一名激进青年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1926年经吕佑乾等人介绍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王孝锡进一步树立了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斗争意志更加坚强。1926年军阀吴佩孚为了达到重新统治陕西的目的，派心腹刘镇华率部10万之众入潼关，兵临西安城下。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及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杨虎城团结陕军，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在此期间，西安市外的学生不能出城回家。中共党的组织为了把学生组织起来，安定城市秩序，稳定人心，通过西安学生联合会办起了暑期学校。王孝锡与其他一批共产党员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王孝锡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忍饥挨饿，辛劳奔波，坚持斗争到底，有力地支持了护城斗争。

西安解围后，党组织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派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到冯玉祥部队各军、师中去，加强了党在部队的力量。1927年初，钱绍泉、宣侠父、延国符、张一悟等领导国民党左派，在兰州驱逐了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解散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并改组了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田昆山等

1925年冬，王孝锡又在西北大学组织了“旅陕青年会”，号召甘、宁、青同学参加。当时参加本组织的陇东籍学生十多人，并起草发表了“告陇东十七县父老兄弟书”，以此唤醒民众，启迪人民的觉悟。这一时期，王孝锡受戴野畴等共产党员开展平民教育活动的影 响，也于1925年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在西北大学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平民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失学失业青年和劳苦群众。王孝锡不仅是平民学校的热心筹办者，也是其中最认真负责的义务教师。他热情的帮助学生提高文化，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

由于王孝锡积极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刊物，接近党的组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实际革命活动，便逐渐由一名激进青年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1926年经吕佑乾等人介绍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王孝锡进一步树立了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斗争意志更加坚强。1926年军阀吴佩孚为了达到重新统治陕西的目的，派心腹刘镇华率部10万之众入潼关，兵临西安城下。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及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杨虎城团结陕军，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在此期间，西安市外的学生不能出城回家。中共党的组织为了把学生组织起来，安定城市秩序，稳定人心，通过西安学生联合会办起了暑期学校。王孝锡与其他一批共产党员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王孝锡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忍饥挨饿，辛劳奔波，坚持斗争到底，有力地支持了护城斗争。

西安解围后，党组织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派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到冯玉祥部队各军、师中去，加强了党在部队的力量。1927年初，钱绍泉、宣侠父、延国符、张一悟等领导国民党左派，在兰州驱逐了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解散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并改组了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田昆山等

人到郑州找冯玉祥控告延国符、钱靖泉等，冯电令刘郁芬将延、钱等押解赴陕，严办其他“闹事”共产党员，并命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的负责人派人来甘调查。当时，开封政治分会的负责人刘伯坚（共产党员）遂派胡廷楨、马凌山、保至善、王孝锡4人为“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来甘整理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的党务工作。

王孝锡与其他三同志抵兰后，首先整顿了甘肃省党部，加强了共产党对甘肃革命力量的领导。胡廷楨担任了省党部常务委员，马凌山为组织部长，王孝锡为青年部长，并被委任为国民联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保至善为农工部部长。与此同时，他们还改造了中共甘肃省特别支部，胡廷楨当选为特支书记，王孝锡为组织部长，马凌山为宣传部长。1927年3月，王孝锡在兰州开始了青年社的组建工作，他以兰州女子师范和兰州一中作为青年社主要活动阵地，发动谈仲瑜、王友璋、冯玉洁、豆香菊等四处串联，在学生中积极发展社员，于4月初在省教育会大厅召开了青年社成立大会，王孝锡向大会作了报告，讲了该社成立的目的、任务和意义，号召广大青年以苏联共青团员为楷模，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大会选举王孝锡为青年社社长，马凌山为书记，王友璋、黄绍男等6人为执行委员，先后发展社员300多人。这一时期，王孝锡领导的青年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吓得军阀报纸惊呼：王孝锡等“抵甘后大肆活动，组织了CY（共青团英文缩写），参加青年甚多，并分布甘肃临近各县。甘肃全境已布满赤色恐怖。”

同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19名共产党员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噩耗传来，震惊兰州。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立即在兰州东教场和临洮等地公开举行追悼大会，声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残杀革命的罪行。王孝锡还发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校刊出了《追悼北

京死难烈士专号》，他在“专号”上发表了一首《悼北京死难烈士》诗，高歌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控诉敌人的卑鄙无耻，表示要前赴后继，斗争到底。他写道：

霹雳一声

在阴霾沉沉 妖氛弥漫的北京

现出霞光万道

主义的鲜花

烈士的血星

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发抖中 你们的精神

高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你们的声音

革命导师

人类明星

.....

你们是为党

为国

为全人类求解放而牺牲

.....

可是诸君的鲜血 深注在我们的脑中

应当怎样努力

前进 奋斗 杀贼

才能完你们未竟之功

勉你们在天之灵

这首义愤填膺，慷慨悲壮的诗篇发表以后，许多官兵和群众看了都流下热泪，激发起对革命的向往与同情。

白色恐怖渐渐笼罩西北，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开始在“西北”清党。6月底，冯玉祥电调王孝锡、胡廷桢、马凌山，保至善去郑州。他们到洛阳时，得知冯已开始“礼送”共产党，刘伯坚已去汉口。不得已他们只好到汉口请示工作。党组织指示他们

仍回西北坚持斗争。王孝锡与胡廷楨返回西安时，保至善已不幸被捕，党组织指示他们回甘肃。8月二人一同来到宁县太昌；在此之前，王晓时、王之经、王尚义、任鼎昌等也先后回到了家乡。于是，他们就共同商定在甘肃及陕甘交界的宁县、长武、彬县、旬邑等地进行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发展地下党组织；时不久胡廷楨离开宁县回临夏开展工作。

（二）

王孝锡等回宁县后，开展了大量工作，主要是：

1、整顿青年社组织，加强政治宣传。

1927年秋，王孝锡组织共产党员王晓时、王之经、任鼎昌等在宁县太昌重新整顿了1925年暑期成立的青年社，重新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在青年社里，他亲自讲课，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又进行讨论，解答疑难，并提出“宣传组织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他们几次同太昌小学学生一起，常常利用逢集日（每10天4次）的机会上街演说，宣传群众。

2、组织驱逐贪脏县长 索呈祥，“烂脏”校长杨蕃昌的斗争。

索呈祥在宁县任职期间，贪脏枉法，高推浮收，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群众早已恨之入骨。为了惩治索呈祥，王孝锡等发动进步青年与进步士绅，深入宁县四乡调查索的劣迹罪证，编成材料，以“宁县绅民联合会”的名义（此时实际上并无此组织）向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提起控诉。在群众斗争的强大压力下，甘肃当局不得不将索撤职查办，追回了赃款800块银元，以充作教育经费。

宁县太昌小学校长杨蕃昌不学无术，是个庸才，师生对其极为不满。王孝锡同王晓时一起，鼓励学生提出了“打倒烂脏校长杨蕃昌”的口号，并写成标语贴上街头，这次斗争迫使宁县当局

终于解除了杨的校长职务。

3、组织“中共宁县支部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太昌临时区委会。

王孝锡返回家乡后，通过积极工作，谨慎活动，于1927年秋成立了宁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县支部执行委员会（一说鄯宁支部，待考）。过了一段时间，又扩大成立了临时区委会，下辖宁县、长武、泾河川3个支部，共发展党员33名。其中宁县支部王孝锡任书记，王晓时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关于党员发展及组建太昌临时区委的问题，王孝锡于1928年农历8月曾专门写过一份汇报材料：“我自回来，立即召集旧支执委荀××、王××成立临时区委会，作暂时指导。待各支整理就绪时，再行选举正式区委。在此过渡时期，太昌区委我们3人荀××、王××与我智编为第一支，并指导中学工作。中学有于××、王××，派王××跨团作团中书记；泾河川为第二支，大学12人，分作4个小组，同志分住在5村，中学同志3人，系大学同志介绍者尚未编入组织；第三组在长武，共16人分3组。泾河南骑马沟有同志4人，智属长支，距第一支约10里，距第二组约2里，但因隔河，预备列入第二支，不知可否。”

4、积极参与组织与支持旬邑暴动

1928年夏，共产党员许才升、吕佑乾等在陕西的旬邑县组织了农民“红枪会”，暴动的队伍打进县衙，捉住并处决了县长、警察局长等7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暴动之前，王孝锡曾两次指示王晓时去旬邑送信，搞联络，接受任务；他本人也亲自去百子沟煤矿发动工人。王晓时在暴动发生后赶到旬邑，参加了农民武装打土豪，分财产的活动。暴动失败后，他3人先后返回宁县。

当国民党反动当局调田金凯骑兵师镇压了旬邑暴动，活埋了许才升、吕佑乾等7人后，王孝锡悲痛欲绝，写了“吊故友七人”诗四首，

挽救工农登仙界 努力实现苏维埃

生平浩气终难泯 革命史上第一页

设置一决瀑冰前 红不吝臂赴杀场

曾官污吏尽丧胆 地主豪绅如亡羊

静夜悲声隐隐扬 且随送君赴杀场

枪声已息君犹哀 烈士坑中舍上亡

一缕清风半轮月 深山幽处暗华哀

回忆往事肠欲断 遗孀惟有眼中尘

5、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试图组织工农武装斗争。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陕甘地区的社会状况，王孝锡效法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开展农村社会调查的办法，以行区为掩护，也深入附近各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所得写入给上级党组织的汇报材料中。他详细介绍说，宁县、长武、泾川、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等数县农村，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以及连年灾荒，造成了“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写道：“目下绝食者十分之三，可以支持年终者十分之二，至明年春间者约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或可支持至明年夏天，能有吃两年者全县（指宁县）不过20余家。所以各乡村之抢案天天有闻……无产阶级自动的三五成群，夜间向资产阶级地主豪绅进攻、杀戮、吊拷。绕泾河、蒲河的两川，有所谓口袋队之称……”他还报告了宁县南区暴发的王瑞璠、傅明玉、邵三刚等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情况。这种状况说明，陕甘边界广大农村正处于革命斗争前夜，只要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农民运动的高潮不久即可到来。

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王孝锡和他的战友们，这时已开

始在宁县几股农民自发武装中做工作，试图把他们引向自觉的革命道路。教育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为组织宁县地区的“农民游击队”，为举行大规模的农村武装暴动做准备。可惜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

1928年秋，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反动当局指令甘肃指导委员会派人追捕王孝锡等人。敌军警处处长刘泾津率军法官杨天枢等来陇东，与国民党宁县县长效维国密谋策划，趁王孝锡回家为其父贺寿之机于农历10月15日将其逮捕。王孝锡对于被捕、杀头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当他诀别了亲人，阔步走到街坊一个面馆时，与前来要求释放他的乡亲们告别，在墙壁上用铅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书剑漂泊二十年 国事无端尚依然
革命未成身先捕 普罗自在人世间

慷慨歌太平 从容作楚囚
暴刀逞一快 何惜少年头

王孝锡被押至平凉后，又转押兰州。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连国民党甘肃指导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发的电报中也这样说：“近在宁县捕获共匪首领王孝锡一名，……绝无悔改之心。”因此在关押了一个多月以后，敌人虽软硬兼施而在王孝锡身上什么也没捞到，便对他最后下了毒手。

当王孝锡得知敌人要杀害他时，深夜给父母写了一首诀别诗：

纵有垂天翼，
难脱今夜险。

问苍天，
何不行方便，
取飞云，
驾慧船，
搬我直到日月边。
取来纸文千万张，
这黑暗世界，
化作尘烟。
出快笔，
看满腔热血
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
把家园骨肉齐抛闪。
自古英雄多患难，
它独我今然。
望爹娘，
你把我挂念。
养玉体，
度残年，
尚有一兄三弟，
足供欢颜。
儿去也，
莫牵连。

1928年12月30日早晨，王孝锡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兰州西关城隍庙行宫前。临刑前，从敌监狱到刑场的途中，他在囚车上不住的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万岁！”等口号。敌人用毛巾塞他的嘴，并用带鞘的大刀使劲砍他的胳膊，他毫不低头，顽强地挣扎着反抗着。在寒风刺骨的深冬，他大汗淋

任 鼎 昌

(1899—1929)

任鼎昌，字宜之，宁县太昌镇任家庄人。1919年太昌小学毕业，考入设在平凉的甘肃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翌年1月西北大学在西安成立，即转入该校读书。1925年冬冯玉祥国民军进驻西安，改组西北大学为中山学院，他继续在该院读书。

任鼎昌在西安上学期间，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大西北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共产党的活动十分活跃。他受到党的培养教育，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党组织派他到冯玉祥部国民军慰劳宣传团从事党领导的宣传工作，并随军赴河南前线搞宣传慰问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他和中山学院的同窗好友王孝锡及该院农民运动讲习班学生王晓时（彦圣）、王之经等同乡一起，受党组织指示回到宁县继续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首先以读书会的形式重新整顿了1925年暑假期间成立的青年社，还吸收了一党进步青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教唱《国际歌》，向邻里乡亲宣传新思想，利用逢集上街搞剪辫放足活动，并同王孝锡等一起，以在西安上学的同学为基础，秘密创建了宁县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宁县支部（一说郑宁支部），任鼎昌为宣传委员。1927年冬，他受组织派遣，到平凉与地下党吴天长秘密联络，打入设在平凉的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任教，并负责平凉地下党的工作。他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平凉郊区驮马殿一带与平凉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联络，进行革命活动，同时利用讲授社会学的条件，自编教材，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师生中影响很大。

1928年4月7日，国民党甘肃清党委员会，指使陇东镇守使陈毓崧在平凉将任鼎昌逮捕。在任鼎昌被捕前，王孝锡在宁县得知敌人要对他下毒手的消息，曾写密信派他的侄儿任国仓骑骡子连夜去平凉报信。信写道：“宜之兄，遥闻兄患肠阻病，特送来走药（即泻药）一付，灯芯竹叶引子，吃了速走速走（泻）……”可惜迟了一步，信送到时，任鼎昌已在狱中挨过一夜。反动派于4月19日用囚车把任鼎昌押解兰州。当时平凉一些进步师生闻讯后，筹集50多块银元纷纷赶到西门外送行。半年之后，王孝锡亦被捕。敌人对任鼎昌多次酷刑拷打，要他供出和王孝锡的关系，他始终坚贞不屈，决不出卖同志和暴露自己的身份，为保守党的机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仍不吐一字，并写下了“乌云遮天，总有一天风吹乌云散”的豪言壮语，表明了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and 无限向往。

1929年10月，在国民党当局决定要杀害他的时刻，任鼎昌因伤口溃烂，逝世于狱中，时年30岁。

任鼎昌逝世后，兰州一中校长王立轩负责掩埋了烈士尸体。1937年冬，其家属同王孝锡家同时去人迁二位烈士遗骨安葬于家乡。任鼎昌是党在陇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是平凉地下党活动的先驱。他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杨有升）

何 万 祥

(1915——1944)

何万祥，宁县人，生于1915年，放羊娃出身，16岁参加红军。他本来姓宋，由于红军在陕甘交界处活动时，家里人几次找到部队，让他回家，因而一气之下向连队党代表请求改姓何。他在别人面前很少讲叙自己，有关他的家世及入伍前的情况也很少为人所知。

何万祥入伍13年，身经大小战斗400余次，屡建战功。3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是山东抗日战场上有名的战斗英雄。1944年4月25日，在山东抗日战场上，时任滨海军区六团二连连长的何万祥，奉命随所在部队参加讨伐国民党顽军吴化文的大泉山战斗，当他率先冲进残敌顽抗的最后一个炮楼时中弹牺牲，年仅29岁。他牺牲后，滨海军区将其所在连队命名为“万祥连”，他战斗过的折露山命名为“万祥山”，公路命名“万祥路”，山东电视台198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拍摄了《我们的连长何万祥》电视剧。

何万祥的英雄事迹在山东广泛流传着：

早在红军时期，一次何万祥所在的支队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红军的一个营与敌人抢占一个山头，敌人借炮火威力已经爬到山腰，眼看红军就要失利，这时何万祥大喊一声，带着本班战士冲出阵地，迅速占领了山顶，甩出一排手榴弹，打退了敌人。

1936年2月红军东征，阎锡山调重兵扼守黄河防线。担任先遣任务的何万祥，于2月20日同战友驾小船抢渡。船到河心被冰块撞破，河水流进船舱。在万分紧急关头，他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堵塞漏洞，但仍不奏效。这时，他忘掉了一切，毫不犹豫地用脊背

靠在洞口上，渗进的冰水象锋利的刀子刺透肌肉，他忍着巨痛和寒冷，象一块铁疙瘩死死地堵着破洞，避免了船沉人亡，保证了抢救成功！船到对岸，他又冲上去推垮了敌人第一个碉堡，打退了敌人，保证了后续部队安全过河。这次他被评为渡河英雄。

1938年夏，八路军一一五师奉命挺进鲁南。在攻打郯城时他已升任副连长，受命阻击日本鬼子，掩护兄弟部队和老百姓撤退。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他率领53名战士，象铜墙铁壁一样，挡住了300多名鬼子的轮番冲鋒，出色的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3年11月19日，滨海军区六团、二十三团奉命攻取临榆城。时何万祥任六团二连连长。他带领突击队，化装成给敌人送给养的老百姓，顺利到达城下，又通过做内线的政训官刘连城进了城。由于有政治攻势的密切配合，我军仅以牺牲3人的代价，取得了俘敌1600余人的大胜利。

1944年1月，滨海军区在反“扫荡”胜利后，为拔除石沟崖敌据点，发起了歼灭汉奸朱信斋的战斗。何万祥率领的二连又奉命打头阵。他巧妙的冲上壕沿，利用被摧毁的敌炮楼遮住敌人的侧射，一气占领了6个地堡和1个炮楼，突破了这一据点，并采取“围攻”战术生擒朱信斋，实现了滨海人民“杀朱过年”的愿望。

1944年3月25日，我军在山东战场上开始局部反攻，军区首长决定对伪军吴化文部发起第三次讨伐，滨海军区第六团奉命参加第一阶段作战。当夜，部队冒着疾风骤雨，在悦庄以南迅速突破并攻占了大泉庄等外围阵地。何万祥象过去一样，勇敢地冲杀在全连战士的最前头。当他冲进残敌固守的最后一个炮楼时，不幸中弹牺牲，时仅29岁。战士们高喊“为连长报仇！”冲进炮楼，活捉了全部敌人。

（杨有升）

雷 敏 之

(1910——1958)

雷敏之，宁县塄马乡雷家川人。17岁离家到国民军冯玉祥部从军，至中校团副。1934年在马鸿逵部因搞兵运工作被捕，“双十二事变”后获释，遂往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以新闻记者身份赴中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次年配合彭雪枫工作，为游击支队副官长兼军法处长。后历任豫上行署主任，淮北行署财政处长，豫皖苏区专员，豫皖苏军区后勤部长等职。解放后历任中航政管理局局长，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

雷敏之身为行政9级的高级干部，而生活十分俭朴。对亲属及下属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待遇。1958年逝世于任内，葬于武汉。时年48岁。

(杨有升)

刘 志 仁

(1910——1970)

1944年11月16日下午，延安、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正在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千余人的会场上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当19名特等英雄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领奖时，一张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签署的“新秧歌运动的旗帜”的奖状，颁发给一位中年农民。他，就是有名的南仓社火头刘志仁。

一个普通的边区农民，能够享受到这样高的荣誉，是与他在新秧歌运动中所做的贡献分不开的。对此，周扬在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作了充分评价：“刘志仁从1937年闹新秧歌直到现在，他是第一个把秧歌与革命结合起来的人；他在艺术上是有创造性的，他把秧歌与跑故事结合成为秧歌剧；他的创作态度，处处以适合群众要求，群众乐于接受为标准；他的社火队内部是民主的，对外关系是团结的。”在刘志仁的家乡，也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南仓社火耍的狂，

区里县里都有名。

里头有个刘志仁，

离了刘志仁，

新故事就要不成。

刘志仁于1910年正月生于甘肃宁县南仓村的一户富裕农民家庭，少年时上过4年私塾和3个月国语学校。这里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地方，农民中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阅读能力，唯有戏剧和社火能够广泛直接的为他们所接受。因而农闲时节排

演社火便成了当地农村的主要文娱活动。刘志仁从小受到熏陶，一有演出，总要跑去观看。后来又直接扮演角色，参加表演，学会了不少民间曲调，掌握了许多表演技巧。

早在1931年春季，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就在宁县东区一带开展活动，宣传革命道理，使刘志仁对红军和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1936年春节前，国民党的一股部队到南仓附近催要粮草，遭到红军游击队的打击。战斗中，一名红军战士受伤。在敌人追兵逼近的紧急关头，碰上了正在排练社火的刘志仁、宋应岐、张彦同等人。他们赶紧把这位战士转移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为了不走漏风声，刘志仁把所有知情者召集到一座神庙里，烧香盟誓，相约不准告密。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这位战士安全的养好了伤，返回部队。通过这件事，使南仓社火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宁县国、共两党进行红白区域划界时，南仓原来划归为国统区，但刘志仁宣传鼓动群众，强烈要求将南仓划入红区。后经双方政府协商，批准同意了群众要求，从此南仓村成了新宁县的一个行政村，刘志仁被群众选为首任村长。

边区的新生活给刘志仁的社火创作注入了新鲜内容。刘志仁认为旧的形式不能满足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应该推陈出新，突破它的约束，用新形式来代替。当时普遍流行的社火形式，是秧歌和跑故事。所谓的秧歌，只不过是同一个人逢场作戏的编几句祝福吉庆的顺口溜，博观众一笑；跑故事则是扮成旧戏里的一个场面，或在地上或在马上表演，但都不唱，只能增添些热闹气氛，没有多少实际教育意义。刘志仁在旧形式的基础上作了大胆创新，他把秧歌（唱的）与故事（舞的）结合起来，形成秧歌剧。表演时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又有故事情节，短小精悍，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及时表现新内容，刘志仁在改造旧社火，创造新形式的

同时，还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调如“珍珠倒卷帘”、“张生戏莺莺”、“绣荷包”、“骑白马挂洋枪”等曲调，填写新的歌词，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1937年，刘志仁编排的《张九才造反》演出后，群众当场给他披红戴花。剧中所表现的情节都是当地群众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剧中人物大都是当地的军阀、土匪、贪官、污吏。群众对这些人的痛恨之情都在剧中唱出来了，因而很受欢迎。此后的几年中，刘志仁编的新秧歌剧的数量逐年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除反映群众的生活外，还配合宣传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号召。1939年演出的有《新开荒》、《新小放牛》、《九一八》、《芦沟桥》、《玩花灯》等。在《玩花灯》一剧中，采取问答对唱的形式，表达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及革命领袖的真诚爱戴，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比憎恨。剧中唱道：

这是一盏什么灯？

这是一盏救星灯。

什么叫个救星灯？

毛主席，大救星，

领导穷人翻了身。

这是一盏什么灯？

这是一盏太阳灯。

什么叫个太阳灯？

共产党，象太阳，

照亮咱们陕甘宁。

这是一盏什么灯？

这是一盏英雄灯。

什么叫做英雄灯？

大生产，当英雄，

劳动英雄真光荣。

这是一盏什么灯？

这是一盏王八灯。

什么叫做王八灯。

顽固派、小日本，

勾结起来害百姓。

这是一盏什么灯？

这是一盏拥军灯。

什么叫做拥军灯？

军爱民，民拥军，

军队人民一条心。

这是一盏什么灯？

这是一盏民兵灯。

什么叫做民兵灯？

八路军，自卫军，

组织起来打日本。

1940年和1941年演出的有《新阶段》、《救国公粮》、《反对摩擦》、《保卫边区》、《缴公粮》、《生产运动》、《织手巾》等。《织手巾》由一个年轻姑娘演唱，表现了对边区的热爱和对恋人的思念：

石榴花开叶叶青， 妹妹房中织手巾，
枣木梭子新上新， 织成手巾送亲人。

一条手巾织的新， 上织日月过山峰，

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男女老少喜盈盈。

两条手中织的宽， 一颗红心织中间，
朱总司令喊头站， 猛将雄兵打江山。

三条手中织的强， 织的八路军打胜仗
骑白马来挂洋枪， 红旗下面兵马壮。

四条手中织的全， 织的是军民大生产，
先织上边区十样景， 再织上秧歌闹的欢。

五条手中织的长， 织的百花向太阳，
人民拥护共产党， 拥军拥政家家忙。

条条手中织的好， 织成手巾情意长，
六一条手巾新花样， 情到前线运情郎。

哥哥前线打日本， 妹妹家中织织忙，
打败鬼子回家转， 英雄模范配成双。

1942年至1944年演出的有《百团大战》、《读书识字》、《桂姐纺线》、《反特务》、《劳军歌》、《新三恨》、《边区好政府》、《十二月忙》、《改造二流子》等。其中的《劳军歌》表现的是几个慰劳八路军的农民在路上相逢，互相问答：

正月里来是新年， 男女老少喜满面，
遇上劳军运动月， 秧歌旱船跑的欢。

老婆子推车前头走， 我老汉挑担跟后面，
一路走来一路唱， 碰上厚庄的李老三。

成一个团结、民主、革命的团体。过去演社火，每家都要派人参加，否则就要罚出灯油费，并且演的时间过长，就会影响生产，群众很不满意。刘志仁听取大家的意见，取消了罚油陋规，代之以请假制度，这样就使耍社火成了大家自愿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过去各村演社火时，互相争强斗胜，演出的节目一家压一家。如一家演“吕布戏貂蝉”，另一家就演“三英战吕布”，常常引起斗殴。1941年新宁县举办社火竞赛，对南仓的社火评价最高。另一村心中不服，便准备找岔子打架，刘志仁察觉后，主动带队退出场子，演起新秧歌，结果吸引了全部观众，大家一致称赞“南仓社火耍的好，旧社火说什么也比不上。”称他们的秧歌剧“是离台教化人的戏。”他还经常带队去友区演出，使那里的人民对边区有了认识，并且送自己的子弟到南仓上学。参加闹社火的人也都很团结，平时在一起排练演出，农忙季节又组成生产互助组织。经过几年努力，刘志仁领导的社火队由十几人发展到60多人，全村50多户的青壮年及儿童几乎全部参加。有益的娱乐活动吸引了他们，消除了村里的抽烟、酗酒、赌博、迷信、打架等不良现象，激发了群众热爱边区，热爱生产的感情，南仓村也一直是执行政策，开展生产、卫生、拥军优属活动的模范村。

1942年，刘志仁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创作热情和革命干劲更加高涨，自觉的用自己的才能为边区的建设服务。凡是能为之歌唱的事情，自己首先热心参加。他带领大家开荒生产，交送公粮，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为了解决闹社火的费用，他和大家先后开垦“义田”40多亩；但当政府提出安置移民的号召后，他便积极响应，大力支持，经和大家商量，主动拨出其中的15亩，送给安置到本村的一户难民去种，使这户难民很快得以安家生产。他每年都带头多交粮，交好粮，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几次利用夜间，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给政府和游击队送粮送面，还把自己的羊杀了送去，为大家改善生活。这种一心为

革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尊敬。

刘志仁为边区新秧歌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1944年10月，他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的文教大会，与马健翎、杨醉乡一起获得特等艺术奖，被誉为“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还给他赠送了一条毛毯，作为鼓励。《解放日报》大篇幅地介绍了刘志仁的成绩和经验。周扬在讲话中称“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堪称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认为“这种新的刘志仁式的秧歌值得提倡”。对此，刘志仁并没有陶醉，而是希望能在延安“多学一些本领带回去，把全新宁县的社火都转变成新的”。会议期间，他与其他艺术家一起交流经验，切磋技艺，与鲁艺戏剧音乐系的师生一起进行创作，研究剧本，排练演出，受到延安各界的好评。周扬、陆定一等十分关心他的创作，多次写信给他，了解他的创作情况，寄送年画及鲁艺工作团编的秧歌剧本，征求他的意见，鼓励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1945年元月在延安召开的群英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为边区英雄，受到奖励。

全国解放后，刘志仁长期担任乡、村基层干部，多次当选为县、省党代表和人民代表。劳动之余，刘志仁继续编写歌谣，歌颂党的领导和幸福生活。十年动乱中，刘志仁被加上种种罪名，惨遭迫害。长期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使他身心憔悴，逐渐发展到神志不清，疯说疯跑，于1970年11月20日含冤去世。这位深受老区人民爱戴的农民艺术家过早的离开了我们！1978年刘志仁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如今，他的名字和他所创作的秧歌仍在民间广泛流传着。

（马兴文）

李 德 禄

(1908——1983)

李德禄，祖籍宁县米桥雷家嘴头村，世代无房屋田产，靠租种为生，后落居宁县湘乐镇字院村。

民国18年，长工出身的李德禄与春荣街北一邵姓寡妇成婚。进了邵氏门后，大妻俩靠做小买卖为生。1933年，因拒绝为当地民团头目杨生福摊收戏款等事，杨诬陷他有盗窃嫌疑，并扬言要抓他坐牢。在那吃人的社会里，有理没处诉，他只得弃家出走，通过乡亲指点投奔到何炳正领导的平子游击队，因其立场坚定，斗争勇敢，不久即升任班长，并由何炳正、寇金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德禄是宁县早期党员之一，为宁县党政建设做出了贡献，在开创苏区、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等斗争中站在最前列。1934年2月，陕甘工农红军第三路指挥部派李德禄协助杜宛等去正宁山甲原开展工作。在同农民骨干结识后，靠结拜弟兄站住脚，然后串通各自的亲邻好友，秘密集合宣传党的政策，鼓动群众起来和旧官府作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山甲原周围14个小村子相继成立了贫农团、村农会和赤卫军，还将一家姓冯的土豪120石粮食分给了穷人，吸收张巨财等5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一带农村革命的火种由南向北，愈燃愈旺，迅速扩大到宁县的九岷原、月明原、金村原。

1934年10月，宁县的临时革命政权“宁县革命委员会办事处”成立。在平子游击队和宁县3支队的武装斗争配合下，李德禄协助刘永培、李尚勤等积极筹建宁县的革命政权，相继在九岷原周围的几条川原打开局面，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培养了韩秀升、何

聚财、米世春、苟生春、张振周、张金奎、罗金财、王秉祥、张荣德、米世英等首批农民骨干，并吸收他们入党，成立支部和党小组，开始领导农民同当地土豪劣绅作斗争。于1935年10月在西坡、贾邑川、月明原、九龙川、九峽原、平道川和金村原等7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经关中特委批准，在杨园子正式成立了中共新宁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李德禄任组织部长。

李德禄在以后的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和群众干部相处甚密。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李德禄也总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立场坚定。1936年东北军“围剿”边区，新宁县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躲进深山老林坚持斗争，由于缺粮断水，大家靠吃酸杏和社梨树花度日，他却精神饱满，信心很足。李德禄后又继任新宁县县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新宁县政府副县长。1948年调任旬邑县县长。在任期间，1949年3月一烈士罗怀玉的家属要求李派民工协助搬迁烈士遗体。因战争中间劳力十分缺乏，且李德禄没有看到过边区政府关于烈士家属搬迁烈士遗体的补充规定及三原专署出具的手续，因而拒绝了烈士家属的要求，由此而造成惨痛事件，过后于同年9月被边区政府通令撤消了县长职务。他从此回家务农，后来组织几次动员他重新工作而未返。在农村多年，他仍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在历次运动中顶着压力，为许多老同志出据证明，驳回了许多不实之词，使一些老同志免遭诬陷。他除参加劳动外，还热心帮助村队干部工作，为改变山区面貌出谋划策。经常调解民事纠纷，为邻里乡亲排忧解难，其高尚品德为村民所崇敬。在其有生之年，他还为编写宁县党史和地方志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

1983年2月10日病逝，享年75岁。

（杨有升）

张 仲 良

张仲良，陕西耀县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2年春因领导农民抗捐斗争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正当王泰吉举行“耀县起义”的关键时刻，他和张邦英组织起游击队，并率部进入陕甘边照金根据地活动。1934年2月，陕甘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指挥部成立，张仲良任政委，从此他领导了包括宁县、正宁一部分的关中地区的地方武装斗争，转战于子午岭周围后，他曾亲率游击队在正宁涇头一带活动，和杜宛等领导五顷原、孟家河、龙咀子、南邑等村庄成立农民联合会和贫农团，并在秦善合家帮助成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1936年入红军大学学习，并任陕西省军事部长、关中分区司令员、关中分区专员等。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解放战争开始后，被党中央派往陇东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很快稳定了这里的局势。后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任纵队政委，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战役，接着进军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9月任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局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在追歼残匪、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0年8月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1月改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害。1977年任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后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列席了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83年2月逝世。

（杨有升）

王之经

(1907——?)

王之经，字正甫，宁县和盛镇公曹人，生于1907年。他是陇东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县支部的创建人之一。1926年曾在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学习，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其他人一起重新整顿了1925年在太昌成立的青年社，组织学员学习进步书刊。1927年7月中共宁县支部成立，他任青年委员。王孝锡被捕殉难后，宁县党组织遭破坏，他前往西安中山学院继续深造。后在陕南兵运工作中牺牲。

(杨有升)

毛 振 华

(1910——1935)

甘肃环县河连湾村，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偏僻乡村。50多年前一位战功卓著的英雄红军连长牺牲在这里，长眠于黄土高原之上。这里没有他的墓碑，现在也找不到了坟墓。但涛涛的环江记着他，环县的人民记着他，烈士的战友记着他。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团第一连连长毛振华。

毛振华，湖南省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十五六岁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毛振华个子瘦高，机警敏捷，浑身有一股灵气，打仗时勇敢顽强，肯动脑筋。由于他的表现突出，被挑选给军长贺龙当警卫员，并随贺龙同志参加了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振华又随贺龙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后来起义军撤离南昌，毛振华跟随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行动，一路克江西瑞金、会昌，消灭了不少敌人。6月下旬，起义军到达广东潮州、汕头一带。经过奋战，起义军终被处于优势的敌人打散，混战中毛振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辗转回到了湖南家乡。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后，向长沙守敌发动了进攻。听到这一消息后，毛振华又从家乡来到了省城长沙，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在红一方面军，毛振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他表现出色，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党员，红军还任命他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连长。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振华率领全连指战员同围追堵截的敌人英勇战斗，转战进入贵州境内。12月30日，红四团接受抢渡乌江的命令，毛振华积极请战，承担了突击任务。

1935年1月1日，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指挥下，毛振华率领8名战士来到乌江边，决定冒着严寒，泅渡到对岸。毛振华代表突击队坚决表示：“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说完，他接过团首长斟上的白酒，一饮而尽，随即跃入了冰冷刺骨的滚滚江水之中，他拉着一根长绳，奋力向对岸游去。行进中，敌人发现了他们，便集中火力向江中射击，打得江水水花飞溅，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不时又有追击炮弹落入江中，掀起一阵阵巨浪。但毛振华和8名勇士不顾一切奋力前进，游过了江面的三分之二，接近了对岸。就在这时，一发追击炮弹炸断了长绳，勇士们失去了联系，被迫返回到原岸边，突击行动失败了，还有一名同志不幸牺牲。毛振华他们并不灰心，当日深夜，他率领5名战士，乘着竹排，再次强渡乌江，袭击敌人。他们克服困难，终于在夜幕的掩护下到达对岸。当时又是寒冬腊月，云贵高原上寒气袭人，偏偏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降到零下10多度，毛振华他们的单衣被江水浸湿后冻成了硬甲。他们全凭一颗火热的心，冒着严寒，隐蔽在敌人工事下边的一个岩洞中。为了保存体力，他们互相拥抱在一起，凭借体温抵御着风寒的袭击。终于熬过了寒冷的漫漫长夜，迎来了黎明。

第二天拂晓，红四团向乌江对岸的敌人发动了强攻。潜伏敌人身边的毛振华他们见时机已到，也突然向敌人发动了进攻，正在集中火力向江中红军主力射击的敌人遭眼皮下突如其来的打击，晕头转向，纷纷逃窜。毛振华和5名战士迅速占领了敌滩头阵地，在他们的掩护和有力配合下，红四团一举突破了乌江天险，完成了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由于毛振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以《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为题，报道了“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和其他指战员受到嘉奖的情况。毛振华的英勇事迹和名字传遍了红一方面军。

在以后的长征途中，毛振华率领全连同志参加了攻克遵义、四渡赤水、飞渡泸定桥等战斗。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毛振华调为一连连长，他带领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9月到达甘南。9月12日，党中央在迭部县俄界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

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时，根据蒋介石命令，甘肃军阀鲁大昌调集了优势兵力，在腊子口构筑了坚固工事，妄图凭借天险阻拦红军北上，而胡宗南也在向腊子口运动，他们妄图将红军消灭于藏区。为了粉碎敌人阴谋，党中央决定攻克腊子口，打开北上抗日大门。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又由毛振华所在的红四团承担。

腊子口是甘川交通中一处要隘。腊子河谷两岸，山势陡峻，峭壁高耸，如同斧砍刀削过一般，难以登攀。湍急的腊子河似脱缰的野马呼啸着，从山岩之间夺路而下，难以徒涉。路在这里，仅有腊子河上一小桥能够通行，封锁了此桥，即封锁了唯一通道。所以，当地群众中有“要过腊子口，如过老虎口”之说。面对敌人居高临下，凭险据守的不利处境，红四团领导制定了正面强攻和侧翼奇袭相结合的战术。毛振华指挥的一连接受了侧翼奇袭的任务。9月17日夜晩，毛振华率全连战士开始行动。他们在腊子口下游伐倒了两棵大树，横架在腊子河上，到达了对岸。深谷里漆黑一片，毛振华率领战士开始向峭壁高耸的腊子口东南侧山顶登攀，以便能绕到敌后夹击敌人。他们用佛腿结成绳子你拉我拽，踩着岩石裂缝和小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奇迹般地登上了数十丈高的悬崖峭壁，占据了腊子口东南侧顶峰。攀登中，有许多战士失手坠落崖下，光荣牺牲了。毛振华和战士们登上山顶后，在黑夜中摸索前进，运动到了腊子口桥正上方山顶上。他们立即发出信号，配合山下的战友，向盘踞在桥头山腰上的敌人发动攻击。在山顶山下两路红军战士的夹击下，腊子口守敌被打得四散奔逃。黎明时分，我军终于夺取了天险腊子口。毛

振华在奇袭腊子口的战斗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9月20日,红一军团《战士》报在《向北进攻——胜利的开始》一文中,记叙了他的英勇事迹:“特别是一连连长毛振华同志……只带两三个人,绕至敌人后侧打手榴弹,配合六连夜摸,胜利地打坍了固守第一线的敌人”。

取得了攻克腊子口的胜利后,毛振华又带领全连战士乘胜前进,到达哈达铺。红军在这里进行了整编,毛振华所在的红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四大队。9月23日,毛振华和战友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继续北上,渡渭河、越六盘、向陕甘苏区前进。10月14日,毛振华随红军到达了陇东环县的河连湾。此时,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陕甘苏区已遥遥在望。

河连湾有一个土围子,一些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盘踞在这里。这伙敌人不时向路过这里的红军队伍疯狂射击,致使许多战士不幸中弹牺牲。为了消灭这股敌人,保证部队顺利通过,毛振华主动请战,带领战士向土围子发动进攻,歼敌一百余人。但是很不幸,战斗中一颗子弹突然击中了他的头部。就这样,这位誉满全军、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长毛振华不幸牺牲了。他的鲜血洒在了甘肃大地上,时年仅25岁。

毛振华烈士参加革命近十年,短短的历史中写下了他驰骋十余省、转战数万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光荣战绩。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青春放射出了夺目的光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称赞他是“带兵的模范、打仗的英雄”。毛振华牺牲后,战友们将他安葬在环江之畔的一处高地上。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等闻讯也赶到烈士墓地,脱帽鞠躬,肃立默哀,向毛振华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为这颗明亮的红军之星陨落在这黄土高原上而深感哀痛。

(选自《甘肃青运史》1989年第1期。作者姜生,文字有改动。)

陈 雄

(1911—1936)

1936年11月，在著名的山城堡战斗中，一位生于南国，曾被部队首长称之为文武双全的战将壮烈牺牲，血洒陇东黄土高原。他就是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陈雄。

陈雄，1912年出生于湖北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班长、排长，参加了多次为创建与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战斗。1934年10月又随红一方面军进行长征。因他作战勇敢，有勇有谋，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又由连长、营教导员，提升为团政委。他是红一军团有名的军政双全干部，曾受到聂荣臻政委和杨得志师长的表扬。

1936年，陈雄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数次战役，屡立战功。当年5月30日，在攻打陇东曲子守敌的战斗中，他同团长曾国华率五团担任前卫和主攻，仅用6个小时就攻下了曲子镇，生俘国民党一〇五旅旅长治成章、副旅长杨子樞等军官10余名，击毙士兵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和弹药，取得了红军西征第一仗的胜利。他所在的五团也被上级授予“夜老虎团”的光荣称号。

1936年11月，陈雄率五团参加了山城堡战役。11月21日黄昏，总攻开始后，红五团、四团担任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截断敌人退路的艰巨任务。当五团突破敌人几道防线，接近目的地时，被山上敌人的火力压在了山坡上。这时陈雄和团长曾国华带四个连队，分头从两侧迂回到敌炮楼前，以突袭的方式“端”掉了敌人的炮楼。部队冒着浓烈的硝烟往上猛冲，突然又受到一座敌碉堡火力阻击，转眼间十几名战士倒了下去。为了减少部队伤

亡，陈雄喊了声“卧倒”，部队便停止了冲击。这时陈雄却从身旁一名战士手里夺过一束手榴弹，飞快地向那碉堡跑去。靠近敌堡后，他迅速地将那束手榴弹塞进敌堡的射孔，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敌堡倒塌了，红军战士冲了上去。可是年轻的政委陈雄却英勇牺牲，年仅24岁。

杨得志上将曾在回忆山城堡战役中写道：“我只要想到山城堡，首先就会想到陈雄。如果说山城堡战役是一座丰碑，陈雄就是这丰碑上一颗永远闪耀光芒的红星！”

（孙明生）

张 月 英

(1909——1938)

张月英(女)，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惠安堡乡人。幼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苦难生活。1936年9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她和丈夫苏明升一起参加了革命。不久，她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月英作为陕甘宁边区妇女干部的一员，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定环县苏维埃政府担任妇女部部长。

1937年10月定环县撤销，张月英调任环县妇女抗日救国会(1938年3月改名为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后又当选为陕甘宁省妇联执委会执行委员。

张月英从担任县妇联领导工作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环县是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偏僻山区，不但贫穷落后，而且封建势力影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土匪猖獗，给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尤其是妇女工作困难更多。张月英在那艰险的环境下，从不考虑个人安危，经常一人翻山越岭，走乡串户向妇女讲解革命道理，教育说服广大劳动妇女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剪发、放足，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力，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在她的说服教育和影响下，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有了一定提高，有的走出家门要求参加革命；有的积极为前线部队做军鞋、磨面、运送军粮；有的剪掉了长发，放开了被缠的脚，使全县妇女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受到上级党组织表扬。

1938年4月的一天深夜，盘踞在甜水的土匪头子赵老五得知县委主要负责人不在家的消息，便派匪徒缪振景、耿开邦率100余匪，与暗藏的奸细里迎外合，向县委、县政府机关发动猛烈的进

攻。县保安队随即进行了反击，但由于寡不敌众，匪徒层层包围了县政府机关。这时，住在县政府内的部分干部也向外突围。在这危急关头，张月英为了掩护重病在身的县委书记刘昌汉的爱人马秀兰一同转移，她机敏地背起马秀兰从院内突围出来。脱离敌人包围后，忽听马秀兰说还有一个文件包忘在屋里，张月英当即立断，她迅速将马秀兰藏在马槽里，毫不犹豫地跑回去取文件。当她找到文件包出门时，敌人已冲到门前，向她射出了一排排子弹，张月英倒在了血泊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28岁。

（孙明生）

孙 万 福

(1883——1944)

孙万福，环县曲子刘旗人。他是陕甘宁边区一位著名的劳动英雄和农民诗人。

在旧社会，孙万福是个一字不识的庄稼汉，靠种着几十亩薄地为生。但他天资聪敏，善说顺口溜，刘旗办社火，他常为春官；农村过红白喜事，他常为总管。因此，他在曲子一带很有名望。

民国十八年大旱遭年馑时，他家地产典当一空，从此全家8口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30年，他又租种土豪川地20余亩，年终收获杂粮不足10石（5000斤），除过苛捐杂税和地租，剩余3石粮不够全家人维持生活。为此，他又借债办起磨坊，靠给别人磨面赚麸子度日。到1936年曲子解放时，他家负债6000余元。他就是这样在旧社会中度过了人生中的多半辈子。

1938年6月，左权、聂荣臻率领西征红军左路军解放了曲子，已入暮年的孙万福才重见天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曲子建立了革命政权，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他家分到川地20余亩，牲畜2头。他高兴地唱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从此，他成了新社会中的主人，开始了由庄稼汉走向劳动英雄和农民诗人的光辉历程。

1939年，孙万福被刘旗村民推选为“优抗”代耕队队长和小学名誉校长，他感到十分光荣。在领导本村的“优抗”工作中，他以身作则，亲自连续5年为本村4户抗日军烈属义务耕地260余亩，受到了曲子县政府的表扬。在任刘旗小学名誉校长期间，他

经常到学校修理桌椅，了解情况，发现退学孩子，就亲自上门动员。为了方便环江两岸的学生过河，他用自家的木椽、木板先后在环江上架起了8座木桥。对穷人家的孩子念书，他更加关心，经常用自己的“铜板”给他们买笔买纸。因此，小学的孩子一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孙爷爷”。后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文章，介绍了他热心公益事业的先进事迹。

1940年夏季，孙万福经庆环分区专署专员马锡五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56岁。

1942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他表现得更为积极。他种了40多年的庄稼，有丰富的农作经验。为了多打粮食，他抓住雨季后季节，增开荒地，扩大种粮面积。他说：“不种百亩，就打不了百石”。仅1942、1943两年内，他家就开荒地50余亩，加上历年开荒和解放后分到的川地，共种粮田180余亩。“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多积肥，他常年坚持拾粪，有时到曲子街办事，他也担着粪筐，拿着木杈拾粪，一年之内能拾精肥500余担；对牲口圈、猪圈、茅圈等，他更是天天用肥土垫一次，这样一年能掏土肥3000余担，他家每亩粮田面积就能上粪30余担。庄稼离不开粪，更离不开精耕细作。他种麦子，麦地普遍耕三次：头次粗，二次细，三次上粪耕的深。麦子在白露前后种上之后，还要耨三次：头次由北向南耨，二次由东往西耨，三次是待春雪消后再耨上一次松土。他种糜谷等作物，则更为讲究，特别是锄地，糜子刚长出两个“耳朵”，谷子刚长得有针长，他就开始对糜谷锄草分苗。直到二次糜上土，三次净过地，才算满意了。辛勤地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42年，他家6口人，年终收粮20余石，达到了“耕一余一”。1943年，他家7口人，年终收获粮80余石，饲草2万余斤，瓜果3000余斤，棉花12斤，达到了“耕一余三”。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他家连续两年超交公粮700余斤。

孙万福自己翻身后，看到本村缺劳少畜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穷困，心中非常着急。为了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943年3月带头组织了刘旗变工队，增开荒地400余亩，多收粮食60余石，使这部分人也有了饭吃。但是，本村还有5名懒汉二流子，他们不但好吃懒做，而且还染有抽鸦片的恶习。此时，孙万福不仅时时的督促他们参加生产改造，而且还编说了打油诗《二流子要转变》来教育他们：

二流子，懒又懒，	东游西逛吃洋烟。
把好人吃成瘦人，	瘦人吃成病人，
病人吃成坏人，	吃得腿长脖子细。
家里没有二亩地。	公家听着要反时，
邻家骂你没志气，	婆娘骂你没脸皮，
又没米，又没面，	娃娃扯住你的衣。
因此一次要转变。	葫芦、烟灯一齐摔。
受奖励，勤生产，	多开荒地多种田。

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这5名懒汉二流子都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久，这首打油诗也因脍炙人口而传遍边区，对边区各县开展的改造二流子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万福热爱劳动，热爱集体，更热爱咱们的八路军，是一位拥军模范。1940年，他把自己的20亩川地长期借给八路军三八五旅驻防曲子部队种菜。逢年过节，他都提上自家的黄酒、猪肉、鸡蛋、蔬菜去慰问部队战士。1943年春季，驻防曲子部队在刘旗白杨树山上开荒种糜子时，他充当义务“老师”，与战士们一起翻地、施肥、追肥、挖地埂、填水壕，并亲手在挖过的荒地里撒播上糜子，年终收获100余石。对此，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雄舟同志曾说：“这是孙万福的好处啊！”并号召部队战士向孙万福学习农作方法。

1943年11月，孙万福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

雄，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大会上，孙万福向党政军领导和与会人员讲了他的农作方法，《解放日报》当即以《孙万福讲农作法》为题，介绍了他的经验。后来，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吴伯箫在他的散文《菜园小记》里说：“他（孙万福）是60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宏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听了孙万福的讲话，吴伯箫等人学会了种菜、种瓜、种烟等方法。

12月9日，毛主席在杨家岭西北局办公厅里，与孙万福、张振财、申长林、刘生海、张清益等17位劳动英雄谈话时，孙万福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激动得颤抖着胡须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他越说越激动，感情破闸而出，即兴编唱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天上三光日月星， 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 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为咱们能过上好光景，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 丰衣足食吃饱饭。

边区人民要一心， 枯树开花耀眼红，
千年的枯树盘了根， 开花结果靠山稳。

当他一口气诵完这首诗后，与会的英雄们都惊喜万分。毛主席拍着孙万福的肩膀问他是不是个秀才，他跟着毛主席回答说：“我

一字不识啊！”听说他一字不识，毛主席亦对这位农民诗人的天才和气质大为惊叹！如果不是旧社会剥夺了他受教育学文化的权利，孙万福一定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优秀诗人。后来，《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被谱曲后唱遍了全中国。一枝报春花，带来万紫千红。这支歌唱出之后，孙万福的名字也传遍了整个边区。有人称赞他“才慧过人”，有人尊称他是“劳动诗人”。周扬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到延安大学欢迎劳动英雄的大会上接见孙万福，叫他作几首诗给大家听。他高兴得背着手，昂着头，踱着步，面对着数万名观众，一连吟诵了5首，这是其中的两首：

一

咱们毛主席比如一个大阳，

比如东海上来一盆花，

照到咱们边区人民是一家，

比如空中飞来一块金，

边区人民跟到一条心。

二

丰稔于福——务耕禾，

眼前的福——压真土。

七十二行，庄稼为强，

一粒落地，万粒归仓。

劳动英雄，夏秋二令，

做的大大地增产一场。

打下来先完这一点儿救国公粮，

剩下的余粮吃起来比人家都香。

周扬听完他的吟诵之后，激动地说：“这个老头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他的讲话就象诗一样，简直是很出色的朗诵啊！比某些职业的朗诵诗人还高明呢！”他说：“孙万福算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这次大会上，陕甘宁边区授予孙万福甲等劳动英雄称

号，发给奖金2万元（边币）。

1944年1月29日，孙万福从延安回到曲子街上。当街的群众向他涌来，大家高呼：“咱们的老英雄回来了！”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吗？延安的世事怎么样？”他用流利语言讲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激励大家都要力争在新的一年里干出成绩，去延安看望毛主席。当晚，孙万福把他从延安带回的毛主席塑像及“劳动英雄”布织奖状交给儿子时说：“这是咱家的光荣啊！咱孙家要祖祖辈辈跟着共产党走。”

2月7日，孙万福在陇东分区大礼堂里，参加了陇东地委、专署及八路军三八五旅召开的欢迎大会，到会人员800余人。大会上，专员马锡五致欢迎词。抗战剧团为此上演了话剧《孙万福回来了》。接着孙万福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提出要把刘旗41户村民都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争取做到“耕二余一”。还表示要用自己的2万元奖金做十几辆纺车，发动刘旗村的妇女纺线线。最后他鼓励青年人说：“我今年80岁了，已经是偏西的日头，还能当上个劳动英雄，你们青年人像刚出的太阳，哪个不是虎背熊腰，都应争取当劳动英雄……”他的讲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纷纷要求他现场作诗歌颂先进人物。在这热烈的气氛之中，孙万福面对着德高望重的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同志略加思索，便顺口吟诵了《马专员》：

陇东分区六县，

马专员挂了牌，

组织的六县人民发了财，

赛过他周朝的姜太公，

稳坐钓鱼台。

组织的土里生金，

万物都能来。

他的吟诵刚一结束，掌声又欢迎着他歌颂了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

王维舟同志：

陇东分区六县人民广，

头一个英雄，

是咱三八五旅的王旅长。

第一个兵多将又广，

保卫我们六县的人民，

大人生产社社长！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孙万福还口吟了《抗战有剧团》、《赵县长》、《高司令和自卫军》等十几首诗歌。这些诗歌都以浓郁的陇东乡土气息，反映了蓬勃发展的新生活。

正当边区火热的革命斗争和幸福生活唤醒诗人被埋没的天才，正当诗人放开歌喉歌唱边区，歌唱新生活的时候，不幸孙万福于1944年7月13日在曲子街为刘旗交工队买油后涉水渡环江时被洪水夺去了生命。终年31岁！

孙万福的一生很平凡，但在他身上记录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在旧社会他受苦受穷，天才被埋没掉；新社会他成了真正的主人，天才被发现，得以成为农民诗人。一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唱出了全边区、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而且历久不衰，将永载革命文艺史册。

（张世峰）

马 福 吉

(1912——1947)

马福吉，乳名候角，他出生于陕西省甘泉县桥镇乡安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朴实憨厚的农民，因家境贫寒，经常外出靠出卖苦力所得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饱尝了人间的苦难辛酸。一次，在山上被土匪用烙铁烙了一顿，抬回家不几天就含恨死去。此时，一家人的生活更是穷迫交加。从此马福吉便不得不辍学回家，给永宁南岭一姓黄的有钱人家放牛。一次因丢失一头牛，遭到黄家毒打并被驱赶出门。这一次受到的身心折磨，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黑暗世道仇恨的种子，也使他认清了只有参加革命推翻这黑暗的社会才会有穷人的出路。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回到陕北开展“兵运”活动，号召和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到陕北、宁夏、陇东的地方军阀中学习军事，准备待机起义。马福吉早就听说过刘志丹是为了穷人拉队伍，打富济贫的，于是他没有告别慈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就毅然离开家乡，投奔了刘志丹。他跟随刘志丹参加了1930年夏天在陇东谭世麟民国军中的“兵运”活动，住在庆阳北部的三道川（今属陕西吴旗县）。后来因遭受土匪张延芝的突然袭击，三道川兵运失败，马福吉逃出后又到永宁山找到刘志丹。不久，刘志丹把兵运失败回来的几个人组织起来，又从保安民团中抽出10多人，枪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于1930年10月初举行了“太白起义”，在合水县太白镇一举收缴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枪，击毙该营正副营长，正式组成了一支游击队，活动在保安、安塞边界。马福吉在“太白起义”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受到了刘志丹的赞扬，以后就让他带领少年先锋队。马福吉把少

年组织起来进行训练，担任站岗、放哨、监视土豪恶霸、送信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表现非常出色。通过部队生活的锻炼和刘志丹的教育培养，马福吉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进步很快，成了刘志丹游击队中的骨干分子，1931年他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12月保安游击队建立。马福吉历任游击队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务。在那艰险的岁月里，他带领游击队员转战于陕甘两省边界，先后参与了消灭安塞、保安、庆阳、华池、环县等地小股民团的战斗，惩处了土豪劣绅，为部分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牛羊，颇受穷人欢迎。尔后，许多青年农民积极要求参加马福吉带领的游击队。到1934年4月，这支游击队很快由成立初的28人发展到60多人，使革命武装进一步壮大。不久，保安游击队又进行整编，编为4个中队，马福吉任二中队队长。是年5月上旬，他带领二中队从保安县境沿洛河向东出击，很快进入了甘泉县刘老庄寨子，以奔袭和偷袭的战术，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匪首刘逢春及其匪徒，缴枪4支，没收粮食30余石，牲畜50多头，羊400多只。打下刘老庄寨子以后，他又带领游击队火速前进，一举消灭了赵沟门赵怀玉民团，从而使游击队声威大震，游击区也迅速扩大。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壮大和游击区域扩大，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抽掉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各一部成立红二团，同年10月中旬红二团在闫家洼子正式成立。保安游击队大部归编为红二团，只留下30多人由队长马福吉、指导员张明科率领，仍在保安等地开展游击活动。翌年10月，马福吉率领保安游击队在陕北吴旗镇迎接了长征到来的红一方面军，此后又在陕甘边地区配合中央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数次进攻，屡建战功。1936年初，保安、赤安游击队合编为保安独立营，马福吉任营长。同年7月，当游击队在环县一带活动时了解到，庆阳三十里铺驻扎的杜成章民团约五、六十人，经常到老百姓家抢粮、抢物、赶猪、捉鸡，无

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马福吉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一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为民除害。于是他率领游击队追击100多里，将这些坏蛋一直追赶到华池五蛟境内的烂泥峁峁，予以全歼。

1937年11月，马福吉调任为环县保安大队长。在此期间，他率领保安大队同盘踞在环县一带的赵思忠（赵老五）等股匪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为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土豪分财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9月，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困难当头，为了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抗战本领，马福吉奉命赴延安抗大学习。他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善于钻研，学习讨论发言积极，深得学友们的称赞。1939年学习期满，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回到陇东分区，担任陇东分区独立团团长职务，为陇东地区革命武装斗争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1946年6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配合中原解放甘工委（时设陇东），决定抽掉一批武装力量和地方干部组成陇南、海固（平西）、华平（平东）3个工委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并在陇南这个既有战略地位又有党的群众基础的地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是月，在甘工委的主持下，组成了陇南支队，刘余生任司令员，马福吉任副司令员，孙作宾任政委，惠庆祺任副政委，约200余人。经过短期整训后向陇南挺进，在行进途中马福吉和其他领导，教育士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及时掌握敌情，很快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线，进入固原、西吉等地区。不几天，又在隆德附近穿过西兰公路直达六盘山区，向泾源县（今宁夏固原地区管辖）进发。9月8日，敌发现了我军的行动，便派国民党正规军骑一旅沿西兰公路警戒，并派平凉敌保安队前来堵截，经过激战，冲破敌人围剿。在此司令员刘余生受伤，马福吉单独负责军事指挥。当部队进入平凉、泾源交界的老龙潭村后，部队正吃午饭，国民

竟整编一旅一部，兵分数路向我军蜂涌而来。在这危急关头，马福吉命令大部队向后山转移，他亲自带领一支小部队担任阻击，边打边后撤，敌人穷追不舍。此时，我军所能依靠的唯一屏障就是背后光山顶峰的有利地形，要到达此地又要翻过一条狭沟。但如果越不过狭谷中途被敌人拦截，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福吉镇定自若，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立即改变战术，坚定沉着地说：“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再继续后撤了，需要积极反击一下敌人，然后再撤。”霎时，指战员们勇猛地向敌人展开了反冲锋，打得敌人乱了阵脚，等他们重新组织进攻时，我军已赢得了撤退时间，占领了光山顶峰。但是，穷凶的敌人并不甘心，又从四面向我军包围而来。马福吉果断命令，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成几个战斗小组，把周围每个大小山头都控制在我们手中，形成了我军在山上，敌军在山下的对峙局面。这时，敌人又封锁了所有的沟滩交叉路口，妄想把我军困死、饿死在山上。马福吉纵观全局，洞察敌情，认为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硬拼可能损失更大。他同工委的领导同志经过周密商量，在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决定突围返回边区。为了取得突围胜利，他反复考虑，分析敌情，深入细致地做干部战士思想动员工作。9月11日晚，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马福吉带领部队乘敌人麻痹大意，机警地跳入了包围圈，使部队转危为安。当部队撤离到大汾坝（今彭阳县罗洼境内）时，国民党某部一个连的兵力又挡住了去路。面对疯狂的敌人马福吉稍加思索后，铿锵有力地对大家说：“准备战斗，打好回边区最后一仗。”顷刻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指战员们个个群情激奋，经过一阵猛烈的冲杀，使敌溃不成军，丢下十几具尸体逃跑了。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包围我军没包围住，追赶也没赶上，设伏更是不堪一击。这一次次战斗是马福吉司令员机动灵活指挥作战的充分体现。他告诉人们，一个指挥员的能动性在打退却战比

打进攻战时更能很好地发挥，具有机动灵活，善于抓住战机，才能在被动中争取主动，退却中争取进攻，在防御中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而不是消极被动的防御，以至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等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这次进攻中，胡宗南的骑兵第一旅，马鸿逵部师八十一的一个骑兵团分两路向陇东分区袭击而来。面对敌人的袭击，担任陇东独立二团团长的马福吉与团的其他领导成员经过周密分析，认为这两股敌人属于两个指挥系统，他们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谁不管谁。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采取积极防御、主动出击，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打悦乐之国民党胡宗南骑一旅，后打元城之国民党马鸿逵部。同年6月的一天，马福吉得知敌人出动的消息之后，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派出两个连作战斗警戒，他亲自带领大部队埋伏在华池县悦乐境内中庄原高峁峁，准备一举歼灭来犯之敌。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没从我军埋伏的路线来，而是从我警戒连执行任务的方向来犯。这时一个连已被敌包围，处境十分不利。在这关键时刻，马福吉当即立断率领全团主力迅速赶往阵地增援。我警戒连听到大部队到来，立即发起反击。一时杀声四起，里应外合，击退了敌人围剿，使战局转败为胜。

中庄原战斗结束后，虽然部队消耗较大，但指战员们士气很高。当知道又要打元城之敌时，个个情绪饱满，信心十足。当天晚上马福吉带领部队急行军100余华里，秘密集结于距元城40里，距柔远30里的红土峁峁埋伏。为了诱敌上钩，马福吉派了一少部分便衣部队伴作游击队的样子，有意暴露自己，迷惑敌人，愚蠢的敌人摸不清我军的意图，果真派了一个骑兵排还有敌自卫队十多人前来“追剿”。我军便衣部队放了几枪，便向红土峁峁方向撤退。敌紧追不舍。待敌全部人马进入伏击圈后，马福吉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如猛虎般地向敌人冲去，一时震耳欲聋的枪炮

声，回荡天际的喊杀声，混成一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就在敌人将要被我部队全歼，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马福吉不幸中弹，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时年仅33岁。马福吉的牺牲使战士们非常悲痛，他们高呼着：“为马团长报仇”的口号，勇猛地冲杀残敌，使敌一个骑兵排无一人漏网。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将马福吉抬埋在新远城边的一个山坡上。埋葬的那一天，全团战士和附近群众都来参加追悼会，个个泣不成声，感天动地。马福吉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用鲜血换来了人民的幸福。陇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的光荣业绩永世长存，将激励年青一代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终身。

（孙明生）

秦 明

(1916——1948)

秦明，原名乔映淮，字清川，甘肃省靖远县人，他是一位立场坚定，斗争不屈，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秦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革命影响。1932年，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他家乡靖远发动的两次兵暴，曾经组成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当地影响很大。当时秦明已经16岁，思想不能不打上深刻的烙印，或者说这时他已接受了革命的洗礼。第二年他考入兰州一中，开始接触到进步同学和进步书刊，产生了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满，逐步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36年初中毕业后，曾往南京求学，受到“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鼓舞，反抗意识更加明确。同年7月返回靖远，担任小学教员，并与友人创办“同进消费合作社”，发行进步书刊。他本人在这一时期，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他毅然走出校门，同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甘肃省青年抗战团。为抗日救国，反对投降媚外的正义斗争到处奔走呼号。火热的革命斗争，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私，加速了他在思想感情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飞跃，逐渐地认识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有前途与希望。于是，他于1937年底在兰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久，党组织派秦明到国民党西北训练团从事宣传工作，动员进步青年去延安投身革命。

1938年10月，经甘肃工委介绍，秦明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妻子被分配到边区“民众剧团”工作；秦明于1939年初仍被派回靖远县以教书作掩护，担任

中共靖远城关支部书记，中共靖远县委书记，领导地下党员和革命工作者，在靖远县城各学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着手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三合乡就介绍魏仰峰、刘俊正、魏著文等人入党，逐步发展为3个支部。1939年秋，秦明任县委委员，他利用社会关系，建立了县委的秘密机关，派地下党员化装成货郎，经常往返于全县5个支部之间，使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是年冬，秦明又积极协助靖远县委书记郑重远建立起了甘工委由兰州经靖远、海固、庆阳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他本人亲自负责由兰州到靖远的中转工作；此时，还曾代理县委书记职务。1940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在这白色恐怖下，中共靖远县委一些人员身份已被暴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甘肃工委请示西北区将秦明等人送回延安。秦明先在延安大学学习一年半，1942年4月调任中央行政院教员。1943年8月，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秦明同甘肃部分地下党员一起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迫害，被定为“叛徒”，关押于边区保安处，横遭严刑逼供和折磨。后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得到平反。对此，他毫无怨言，仍回行政院勤奋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延安的地下党员陆续被派回甘肃工作，着手恢复地方党组织。1946年4月，秦明回到甘肃工委（时设陇东）工作；同年6月又被工委派回靖远恢复地下党组织。他只身赴国民党蒋管区靖远、海原一带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终于接上了关系，完成任务后又返回庆阳。同年10月，调任中共环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后任部长）。当时的统战部实际上是党的白区工作部，负责环县周围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他经常率武工队深入环县与固原交界处的庙耳掌一带巡视敌情，联络地下党员，开展统战活动，建立“两面政权”。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为了革命胜利，秦明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给爱人的信中说：“战争不可能避免，环

转变了，思想也要跟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1947年4月，宁夏马鸿宾部队马惇靖八十一师侵占环县后，环县县委决定各级党政机关暂时分散转移，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秦明被派到豆城子，将毛井、虎洞、车道三个区的30多名游击队员统编为一支武工队，由田雨雷任队长，秦明任政委。就地坚持斗争。他们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在敌军空隙里穿插周旋，几乎每天都要转移驻地，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但他们把敌人搅得不得安宁。一次秦明率少数武工队员在下米堰峁与敌八十一师一七九团激战，打死不少敌人；后来秦明又同县委副书记王保民等人随环城区游击队转到河东、河西开展游击活动。5月19日环城区游击队在水钵殿家掌由于奸细告密，突然被马家军一个骑兵团包围。秦明听到枪声，从炕上一跃而起，和游击队长秦应江等一起率游击队与敌人展开激战。战斗中，秦应江和县大队参谋赵廷杰等人牺牲。为了保存力量，秦明决定兵分两路突围，他本人带领几个游击队员担任阻击，结果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了，他因眼镜摔坏，不慎跌下沟去，腿部摔伤而被俘，这次被俘还有县委副书记王保民。

当晚，敌旅长在环城河对坡亲临审问秦明，要秦明承认国民党比共产党好，秦明又正词严地答道：“国民党祸国殃民，不齿人类，共产党为国为民，深得人心！”这响亮的回答如同霹雳，惊呆了敌旅长。敌人又命他摘掉眼镜回答。秦明大义凛然地还击道：“要吃开口，要杀开刀，少说废话！”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敌旅长又气急败坏地命令随从拉下严刑拷打，但不论怎么摧残凌虐，终未能从秦明口中掏出任何供词。随后秦明被解押中宁、平凉，又送往兰州，在平凉监押期间，有位同乡曾打算设法营救他，他分析了情况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少，怕连累别人，遂劝阻了同乡的好意；这位同乡又劝他先办个假手续，先获得自由再说，他坚决拒绝道：“不行！共产党员宁愿牺

牲，不能变节！”甘肃工委为营救秦明，曾请示西北局，打算用俘虏来的一名敌团长相交换，还曾准备以重金相赎，但因马鸿逵提前把秦明押往兰州，营救计划落空。在兰州，秦明先后被关押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爱国青年训导大队”（简称青训队）所属的杨家巷附7号、五泉山东龙口四川会馆，敌人先是用威势恫吓，接慢步，疲劳跑操，轮番审讯折磨他，接着是实行“政治感化”，但都无济于事。敌人还让叛徒利用同学关系，对他诱降。叛徒对他说：“你爱人和孩子也被抓来了，如果你能办个手续，马上可以与家人团聚。”秦明呵斥道：“我相信你们抓不到他们，就是抓到了，我也不见！充分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兰关押期间，秦明结识了我某团政委高波，二人在狱中秘密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高任支书，秦明任副支书，形成了一个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他们将狱中的30多位党员组成4个小组，团结起来，拒绝发表“反共宣言”，不写“自首书”。

1948年5月初，秦明与高波等4人以“共匪”受犯，被敌人用飞机押抵南京，后被监押在镇江金山寺“国防部训导所”，编入第一中队。敌人妄想用“三民主义”教育继续“感化”他，但秦明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和高波采取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办法开展斗争，在墙头、门板上书写标语口号，张贴传单，揭露国民党的虚伪与腐败，宣传我党的主张和大好的革命形势，鼓舞同监人的斗志。敌人见“感化”不成，又把他們20多人编入第三中队，即“顽固中队”，严加监禁。然而铁窗只能锁住革命者身躯，却锁不住革命者的斗志。后来秦明与高波又共同策划了一次越狱斗争，使李魁子等好几个难友逃出了魔窟。敌人的多种伎俩都失败之后，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终于在1948年10月，将秦明秘密拉到南京雨花台杀害了！

秦明遇害时只有32岁，正当壮年！他死在黎明前的黑夜，未能看到全国的解放，未能为中国一展才华！让我们继承烈士

的壮志，踏着烈士的足迹，把革命进行到底！

（张世耕根据贺进民等人回忆整理，刘凤阁参照《甘肃现代人物传》①·本传》增补。）

王 保 民

(1910——1949)

王保民，出生于甘肃省环县木钵乡新营湾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父王清平，早年随张文才起义任副帅，起义失利后牺牲。此时，少年丧父的王保民正就读于当地小学，17岁时迫于家庭的困境辍学回家，同弟爱民精耕农田，并兼开一小磨养家糊口。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环县，从此，使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获得了解放。年轻的王保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光明，积极要求参加革命，起初任曲子县木钵区七乡苏维埃政府文书。他在革命阵营中，受到了党组织培养，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工作积极负责，爱憎分明，进步很快，不久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继而在1940年1月被中共环县委任命为环城区委书记；1941年春任车道区委书记；1943年冬离职赴延安中央党校第五分部学习达两年之余；1946年初王保民学习期满后怀着满腔热情返回环县，在同年2月召开的环县第三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议长，并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年夏，陇东地委决定任命王保民中共环县委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

1947年4月，国民党马鸿宾部八十四师、马步芳八十二师先后占领了环县等地。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为保存革命力量，上级党组织决定县级党政机关暂时分散转移。为了有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环县县委决定组建4支游击队，并派县级领导分赴各支游击队加强领导，开展工作。当时，任环县委副书记的王保民被分配在环城区游击队任政委。在他的带领下，这支游击队转战于环县南部地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是年5月19日，当环城区游击队驻木钵殷家掌时，因遭叛徒告密并带路，

被国民党宁马八十一师一个营包围。游击队在突围中，王保民等人被俘，当晚，被押至环县城附近的河对坡。国民党马家军得知王保民的身份后，妄想从他口里掏出县级机关转移地点和共产党员名单，于是对他采取利诱与严刑拷打，但丝毫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情况，而王保民面对敌人的残暴行为大义凛然，严辞斥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后被解押至兰州。

在兰州监狱关押期间，甘工委曾进行了多方营救，始获释放。但又遭国民党特务的密告，二次被逮捕收监。在监狱里敌人对王保民软硬兼施，劝其投降，王保民始终坚如磐石。于是在1949年夏，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挥锤反革命屠刀，将年仅38岁的共产党员王保民杀害于兰州段家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褒扬献身于解放中国之革命事业的先烈，于1949年×月1日给王保民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纪念证全文是：“查王保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月一日”，盖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不仅肯定了王保民光荣的革命业绩，而且激励后人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孙明生）

李 建 堂

(1896——1951)

李建堂，生前是陇东分区曲子县供销联社主任，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种痘劳动英雄；供销合作战线上的特等劳动英雄；中华全国第一届合作社工作会议代表。

李建堂出生在宁县和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家庭遭土匪抢劫，被人贩子带到曲子，卖给曲子街染房店李长清为孙。自此李建堂在染房店里度过了10余年。1916年，染房店因受官僚政府的高利盘剥而破产，李建堂又做买卖，日常在山野庙会上靠卖一些粽子、麻花维持生活。1933年，国民党环县政府由环城迁驻曲子，他的买卖又做不成了，因为国民党环县民团李恒泰的部队及其保安队人员，常常在曲子街上白吃他的粽子和麻花。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激起了他的反抗情绪。

1934年11月上旬，李建堂在庆北游击队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主动地向他们提供环县民团的设防情况。24日，庆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奇袭曲子城，一举歼灭环县民团500余人，使受压迫的曲子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从此，李建堂与庆北游击队正式建立了联系，经常为庆北游击队通风报信，传递情报。

1936年6月曲子获得解放后，李建堂任曲子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他工作积极，表现突出，1938年1月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党员，并被提拔为曲子区区长。5月，带职随庆环分区专署专员马锡五等人到延安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学习期间，曾和马锡五等人到安塞等地帮助过工作。1940年8月学习结束后，任曲子县政府第四科（生产建设）科长。1941年6月调任曲子县供销联社主任。

此后，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惊人的成绩。

1941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第二年，棉花、布匹、纸张等边区不能生产自给的东西被断绝了。为了搞活流通，发展生产，李建堂和县联社工作人员，分赴合道、天子、木钵、曲子、八珠、马岭、土桥等区，走乡串户，动员群众用现款或实物入股扩大县联社资金。经过宣传动员，全县入股社员达4183人，入股资金达15万元。1942年，李建堂用群众入股的羊毛、皮子等土特产品，从白区渭原、镇原、西峰等地的商贩手中换回了棉花、布匹、纸张、铁棒等物件，价值达53万余元，解决了曲子生活中的部分困难。年终，李建堂给入股社员分红7.8万元，存公积金3.7万元，公益金4800元，受到了曲子和陇东分区合作社的表扬。

1943年，李建堂按照民办方针，改造全社工作，退还旧股，扩大新股，增办脚户店、染房店、信用社、铁匠铺等附加营业，使联社入股资金由原来的15万元增至1千万元。在资金分配上，经营棉花、布匹占80%，文具纸张占5%，一般用品及土特产品占10%，染房占3%，投资工厂占2%。由于资金分配恰当，加上改变了工作方法，使县联社在1944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年进货15400余万元，销货9600余万元，资金周转3.6次，全年获利4205万元（边币），盈余为陇东各商店之首。当年7月，李建堂在陕甘宁边区供销社联席会议上讲了他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被边区政府誉为特等劳动英雄，并奖给他二毛皮袄一领、呢子衣服一身。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他斟酒送行。《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介绍了他的事迹，并将他的画像也印在《解放日报》头版上面。

与此同时，李建堂还组织群众种蓝打靛，改变了边区人民采用草木灰、槐树籽作染料的落后局面。1943年春季，他从白区镇原县一个官员手里用大烟土换回蓝籽300余斤，积极组织13户群

众在曲子试种300余亩。不料试种获得成功，蓝叶头大肥美，丰收在望。李建堂十分高兴，立即按照白区一位商人给他传授的打靛方法，带领县联社工作人员在椿树庄打坝6处，烧石灰1500余斤，指导帮助群众义务打靛10余天，共打土靛15000斤；然后，以每斤千元边币的价格收进县联社，种蓝农户共获利1500万元。接着，李建堂在县联社里办起了染房店，用土靛给群众染布。染出的布颜色鲜艳，价格便宜。消息传开，附近的染匠们纷纷前来学习土靛染法，争购土靛。此时，李建堂成了新闻人物，老百姓称他为“农民状元”，边区政府在《解放日报》上称他为“种蓝劳动英雄”。同年11月，李建堂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在大会上讲了他的种蓝经过和方法。边区建设厅立即号召各县劳动英雄学习他的经验，要求在1944年大面积推广。在这次劳模英雄大会上，李建堂荣获甲等种蓝劳动英雄光荣称号，边区政府奖给他边币2万元。

1944年春季，边区各县普遍种蓝。陇东分区在李建堂的倡导下，共种蓝1200余亩。其中曲子县种蓝700亩，机关干部种蓝100亩，县长赵耀先带头种蓝4亩。7月，李建堂风餐露宿，分赴环县、曲子、华池、镇原、庆阳等地举办打蓝技术训练班，培训打靛技术人员。8月5日，李建堂还应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的邀请，专门在庆城作了打靛技术示范。随后《解放日报》以《李建堂的打蓝课》和《李建堂同志的打靛经验》为题，向边区各县介绍了他的打靛方法。

1946年，曲子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加紧战备。李建堂从战备观念出发，用县联社盈余的资金，从白区商販、逃兵手中买回了一批火药、炸弹、枪支，补充了曲子县游击队的装备。同时，他还在椿树庄帮助民兵试制火药，制造水雷、石雷；在县联社的铁匠铺里，组织铁匠为民兵打造大刀、长矛100余件。与 此

同时，他还把县联社的货物全部转移到沙沟、柳树渠等地隐藏起来。

1947年4月，青马八十二师马继援部队侵占曲子县后，李建堂随县政府工作人员转移到木钵、八珠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1月，为了解决曲子县战备经费紧缺问题，李建堂又做起了生意。他悄悄地把隐藏了的货物运到柳树渠叔父李恒富家隐藏起来。白天用一匹骡子驮到木钵街上摆摊子，晚上再驮回柳树渠，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时间。1949年1月19日，李建堂得悉“青马”八十二师要奔袭驻在木钵的曲子县党政机关时，他急忙从木钵街上转移了货物，然后独自一人带枪隐蔽在山头上，保护这些货物。同年3月战争环境好转后，他又将货物转移到曲子街道继续开业。就这样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李建堂不但没有丢失公家一分钱，而且还经商支援了解放战争。

1950年6月，曲子县合并于环县，李建堂调到环县联社工作。7月被选为中华全国第一届合作社工作会议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把这次会议精神编成顺口溜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其中最后四句道出了他的心得：“经济工作本难行，好坏出在干部身，若把思想搞得通，不怕困难要克服。”9月，李建堂从北京返回环县后不幸患病，于翌年1月25日去世，终年55岁。

李建堂去世后，环县委给他的挽词是：“忠心革命十七年，临终嘱托未竟业。”庆阳地委给他的挽词是：“忘我精神办合作事业奋斗不懈堪称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虽死犹存！”庆阳分区专员公署给他的挽词是：“建堂同志是生产合作建设中的模范共产党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副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等给他的挽词是：“为革命事业尽了应有努力，与劳动人民留下最好榜样！”

（张世锋）

雅 生 华

(1896——1979)

雅生华，环县毛井乡牛寨村人。生前是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

1942年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年已46岁的雅生华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带领全家人开荒地108亩，植树73株，发展大家畜13头，养羊142只，达到了“耕一余二”。1943年11月，雅生华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大会上，雅生华获甲等劳动英雄奖金2万元（边币），返回环县后，他曾在环城、洪德、毛井等地动员群众努力生产，争当劳动英雄。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积极拥军支前，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

全国解放后，雅生华已入暮年，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仍然在黄土地上不停的耕耘，直至1979年病故于家中，终年83岁。

(张世锋)

王 维 舟

(1887——1970)

王维舟，字天楨，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人。出生于一户农民家庭。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随父在家务农，又当过3年店员。1908年为谋生计，赴成都进“新军”工农学校，半工半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家乡组织500多人，自任总指挥，首先光复宣汉县城，继而又攻克绥定府，于是川东各县纷纷起义，对推动整个四川的光复起了重大作用。随后，王维舟在绥定又组织6000人的“北伐大队”，准备“直捣幽燕，驱除魅魍”，但不久辛亥革命失败，1913年王维舟怀着沉痛悲愤的心情再次赴成都，进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知识，以图再举。两年毕业后，适逢父亲病故，回乡料理丧事后，被省警备司令卢锡卿委派为绥定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

王维舟在四川旧军队任职期间，深感四川军阀各霸一方，为争夺势力范围混战不休，眼见对原来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民主，救民生于水火的革命理想已成泡影，便弃职离开旧军队，于1920年5月到上海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王维舟到上海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朝鲜共产党员金笠，后经金笠介绍加入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1920年冬，受金笠派遣王维舟赴苏联在彼尔库次克学习，后被送到莫斯科参加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庆祝活动。1921年底启程回国到达北京。1922年春，王维舟在北京同吴玉璋一起组织了“赤心社”，吸收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通过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22年后季，王维舟离京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由于金笠被朝鲜反动派刺杀，失掉联系。1923年春，得家中急电，母亲病危，王维

舟又重新回到家乡宜汉县清溪场。不久，母亲病逝，丧葬后，他便在清溪场创办学校，培育革命力量。在办学期间，王维舟邀集周伯士、冉雨生等进步知识分子十余人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学习进步书刊，开展革命活动。王维舟在家乡领导的革命运动，日趋震慑反动统治者，军阀刘存厚密令拿办他。在紧急关头，王维舟于1925年冬借冉雨舫、赵举伯等奔赴开江联络旧部王成子、彭子明等开展了驱逐刘存厚运动。由于力量单薄，与反动军阀刘存厚等周旋两年时间未达到目的，遂于1927年1月出川到达宜昌，不久又直下武汉同吴玉璋一起再次开展革命活动，并在武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八一”南昌起义后，党中央号召各地的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王维舟和其他一些川籍共产党员复回四川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王维舟同唐伯壮在开江县普安场建立了中共宜汉特支；4月，又建立中共广邻支那委员会。4月27日，王维舟在宜汉、开江、达县、大竹县等地农民武装中，挑选精悍壮士80名，参加了白羊庙起义，组建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与四川军阀展开了两年多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1年5月28日，王维舟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会议。省委决定：成立川东军委和重组川东游击军，任命王维舟为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5月，川东游击军改为川东红军游击队新编第一路总指挥部，王维舟仍任总指挥。他为发展革命力量各处奔走，积极联络。不久在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下组成了3个游击队，在川东一带活动。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入川，王维舟即率部加入红四方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他领导红三十三军继续在宜汉、万源等地开展游击斗争。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由于王维舟坚持党的正确立场，而遭到张国焘的打击和迫害。

1934年11月中旬，王维舟得通知借贺长庚去巴中参加江渡会

议，待他们徒步到会场，会已结束，王维舟三十三军的指挥权已被剥夺。他住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既不通知他回三十三军，也不宣布另任职务，让他坐冷板凳。幸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王维舟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战绩有充分的了解，非常尊重他，他便在徐向前身边做不任职的随身参谋。1935年2月，王维舟随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长征。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绥靖（今金川）东北的卓木碉拉拢一些干部开会，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封中央主席。接着他在卓克基将红四方面军编为两个总队南下，为笼络人心，又启用王维舟为参谋长。11月王维舟任大金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他在天全、芦山、宝兴等县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宣传组织当地青年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1月，王维舟又被任命为伪中央五局局长，负责探索再次翻雪山过草地的路线和筹集粮秣。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是年冬，王维舟进驻保安，从此，摆脱了张国焘的羁绊，回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身边。

1936年11月，王维舟在保安同刘伯承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向毛主席汇报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12月7日，中央军委改组，王维舟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1937年1月，王维舟随中央直属机关迁驻延安，为丰富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他主动申请并获准调往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王维舟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三八五旅下辖七七〇团、警备二团、警备七团。整编后，王维舟率部进驻陇东，后编入八路军总部延安留守兵团序列。旅部驻陇东庆阳城，七七〇团驻庆阳县驿马关、警备二团驻环县、警备七团驻合水。

1938年6月王维舟由副旅长兼任政治委员，年底升任旅长。1939年底兼任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0年春兼任陇东分区专

员，1941年兼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三八五旅在陇东驻守期间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军民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组织，支援抗日前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协助党组织和地方政府搞好工作。

三八五旅初到庆阳时，正值冬季，困难重重，首先遇到的就是住房问题。为了不给群众增添麻烦，年过半百的王维舟带领旅部及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在庆阳县的田家城、麻家湾沿山崖城墙挖窑洞，在半年时间内，共挖窑洞一百多孔。其次是由于初来乍到，安营扎寨，各方面的开支都很大，而国民党西安当局供给的军饷和物资犹如杯水车薪，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为了解决困难，使边区西大门的边防守卫和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受影响，王维舟又带头在陇东地区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他身体力行，发动全旅干部战士自己种菜、养猪、养羊、砍柴烧炭、打草鞋、捻毛线，办起了油坊、粉坊、豆腐坊……。为了解决部队和群众的吃盐困难，王维舟又指示把部队的牲口统一组织起来，到定边去驮盐。他们还在边区贸易公司的协助下，把食盐、甘草、皮货等物资有组织的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换回我们紧缺的物资。在王维舟的组织和领导下，仅一年时间，部队就从根本上改善了生活和居住条件。为了推动生产自给，王维舟还指示部队开展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的竞赛活动，使整个部队的生产自给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党中央正式提出大生产运动号召之前，王维舟实际已经领导三八五旅这样做了，这就为整个陇东的大生产运动带了好头，做出了榜样。

王维舟虽然身居后方，但他仍胸怀抗日全局，置自己的高位与安危于不顾。为了推动全国全面抗战，他于1938年12月12日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着手开展四川的工作。他认为，根据全国的形势和四川的地位及特点看，“四川已转入全国军事政治中心抗日根据地地区。”这个分析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还毛遂自

荐说：“如果推动四川工作需要人，请调维舟前往帮助一时期。中央从多方面权衡，没有派他去四川，而是仍留他驻守陇东。但他的分析与建议，对中央肯定是有参考价值的。”

1938年3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订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胡宗南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和搞摩擦活动。王维舟遵照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对国民党部队一是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多数群众；二是进行谈判展开说理斗争；三是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他以军人的警惕和敏感时刻观察时局，注视顽固派的动向。4月，王维舟在巡视中发现国民党部队在宁县、镇原有向我根据地进攻的迹象，便立即指示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加强警戒，立即采取措施，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由于王维舟率领三八五旅驻军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此后顽固派挑起的两次陇东摩擦事件都被及时粉碎了，后来虽然发生过多次战斗，但我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并且每次摩擦事件后，驻军都协助边区政府与对方谈判达成临时协议，使事态不致扩大，维护了团结，使顽固派既失理又失利。通过反摩擦斗争，在陇东的北部消灭了环县的政治土匪赵老五，赶跑了顽固派的环县政府，解放了甜水堡一带地方；在东部同样赶走了顽固派的合水县政府，使合水人民获得解放；还挤跑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在庆城的办事处及第三、四区公署；在南部和西南部的宁县、镇原八路军留守部队虽然退出了县城，但维持了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地盘，顽固派蚕食边区的企图未能实现；边区在镇原县的马渠正式建立了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陇东的解放区由原来的3个县——华池、曲子、环县，新增加了庆阳、合水、镇原，变为6个县。为管理新3县，正式成立了陇东分区专员公署。这一重大胜利，应主要归功于王维舟及其所指挥的三八五旅。

1939年春季，国民党停发了我军的一切经费，并加紧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1942年在边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王维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边区的号召，他在总结前一个时期领导三八五旅开展生产自给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向部队和陇东人民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的口号，领导军民更深入广泛地展开大生产运动。他以身作则，进行试验，进行示范，亲自开荒种蔬菜，从开荒整地到施肥，从挖沟修渠到从河里挑水浇地，他都亲身一一去干。他挖的地，土打得特别细，整地也特别平，沟渠交错，就象多年的老农整出的田园，赢得了当地群众和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赞扬。在王维舟的带动下，三八五旅机关、警备二团、七团都在驻地开了大片荒地，种上了粮食和蔬菜。从1939年开始到1941年部队的粮食和蔬菜达到了基本自给，而且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先后办起了团结纺织厂、新华制药厂、光华制药厂、联合工厂、贾桥化工厂、黎明卷烟厂、缝制厂、铁工厂、木工厂以及饲养厂、八一商店等20多个工商企业。为了解决部队吃油困难，王维舟又亲自指示供给部在庆阳、西华池、东华池、合水、曲子、环县等地城镇和农村的油料生产区办起了十多处榨油坊，既方便了群众，又解决了部队的吃油困难。并在庆城和群众合资创办了生产规模较大的庆兴纺织厂，部队和当地群众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仅1941年就解决了全旅每人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一副棉裤以及所需的皮带、挂包、子弹袋等。指战员们的棉被和棉鞋也大部分得到补充和更新。

从1942年开始，王维舟又亲自挥师东进，领导七七〇团开进大风川屯田垦荒，创办农场。他一面勘察土地、草拟计划，规定任务，一面召开大会向干部战士作思想动员。会后带头行动起

来，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热火朝天的在大凤川周围百余里的荒山上干起来。没有农具，捡破铜烂铁自己炼铸；没有营房，用树枝野草搭临时帐棚。部队里南方战士多，不熟悉北方农时气候，每个连队还请了当地有经验的农民作指导，经9个月的艰苦创业，昔日荒芜的山野变成了大片富饶的田园，长上了嫩绿的禾苗。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三八五旅的大生产运动达到了新水平。

连续几年的奋战，截至1945年三八五旅离开陇东，全旅生产的粮食除自给自足外，还调拨给其他部队一部分。大生产运动不仅夺得了物质丰收，还锻炼了人，产生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单位，其中七七〇团的第二连被转为全军先进集体。

吃饭问题解决了，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层层封锁，外地棉花运不进来，没有棉花，纺织厂难于办下去，部队的穿衣也成了问题，而陇东地区又无种棉花的历史。在这一重大困难面前，王维舟经过慎重考虑后，到农村进行实地考察，访问有经验的老农，经过调查研究后，他决定大胆试验种棉花。首先，他找来曾在关中种过棉花的干部战士进行座谈，从中摸清了种植棉花的特点、技术及生长过程后，亲自开了一亩八分荒地，因地制宜，适时播种，第一年就生产皮棉30多斤，打破了陇东地区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观念。他的试验在部队及陇东地区得到了普遍推广，仅1942年七七〇团、警备二团和旅直机关就种植棉花437亩，共产棉花8500多斤，人均产棉2斤，为纺织厂提供了原料，解决了军民穿衣的急需。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在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到会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在会议结束前夕，就近年来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和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显著而又克己奉公，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干部予以表扬和奖励。王维舟被西北局评为生产英雄受到奖励。2月3日在隆重的表彰会上，毛泽东亲笔为王维舟

书赠“忠心耿耿，为党为国”8个大字。

王维舟在陇东驻防的8年中，时刻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护政爱民，做到军民一家。有一次，一个旅部管理员汇报说庆城驻防部队某班长强买了群众的几棵枯柳树，少付了钱，王维舟听后气愤不已，要处分当事人，并要撤换防副司令江贤玉的职。待事情弄清不是这样，而是这位管理员诬告后，他又亲自向江贤玉赔礼道歉，并处分了诬告人。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王维舟是时刻放在心上，关心如同亲人，因此被陇东人民誉为“王善人”。一次，他利用休息时间带上警卫员下河帮炊事员挑水。他们挑着水来到城墙下歇息，发现一个中年妇女带个孩子在城墙下挖着什么东西。王维舟有个习惯，见了百姓少不得问寒问暖。经询问，原来这位妇女是莲池人，丈夫史华是民兵营长，到延安集训去了，全家5口人，去年打的一点粮食大半交了地租，生活没办法，只得挖“观音土”给孩子充饥。王维舟接过“观音土”看了看，难过地说：“老乡，这东西不能吃！走，上我家去吧。”王维舟挑起水，拉住那小孩的手便往营房走，一进家就对妻子喊：“来客啦，锅里还有饭吗，她娘俩都没有吃饭哩！”妻子马奎宜去厨房一看，只剩两碗小米粥。怎么办？王维舟又急忙让警卫员到旅部伙房拿回10个大馒头，他亲自端到这母子俩面前，又倒了茶水看着他们吃，并关切地问这问那。吃完饭，王维舟又歉意地对这位妇女说：“老乡，实在对不起你们！我们的政权刚建立，群众生活很苦，照顾不周，以后，要逐步帮助大家解决困难。”说罢，又取来笔墨，写了张便条让警卫员领着这母女俩去找副专员马锡五领取救济粮款。临别王维舟又让妻子马奎宜拿来两件半新的孩子衣服。王维舟把衣服递给妇女，笑着说：“别见笑，我家小孩的衣服也没有很好的，不过还可穿一半年，带回去给小孩穿吧，有机会，我来莲池再看你们。”史华的妻子接过衣服，激动得双手发颤，临离别时，热泪

滚滚地说：“您真是个大好人，行善救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您留个名字吧，等孩子长大了，我们一定报答您的恩情。”王维舟笑着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要为人民做好事嘛，军队要这样做，专署也要这样做，记住我干啥子，记住共产党、毛主席吧。”

史华妻子随警卫员到专署找到马锡五，很快便领到了5斗小米和30元(边币)。她边走边一个劲地问警卫员，给她饭吃和批条子的“老汉”叫什么名字，警卫员告诉她：“他是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专署王专员。”她走出专署大门，一路上逢人便讲王旅长好，逢人就说王专员是个“大善人”。从此，“王善人”的称号便渐渐传开了。人们称他“王善人”，称三八五旅的战士是“王善人的兵”。此外，至今庆阳还传着王维舟给一位老太太治“痼瓜瓜”的故事，以及他指示三八五旅卫生院开办“利民医院”为老百姓防病治病的一些事迹。王维舟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发扬阶级友爱，孩子受他的影响，也自幼养成了团结同学、爱护穷人的品质。一次，他和爱人发现自己的孩子吃饭时只喝稀的不吃馍馍，王维舟一问，孩子才说：“他们学校里不少同学没饭吃，他要把馍馍节省下来给同学吃。”

1942年6月10日，是王维舟55岁寿辰，这天陇东地委、专署以及旅部和各机关都张罗着给“王善人”祝寿。祝寿会上，庆城居民送来了好几幅匾。有的金匾上题着“德高望重”，有的写着“善星永光”。当晚，旅部文工团专门为王维舟举行了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唱唱咱们的“王善人”》最受庆城军民欢迎，有段唱词是：

说“善人”，道“善人”，

王旅长是个“大善人”，

做的好事数不清，

陇东军民人人敬！

伊伊呀，嘿哟哟。

唱“善人”，学“善人”，

王旅长是咱们的打带头人，

爱兵爱民忠于党，

赤胆忠心干革命。

伊伊呀，嘿哟哟，

赤胆忠心干革命。

在这次晚会以后，“王善人”这个美名在陇东军民中便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了。

1945年王维舟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补委员。1946年2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和选调的一批川籍共产党员离开陇东到延安。当王维舟离开庆阳城时，居民家家家户户在门上插了小红旗，门前摆桌设茶水、黄酒、糕点、水果、香烟等物品隆重欢送。王维舟率领300余人9点钟入庆城北门，欢送的群众已站满了街道两旁，争先恐后同他握手话别，让进屋喝茶、敬酒、吃糕点，倾诉离别之情。王维舟怀着依恋之情逐户向居民告别。全城三华里长的街道，直走到下午3点钟才出南门，已不能赶到合水宿营，只得又重返原地。第二天，在鞭炮和数千人的掌声中才离开庆阳城。

1946年3月，王维舟带领全家，从延安秘密地来到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吴玉章任书记。从此，两位革命老人又战斗在一起了。但此时蒋介石正酝酿发动内战，7月为借故撕毁国共两党谈判协议，诬称王维舟是“暴动专家”留在四川不放心，公开下令限3日内出川。王维舟为争取和平，经组织批准只好离开重庆赴南京，9月转回延安。1947年初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参加指挥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8年5月23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当面对王维舟说：“各战区不断取得胜利，全国反攻形势已经到来，我去华北计划全国

的事情，延安收复后的善后工作你们去做。”4月22日收复延安，王维舟在接收敌伪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9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与晋绥军区合编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区，贺龙任司令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指挥第七、第八两个纵队打击敌人。

1949年2月王维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3月参加了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结束后返回西北。4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区改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王维舟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指挥晋绥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5月20日，西安解放，为准备向西南进军，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解放成都前进部队（一说为西路军），王维舟被任命为副司令员。11月，他同司令员贺龙一起指挥十八兵团向陕南进攻，12月中旬入川与重庆方面西进的第二野战军合力聚歼由陕南溃败入川的胡宗南部3个兵团。12月26日至27日将其中的第五兵团歼灭于成都以南；胡部另两个兵团（第十八、第十七兵团）则举行起义。这样，人民解放军于12月27日解放了四川省会成都。王维舟于29日进驻成都。随即，其他敌军纷纷宣布起义，四川全省即告解放，胜利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王维舟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又投身于地方改革工作。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西南地区胜利的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1951年，他带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边分团，赴四川老区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广元、旺苍、宁羌、剑阁、阆中、苍溪等22县，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慰问。他还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为加强民族团结，西南民族学院成立后，他兼任院长；接着他又亲自筹建了贵州、云南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干部。1954年

王维舟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56年，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9年秋，王维舟率中国老红军代表团赴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参观访问。回国时，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大反右倾，继续发展“左”的错误。但王维舟为维护党的“八大”决议，仍冒着极大风险到各地视察，严肃批评“左”倾冒进，大刮“共产风”不顾群众死活的错误。

1975年当王维舟78岁荣寿时，老战友谢觉哉为他作诗祝贺道：

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如今。

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维舟坚持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极力保护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反被江青诬陷为“不甘寂寞的老头”，康生捏造他有历史问题，因而遭软禁和迫害。因久病得不到治疗，于1970年1月16日含恨逝世，终年83岁。1970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王维舟补开了追悼会。中央各部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生前好友、亲属800多人参加追悼大会并送了花圈。他的亲密战友徐向前主持追悼大会，王鹤寿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说：王维舟早年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有威望的革命战士。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令，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行为作不懈斗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贡献了终身。王维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叶志军整理，刘凤阁改写）

陆 为 公

(1909—1989)

陆为公，庆阳县城人。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89年4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享年81岁。

青年时期的陆为公，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勇于进取。1930年，他将原名陆和改为陆为公，是取其“愿为天下为公而奋斗之意”，充分表现了为公的革命胸怀和远大抱负。1935年初，他在庆阳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西街小学、西街完小校长。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师进驻庆阳，为公大为振奋，热忱地率领师生员工欢迎，积极组织师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12月，担任庆阳各界抗日救国会主任，亲自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庆阳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粮款的斗争。后又以抗日救国会主任的身份，组织和领导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他还与地方进步人士一道组织了庆阳文化慈善委员会、民众教育馆，亲任主任和馆长。为提高党在庆阳的威望，巩固和创建庆阳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革命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不移，经老一辈革命家慕畅和任质斌介绍，于193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为公先后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延安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权训练班学习，使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大为提高，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4月至次年2月，为公受党组织委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建了庆阳陇东中学，并亲自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人才，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重视和支持。1941年3月至1943

年10月，为公担任庆阳县委常委、县政府第一任民选县长，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付出了极大心血，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为公在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秘书主任，1947年3月至1949年7月任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庆阳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武工队队长期间，在国民党“围剿”边区极其严峻的斗争面前，为公直接投入了对敌斗争的前线，为边区的革命建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巩固后方基地、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11月，为公先后担任中共定西地委委员，定西专署副专员，甘肃省农业厅副厅长，省交通厅副厅长、党委书记等职，为甘肃的农林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1954年12月至1958年2月，为公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在繁重的工作面前，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忘我工作。1950年至1958年2月，为公被选为省党代会、人代会的代表。1958年2月，为公因对当时一些“左”倾的错误做法，敢于直言相谏，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残酷迫害。降级、降职，下放到兰州第三工程局联合企业公司木材厂等基层单位。1963年底，他的冤案得以昭雪，于1964年2月调任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十年动乱”期间，为公又一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而后失去工作达11年之久，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为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1977年10月担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到1983年离职休养的6年多时间里，他不顾年高体弱，多次深入各地考察研究，督促检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给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功绩。

为公极为关心和热爱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广泛联系和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并用自己省吃俭用的工资购买收藏保护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古迹和字画，又无私的捐献给国家和家乡人民，他还时刻挂念着家乡庆阳的建设事业，多次回乡视察，编撰县志，修桥补路，造福桑梓，受到家乡父老的衷心拥戴。

为公参加革命工作50多年来，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不论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毅力，即使在遭受迫害，蒙受冤屈的时候，他仍然对马列主义坚信不疑，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生活简朴，尊老爱幼，平易近人。他对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同志和蔼可亲，团结帮助；对子女严加教诲，不搞特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王 春）

刘 仲 鄒

（1891——1940）

刘仲鄒原名刘兴周，祖籍山西省灵石县大道地村。祖上世代居官，为灵石望族。其父刘恆字式甫，清武举出身，同治九年（1870年）授武翰林，官御前侍卫，光绪九年（1883年）从御前侍卫授甘肃庆阳府游击，先后3次镇守庆阳20余年；宣统元年（1909年）因任甘肃肃州（今酒泉）挂印总兵有功，升任陕甘总督中军协镇，不久又荐补为西安城守协镇。刘仲鄒于1891年在庆阳出生。弟兄3人，排行老二。少年聪颖，笃志好学，风流倜傥，由监生保花翎五品衔，升千总。其原配妻早亡，续娶庆阳大族李梯之女，故定居庆阳。1912年父亲弃官回山西老家后，便把庆阳的一份产业交他掌管。

刘仲鄒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养成了正直豪爽、俭朴善良的性格，同情劳动人民，乐于济困扶危，绝无一般纨绔子弟常有的那种骄横淫逸等恶习。在他10来岁时，有一次就将一位沿街乞讨的老太太叫到家中，周济米面衣服。长大以后，更是时常行侠仗义，疏财助人。他憎恶那些为富不仁者自己过着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生活，面对穷苦百姓却不肯拔一毛。他常说：“自己节省一点，帮助别人一点，成全他人的好事，解决他人的困难，自己就觉得愉快一些。”因此，他自己生活上节衣缩食，粗茶淡饭，很不讲究，但邻里朋友有了困难，或有些不相识的穷人，求到他门上，他总是解囊相助。庆城北关有个人名叫夏典，曾在他父亲帐下当过兵，后来解甲归田，年老体衰，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一次携着孙子找到刘仲鄒。当刘仲鄒听了夏典的叙述，再看看爷孙二人面黄肌瘦，衣裳破烂不堪，十分痛心，便当面给了些钱物，

又让管家给夏家送去一石多小麦；以后他还多次亲自去看望夏家一家，解决他们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后来，庆城周围几十里的穷苦百姓都知道刘家为人和善、助人为乐，便纷纷登门求助，有借粮借款的，有拖欠地租的，刘仲郊几乎是有求必应，深受称赞。

刘仲郊对庆阳县一些地主豪绅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行为十分不满，时常站出来主持公道，替老百姓撑腰。然而，刘仲郊好行善施的品德和声望，也遭来了这些豪绅恶霸的强烈嫉恨和排挤。特别是匪霸谭世麟与刘仲郊成了死对头。他一方面利用手中的实力无中生有给刘仲郊找岔子，一方面竟派人想暗杀刘仲郊。刘仲郊无奈，只得于1927年秋携带家小，离开庆阳，回到原籍灵丘县小浦湾村（今赵北村）居住。

刘仲郊虽然遭受富豪的打击排斥，但他并不灰心，反而更加热心公益事业，时时考虑救国救民的路子。他回到灵丘后，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地的老百姓同样也是受压迫受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心情十分沉痛，时常在小陇海、大道地周围散步，长叹！灵丘县城南面有一条河名叫塘河，水势湍急，蜿蜒绕过太白山，在塘子城、大道地形成一道大川，河床宽阔，水势变得平静缓缓，再往下走去，从塘子城、大道地经小浦湾十余里内都是被围水冲刷的淤泥滩，土地平坦肥沃。但因河水忽涨忽涸，旱涝不定，这些土地世代无人耕种，一直荒废着。1928年夏天，刘仲郊一次散步中，正苦思冥想报国之门，他忽然抬头看见这一片荒芜的土地，心中陡然升起一个念头，如果在这里打坝筑堤，挖沟修渠，把这片土地变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增加农田给穷人耕种，不是可以解除很多无地农民饥馑之苦吗！他的这一设想，经与亲邻朋友协商，得到大家一致赞许，并公推他任总指挥，着手筹备兴修塘子城至小浦湾水利工程。于是他便开始四处奔走，上下联系，筹集资金，亲自勘察设计，动员民工；工程开始后，他又吃住在工地，与民工共同劳动。经过3个月的苦干，他

主持的这一重大水利工程竣工了。这一工程，从塘子堤，经大直地到小清河全长十余里，修成水地3800多亩。他把这一工程全部移交给国民党灵丘县政府，建议政府划段发给老百姓耕种。灵丘县政府奖给他银质奖章一枚，并授于他“义士”的称号。他的这一功绩，在当地被历久称颂，人们念念不忘。

刘仲邹先生是一位真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十分关心国家的安危存亡。当“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步步退让，中华民族眼看就要沦为亡国奴。刘仲邹看到这种形势，心急如焚。他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也恨自己是一个懦弱书生，不能从戎杀敌。他想，整个国土都将难保，我还指望兴修农田强国富民，这能有什么用呢？在国难当头，他为寻求救国门路，又毅然离开山西，于1934年春返回他的第二故乡庆阳。到庆阳后，他一方面整顿清理祖上留下的几百亩田产家业；一方面对一些家境贫寒的佃户历年所欠田租，实行减免，或干脆施舍几亩土地和生产资料，扶持他们休养生息。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驻庆城的东北军撤往西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教导师（即红大三科）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工作团进驻庆阳，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宣传和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刘仲邹从共产党和红军那里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深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才有前途。于是他积极响应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为了表示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立即把家眷全部从山西搬来庆阳，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穷人，把20多石余粮捐献给红军。

为了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红军教导师和中共庆阳县委（对外称“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于1937年春在庆阳发动了一次“反冯灭霸”运动。“反冯”即反对庆城八大家之首冯增清。冯增清是庆阳最大的恶霸地主，占有4个乡的2000多亩土地和许多

商业店铺，勾结官府和谭世麟等地方匪霸，鱼肉乡民，作恶多端。刘仲邹踊跃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串联王家彦等一些中小地主和进步绅士，站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一边，积极揭发控告冯端清的罪恶，向教导师民运部提供线索，共商对策。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一些中小地主也纷纷和冯端清划分界线，使之陷于孤立境地，很快便被抗日群众彻底打垮了。另一方面，刘仲邹更注重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红军的号召。他主动接近抗日红军和群众抗日组织，帮助解决困难。如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驻防庆阳后，他发现部队人多无处住，便主动将自己家的房子，窑洞腾出来给部队住，帮部队募捐和购买粮食。1938年12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陇东制造摩擦事件，一些地主豪绅便也蠢蠢欲动，人民群众也怕“反水”，因而庆城一时人心浮动。刘仲邹便挺身而出，亲手焚毁帐约，废除佃户全部欠租；同时，还动员其他地主、绅士也都响应减租减息运动。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也安定了人心。他还把自己的二儿子刘克武送到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在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1940年，陇东和庆阳县响应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号召，掀起大生产运动，以打破顽固派的封锁。刘仲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陇东第一个办起“利民工厂”，为全区军民生产急需的布匹、毛线等，推动了全县乃至全分区办厂建店、发展生产的热潮，为此曾受到陇东分区和庆阳县政府多次表彰，边区报纸也作过专门报道推广。

刘仲邹的爱国热忱和真心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表明他是抗日民主政府和陇东人民信得过的挚友，陇东人民和抗日政府对他十分敬重和爱护。当1940年8月，陇东专员公署决定召开临时参议会时，便一致推选他出席临时参议会。在这次临时参议会上，又一致公推他任议长。刘仲邹不负众望，他把参政议政看成是代表人民实行民主权利，推进民主政权建设的神圣职责。在陇东专员公署临时参议会召开期间，他与其他议

员一起，积极提出了《健全民众组织，加强锄奸运动，巩固抗日后方》、《实行民权主义，推进民主》、《实行民主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根绝烟毒、赌祸、酒祸》等好几个重大提案。在这些提案中，有内容有办法，既属当时抗日施政的重大紧迫问题，又切实可行。所以一经提出，便为政府所接受，形成决议。会后，刘仲邹又到各地宣传动员，检查指导，帮助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这些决议。特别对于在全区实行“三七减租”和豁免1938年前的全部欠租，他主持最力，奔走各县亲自召开座谈会，研究减租办法，亲自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抗租，登门做一些顽固地主分子的思想工作。当时《解放日报》曾报道称“陇东分区减租减息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其中就有刘仲邹先生的大量功绩。

正当刘仲邹先生以满腔热情与共产党合作，为陇东根据地的政权、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做出贡献，为抗战大业奔走呼号的时候，不幸于当年10月中旬突然患急性喉症。在病中他念念不忘自己承担的使命，躺在病榻上仍批阅文件，与各界人士协商工作。最后，在病情恶化时，他说：“我苦苦寻求的真理，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走上这条道路是我很欣慰的。但是，我不能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一道工作了，看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了，又是很遗憾的……”

这位共产党和陇东人民的忠实朋友，10月22日病情不治，与世长辞了。他在陇东分区临时参议长任上仅有一个来月时间，终年也只有49岁！

刘仲邹先生逝世后，中共陇东分委、陇东专署、中共庆阳县委、庆阳县政府和当地驻军三八五旅，在庆城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马文瑞、马锡五、王造时、耿飏等党政军负责人参加大会，沉痛吊唁；王造时、耿飏、谢扶民、甘渭汉送了一幅挽联是：

“作抗日先导为民主先锋壮志未酬君竟死

愤寇焰旋腾怪妖氛得扫老成凋谢我何言”

肖劲光送来的一幅挽联是：

“任务重于生命”。

（褚斌整理 刘凤阁作文字加工）

贾 联 瑞

（1908——1968）

贾联瑞，甘肃省镇原县孟坝镇西垵村人，镇原早期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前，曾任孟坝区抗救会主任、镇原县抗救会主任、中共镇原县委组织部长、镇原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庆阳专署民政科长，国家石油部供应制造局副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轻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银川制药厂副厂长等职。

联瑞少年时期，曾读过几年私塾，他在学习上勤奋努力，成绩优异，成了当时本地略知文墨的人。后因家境贫困辍学，靠给一家地主药店当雇工和租田种地为生。

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北部部分地区，联瑞遂于1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孟坝抗救会主任，在当地配合党组织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1937年3月，红军援西军击溃了打着“孟坝镇国民党自卫军”旗号，破坏抗日运动的反动民团200多人。为彻底肃清这股反动势力，联瑞冒着生命危险，带领20余人，逐村清查逃散的“自卫军”人员，查缴步枪34支，马刀21把。5月，他任镇原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援西军积极筹粮集款，并查处了一些地主、豪绅欺压百姓的案件，为此，8月18日被国民党镇原县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亲自审讯了贾联瑞。面对顽固派的审讯，联瑞进行了有力、有理、有节的揭露和斗争，使邹介民理屈词穷，被迫将联瑞释放。

1946年5月，联瑞担任镇原县委组织部长。他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干部；组织上坚持“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为革命培养、提拔了一批干部。

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镇原县委、县政府奉命撤离孟坝，转移到大小方山、环县一带活动。联瑞随县委、县政府一道与敌周旋，积极侦察敌情，打击敌人。1948年，他任镇原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后，多次率领游击队深入到敌占区，割电线，埋地雷，打击敌人。同时还组织敌占区群众抗粮抗款。4月的一天，联瑞带一个班的游击队执行任务时，被敌人一个正规营包围，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形势十分严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带领仅剩下的4个游击队员突围。在敌人步步逼近不断叫喊：“抓活的，抓活的！”的危急时刻，联瑞急中生智，大喊一声：“张连长，开炮！”敌信以为真，纷纷卧倒；他乘机将身上带的一块干馍用纸包了掷于水中。敌人以为他把什么宝贝投进水里，便蜂拥而上抢着打捞，乘机机会，他带领队员冲出包围，得以脱险。

解放战争时期，联瑞兼任县支前运输大队长，一次他率支前大队路过家门，家里人劝他休息一会，他只在门前喝了一碗水便说：“前头战斗很激烈，部队急需要弹药、粮食，等把敌人消灭了，西北解放了，我再回来休息！”即随队出发。这一年，他配合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为解放宁夏组织担架554副，驮畜2068头，民工3030人，送军粮1,953,068斤，饲料164,000斤，送军鞋286,000双，获得了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1950年5月到次年8月，联瑞任庆阳专署民政科长。他常自带被褥下乡，徒步到各县检查指导工作。1956年，他在国家石油部供应制造局任副处长，这年适逢调资，他是调资组长，按政策条件，本应调升一级工资，但他硬是不要，把指标让给别人。身边的同志称赞他“当官不拿官，享受不沾边”。不久，联瑞患病住院治疗，当时肃反运动开始了，他在没有治愈的情况下，千里迢迢到湖南等地调查研究，开展肃反斗争。

1958年9月，联瑞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轻工业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为刚刚起步的自治区轻工业作出了贡献。在反右倾运动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捏造罪名，搜集整理他的“黑材料”。1960年给他戴上“诬蔑大跃进、人民公社”、“右倾保守”、“反对党的领导”、“违背集体领导，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帽子，撤销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年后，组织派他到银川制药厂协助工作。到厂后，他向领导提建议，协助厂里订措施，搞规划，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十天八天不回家。妻子儿女见他熬红了眼，瘦了好多，劝他：“你何必那么认真？为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嘛？”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和子女说：“共产党员就是讲‘认真’，我从革命那天起，想的就是革命，没想过当官，撤职有什么要紧！”并谆谆告诫子女：“你们要热爱共产党，维护党的团结，服从党的领导，任何时候都要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

联瑞在银川制药厂协助工作近两年，他置个人被罢官于不顾，把各种讽刺挖苦当耳边风，一心扑到工作上，由于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较高的组织才能，组织上又任命他当了该厂副厂长。他任职后，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工厂管理措施，改进生产工艺，常常深入第一线，带领职工甩开膀子大干。为改变制药厂面貌做出了贡献，使这个厂一举跃入全区先进企业的行列。

“文化大革命期间”，联瑞被当成“叛徒”、“走资派”揪斗、批判。他白天受批斗，夜里写检查，“车轮战”没个完，一些造反派为达到整革命老干部的目的，经常到他跟前取证明材料。对此，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丁是丁，卯是卯，为此，曾招致过许多责骂。

由于联瑞无缘无故地挨批斗，遭毒打，人格受侮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肺结核”、“气管炎”病复发，不幸于1968年5月2日在银川含冤去世，终年60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1981年11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决定，撤销

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给贾联瑞同志撤销区轻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的处分，将强加的各种罪名统统推倒，“文革”中给其捏造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取消，联瑞的冤案终得彻底平反昭雪，宁夏回族自治区还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郝世昌）

贾 其 昌

(1902——1976)

贾其昌，甘肃省镇原县县城西街人。1943年开始在镇原县孟坝区四乡西塄初级小学担任教师。

西塄小学是一座私塾，仅有学生11名，教学也完全是旧的一套死记硬背的方法，教材是《三字经》、《四书五经》和一些古文。当他了解到孟坝完小使用边区政府教育厅编的新课本，并教学生写白话日记、作文，学技术、珠算，学生学到的知识就能在实际中运用，学习进步很快时，决心也要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办学。为此，他在学校专门召开了一次家长会议，广泛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可是有些家长还是坚持要教《四书五经》。他使用现身说法来开导，他说：“我念了10多年古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可就是解不开其中的意思，更谈不上运用。这些娃娃年纪小，怎么能学懂呢？过去是读死书，死记硬背的办法把孩子们的脑子越搞越僵化。”结果说服了家长。于是，其昌就向县政府买来新课本120册发给学生，进行讲授。这消息很快传开，学生就很快增加到45名。

其昌贯彻陕甘宁边区颁发的新教育方针，提倡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力求学以致用。据此，他制订了新的教学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学校 and 教学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大抓贯彻落实。

在教学上，他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口语授课。对上过的语文课要求学生会认、会写、会用，并联系学校、家庭、社会的生活实践用字、造句、写日记、作文；对学过的算术课，要求学生不但会做课本上的各种明式计算题、应用题，还要会自编自算应用题。坚决废除“溜口歌”和背诵的方法。

在学校管理上，严禁打、骂、体罚学生，运用表扬、奖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竞赛等办法来训导、管理学生。在各班各年级中，由学生民主选举班干部。

在学校活动上，他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政府算公粮帐，给变工队记帐、算帐，替群众写信，宣传医药卫生、防疫、新法接生等知识。在学校组织学生翻地、种粟、栽树、砍柴、送粪。农忙放假和放学回家叫学生帮家里抬水、扫院、割草、垫牲口圈等零活。

其昌生活极其俭朴。他的西塄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晚上他就住在学校，自己做饭吃。白天忙个不停，晚上既要备课，批改作业，还要教来校求识字的农民。不管多忙多累，他从未怨言。经他教识字脱了盲的农民很多，其中一个人他一年内教识字1,000个，这人后来还当了乡长。

由于其昌坚决贯彻执行了新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使学生越来越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称赞。他曾在镇原县及陇东分区的文教大会上荣获“模范私学”、“模范教员”称号。1944年10月，其昌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评为特等模范，获得特等奖，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给其发了奖品和奖章。《陇东报》、《解放日报》、《边区教育通讯》等报纸和杂志多次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他坚决响应党提出的支援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伟大号召，克服家庭和自身的许多困难，毅然离开家乡到了条件极其艰苦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豫旺、何家寨等小学任教。同心县是回民聚居的地方，豫旺、何家寨小学90%以上的学生系回族。他看到相当一些适龄儿童未入学，尤其是女孩子居多，便走村串户、翻山越岭深入各庄头做家长工作，从而使绝大多数适龄儿童入了学。

他在教学上遇到的最大拦路虎是不懂汉语拼音。为了闯过难

关，他向教师学，自己刻苦钻研，终于学会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翻阅参考资料，写教案，认真备课，常常工作到深夜。不论在课堂或课余，他总耐心向学生讲解、批改作业，从不放过一个错别字和一句不通顺的句子。他所在的学校，每年的升学考试在全县都名列在前头。

同心县是全国出了名的干旱地区。他看到学生在校啃干馍，心里很难过，曾沉痛地同人说：“学生喝不上水，非但学习搞不上去，还会把身体弄坏的。”为了解决这一特大困难，他亲自四处找水源，找到后就发动家长和年龄大的学生，自己亲自带领打了一口井，学生都喝上了水。但他并不满足，他想，学生喝生水会生病影响健康，于是又组织学生砍柴，烧开水供应他们，学生和家长无不感激。

其昌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学生在校参加劳动，给群众送粪、拉运庄稼。为了增强学生体质，他率领师生开辟活动场地，用勤工俭学赚来的钱购置篮球、排球、乒乓球，开展体育锻炼。

其昌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常率领学生下乡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自编节目，给学生排练，下乡巡回演出，很受欢迎。他在同心县从教近20年，从不因私事耽误一节课，总是一学期不结束不离开岗位。有时上级组织教师开会、学习，抽调扫盲等中心工作，他就干脆在寒暑假中不回家，唱“连台戏”。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奉献了30个春秋，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贾其昌1973年从同心县退职后回老家休息，1976年1月病逝于家中，终年74岁。

（祁世昌）

李 义 祥

(1908——1976)

李义祥，甘肃省镇原县小岭乡惠沟行政村人。1936年9月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他历任中共支部书记、中心支部书记，华亭工委、平东工委、华亭工委副书记，为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建国后任华亭县县长，省农会副主席、武都专署副专员，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出了新的成绩。

李义祥的父亲系前清秀才，家境较好，但到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中败落。父亲李富华自幼就靠当雇工渡日，后学会木工，家境有了转机。义祥弟兄二人，大哥李义海，早年跟父母耕种农田，1939年参加革命，积极为党工作，1948年秋，因叛徒出卖，被敌杀害。李义祥自幼聪敏、性情温和，父母甚为喜爱。9岁入私塾读书，学习非常用功，常受老师夸奖。后来因家境衰落，12岁那年只好辍学回家，替人放羊，但他仍然到处搜集书籍，利用劳动间隙和夜晚进行阅读。

1922年秋，年仅14岁的李义祥，离家到平凉“正兴隆”药铺拜师学医。三年学徒期满后，借得掌柜60余元，在新城办起药铺，为民治病。后遭土匪骚扰，于1929年搬回家中，1932年又迁固原草庙子。1936年初，李义祥为了还债，将药铺卖给当地联保主任，回家帮助父母种田。谁知，不久联保主任看药铺无利可图，又要退回，遭他兄弟2人拒绝，联保主任竟诬告他“串通红军、抢劫谋财”。原来1935年8月和10月红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镇原时，李义祥和别人曾在一起谈论过红军，便遭此诬告，竟被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监禁一月余，后因无事实根据才释

放。

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曲子、环县和镇原、固原一些地方，后来红军派工作队到新城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李义祥闻讯后，怀着对国民党的仇恨，约本村农民惠玉民、惠新民等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活动，很快当上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委员，成为群众运动的出色组织者。

1937年初，红军援西军进驻镇原新城、平中原一带，一方面营救西路军失散官兵，一方面发动群众抗日，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李义祥就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惠沟村党支部书记。接着，在庞家村阎家湾又建立了两个党支部，有党员30多人，不久成立中心支部，李义祥任中心支部书记。由于他对抗日救国表现积极，而被国民党保安局捕押，经中共镇原中心县委救出，送边区党校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分配中共曲子县委担任巡视员。1937年秋，调镇原中心县委工作，不久又以中心县委特派员身份，到华亭县安口开展工作。

到华亭后，首先与早年开药铺时结识的农民范仲元取得联系，两人一起以贩卖陶瓷为掩护，到安口熟悉情况，不久他又介绍范入了党。为接近煤矿工人，他又到“广”字号烧酒铺拉骡子，驮煤送烧酒，来往于土谷堆与安口之间。1938年，他以行医为掩护，随范仲元到沿山一带高山、龙眼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他不仅给小孩种牛痘，给群众治病，还亲自采药、亲自煎药守护病人，穷苦人看病他不收钱或少收钱，老财看病则分文不少，把收来的钱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由于他医道高，医德好，很快取得了农民信赖，都亲切地称他“李先生”、“李花儿匠”，在群众协助和掩护下，很快建立了秘密华亭支部。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镇原县委被迫撤到马渠，后又移驻孟坝。李义祥根据平东工委指示，继续在平凉、华亭、崇信一带坚持开展地下工作，并以开药铺为名，

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后来一直把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到陇县一带。

1943年任平东工委委员，当时工委急需工作人员，他不顾后果，就把大儿子李世清送到工委机关，使之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时期他仍负责以华亭为中心的平凉、华亭、崇信、陇县一带党的工作。一次他从高山乔原到雷声清联络点，遭到4名国民党乡丁追捕，在和乡丁搏斗中，头部受重伤，左手食指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幸得地下党员掩护才得脱险。1945年夏他又被甘工委任命为特派员，回到镇原新城一带整顿和恢复党组织。1946年初，李义祥为了加强对华亭、崇信、陇县交界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他以高山塬坎支部为主，建立了高山区委，并秘密建立武装，在境内西兰公路干线开展工作。1946年6月，李义祥任华平工委副书记，他协助工委书记兼华平武装大队政委张可夫，带领50多人，到华亭关山一带开展武装活动。他被称为陇东一带的“活资料”、“活地图”。一次武装大队遭到国民党军队伏击，损失严重，大队长被俘，副政委黄鼎壮烈牺牲，头颅被挂在华亭县城门上。政委张可夫回边区汇报情况走后，干部、战士思想波动很大，面对这种情况，李义祥立即召开会议，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大家的情绪；并当夜派向导将大家送到他家休整。

李义祥的家地处镇原、平凉、固原三交界的偏僻山村，自他参加革命后，他家就成为边区连接平凉、陇南等地革命斗争的联络点和交通站，来往的地下工作者，都要在他家吃住休息。一有任务，他们全家总是忙里忙外，做饭放哨，为来往的地下工作者打探消息，地下人民热情地称他家为“娘家”。武装大队全体人员在他家休息后，接着全部搬进了边区。而他本人却顾不上回家，继续留在坂塬作善后工作。他冒着被捕的危险，一方面转移几名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通过统战关系营救被捕的同志，还只身潜入华亭城内，组织城关党支部通过内线协助将悬挂在城门上的黄鼎的头颅秘密转移安葬。

1946年10月，平东工委成立，李义祥仍任副书记，在平凉以东，华亭、泾川、崇信、灵台和镇原西南、固原东南一带活动，并建立秘密联络点，以马车站为掩护开展工作。1947年6月，华亭工委成立后，义祥任华亭工委书记。他发展一名申家庄的长工入党，让他在华亭开办一个带食堂的小客店，作为新的联络点。后季，李义祥根据甘肃工委环县四合原会议精神，协助张可夫组建了平东游击队。为了壮大游击队，他派地下工作人员以经商为名，多次到宝鸡等地买回枪支弹药、布匹、药品。

由于李义祥长期的积极有效的地下工作，平东一带，包括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到处都有我党地下党员在活动，加之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所以他在敌区活动竟能如鱼在水，多次化险为夷。一天夜里，李义祥去固原南原召开党组织会议，被驻城阳的马家军知道了。要城阳守备队长虎志刚带队抓他。原来虎是我地下党员，他一方面集合队伍。一方面派另一地下党员急去给李义祥送信，使李和其他开会人员得以安全转移。再一次，他去平宝路潘家岭道班找地下党员交谈工作，被3个便衣盯上，他们拿着照片来抓他，他发现后立即换上长袍戴上礼帽，假说，这着便衣走过去，擦身而过，便衣竟没认出他来。

1948年，李义祥派地下党员杨占奎打入镇原麻子沟固郭维水的土匪队伍搞策反工作，拉出一批武装，参加了游击队。5月他与张可夫带游击队在崇信一带活动。一次在罗寺湾，他们仅有5个人就收缴了保安队31支枪，千余发子弹，将游击队扩编为一个连，并进入平凉、镇原、固原三角地带开展活动。后季一天，他去安口申家庄联络点安排工作，被敌人围在窑洞里，联络点地下党员胡秀珍灵机一动，说他是赖家兄弟，听说她有病来看望，他也顺口应称，混过了敌人盘问。过了一会儿，他假装去厕所，溜出窑洞，敌人急追，他已钻进密林跑了。

1948年2月，甘工委根据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指示平东工

委加快组建各地的武装力量，为配合解决平凉地区做准备。李义祥协助张可夫对这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他们先后成功地指挥收缴了平凉眉坞、崇信赤城、灵台梁原等地国民党乡镇公所枪支弹药。同时指派杨希江、孙克录等人带领游击队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小组配合，处决了与人民为敌、破坏地下党组织、残害地下工作人员的恶霸特务，为平凉地区的解放扫清了障碍。

1949年7月，平凉地区各县相继解放后，李义祥被任命为华亭县县长。从此以后，他便以公开身份，又带领全县人民接收旧政权，组织战勤服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解放大西北的斗争。

1950年甘肃省农会组建成立，李义祥调任省农会副主席，他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和领导土改和清匪反霸运动。1952年是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他学习刻苦，积极进取，还利用休息时间为同志治病，在中南海曾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1955年后季，他从中央马列学院毕业回甘肃，任武都地区副专员。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号召群众种植中草药，开展生产自救，并在文县办起了药材厂。他分管文教卫生事业，深入山区，访贫问苦，兴办学校和医院，积极为群众防治疾病，深受群众的爱戴。

1956年10月，李义祥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分管思想政治工作。他工作积极负责，住在办公室，吃饭在饭厅，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严肃认真地处理了财会人员的贪污问题。

1958年分管业务工作，他大力提倡发展中医药事业，提高祖国中医药质量，主办中医训练班，传授中医技术，培养了大批中医技术人才。并利用工作之余，不顾身体有病，为一些干部、工人、农民和家属看病。到武都检查工作，专门腾一间房子，为前来找他的人看病。

1959年，群众生活困难，省委派李义祥带领40多人到徽县考察。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说了实话，而受到停职批判，后经

中央考察组证实，李义祥的观点是正确的。李义祥在患病住院期间，深入病房了解情况，帮助病人排忧解难；教育义务人员，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

1962年后季，李义祥因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折磨，身体非常虚弱，无力继续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离职回平凉四十里铺家中休养治疗。在此期间，前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他热情接待，认真诊断治疗，对远道而来的病人，留家住宿治疗。

1965年6月，面对找他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他同四十里铺大队商量后，办起了大队医疗站，他带徒学医，传授技术。无论天寒地冻，刮风下雨，总是从早到晚，坚持每天上班，带病就诊。无论什么人，他都同样热心接待，精心医治，有时一天诊治达80多位病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时镇原、固原来的病人无处食宿，他就留在家吃饭。他发挥民间土、单、验方的作用，治愈了一大批患者，使他们重新走上了工作和劳动岗位。他除了治病，还常被一些机关、部队、厂矿、学校请去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义祥也未能幸免，他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信、出证明，保护了很多和自己一块搞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在受党组织派遣做土匪队伍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杨占奎被打成反革命关押后，李义祥非常气愤，写信给固原地委为杨作证明，并说“杨占奎要是反革命，我李义祥就是反革命，因为杨是我派去的，要坐牢就让我替他坐牢。”从而使杨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1970年11月，李义祥病情逐渐恶化，行动和说话都很困难，就离开医疗站住进医院。这时医疗站资金已由1,200元发展到8,000多元。在医疗站期间，他连病人送来的一颗鸡蛋也不收。就这样无私地向党向人民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他被广大人民群众

亲切称为“我们的白求恩医生”。

1976年10月1日下午4时，李义祥同志不幸在平凉病故，终年68岁。

(宋德良原稿，史德智增写)

王 子 厚

(1911——1981)

王子厚，原名崇德，甘肃省镇原县平泉镇麻王村人，他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王存灵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在乡邻中颇有声望。子厚自幼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刚正不阿、开朗豪爽的性格。

子厚8岁入本村私塾。他勤奋好学，长进很快，得到老师器重。1924年，家遭土匪洗劫，生计艰难，年仅13岁的子厚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父亲务农。1928年大旱，秋粮颗粒不收，麦子未种，次年年馑，可官府的青捐杂税丝毫不减，子厚的父亲被迫自缢身亡。从此，家庭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18岁的子厚身上。他家口粮虽然紧缺，但看到乡亲们吃草根、啃树皮，他就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灾民，自家却饥一顿、饱一顿的勉强维持。为此引起叔父和弟弟的不满，遂与他分家另居。在这民不聊生之际，地主豪绅逼租收债有增无减，逼得不少贫苦百姓家破人亡。子厚见此，义愤填膺，就出面组织贫苦群众抗租抗债。由于他仗义疏财，抱打不平，主持正义，1930年夏，被群众推举当了本村村长。他办事公道，对上敢顶国民党政府的不合理摊派，对下敢为穷苦百姓说话，有时还拿出自家的钱为乡亲们垫支税款，深受村邻信赖。但日久天长，他的家却渐临破产了。

1934年夏，为了抗拒国民党政府浮收捐款，反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子厚和本县孟坝镇刘海晏联络，发动南三镇（平泉、中原、新城，下同）400多名群众，聚集于县城王母宫山，有组织地围攻县衙，控告南三镇镇长和地主豪绅。县城附近各乡镇贫苦农民闻讯也赶来参加，迫使国民党镇原县长钱史彭当众

宣布“缓征捐税，免除额外摊派，派员查办豪绅。”事后，县府派人到南三镇敷衍，敷衍群众，并暗示平泉镇公所和地主豪绅杀害王子厚，因子厚受广大群众保护，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此后，子厚卖掉80亩地，买得手枪一支，准备组织群众发动武装斗争。

1935年8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转战进入镇原县新城、平泉一带，袭击了国民党新城镇公所，处死县警察局长党效贤等3人。红军还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救国救民的方针政策。采买补给时，尊重群众，公平合理；住营时纪律严明，不随便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都使子厚看到红军与旧军队不一样，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从而使他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念头。当时，地主豪绅都跑光了，他却把红军请到家中，管吃管喝，帮助红军采买补给，并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1936年12月，在陕甘宁省地方工作团的帮助下，他与张元龙、朱良汉等在南三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担任该会生活部长，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3月，刘伯承率领红军援西军进驻镇原。红三十一军驻平泉、新城、中原一带。一方面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官兵，一方面在驻地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帮助地方建立群众抗日救亡团体。4月，王子厚由李万全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中共镇原县委成立，同时在中原、平泉、新城、屯子等镇成立了秘密区委，对外称“抗日救国会”，子厚任新城镇救国会主任、南三镇中心区委组织科长。他充分利用情况熟的有利条件，宣传发动群众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扩大中共在南三镇的力量，使南三镇成为当时镇原县党的力量最雄厚、斗争最活跃的地区。

抗日战斗爆发后，子厚被派往抗大学习。1938年1月，他与同乡刘自能冒着风雪，步行15天来到延安。在抗大，他如饥似渴

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优异成绩。毕业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努力为党工作，子厚受到极大鼓舞。

1938年6月，子厚回镇原仍任南三镇中心区委组织科长；12月，调任庆阳县委武装部干事；1939年2月，调庆环分区机关任管理员。虽然工作调动频繁，但他所到之处，任劳任怨，忘我工作。1939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在镇原摩擦事件中，南三镇的党组织和群众的抗日团体遭到极大破坏，八路军指战员和革命干部的家属遭到残酷的迫害。子厚的家被查封，财产被没收，国民党并且悬赏通缉子厚本人。他一家三代，被迫深夜逃到马渠，母亲和妻子靠给人洗衣做饭维持一家生活。这时正在庆环分区机关当管理员的王子厚，一心扑在工作上，也没有回家看看。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政府在马渠成立，王子厚被任命为县政府四科（建设）科长。他跑遍6区34乡，宣传动员农民搞好生产，指导县贸易公司、土产公司搞好经营管理，竭尽全力解决全县革命工作人员和驻军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带头开荒种地，捻线织布，被译为劳动模范，受到陇东地委和专署的表彰。1943年3月，子厚任镇原县政府保安科长。他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县警卫队及各哨站、检查站，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掌握敌情，帮助解决困难，保证了镇原县与敌接壤边界的稳定，使解放区得到了巩固。

1946年2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镇原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子厚当选为镇原县县长。他积极领导解放区人民增加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8月，在“迎王战役”中，他与县委书记刘文山、保安科长陶维尧带领县警卫队、游击队配合警三旅攻下太平镇，打通了太平至屯子镇的通路。在太平，他将自己的乘

马、穿的衣服鞋袜等都送给了王震将军，自己却赤着脚回到县政府驻地。12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形势日益严重，镇原奉命成立战争动员委员会，子厚兼任主任。他辛勤操劳，组织群众进行战争准备，实行坚壁清野，动员组织青年参军参战，一月内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新兵140多名。

1947年2月，胡宗南部一个团进攻孟坝镇。根据上级指示，王子厚指挥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及警卫队、游击队，各区乡干部撤退到县北大、小方山一带，镇原解放区大部分沦陷。3月，县委、县政府将全县武装力量整编为一个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队，共190余人，子厚兼任大队长。他与政委刘文山带领游击队在镇原、环县、庆阳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他多次带领小分队深入敌后进行突然袭击，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捕捉“舌头”，配合陇东地方部队作战。4月，因他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战绩突出，陇东专署颁布命令，给他记大功一次。

同年7月，镇原县委、县政府组织4个武装工作队，共40余人，深入各区乡开展地下斗争，发动群众，保护群众生产，开展反奸斗争，组建两面政权，侦察敌情，整顿党组织。在他的领导下，一年内，镇原游击队、武工队与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部队及地方保安团队作战55次，毙敌近百名，缴获一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当年镇原县为支援前线，在战勤服务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先后组织担架704副，参加2900余人；运输队33个，参加543人，322头驮畜，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8年2月，王子厚调任平东游击大队长。他与平东工委书记张可夫、副书记李义祥团结一致，领导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周旋，多次袭击国民党乡（镇）公所、保安队，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先后和平凉花所、崇信黄寨原、镇原新城、马渠等地，经决

了与人民为敌，作恶多端的反动乡（镇）长朱连成、李应福、贾志杰等，影响震动很大。在斗争中，平东游击队由几十人发展到100多人，军事战术水平迅速提高，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地方武装。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子厚带领平东游击队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为平凉分区各县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9年8月，子厚被任命为平凉专员公署副专员。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充沛的精力，组织平凉分区各县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惩治反革命，救济贫民，安定民心；动员人民筹军粮，做军鞋，组织运输队、担架队，继续支援解放大军西进。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使自已适应从战争环境向经济建设的转变，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经济工作知识。经常深入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总结积累经济工作经验，很快成为一名领导经济工作的内行，为平凉分区的经济恢复出了很大力。他忘我工作，积劳成疾，1952年9月，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组织送他到甘肃省干部休养所休息。

1954年，子厚被任命为武都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他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现场指导工作。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注重从实际出发，做好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及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强调加强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保证了武都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稳步健康的进行。1955年9月，党派他到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他认真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理论修养，研究时事政治，研究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优异成绩毕业。1957年7月，重新回到武都专员任上。他坚持运用革命理论指导工作实际，从肥南的实际出发，分别指导各县的工作，不搞一刀切。在经济建设上，允许各县有自己的侧重点，发挥各自特长，使各县的经济工作有了充分的发展。

1958年后半，因受所谓“许张反革命集团”案牵连，王子厚被诬指为“黑后台”、“镇原的太上皇”等，立专案审查，受党内警告处分。1959年又以所谓“用人不问政治”等问题，受到错误批判；嗣后，在反右倾运动中再次受到批判，并被降职，“挂职下放劳动”达4年多。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向领导认个错”以求平安，他果断地回答：“我只有向事实认错，向真理低头的习惯，没有向错误东西屈服的必要。”对当时“左”倾错误予以坚决抵制。时任镇原县委副书记的女儿王建，正在省党校学习，被调回县上交待问题，顺便去看他，他严肃地要求女儿：“你们要坚持党性，实事求是地谈问题，自己做事自己当，不要伤害别人。”

1962年11月，王子厚调任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他没有因受冤屈而消极气馁，继续以高昂的革命激情，经常深入灾区，慰问灾民，组织救灾抗灾，帮助灾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他坚持原则，为党为公，没有用手中的劳动人事、社会救济大权办过一件私事。他严格要求子女及亲属，教育他们要大众化、普通化，努力工作；要记住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要做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派。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些人再次利用“许张冤案”和反右运动中的材料，对王子厚进行攻击和诬蔑，使其受审查、批斗达16年之久，政治上蒙受冤屈，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在大多数老同志遭受迫害的日子里，不少专案人员到他跟前调查材料，他实事求是，是什么就写什么，对一些问题他出面承担责任，保护了一誉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同志。当有人对他写的证明不满意，逼他写假证明时，他就严肃地说：“要尊重事实，一句假话，会造成多少人含冤受屈，这种事我绝对不做，

建议你们也别作。”

1978年，王子厚重新恢复工作，再次担任甘肃民政厅副厅长。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带病奔赴陇东老区调查研究，收集第一手材料，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制定老区优抚救济计划，受到老区人民热情欢迎和赞扬。1979年12月，在甘肃省人大二次会议上，王子厚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带病坚持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落实干部政策，对受迫害的老同志，他总是耐心说服他们要相信党，按组织纪律办事，对生活上有困难者，他就拿出自己的钱予以帮助；他一封一封地研究上访信件，一一予以回复。由于长期奔波劳累，1980年后季他病倒在外出途中。经检查，他患的是胃癌，已到晚期，才不得不住院治疗。此时还有几十封来信没有答复，他就躺在病榻上口授，让女儿王玖代笔，直到全部回复完为止。

他身卧病榻，心里还想着老区建设，对前来看望他的省上领导同志说：“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保护养育了我们，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要为他们着想，抓好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他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就是在他病危期间，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他说：“我的病已经不行了，你们不要浪费药了，把它留给别的同志用。”在他弥留之际，再三叮咛，“我死后火化，办丧事要从简，不要在这上面花国家的钱。”并要求把骨灰撒到黄河里，以报中华母亲。他对子女们说：“你们要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要顾全大局，不要跟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表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宽大胸怀。

1981年1月18日12时30分，镇原人民的优秀儿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子厚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1岁。

（张德杜）

• 简介部分 •

赵 明 发

赵明发（1910—1933），出生在华池县怀安乡张阳垣一个贫农家里。弟兄6人，他排行老四。因人家多贫，14岁给人家放羊喂饭，不挣工钱。17岁出外扛长工、打短工，挣得微薄工钱，作为家里垫补，几个哥哥也一样在外拉长工。后因父亲年近，在他20岁那年，开始回家种地，养活一家老小。

1933年1月，在怀安的坪庄、吴旗的头二道川、柔远、乔河一带“闹红”时，23岁的赵明发同本村的几个青年农民，立即参加了南梁游击队。由于他精明能干，耿直忠厚，不久被任命为游击队的中队长。上任后，他带领30多个游击队员，迂回在坪庄、元城、柔远、乔河、吴旗的庙湾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充游击队。虽然时间短，但他带的游击队工作很出色，在周围群众中颇有影响。不幸的是，1933年3月19日早饭后，赵明发召集游击队干部马季、李生江正准备在怀安赵砭沟一农民家里开会，研究处理打土豪中所没收的牛羊牲畜问题。这时遭叛徒告密，被盘踞在元城的马鸿逵部队300多人包围，经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因寡不敌众，赵明发3人被马匪俘虏。为了威逼游击队投降自首，穷凶极恶的马军将赵明发3人吊在大柳树上，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开始为使周围未暴露的游击队得到讯息，赵明发高声大骂不止，后来他腰腿骨被打碎了，胳膊被打断了，死去活来，气力耗尽，再骂不出声了。

这样的恶毒审讯一直延续到下午，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马家兵，放火烧毁了赵明发等人的庄院，并把他们3人拴在马后，一直拉到元城。由于他们脚坏、腿疼，跑不动，走不成，

基本上是在地上被磨了几十里路。到元城时，赵明发等人，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马家军为了杀鸡警猴，镇压革命，消灭游击队，3月21日上午10点钟左右，在元城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用马刀割下赵明发、李生江二人的头，悬挂在元城街北的高杆上示众，并派兵看守，不让家人收尸。匪徒灭绝人性的暴行，激怒了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26日晚，在元城群众的配合掩护下，赵明发生前所在的游击队，杀死了哨兵，搬走了烈士尸体。

赵明发被害时，年仅23岁。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还不足3个月，但他却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歌曲！

（陶兴范）

李 生 江

李生江（1906—1933），华池县怀安乡坪庄村赵歇沟人，从小务农。1933年1月，参加南梁游击队，任游击队中队长。为扶正除恶，解放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他同中队长赵明发带领30多个游击队员，在坪庄、元城、吴旗、柔远、乔河一带攻打民团，消灭土匪。并且没收地主豪绅的牛羊财产，分配给贫下中农。他们的游击队所到之处，深得广大群众欢迎；也引起反动民团、地主劣绅惶惶不安，心惊胆颤。

1933年3月19日，李生江同赵明发、马孝准备在赵歇沟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研究分配没收地主的牛羊牲畜。早饭刚过，人未到齐，就因叛徒告密，被元城窜来的马鸿逵部300多人，将赵歇沟庄子团团包围。虽则他们3人在窑洞奋力向敌射击，但因子弹打光，寡不敌众，终被马军俘虏。

马军为逼迫他们投降自首，将3人吊在赵墩沟门前的大柳树上，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下午，万恶的敌人将李生江拴在马后，一直磨到相距50多华里的元城。

3月21日上午10时许，马鸿逵部在元城街召集大会，当场用马刀将李生江头砍下，挂在街北的高杆上示众，并派匪兵站岗，不让家人收尸。马军残无人道的暴行，并没吓倒游击队的战士和正义善良的老百姓，反而加剧了人民革命的愿望，增长了打倒反动派的决心。为此，在元城群众的配合掩护下，26日晚，李生江游击队的战友，杀死马匪哨兵，将烈士的头颅同尸体运回到赵墩沟埋葬。

（陶兴范）

白 阳 珍

白阳珍（1872——1934），甘肃省华池县南梁葛园堡村人。1933年秋参加革命，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任。那时，他已是61岁的人了。

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开创前，白阳珍和广大贫苦群众一样，酷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倍遭团丁土匪的欺压，被逼领着一家13口人，深居南梁金岔沟梢林里，靠开点零星荒地和粗种地主要部分薄田度日。稍遇年馐，全家老小便不得不靠在山里采集野菜、野果接济点粗粮充饥，生活甚难熬煎。尽管家境如此贫寒，但他还时常接济比自己更穷的邻居和亲属，发现谁家揭不开锅，他总是让家里人给送去一点。

1928年，陇东大旱，第二年南梁一带饥民为求生存，不得不

成群结队出去“吃大户”。白阳珍在其中最为积极，他鼓动村邻们说：“饥荒年，人命关天，饿死的人都是胆小的，他们（指地主豪绅）为富不仁，就应硬来！”在那场闹饥荒的斗争中，白阳珍勇于反抗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得到充分表现，并且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以后，大家每有拿不准的事，都来找他商量。

后来，刘志丹在南梁组建起一支革命武装，吓得地主和反动民团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们广作欺骗宣传，称这支革命武装为“土匪”，要群众闻讯后“马上报告”，“赶快躲起来”。白阳珍为此思索良久：地主、民团和土匪经常狼狈为奸，欺压百姓，是穷人的死对头，他们说的“土匪”说不定就是好人哩。白阳珍便留心打探情况，要弄个明白。一次，他正巧遇到曾在白马河川给人打过短工的杨培盛，他俩是老相识。培盛便把刘志丹游击队的详细情况讲给白阳珍，还要白阳珍把真实情况向群众多作宣传。白阳珍解开了心里的疙瘩，非常高兴，便把听来的情况告诉给村里人。开始人们还半信半疑，后来游击队间或到荔园堡一带活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严明纪律，使群众进一步受到了实际教育，都说白阳珍“人老见识广，说话就是有准儿”。从此群众见了游击队不但再不躲避，还时常帮助游击队，起初称游击队为“好土匪”，后来亲切的称呼“咱们的南梁游击队”。

1933年10月中、下旬，张策、习仲勋等受陕甘边区党的指示，先后来到南梁，开始作创建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他们常常落脚在白阳珍的家里。在张策等人的指引下，白阳珍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协助张策在荔园堡附近组织和发动群众。他不顾年老体迈，走遍荔园堡川的庄头院落，挨门挨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联络农民积极分子。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这是南梁地区第一个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白阳珍被推选为主任。当时缺乏革命骨干，为了给革命增加一份力量，白阳珍还把自己的儿子白天章推荐给张策。他对张策

说：“天章人还机灵，又有胆量，就让他也参加革命吧。”张领高兴地称赞他是位“有远见的老人”。这年底，南梁地区建党工作开始后，白阳珍首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初，他的儿子白天章也入了党，还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对儿子的迅速成长，白阳珍无比高兴，他常叮嘱天章说：“要把革命的事干好哩，就是掉脑袋，也应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当时，农民赤卫军刚刚成立起来，没有武器，白阳珍就发动群众搜集废旧铁器，同李青山等人很快赶制了些红缨枪和大马刀，让天章拿去发给赤卫队员。白阳珍一心为革命的行为，曾受到当时陕甘边区负责人的多次表扬。

南梁地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震慑了国民党陕甘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1934年春，国民党地方军仇于康部和庆阳谭世麟国民团千余人向南梁发动大规模“围剿”；为粉碎敌人“围剿”，主力红军转移外线作战。4月28日，敌人进占荔园堡，大肆烧杀抢掠，搜捕革命干部和红军家属。那天上午，一部分敌人径直向金岔沟扑来。这时白阳珍正在后沟组织群众转移、坚壁物资。在这紧急关头，老贫农贺大奶冒着生命危险，捷径绕过一个小山头，跑了七、八里路，去给他报信。闻讯后，白阳珍迅速布置群众转移，自己留下收拾现场。不一会儿，只见前沟尘土飞扬，敌人的马队涌了进来。白阳珍看到群众刚躲过敌人的视线，还没走远，十分焦急。为了把敌人引开，给群众转移赢得时间，他故意跑出村子，越过沟台的宽僻地，向对面的一条小河沟跑去。敌人果然发现了白阳珍，便一窝蜂向他扑去，白阳珍被撞了，群众脱险了。

敌人把白阳珍捆绑起来，押到离金岔沟不远的阎洼子村，关在窑洞里。当他们得悉被抓的就是白阳珍后，如获至宝，企图从他口中掏出急需的情报。谭匪用压杠子等酷刑审讯白阳珍，要他供认“谁是红军家属”，“谁是共产党和地方干部”。白阳珍年

老体弱，几次被折磨的昏厥过去，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强忍剧痛，英勇不屈，拒不回答敌人的任何审问。谭匪见从白阳珍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便大发淫威，于1934年5月4日（古历3月21日）拂晓逃窜前，用铡刀将白阳珍杀害，那年他62岁。

敌人逃窜后，乡亲们含泪从血泊中收尸整容，将这位老人掩埋在南梁的后庄岭上。

白阳珍牺牲了。他在党的指引下，晚年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为革命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最后为了迎接“满目青山”的未来，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黄昏颂”……今天，这位英雄的名字刻在高耸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塔上，也深深铭刻在南梁人民的心里。

（王来才）

黄 宗 万

黄宗万（1915——1934），乳名万子，华池县悦乐镇庙咀子村人。1933年冬在他的家乡参加庆阳游击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部队在庆北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抗粮，抗苛捐杂税，同地主豪绅作斗争，为开创庆北苏区立了功。在他入伍后的一年战斗生涯中，曾参加过攻打悦乐堡，五蛟堡大小战斗十余次，表现英勇机智，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先后被提任为庆阳游击队班长、中队指导员等职。

1934年春的一天，他同何占胜、张德财3人侦察到驻杨寺岔曹家原的国民党部的梁营长和一个连长，带着两个护兵另住在离其部二、三里处的一个庄头。于是，决定擒拿这几个家伙。他们乘天黑摸到敌人住的窑洞前，只见梁营长和那个连长正躺卧抽大烟，两个护兵抱枪靠在窗台前打盹。黄宗万和何占胜、张德财健步冲

进窑里，喊了声“不许动！”将枪口对准了敌人的脑壳。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得敌人呆若木鸡，不待反应过来，便乖乖举手就擒了；还缴获手枪两把，马管枪两支。

不久，为了避开敌人“围剿”的锋芒，保存革命实力，庆阳游击队于4月下旬，在队长张志孝、政委王宝珊的带领下，北上吴旗一带活动，寻机打击赵昆、贺凤喜、张廷芝诸反动民团武装。一次，庆阳游击队在牛家胡同被张廷芝部和地方反动民团包围。在敌众我寡，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庆阳游击队立即组织突围，政委王宝珊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在这关键时刻，黄宗万命令一部分战士阻击敌人，他背着王宝珊冒生命危险突围。他接连击毙敌人数名，杀开一条出路，将王宝珊隐蔽在一个安全地带。随后，他又投入战斗，牵制敌人边打边撤，使游击队化整为零，退入梢山，避免了一次重大伤亡。

5月中旬，庆阳游击队与保安游击队、骑兵大队分兵三路，进袭驻在吴旗王西沟的赵昆、张七、王万邦等土匪。黄宗万带领17名战士沿一道小沟按计划直抵王西沟目的地时，因忽下大雨，其他部队未能准时到达。战斗打响后，黄宗万带领战士直取王西沟山巅，但因寡不敌众，被压了下来。黄宗万只得命令游击队迅速撤退，他在后掩护阻击，不幸中弹受伤被俘。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高悬山头，惨状目不忍睹。敌人的罪恶行径，更激起了游击队战士的满腔怒火。他们高呼“为指导员报仇”、“为烈士报仇”的口号。正在这时，游击队总指挥马福吉带领主力赶到，再次向王西沟发起冲锋，敌人见势恐被包围，便乘雾霭逃跑了。

黄宗万牺牲了，他才13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闪烁着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光芒。

（王来才）

曹 渺

曹渺（1904——1935），甘肃省华池县城壕乡鹑子原人，1933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初受党的指示做地方工作，后参加庆阳游击队，任第二大队分队长。1935年4月的一天，国民党东北军骑兵部队百余人，经城壕李家原一带“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曹渺带领7名游击队员在李家原一带率制诱感敌人，毙敌排长1名。后因寡不敌众，即命令其他队员迅速撤退，自己只身阻击迫随之敌，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使其他战友脱离险境。而他自己由于身负重伤，落入敌手，被杀害。时年31岁。

（王来才）

龙 治 祥

龙治祥（1912——1935），华池县元城乡西和平人，1933年参加革命，任乡农会主席。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常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粮送草，做军鞋。

元城是一道南北方向的川，川中间的山包上修着一个不大的山寨，山寨里住着庆阳民团谭世儒的一个连，这个连的官兵三天两头到村里杀人放火，抢劫东西。他们还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所谓“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1934年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指挥下决定攻打元城子山寨。龙治祥和当地群众平时受尽了寨子里匪徒的气，早就恨不得把这帮土匪消灭掉。一听说红军要打山寨了，龙治祥马上积极组织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

战。大家送水的送水，做饭的做饭；有的带路，有的还拿起大刀长矛直接参加战斗，助威呐喊。在群众积极支援下很快攻下了山寨。消灭民国70余人，缴获了部分毛毯、枪枝，拔掉了华池北面的一个钉子，给元城人民除了一害。

1935年4月，龙治祥正在家里吃早饭，国民党政府军马鸿宾部队，突然从环县过来直奔龙家将其捆绑。并把当地一些群众也强运到陈兴庄的场里，叫他们站成一排，供认龙治祥是好人坏人？谁是游击队员？谁不说就把谁抽打一顿！逼供未得到任何结果，马家军将龙治祥和另一个人绑在新庄洼一群众的棚梁上，龙治祥悄声对被绑的另一个人说：“就是杀头，也不能说出游击队在哪里！”

第二天上午，匪军将龙治祥拉到一个小屋子又进行拷打，逼问：“红军在哪里？游击队的枪埋在什么地方？”龙治祥还是坚强地回答：“不知道！”敌人从龙治祥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恼羞成怒，将他拉到元城南街戏台后面杀害了。当时他只有23岁。

（曹向阳）

张 有 财

张有财（1911——1935），华池县乔河乡虎坪村枣刺砭人。从小给人扛长工，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摧残折磨，对黑暗的社会充满了憎恶和仇恨。

1933年间，红军开始在南梁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华池各地迅速组织起了工农武装力量。在“闹红”热潮的影响下，张有财与几个伙伴相遇，联名参加了当地赤卫军。参加赤卫军后，他们白天坚持生产劳动，夜晚与队员们进行军事演

习，切磋射击刺杀技术，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天午夜，张有财与赤卫军队员放哨时，发现一股土匪向村中窜来，他们立即分头组织村民坚壁疏散。瞬间，土匪已扑进村中乱砍乱烧，赶猪捉鸡，抢粮抢物。忙乱中张有财突然发现一位年近老妇倒在地上乱摸乱爬，他毫不犹豫地跑上前去，背着老奶奶离开村庄，把她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不久，张有财和其他赤卫队员一起被编到庆阳游击队。在游击队长张志孝、王宝珊等教育培养下，张有财进步很快，先后当上了班长、分队长。

1934年至1935年间，张有财所在游击队活跃在定边、志丹、吴旗一带，配合各游击队、赤卫军打土匪和国民党民团。因张有财很勇敢，大家称他“张二冒”。

1934年的一天，游击队在攻打吴旗县白豹许廷祥的堡子时，由于枪弹奇缺，3天3夜未能攻破。张有财便乘黑夜带领全班战士，借着云彩悄悄爬上堡子，消灭了守夜哨兵，夺得长枪4支，子弹4袋。待堡内敌人发现逼近时，张有财纵身从几丈高的堡子上跳了下来。由于枪弹得到补充，堡子很快被攻破，游击队给张有财记了一等功。

1935年5月，陕北蔡丰民团集结定边五岔城子，胡作非为。庆阳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赤安游击队配合消灭蔡丰部百余人。在追击蔡丰残部逃兵时，张有财冲锋在前，一人夺枪3支。接着，保安游击支队、庆阳、安塞等游击队根据群众要求，决定打击金鼎山匪。由于敌堡防御坚固，一连几天攻不下。张有财便潜伏到堡子附近侦察地形、敌情，终于发现敌堡底墙石条下地基不牢，若能抽掉底墙石条，即可破堡攻进匪巢。但敌人十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守甚严，稍有动静就有可能被发现。于是张有财只好在深夜摸到石堡下，为避免弄出响声，他尽量不用其他工具，而用双手挖石条，结果十指磨得流血，才拆掉了基石，使游击队进入敌堡，全歼匪部向魁部，缴枪30余支，子弹3箱，战

斗结束后，战友们围着张有财亲热地说：“这一仗功劳全在你呀！”就在会鼎山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张有财又与游击队政委强家珍合骑一匹马出外勘察地形，侦察敌情，途中碰到了道庙民团首领张四。张有财与强家珍活捉了张四，搜缴了他随身带的盒子枪，并迫使其下令从窖子里吊出该民团的17条步枪，3把盒子枪。6月的一天，游击队与骑兵队又巧袭了定边华山城子民团。战斗中，张有财看准时机，率分部抄断民团后路，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击溃民团3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同年夏，安塞、庆阳等游击队整编为陕甘边区独立第一营，张有财任独立营运输队长。7月15日，他前往吴旗县刘家砭凤凰寺送粮，由于阴雨连绵，河水暴涨，道路中断，当天未能将粮食运回部队，影响了部队正常生活，被枪决。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吴旗后，张有财所在部队战士一致提议：张有财有错无罪，不应枪决。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经全连讨论，上级批准，当即给张有财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赵晓红）

郝文明

郝文明（1900——1935），甘肃省华池县南梁乡白马庙村人，弟兄4人，排行第四，当地人又称郝四。年少时为人牧羊，稍长随父租田种地为生。

南梁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南梁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武装斗争，郝文明受到教育和影响，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意识。他利用农闲跟庙会、听说书的机会，接受党的秘密宣传，还把自己初步接受到的革命道理讲述给群众，鼓励一些出身贫苦的青年投身革命活动。

1933年冬，南梁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金岔沟农民联合会建立后，郝文明积极参加“农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经常晚上步行20多里路去参加会议。为了尽快将群众组织起来，他奔波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村头院落，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群众反抗剥削的阶级意识。在此同时，他抓住有利时机，很快在白马庙川等地组建贫农团、雇农工会和赤卫军等革命组织，为当时党在南梁一带迅速发展革命势力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不久，他由南梁早期党员张惠德、张钦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育下，成为当地一名优秀的群众工作者。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成立，郝文明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长。他紧紧依靠群众和基层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贫苦农民分了白马庙川地主的土地和牛羊财产。他还用具体事实教育群众提高觉悟，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同地主势力作坚决斗争，巩固革命果实。

1935年5月，国民党地方军马鸿宾部“进剿”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转移。郝文明主动请求党组织把他留下。他说：“我是本地人，情况熟，留下来对开展工作更有利。”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

郝文明留下后，积极带领群众坚壁物资，运送伤员，传递情报，配合红军和赤卫军阻击“进剿”南梁根据地的敌人，掩护政府机关安全转移。在此期间，他的家成了伤病员和革命干部的秘密聚集点，掩护和转移了许多伤病员，工作做得很出色。

马鸿宾部占领南梁后，5月中旬，郝文明换上红指录，要他去陕北靖边一带协同先期到达那里的闫子恒、白东、霞云山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以迎接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解放靖边（今靖边县城张家畔）。郝文明到靖边后，即与闫子恒、白东、霞云山等人一起开展工作，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很快于靖边的桃

李隆（今在志丹县境内）成立了西靖边县革命委员会，周子恒任主席，白东、殷云山、王国庆任副主席，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郝文明不仅负责肃反工作，还同大家一起迅速开展区乡苏维埃政权的组建工作。在革命势力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西靖边县革命委员会于当年8月在店坪召开千人群众大会，明确宣布了西靖边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县、区、乡领导人。周子恒、白东、郝文明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大会标志着靖边地区红色政权的蓬勃兴起，宣告了旧政权、旧制度的灭亡。参加大会的群众为自己的新生政权欢欣鼓舞，革命情绪大振。

9月下旬，根据上级指示，成立靖边战区，郝文明任战区主席。他任职后，同其他领导同志团结一致，紧密配合，领导靖边人民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扩大靖边苏区，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区乡政权由原来4个区、20个乡很快发展到9个区、35个乡，地域1300平方公里。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郝文明、殷云山、王国庆立即在一起召开会议，做出了：1、热烈欢迎长征红军到达靖边；2、各区、乡政府干部及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长征红军；3、搞好长征红军的吃住和伤员护理工作；4、游击队、自卫军要紧密配合中央红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四项决定。为解决中央红军过冬问题，郝文明同殷云山、王国庆等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支援长征红军，很快完成了300驮皮袄的任务，以解决红军过冬之急需。

正当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这时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正在陕北、陕甘边推行错误肃反。这种错误肃反虽被长征到达陕北的毛主席、党中央制止，但由于种种原因，基层干部尤其是普通群众思想困惑，被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混入革命队伍并担任靖边红七支队要职的蔡文耀、金林等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惑众，策谋叛变。他们与驻守梁镇的段宝山部相勾

结，于1935年11月27日上午，包围了正在沙湾一带开展工作的郝文明、王国庆、李白锁等5人，并相继袭击了驻守曹元崇的红七支队和西靖边革命委员会驻地沙洼。

郝文明、王国庆等被包围后，马上组织随同人员英勇突围，但终因力量单薄未成，不幸被捕，落入国民党段宝山之手。段宝山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从郝文明等同志口中获取他们所要得到的情报。郝文明等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坚强不屈，只字未吐。段宝山无可奈何，便命令部下用铡刀将郝文明、王国庆等5人杀害。那年，郝文明仅35岁。

（王宗才）

马 世 明

马世明（1902——1935）原籍陕西省，后逃荒定居华池县乔河乡火石沟门村。

1934年春，陕甘边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开辟根据地，给马世明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当即参加了革命，被分配做地方群众工作。不久担任了柔远区土地委员。由于他深知农民无地种的苦衷和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所以对这项工作特别热心，时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向区苏维埃政府反映群众反抗斗争情况，在红军游击队的指导配合下，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浮财、牛羊、烧毁地契，很快在柔远区乔河一带组织起了农联会、雇工会等群众组织。

1935年3月至9月，柔远区苏维埃政府遭国民党马鸿宾部队“围剿”，暂停活动。为尽快恢复区政府工作，马世明和杨子勋等历经千难万险，在充分发动群众和组建农民武装的基础上，于9月在柔远乡东沟二次组建了区政府。10月29日，马世明被群众擒

选为区主席。11月9日上午，世明在区政府临时驻地杨高庄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次日由他与游击队员张廷孝一起去庆北办事处龙木庄领取枪支；当晚他又召集梁远游击队队长李兴玉等4人商量扩充游击队的问题，直至深夜。不幸被国民党杜成章民团获知，带领民团60余人倾巢而出，包围了区政府驻地杨高庄。马世明等人仓促突围被抓住。民团土匪成性，刚抓住马世明就在他臂膀上狠狠砍了一马刀，鲜血染红了他的半边身子。接着民团又将马世明家里洗劫一空，连老人小孩身上的衣服全都剥下拿走。

马世明被捕后，当晚即被押解至庙巷乡红庄村。途中他们将世明的鞋袜、外衣全部脱下扔掉，马世明每走一步，就狠打他一枪托，还逼问他“区政府里还有什么人？他们现在在哪里？”但不管他们怎么施展淫威，马世明始终沉默不语。土匪们无可奈何便朝他头部打了一枪，并在他肩膀上连砍数刀。世明慢慢的倒在地上，但他仍然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瞪视着土匪。这些家伙又朝他的胸口扎了一矛枪，才跨上马一溜烟跑了。

马世明牺牲时仅33岁！

（赵晓红）

何 占 胜

何占胜（1914——1938），乳名背景，甘肃省华池县悦乐建海门村人。6岁丧母，12岁起为人牧羊，以此糊口度日，历时5年。尔后回家随其兄何占连给人揽工，过着食不充饥的生活。1933年秋，他听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在南梁一带活动，专打富济贫，为穷人谋利益，便思谋着要去投奔红军。他对哥哥说：“象咱这般穷的人，要想有出头的日子，只有当红军才行哩。”

1934年2月，王宝珊带领庆阳游击队途经悦乐小川沟，占胜

得知，遂参加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王宝珊视其机灵勇敢，不久命他为庆阳游击队通讯员。仲春，庆阳游击队在华池城壕等地活动，他和两名游击队员化装后在五蛟一带侦察敌情。一日，他们发现国民党谭世骥部10余人沿川北上，便尾随其后，乘谭兵分散村里抢物时，发起突袭。占胜毙敌一名、获战马一匹、缴长短枪各一支。秋初，庆阳游击队接受除掉土匪头子马拐子的任务，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智擒，何占胜主动请求执行任务。他设计将马拐子和两名匪徒诱至游击队驻地，乘其拉大烟时，缴了土匪的枪，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害。九、十月间，庆阳游击队曾接连攻打悦乐堡子和五蛟堡子，占胜均表现勇敢，受到游击队嘉奖，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庆阳游击队与合水游击队奉命配合红二十六军主力发动黄大原田峪峁（华池县境内）战斗，结果全歼宁马马股邦团一个连。战斗中，占胜毙敌数名，缴获手枪2支、步枪5支。

田峪峁战斗结束不久，何占胜和20余名游击队员编入红二十六军二团，开赴陕北作战。在陕北东村镇战斗中，国民党政府军布防严密，火力很强，红军两次攻城未克，便佯装停止战斗。少时城壁火力稍减，乘此间隙，何占胜从城侧攻上，将一束手榴弹投向城壁火力点，为战友打开道路，取得了攻城胜利。事后，连队战友都称赞他“在敌人面前猛如老虎。”不久他被提升为红二十六军二团二连副连长。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占胜任先锋连连长，随军相继参加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每次战斗中，他都冲在最前边，表现得极为勇敢。

1935年2月，何占胜奉命率先锋连随军出发东征。一日深夜，在陕北清涧县河口附近上船东渡，船至对岸时，遭到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守兵猛烈阻击，先锋连伤亡惨重。看到战友纷纷倒下，

何占胜心急如焚，奋不顾身，一方面组织火力掩护，一方面亲自带两名战士匍匐前进，至距敌堡垒20多米处，他立身将一捆手榴弹掷出，随着一声巨响，敌人堡垒立即坍塌。为了东征抗日，何占胜的血洒在了黄河岸边……时年仅32岁。

（王素才）

赵 志 喜

赵志喜（1908——1938），华池县柔远乡城关村人。世代农民，赵志喜自小天禀聪颖，深得父母喜爱，故竭尽全力，供其读书学习，终至能提笔成文，且一手字刚劲洒脱，在村中有“秀才”之称。

1933年，庆阳游击队成立后，在柔远川一带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反动民团、土匪；发动群众，扩建苏区，发展地方武装。赵志喜就是在这一年后季参加革命的。他先是搞地方群众工作，1934年后季被调到庆阳游击队柔远小分队当管理员。由于他工作积极、勇敢，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仍随游击小分队在柔远、南梁一带活动。

1934年10月，游击小分队配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红二团渡街驻在梭坊坪的张廷芝匪部，赵志喜与战友们满怀胜利信心和战斗热情，长途奔袭梭坊坪。经过激战后，因红军、游击队长途行军过度疲劳，且武器装备不良，未能攻克匪巢，即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虽未取胜，但打击了张廷芝民团的嚣张气焰，使他们很长时间不敢为非作歹。赵志喜本人在这次战斗得到了实际锻炼，尤其使他认识到了革命的艰巨性，从而增强了他革命的坚定性。此后不久，赵志喜随柔远小分队一起编入庆北游击队，开始仍当供给员，之后升任指导员。

1935年2月18日，赵志喜与游击队战士们追扰国民党马家军至柔远乡白家川。次日拂晓，赵志喜带领游击队员进行军事训练时受重伤，后伤口感染，医治不愈，于1936年2月在乔河乡田桥村去世。

（赵晓红）

汪 占 祥

汪占祥（1901——1936），祖籍陕西省横山县富家坪乡，后逃荒定居华池县南梁乡高台村。幼年曾间断读过几年“冬塾”，因此在这深山沟里也就算是一个文化人了。

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后，汪占祥怀着翻身求解放的迫切心情，参加了赤卫军，在打土豪、分财产，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他处处走在前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得到了群众和赤卫军领导的赞扬。

1935年后季，汪占祥被选拔为赤卫军营长。当时陕西省吴旗县三道川一带地方民团作乱，汪占祥带领赤卫军隐蔽在三道川一带，准备打击这股土匪。一天中午，汪占祥偵探到这股民团正在长官庙（水泛区）一个村庄睡午觉，他当即立断：兵分两路，一路包围村庄，一路迅速潜入村中，乘其不备，一举消灭了这股民团。通过这次剿匪，赤卫军和汪占祥的名声大振，一些地痞流氓一听到汪占祥的赤卫军就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1935年9月，华池战区工人联合会成立，赤卫军营长汪占祥兼任战区工会主席，他深知工会工作就是民众宣传工作。为了宣传教育群众，汪占祥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然后把学下的东西，用通俗易懂又幽默诙谐的板话、顺口溜的形式教给民众。经过汪占祥的宣传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大批的青壮年都积极

行动起来参加赤卫军。广大妇女也纷纷起来同封建思想作斗争，参加社会活动、放足、争取婚姻自主，给红军做军鞋。

1936年7月，汪占祥带领两个战士去河连湾（环县境内，时为陕甘宁省府驻地）开会，返回途中，在华池县白马乡将台附近与当地民团杜成章部相遇，陷入重围，3人一同被捕。当敌人得知汪占祥是华池县政府赤卫军营长、县工会主席，并且是去省府开会的共产党干部时，认为他身上一定带有许多银钱，结果搜遍全身却分文没有。匪徒们又审问他，企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但汪占祥守口如瓶。反动民团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他杀害，时年36岁。

（赵晓红）

李 兴 玉

李兴玉（1911——1936），华池县乔河乡乔渠村人。

1935年11月，李兴玉参加了安定游击队。1935年后季，党组织派他组建柔远游击队。期间，他深入农家，一边亲热地帮助乡亲劈柴挑水，一边按家常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动员年轻人参加游击队。为了做出榜样，他动员自己的弟弟带头报名入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群众工作，李兴玉把一伙血气方刚的青年小伙组织了起来，他带领这些青年白天坚持生产劳动，夜晚站岗放哨，进行军事训练。

1936年11月9日，柔远游击队队长李兴玉与游击队员郭占锦等4人到柔远区政府驻地杨高庄同柔远区主席马世明商量扩建游击队事宜。当天深夜，他们一同被从元城流窜到柔远的杜成章民团50余人包围逮捕。敌人从马世明口中得不到点滴机密，便凶残地将其杀害。并且威胁李兴玉等若不说出区政府秘密，马世明的

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面对敌人悬在头顶沾满鲜血的屠刀，李兴玉威武不屈，只字不吐，还鼓励郭占锦等战友同敌坚决斗争。后经组织营救，李兴玉脱离了虎口，继续带领游击队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36年7月，李兴玉告别了年迈的父母，随游击队转战华池、曲子、环县等地。不久陕甘红军独立师在曲子组建，李兴玉任独立师二团连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10日，独立师驻营环县皮大岔。次日拂晓，被国民党民团军包围，在这危急万分时刻，李兴玉一边急忙组织战士撤退，一边带领数名战士断后阻击。然而民团封锁了游击队退路，并用一架机枪向游击队员扫射。李兴玉看着亲如手足的战友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中，悲愤异常，他不顾一切，跳出掩体，瞄准敌机枪射手，一枪将其打倒。可他自己也同时被乱枪射中，跌倒在掩体外，几个民国兵端着刺刀一涌而上，在他身上乱刺一通……李兴玉当场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赵晓红）

冯 世 祥

冯世祥（1912——1935），陕西省铜山县韩岔乡黄圪塔村人。由于家境贫困，13岁起就给本村一家地主拉长工。1930年，陕北大旱，民以草根树皮为食。在无以生活的情况下，冯世祥一家6口人背井离乡，沿途乞讨，逃荒到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固合台村，靠打短工，卖苦力勉强维持生活。南梁团头白子文视冯世祥是个好苦力，便把世祥招为“姑爷汉”。但自家却不把他当人看。世祥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出尽了牛马力，吃不饱，穿不暖，还动辄遭受白家的打骂，尝尽了人间的辛酸。

1933年11月，红军游击队来到南梁，冯世祥毅然报名参加了

在他家乡小河沟刚刚组建的保安游击队。冯世祥胆大心细，精明能干，很受游击队负责人刘约三的赏识。不久，组织上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带领两个人一支枪，到陕甘边界的白沙川、义正川、洛河川一带去发展游击队。他经过一个半月的宣传发动工作，便有八、九名青年参加了游击队。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提任游击队班长。

为了进一步推动陕甘边界的“扩红”斗争，尽快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1934年春，刘志丹、习仲勋等在南梁小河沟召开各路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决定每支游击队内设三至五人的宣传员，配合开展游击战争，向群众做好革命宣传。保安游击队便选中了活泼机灵的冯世祥兼任红色宣传员。他随保安游击队开赴陕北脚扎川、罗坪川、杨青川、卜罗寺一带进行“扩红”斗争。起初，由于受敌人的反动宣传，一些群众对红军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因此，往往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白天冯世祥同游击队一起打土豪、斗地主、分财产，农忙时还带领部分战士帮助农民做庄稼活；夜里冯世祥便组织游击队战士，深入到庄头院落，召集贫苦群众，采取开“村头会”、“院子会”的办法，进行诉苦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游击队的性质，揭露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鼓动穷苦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起来闹翻身。就这样，游击队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打开了工作局面，逐步建立了区乡政权和赤卫军、贫农团、农联会组织。与此同时，他还把当地儿童、妇女也组织起来。世祥有一副好嗓子，歌儿唱得很不错。他一有时间，就给婆姨娃娃教唱红色歌曲，他教唱的“妇女姐妹快起来，赶快把你们脚放开，劳发放足人人爱，自由平等来”的歌很受欢迎。冯世祥到哪儿，哪儿就有歌声，就有笑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冯世祥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冯世祥在革命队伍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成长很快。1934年

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保安游击队中队长。他随游击队转战陕北的保安、吴旗、定边、靖边一带，指挥游击队攻敌寨，歼民团，搅得敌人惊慌失措。在攻打陕北义正川高台寨子时，冯世祥带领9名战士，正面突击，首破寨门，俘敌十多人，缴获枪15支。

1935年5月，保安游击队在庆北游击队的配合下，在定边党家畔石场沟伏击高七宝反动民团，毙敌10余人，俘敌300多，缴获步枪40多支。在这次战斗中，冯世祥担任正面堵截，对歼灭敌人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家畔战斗之后，冯世祥又随游击队迅即开往双佛寺余家窑，击溃了吴占魁的土匪武装。6月下旬，游击队与骑兵大队配合作战，在定边三圪盒蜿蜒突袭贺凤喜民团。在战斗中，冯世祥为追击逃窜的敌人，不幸中弹受伤。当战友们见他伤势很重，要抬他转移时，世祥命令道：“别管我，快去多捉几个俘虏，多收拾几条枪去……”冯世祥从戎3年，曾参加水宁山、宁条梁、乱石头川等大小战斗三、四十次，战斗中，他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冲在最前面，勇杀顽敌，曾立功多次，受到游击队的表扬和嘉奖。

1935年12月，靖边游击队负责人金林、宗维耀叛变，疯狂向赤安苏区反扑。12月7日这天，金林、宗维耀带领叛匪突然袭击了赤安县委和县政府。赤安县游击队长冯彦士，十区区长张克俭此时也叛变投敌。张克俭投敌后谎称：各路游击队要攻打旦八寨曹俊章民团，要赤安游击队支队长冯世祥带领战士前往配合作战。伤口刚愈的冯世祥受敌欺骗，带领游击队战士前去攻寨。不幸落入敌网，被张克俭抓获，拱手交给旦八民团头子曹俊章，以作为其投敌心诚的“礼物”。曹俊章早知冯世祥的威名，施尽奸计诱和酷刑折磨，逼其投降。但冯世祥坚强不屈，痛斥匪首和叛徒。1933年春的一天，惨无人道的曹俊章命令部下，将冯世祥用绳子吊在旦八寨子上活活勒死。

南梁人民的好儿子冯世祥牺牲时才只有24岁。

(王宗才)

杨 再 宏

杨再宏(1911——1937)，原籍山西省包头。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因家乡遭灾，流落华池县山庄乡苗砭村。幼时读过6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困辍学，随父租田种地和打短工为生。1933年冬，在南梁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参加革命。当时二将川还没有建立革命政权，当地群众因长期受兵匪之灾，后顾之忧颇重，开展群众工作困难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杨再宏被派往尚湾、山庄一带搞群众工作。杨再宏接受任务后，千方百计接近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做思想工作。金盆沟农会建立后不久，他就在尚湾发动群众建立农会，贫农团，掀起了群众革命运动的热潮。1935年春，他奉命到白马区工作。1936年2月调华池战区委员会任秘书。这时正处于基层革命政权的组建和完善阶段，由于当地干部群众多数没文化，加之国民党政府军和地方民团频繁“围剿”，政权建设工作遇到很多困难。杨再宏夜以继日地起草文件，刷写标语，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教育群众坚持对敌斗争。为根据地基层政权建立和完善，在白马区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和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华池县后，根据他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组织任命他为太白区区长。到职后，他不怕辛苦，冒着险情发动群众，建立和完善了乡村政权，积极组织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使本区工作有明显好转。1937年2月，他带领5名工作人员，到平定川的倒水湾侦察敌情，与国民党榆林二十二军12名便衣特务相遇，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遇难。

(曹向阳 郝兴华)

饶 俊

饶俊（1918——1987），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饶湾人。1933年冬参加庆阳游击队，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庆阳游击队战士、班长，陕甘边区独立营骑兵队指导员、队长、连长等职。在4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身经大小战斗数十次，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尤其善于骑马，远程奔袭敌人。

1934年春，饶俊刚参加游击队时，随部队在庆北家乡打游击。由于他对当地情况熟，常常作为“小向导”、“侦察员”活动在城壕、悦乐、五蛟一带，侦察敌情，袭击散匪。曾同游击队一起参加过攻打悦乐堡、五蛟堡等战斗，表现机智勇敢。后被编入骑兵团，任班长。一次，他奉命带领6名骑兵战士从华池出发，乘夜间在环县核桃川袭击土匪赵老五部，歼匪5名，获枪4支。

在任陕甘边区独立营骑兵队指导员、队长期间，饶俊随骑兵团经常活动于吴旗、赤安、定边一带，配合兄弟部队，时儿歼民团、袭击寨、擒匪首；时儿奔驰在茫茫戈壁滩，出其不意，消灭顽敌，搞得敌人闻风丧胆，惊慌失措，为开辟新苏区立下了功。陕甘边界人民称赞他的骑兵团是“共产党派来的‘神兵’”。

1935年5月初，饶俊同张弟带领骑兵团和赤安游击队一起，在陕北杨青川消灭王子元骑兵一部，俘战马30匹。当天，获悉陕北反动民团蔡丰各部在五岔城子集结，骑兵团旋即抵达距五岔城子一、二里路的穆沟村，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兄弟部队消灭蔡丰部百余人，缴获马立匣步枪和自来德枪100多支，子弹数百发。当月中旬，骑兵团与保安游击队、庆北游击队配合，在定边党家砭、石场沟伏击高七宝反动民团。在战斗中，饶俊策马当先，一

人毙敌8名，获枪7支。这次战斗俘敌360多人，缴获步枪40多支，给敌沉重打击。同年6月下旬，在华山城子，骑兵团巧袭贺凤喜部，饶俊跃马冲入敌群，同敌人骑兵拼搏厮杀，消灭敌骑兵十六、七人，获短枪两支。

靖边游击队金林、宗维耀叛变后，与蔡丰等反动民团纠集在一起，疯狂向赤安一带扑来。为平息匪患，保卫苏区，饶俊奉命带领骑兵团，配合红军和赤安独立营，游击队向叛敌和蔡丰诸反动武装势力发起总攻。杨城一战，消灭路丕政反动民团，俘敌35多人；攻打保安城，击毙马占奎和还乡团头子王真、马玉英等，为民除了一大祸害；顺宁高台子战斗，饶俊带领骑兵团战士担任主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敌蔡丰败退蔡边老果，金林、宗维耀带部逃窜三边，取得了俘敌40多、获枪60余、缴羊300只的重大战果。

在党中央号召下，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1935年9月，中共赤安县委决定收编张廷芝部的武文英连，遂任命武担任水泛区抗日义勇军队长，后因武文英土匪恶习不改，抢掠民财，横行乡里，引起极大民愤。赤安县委逮捕了武文英。1937年4月30日，武万甫、武文英等煽风点火，并策划水泛区区委书记童守珍、乡主席高占仁叛变，袭击了赤安县委，打死我工作人员3名，爆发了震惊边区的“赤安事件”。事件爆发后，为尽快平息这场反革命叛乱，饶俊奉命带领骑兵团前赴赤安县的松大岔、杨桥一带平叛。他一方面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一方面带领骑兵团与当地游击队一起，先后捕获了武文英、李宝善、项成英和武文甫、武文英、童守珍等为首分子，使这些叛匪首领受到了人民的惩处。

1937年10月，饶俊率部北上定边、盐池一带活动，遭敌宁马部重兵包围，最后在突围中，他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4岁。

（王素才）

李 培 兰

李培兰（1905——1937），原住庆阳老店原，靠讨要为生。后用女儿在上里原彭家寺换了一份土地，迁往定居。他小时候在给人拉长工时，身上就留有地主老财的鞭迹和土匪的刀伤，因此对黑暗的旧社会和地主恶霸恨之入骨。在艰难的生活中养成了嫉恶如仇的强悍性格，常与一些坏人作拼死斗争。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陇东各地革命根据地逐步得到发展巩固，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苦生苦长的李培兰看到了光明，认识到参加革命才是穷人的唯一出路。所以1935年4月他毅然参加了庆阳游击队。在游击队，他参加过田峪峁、曲子战斗，袭击过庆阳、悦乐的反动民团。因他干得很出色，不久当上游击队中队长。1937年游击队在庆阳野狐沟一带活动，一天晚上他出去查哨，因天黑道路不熟，失足落崖，时年32岁。

（曹向阳）

张 志 德

张志德（1918——1941），原籍陕西省靖边县。后因家庭贫困，无法度日，随父逃荒到华池县南梁大台村居住。刚来时，靠父亲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养家；一年后，请人说情，租种了当地地主几亩薄田，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6多岁的张志德思想已过早地成熟了，他经常同几个伙伴一起助弱抗强，维护群众利益。1933年

冬，张策、习仲勋在南梁一带发展党员时，发现张志德忠厚善良，群众威信很好，就吸收他和张志德等4人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入党后，张志德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工作做得也很出色。接着成立了华池县第一个党支部——白马庙党支部，张志德被选为支部书记。从此，他身上的担子重了，革命的决心也更大了。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不但积极主动地搞好支部各项工作，还走村串户，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帮助组织了农联会、雇工会等群众组织。同时，经常配合游击队，赤卫军侦察敌情，搜集情报，为开展武装斗争，开拓革命苏区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张志德做支部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对敌斗争更是胆大心细，灵活机动。为了帮助红军、赤卫军消灭民团土匪，他经常只身潜入匪巢，同敌人周旋，曾几次遇险都巧妙脱险，使当地民团、土匪一提起张志德就胆颤心惊。1935年4月，国民党马鸿宾部占领南梁苏区堡，企图“围剿”革命政权机关，消灭苏区。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实力，打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县级机关分散转移。张志德同赤卫队、旋风队一面组织指挥群众坚壁清野，一面积极准备阻击敌人。一日，在南梁大沟门的一个山梁上，张志德与赤卫军完成掩护政府机关转移任务后，又掩护伤病员转移。此时敌兵又跟踪追来。在情况异常紧迫的关键时刻，张志德返身隐蔽在一条河沟里，当马家兵临近时，他向敌群猛烈射击，在对方还未醒悟过来时，他已纵身跃过河沟换了地方，边跑边打，敌兵紧追不放。张志德一直把敌人朝相反的方向引开10多里路时，才钻进桦林顺着小道跑了。当敌人发觉上当时，赤卫军伤病员早已转移到隐蔽地点，赤卫队员也安然无恙了。

1935年9月，华池战区恢复成立，秋季共青团华池战区委员会成立，张志德被推选为团委书记。这时，他职务变了，但革命

的本色没有变。在此期间，他带领团委的宣传、少先队等负责人深入农村，宣传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实行婚姻自主等政策，使当时华池上述各项工作进展很快，效果良好，华池县及张志德本人，多次受到边区政府表扬。

1935年10月，中央长征红军到达吴旗镇，11月下旬，与国民党军队在直罗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中，张志德先是奉命率领少先队担任侦察工作，战斗打响后，他带领少先队同红军、游击队、赤卫军配合作战。在激战中，张志德同战友活捉了一名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射手，经他说服教育，这位国民党兵反戈一击，积极提供情报，使游击队缴获了好多枪支弹药。

1936年8月，华池战区与庆北办事处合并，成立华池县，张志德任团县委书记。他积极带领青年儿童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中，并在站岗、放哨、除奸、反特等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7年后季，张志德母亲病危，组织劝其回家探母，不幸身染重病，医治无效，于1941年病逝陕西靖边县，时年23岁。

（赵晓红）

崔 凤 鸣

崔凤鸣（1903——1943），原籍陕西省靖边县。1923年举家逃荒到南梁白家砭村（今甘肃省华池县境内）居住，全家靠租种土地和打短工为生。

1933年冬，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活动于荔园堡、二峪川一带，打击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深入到村头院落宣传革命道理。崔凤鸣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农联会的各种活动，为红军游击队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工作很积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国民党

宁夏马家军队和当地军阀民团纠集在一起，向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崔月峰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转移到陕北，周德击队在安塞等地进行武装斗争。10月被上级任命为中共华池战区委员会书记。回到华池后即进行党组织和革命政权恢复工作，重建群众组织和革命武装，打击反动民团和土匪的骚扰活动，积极进行土改工作，重新将土地很快分给贫苦群众，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他主持华池战区的错误肃反，错杀了不少无辜，伤害了不少革命干部，对革命造成了损失，1938年2月被撤销华池战区书记职务。之后，曾先后任华池县温台区区委书记、白马区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带领区乡干部积极进行拥军优属，移难民安置以及抗灾救灾工作，大力发展生产，工作认真负责。1940年4月，他调华池县委组织部工作，不久因家庭拖累重回乡务农。回家后他就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对自己要求不严，1942年夏因故而亡。

（王来才）

倪克光

倪克光（1918——1947），华池县怀安乡杨岭人。1937年参军，历任警三旅五团战士、副连长等职，1937年1月在合水卧牛铺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9岁。

倪克光出生于农民家庭，排行第四，父母比较疼爱娇惯。他从小身板结实，性格刚烈，说话做事，像在铁板上钉钉，从不马虎。

1937年，刚结婚不久的倪克光，不听父母的劝阻，丢下新婚的妻子参了军。在部队中，他努力学习文化，学习军事技术，苦练杀敌本领；在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他也表现突出，最后升

任警三旅五团副连长。

1947年1月25日，合水卧牛铺战斗打响后，倪克光遂担任攻城任务，由于敌人防守坚固，火力较强，几次攻城不克，我军伤亡较大。战斗的失利，战友的牺牲，激怒了本性刚烈的倪克光，他迅速地组织了攻城突击队，并亲自带领，冒着敌火力、在城墙下搭起云梯，他第一个爬上城端，正准备向敌火力点投掷手榴弹时，不幸被敌人射来的子弹射穿胸膛，英勇牺牲。

（陶兴范）

李 志 成

李志成(1921——1947)，甘肃省华池县悦乐店坪村人。13岁便随父耕耘田亩，因他务农精细，地里活样样能干，被乡邻誉为田里的“小把式”。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刘志丹在南梁“闹红”的岁月，受革命思想影响，他便渐渐产生了想去当红军的念头，但每每谈及此事，都被家里人以“小小年纪”为由劝阻了。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苏区蓬勃展开，这使志成的心情久久不得平静，于是他随着母亲要去参加红军游击队。母亲不同意，他便悄然离家，于当年3月参加了白万和领导的混合游击队（不久改名合水游击队）。事后游击队领导得知他是“偷”着跑来的，便让其回家探望母亲，做通思想工作。他回家做通母亲思想工作后，次日便归队了。在部队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当时游击队经常活动于柔远、悦乐一带，他却从不回家。1938年夏，李志成所在的合水游击队编为庆环分区保安第五大队。时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大队部通讯班长。1942年后季，部队编入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他任二营六连副指导员。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屯田”令，次年4月部队进驻华池县

大风川。在大风川“屯田”和练兵活动中，李志成处处给战士起模范带头作用。为多开荒，他和战友张守成等半夜燃火挖地；为练就一身好武艺，他同机枪班班长赵怀玉利用生产间隙反复苦练，互相切磋技术。他多次被团部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荣获“贺龙神枪手”称号。

1946年春，七七〇团分批开赴前线，二营六连最后撤出，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警三旅五团三营八连，驻防庆阳驿马关，李志成任八连指导员。8月26日，为迎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与西北人民解放军右翼兵团会师，李志成奉命带领三营八连，配合警三旅七团作战，八连接到命令后，星夜疾驰，开赴太平参加战斗。战斗中，三营三排被敌包围，情况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李志成立即组织“勇敢队”，并亲自带领80名“勇敢队”战士从敌部两侧迂回，最后围歼和俘虏敌人近百人，缴获枪数百支，出色地完成了援助三排突围攻取太平镇的任务。

1947年3月20日，驻西峰的胡宗南七十六师四十二旅常德部从西峰出发，直攻驿马关。驻驿马关的警三旅五团三营为阻击胡部，掩护陇东地委、专署和庆阳县委、县政府机关安全转移，在驿马关阻击敌人。李志成带领8名机枪射手镇守南城楼，经两小时激战，打退胡部数次冲锋，最后在掩护战友撤离阵地时，他不幸阵亡。时年36岁。

（王家才）

赵 怀 义

赵怀义（1911—1947），华池县柔远乡柴畔人。出身农家，性格豪爽。1925年他刚满15岁便参加了革命，任柔远区青年干事。他全力以赴发动青年搞战勤，刷标语，做宣传，特别在动员

妇女放足、学生上学、群众交纳公粮等项工作中，成绩突出，受到群众交口称誉和区政府的表扬。

1939年冬，赵怀义被组织选派到庆阳学习。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庆阳专署保安处工作。因工作积极，有培养前途，组织又送他到延安学习。通过学习，赵怀义的政治觉悟、文化理论水平、工作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毕业后被任命为庆阳专署保安处参谋。

1947年3月，陇东战争爆发，为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赵怀义自告奋勇担任艰巨的侦察任务。一天夜晚，他与两名战士从国民党合水城侦察返回途中，被国民党马鸿逵部逮捕。马军得知赵怀义的身份后，妄想从他口中得到庆阳专署活动情况，因而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向敌人吐露一句口供。敌人见得不到口供，便强迫赵怀义等在行军中给他们背武器行李。开始，赵怀义装病的服服贴贴，待敌人有所松懈，他便寻机逃跑了。但由于多日受刑，他已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疲惫不堪，逃出不远就倒了下来，但他仍然顽强地着前进，等爬到固城唐沟河岸边时，就昏迷过去，被追敌赶来杀害。时年仅27岁。

（赵晓红）

乔 步 英

乔步英（1912——1947），又名乔玉瑞，陕西省靖边县人，后举家迁党定居华池县南梁乡白马庙村。16多岁就给人拉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33年冬，张策、习仲勋在南梁白马庙川、玉盘庙川等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时，给乔步英家分配了土地

和牛羊，使他家的生活状况逐渐好起来了。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乔步英1938年3月参加了革命。初任白马区四乡自卫军干事，不久又被任命为白马区四乡乡长，同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初，乔步英担任白马区民兵营长。5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西北解放区。一天夜晚，乔步英侦察敌情时，在马连岔与敌散兵相遇，为摆脱敌人，他纵马驰入深山密林中，因天黑路陡，马惊失蹄，落马摔成重伤，医治不愈去世，时年35岁。

（郝兴华）

韩文奎

韩文奎（1917——1947），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黄蒿滩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24年父母逃荒到华池县崇坊乡高庄村居住，他随伯父仍在原籍给地主放牛羊。

1933年7月，年仅16岁的韩文奎，不堪忍受地主欺凌，毅然参加三边游击队。1935年春回家（崇坊高庄）探亲时，家长思想一时不通硬留他在家呆了几个月。秋季他说服双亲重返游击队。1937年冬，各地游击队整编时，他被编入三八五旅警七团。1942年，警七团改为警五团，他编入五团二营五连当战士、班长。1946年春陕甘境内部队整编，三八五旅五团并入警三旅，他随部就编。在长期的部队生涯中，韩文奎养成了秉性刚直，待人诚恳的性格，在干部和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编入警三旅后，他先后参加过大小十多次战斗，每次打仗他都勇敢冲杀，不怕牺牲，后来被提拔为排长、五连副连长、连长。1947年5月中旬，在陕西旬邑碾田镇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0岁。

（曹向阳 郝兴华）

张 发 信

张发信（1917——1947），生于华池县悦乐镇张坊原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务农。1937年5月参军，共产党员，曾任红六军七团连指导员。不幸于1947年10月在陕西省渭河战役中牺牲，时年30岁。

（陶兴范）

杜 培 忠

杜培忠（1921——1948），华池县紫坊畔乡郭畔人。1937年10月参军，曾任陇东独立团某连连长。1948年4月牺牲于庆阳，时年27岁。

（陶兴范）

孙 占 奎

孙占奎（1919——1947），华池县柔远镇孙家川人，1933年参加庆阳游击队。

1934年11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奔袭曲子时，孙占奎曾和几个游击队员乔装成做买卖的、卖萝卜的、补锅的小手艺人，混进曲子城摸清了曲子城内敌人兵力、装备情况，为红二十六军领导人制订战斗方案，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完成侦察任务后，孙占奎还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中他表现也很勇敢，夺得了敌人一支

快枪。在以后的反“围剿”斗争中，孙占奎参加过华池老爷岭、田岷岷，以及合水柳村原等地的战斗。每次打仗孙占奎表现都很出色，猛冲猛打，受到指战员的好评。

1935年春末庆阳游击队整编时，孙占奎被编入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当班长。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一起合编为十五军团，孙占奎被编入七十八师第二团。不久随部队参加了吴堡、靖边、青化砭、直罗镇等战斗。在吴堡战斗结束后，他被提为排长；在青化砭战斗中，他带领全排战士消灭敌人一个机枪连，提为二团一连连长。

1936年初，孙占奎随军参加了东征，5月又回师进行西征。他所在的部队打开了定边、盐池、安边。西征结束以后，孙占奎在干部教导队受训（又称军政干部训练班），他在思想和军事素质上均得到提高。以后他在陇东独立团某连任连长。1947年5月在合水五汉砭战斗中，遭敌机轰炸，孙占奎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

（曹向阳）

赵怀玉

赵怀玉（1917——1943），甘肃省华池县温台乡鸭儿洼村人，1939年11月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池县保安大队战士，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二营六连机枪班班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警三旅五团三营八连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

1942年2月，赵怀玉从华池县保卫队抽调出来，编入到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后来随部队驻东华池大风川“电堡”。在“电堡”期间，他同战友张守成等半夜点火挖地，受到部队首长表扬；在练兵活动中，他从严要求，苦学苦练，荣获“贺龙神枪

手”称号。后被任命为机枪班班长。1946年2月，六连撤出大风川，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警三旅五团三营八连，驻守庆阳驿马关。同年8月26日，为迎接王震大军回师陇东，赵怀玉所在连奉命参加镇原县平子镇战斗，配合警三旅五团、七团歼灭国民党政府军七十六师新一旅一团的一个连和其重机枪排。战斗中六连三排被敌包围，为援助三排突围，赵怀玉主动请战，带领全班战士参加“勇敢队”，战斗结束不久，提升为排长。

1947年3月20日，驻西峰的胡宗南七十六师四十二旅分两路直攻驿马关。为掩护陇东地委、专署和庆阳县委、政府机关、群众安全转移，赵怀玉在李志成指挥下，带领3名机枪射手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出色完成了掩护战友撤离和机关转移的任务。9月，他提升为连长。次年5月在镇原县屯子镇与国民党马继援八十二师等部作战中，他始终冲在最前头，勇杀顽敌，最后光荣牺牲。

（王秉才）

高 贵 发

高贵发（1916——1948），华池县李良子乡马河村人。他生长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饱受了旧社会的苦难。1938年参加自卫军，担任一乡自卫军副营长、营长，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组织送他到延安学习，学习结束后留延安任运输大队队长。大队有十几个人，五、六十匹骡子。他经常带领运输大队往返在延川一带，为八路军运送军需品。

1945年初，高贵发奉命返回原籍华池县温台乡任民兵营长。1947年2月代理区长。不久，他为了支援前线，积极配合大军作战，迎接全国解放，高贵发重返部队当兵，在陇东十四团某连任

指导员。1948年8月他随部队途经怀安时得了中毒性痢疾，因病情严重，治疗无效，不幸辞世。

(曹向阳)

高 孝 贵

高孝贵（1910——1948），华池县元城乡老庙嘴村人。1947年3月参加华池游击队，并任中队长，1948年8月在执行公务中牺牲，时年38岁。

(陶兴范)

赵 思 功

赵思功（1915——1949），华池县怀安乡赵中庄人。1934年参加地方游击队，1938年转为正规军。共产党员，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排长、连长等职。1949年，在解放兰州战斗中，壮烈牺牲在狗娃山上！

赵思功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都是耿直善良的庄稼人。由于家庭熏陶，大人影响，从小养成了为人刚正，勇敢勤劳的性格。他从10岁开始放牛放羊，帮大人干活。15岁起替换体弱多病的父亲顶班劳动，养家度日。

1934年2月，年仅18岁的赵思功，为了摆脱贫困，寻求光明，毅然在怀安乡的杨峡峁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跟随这支红军队伍，经常活动在吴旗、定边、头道川、坪庄一带，打击敌人，消灭土匪，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和欢迎。也使这个初出茅庐的农村青年，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前景。

1936年春，赵思功所在的游击队编入红军陕甘独立师。他当了独立师二营的通讯员。在此期间，他不但积极主动地搞好通讯和服务工作，而且暗下决心，时时处处苦练杀敌本领和学习军事、文化知识，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由于他刻苦努力，首长耐心培养，很快便成为闻名全营的优秀战士。

1938年，赵思功被选调到警备七团武工队搞侦察工作。经过几年的勤奋学习、实际锻炼和战斗考验，他更进一步树立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坚定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也具备了良好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在多次荣立战功、出色完成侦察任务的情况下，于1946年被破格提任警备五团侦察连长。由于当时战事需要，1948年春，侦察连缩编为侦察排，赵思功继任排长。同年11月，三八五旅编入第一野战军，赵思功调到十一师三十一团侦察连当战士。1949年又任三十一团八连副连长。是年，陕西扶郿战役胜利后，赵思功接任八连连长。

1949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向兰州进军。兰州是甘肃省会、西北交通要道，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在此重点设防，在兰州的狗娃山，盘踞着马家的精锐部队。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奄奄一息的此时此刻，马家官兵准备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这一仗能否打胜，是夺取兰州、解放西北的关键。因此，战前根据首长的指示，赵思功动员全连战士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斗准备。他要求战士牢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战死疆场为己任！”他个人也向全连立下誓言：“拿不下狗娃山，决不活着下战场！”

赵思功所在的三十一团，担任主攻任务，赵思功的第八连又是三十一团主力连。战斗一打响，八连战士在连长的带领下，如出笼猛虎，冲向敌人阵地。紧接着一排排敌炮被随着炮声毁灭，一排排马家军随着炮声倒下……但是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仗着美式装备的优良武器，不顾一切向我军疯狂射击，使我

担任主攻的战士，一次又一次的被猛烈的火力压了下来。这次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打得特别激烈。当三十一团只剩下30多人时，他们还在拼命冲杀。赵恩功身负7处重伤，鲜血染红衣衫，但仍然坚持战斗，组织战士不断强攻。尤其是刚冲到敌人一个炮楼附近，正要消灭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时，敌人一排机枪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臂。当跟上来战士，流着眼泪，劝他退下战场时，他神态自若地说：“侥幸我拿枪的右手还在，这就不影响我的打仗和指挥，我一定要活着看到这次战斗的胜利！兰州的解放！”说完，他叫战士用腿带给他扎紧伤口，继续战斗。不幸的是，在战斗将要胜利结束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穿他的左眼，致使这个钢铁般的英雄，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倒在了西北大地的狗娃山上……

8月26日，当兰州城内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数万军民喜庆兰州战役大捷之际，躺在医院病房的赵恩功，人民的好儿子，我党的好党员，终于停止了心脏的跳动，与首长、战友以及永远不能忘怀的乡亲、父母永别了！

面对烈士的遗体，守护在旁的首长、战友和医护人员，流着行行泪水，默默嘱咐：“我们胜利了！你的战友、还有全国人民，将会继承先烈遗志，完成你们的未竟事业，……赵恩功同志，安息吧！”

（陶兴范）

张 守 珍

张守珍（1916——1949），华池县柔远乡山根底人，出身农家，日子过得很清贫。但他受父亲影响，从小为人忠厚善良，做事踏实认真。

1939年12月，刚20出头的张守珍应征入伍，被编入三八五旅警二团。接着他和其他新兵开始在环县曲子的五里桥整训。张守珍对学习军事知识，尤其是练习射击特别感兴趣，经过3个月的滚打摸爬，张守珍操作运用武器的熟练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可以蒙住眼睛拆卸、安装机枪，还能用几种姿式取得连发连中的优异成绩。在考核时，他的各项成绩均名列第一，受到上级的表扬和战士的钦佩。

1940年初，流窜在环县曲子大、小方山一带的土匪赵思忠气焰嚣张，活动猖狂，经常偷袭驻在曲子县的陇东分区党委、专署机关。为此机枪班长张守珍奉命带领全班战士跟踪追击，给予赵思忠匪团沉重的打击，赵团吃亏后，带领残兵逃至环县以北的甜水堡。不久，张守珍又带领全班战士参加了警二团和独立营进剿驻环县甜水堡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的战斗。战斗打响后，张守珍身先士卒，带领机枪班战士勇敢冲杀，充分发挥他射击的特长，连连击中敌指挥官，保安大队阵脚顿时大乱，张守珍乘机带领战士们勇敢追击，消灭敌保安队员40余人，获敌枪支数10支。

1942年4月，警二团改编为三八五旅第四团，张守珍在该团任排长。他随团部转战固原、镇原后，在青水寨、三岔、孟坝、马渠一带参加了大大小小数10次战斗。

1943、1944年，张守珍随部队驻大风川“电堡”。1946年3月，三八五旅合并入警备第三旅。1947年2、3月间，警三旅在西华池与国民党胡宗南二十九军四十八旅作战中，张守珍带领全排战士，抢先占领有利地形，组织本排优秀射手，对敌人的主攻部队加强射击。在战斗关键时刻，他们排竟打退了敌主力3次进攻，击溃了敌4个火力点，为大部队反攻争取了时间。

1947年9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改编成立，张守珍任四纵队十一师三十团三营八连副连长。1948年8月20日，在兰州战役中，张守珍所在十一师驻守三大主阵地之一的沈家岭。沈家岭位

于兰州城南面，是个地势突兀险峻的天然屏障。因此，兰州战役的关键便是沈家岭。25日，部队向兰州发起总攻。主攻沈家岭的先锋营（三营）副营长乔崇义牺牲，由张守珍代替。为了尽快攻占制高地，张守珍将八连战士组成先锋队、预备队、决死队，向盘踞在沈家岭的马步芳驻敌发起6次冲锋，但由于马部占据有利地形，防御坚固，使许多战士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下……面对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和战士的遗体，已被怒火烧灼的张守珍，顾不得多处受伤，满脸流血，重新组织了力量，调整了攻占方案，号召战士作第7次冲锋，他说：“我们男儿宁死疆场，也要从敌人手中夺回每寸土地。”在他的鼓励下，战士们向敌阵地发起了第7次冲锋。这次冲锋取得了胜利，为担任主攻任务的三十一团、三十团冲开了一条血路。8月26日，兰州城宣告解放。但张守珍却壮烈牺牲了，时年33岁。

（赵晓虹）

孙 宽 顺

孙宽顺（1924——1952），祖、父辈靠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在柔远区胶泥嘴（现属悦乐镇）度日。1922年胶泥嘴一带遭灾歉收，孙氏全家逃荒定居在庙巷乡黄岔村。

孙宽顺8岁就开始给人揽羊做工。长达10年的雇工生活，使他深知穷人的疾苦，因而非常关心乡亲的利益，经常热情帮助村中的老弱病残人，深得当地群众的称赞。

孙宽顺对当时艰难、饥寒的生活现状极为不满，更无法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兵匪的骚扰。因此，总想伺机起而反抗，更渴望早日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孙宽顺的大哥参加了悦乐区游击队。1947年12月游击

队路过庙巷乡，于是宽顺便瞒着年迈的父母偷偷地顶替大哥参加了游击队，不久编入陇东分区十四团一营当战士，决心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孙宽顺参加革命后，在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加之他平时勤学好问，因此军事素质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工作更为出色，参军还不到一年，便于1948年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当上了班长。此后，他带领全班战士随团部辗转陇东各地，配合红军和地方武装英勇作战，给进犯革命根据地之国民党军队以有力的打击，保护了革命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复杂多变的艰苦环境中，孙宽顺注意积累作战经验，并临场发挥，灵活应用，因而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团部嘉奖。1949年7月下旬，在解放平凉的战斗中，因他作战勇敢，战后不久即被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凉警备二团一营二连排长。

1951年春，孙宽顺被选派到平凉教导大队学习半年。10月，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辑重营赴朝参战，先后任副连长、连长等职。曾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一次他所在的连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攻占一个山头，遇到敌人碉堡里火力的猛烈射击，部队伤亡很大。他两次亲自带领突击组进行爆破均失利。最后重新察看地形，改变突破方案，一方面用主力正面吸引敌人火力，另一方面他带领突破组从侧翼悄悄接近敌堡。这时孙宽顺全身已有六、七处受伤，但他咬紧牙关，终于摸到敌人碉堡下，攻破了碉堡，为主力歼敌扫除了障碍，保障了战斗胜利。

1952年9月8日夜，孙宽顺带领全连战士在朝鲜某火车站执行卸车任务。当他们就完成任务时，突然遭到美军飞机的袭击，有5颗罪恶的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顿时，火车站便笼罩在一片浓烟火海之中，10多名战士倒在了血泊里……孙宽顺看到这惨绝人寰的场面，如同发疯一般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一起

又一趟地将受伤的战友背往山洞中……

不幸的是就在孙宽顺背出最后一个伤员，刚要跨进山洞时，又一颗炸弹在孙宽顺的身旁爆炸，随着震耳的爆炸声，孙宽顺高大的身躯慢慢地倒在了烟雾中。山洞中被救的战士看到此情此景，个个痛哭失声……孙宽顺生前曾给父母亲人写信说：“等我们打完敌人就回来！”可为了中朝人民的友谊，英雄永远长眠在了朝鲜大地上。

（赵晓红）

陶 贵 耀

陶贵耀（1894——1955），华池县怀安乡怀安村人。秉性纯厚，孝敬父母，待人谦和，办事公道。青年时代在群众中就颇有威信。

1934年春，陶贵耀参加革命。一开始，他跟随地方游击队，在元城、定边、曲子、悦乐一带打土豪分财产，消灭民国土匪。1935年入党后，奉命搞地方工作，先后任元城区农民联合会会长、土地部长、元城区二乡（怀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元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6年10月，赤庆县在元城成立，陶贵耀又被选为赤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任县区主席期间，他在陕甘宁省的领导下，跋山涉水，充分发动群众，组建赤卫军、游击队，参与建立了元城、五蛟、八珠、铁边、铁角、罗儿峡峡等6个区政府和几十个乡、村政权。

1937年7月，赤庆县撤并于华池县，县址设温台乡大沟门。陶贵耀因病被留任元城区区长，1938年调任元城食盐总公司总经理。

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后，陶贵耀被选为元城区民兵大队长。

当时他已是53岁的人了，有许多亲戚邻居劝他应为家庭孩子着想，可以解甲归农，得不必要冒生命危险了。然而，为了全国解放，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陶贵耀谢绝了亲人的关怀，邻居的劝告，坚决投入了新的战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带领全区民兵站岗放哨，侦察敌情，运送物资，积极支援和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尤其在陇东战役的菩萨山和蒋台战斗中，陶贵耀及元城广大民兵起了很大作用。

1949年因病退休回家，1956年9月5日去世。陶贵耀一生虽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但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干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识大体、顾全局的革命品质。他在创立革命政权，组建革命武装方面所做的工作，至今人们仍念念不忘。

（陶兴范）

李 兴 高

李兴高（1904——1968），字子盛，原籍陕西省横山县清平堡（现吴旗县互社乡）。9岁开始给人揽工放牧牛羊；1921年逃荒至南梁一带继续给人拉长工。

1935年秋，李兴高在南梁王皇庙川参加了革命，10月被群众推举为白马庙三乡（玉皇庙）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由高生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担任白马区苏维埃政府主席；2月任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任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8年初，被组织选派到延安学习。学习期满后，历任华池县白马区、温台区、陕西省吴旗县吴旗区区长、华池县白马区委书记、纺纱厂厂长等职。他到哪里都能坚决听党的话，服从组织领导，积极工作，完成任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

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48年6月，李兴高病休在家中。1953年10月身体康复后，担任华池县林业科科长；1956年7月在西峰干校学习两年；1958年7月后历任庆阳县商业局山庄牧场场长、合水北岔子牧场场长、梁运林场场长、县手工业联社主任等职。李兴高在10多年的林业工作中，坚决执行以林为主，林粮并举的方针，在年高体弱的情况下，仍坚守第一线，亲自带领林业工人育林、护林、兴修水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65年8月，李兴高退休家中，于1968年病逝。

（赵晓红）

高 生 荣

高生荣（1904——1980），甘肃省华池县林镇小河沟村人，过去家境贫寒，曾为人当雇工数年。

1933年冬，刘志丹、习仲勋、张策等共产党人来到南梁一带开创革命根据地，高生荣受到革命思想教育，决心为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而斗争，积极参加了农联会活动，鼓动当地十余名贫苦青年参加了赤卫军，为红军游击队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革命积极性很高。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镇小河沟的四合台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林镇、小河沟、豹子川一带着手建立乡村政权。高生荣被秘密选为小河沟村主席，不久又参加了共产党。

同年5月，国民党地方军和反动民团进剿南梁。高生荣带领群众首先整置物资，把男女老少都疏散掩蔽在豹子川一带的纳林里，使反动派扑了个空。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池县、区、乡苏维埃政权也迅速建立，高生荣任华池县一区苏维

埃政府主席。他带领赤卫军和贫苦农民分了豹子川地主薛万铭的土地、牛羊，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1935年春，国民党宁夏马家部队与当地军阀、民团分三路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再次进行“围剿”，高生荣随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到陕北。此后，他随游击队到安塞一带开展工作，曾任安塞延安湾区主席。10月受陕甘边特委指示任华池战区主席，为恢复华池战区的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做了不少工作。但因受“左”倾思想影响，他同崔凤鸣主持华池战区错误肃反，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此后多年曾担任华池县白马区区长和白马区五乡、八乡党支部书记。在基层工作中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为革命战争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上级组织和群众的赞扬。

1949年底，由于健康原因，高生荣回家务农，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但他从不向组织要求照顾，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1980年秋，因病去世，享年78岁。

（王秉才）

张 建 堂

张建堂（1913——1985），华池县南梁乡转嘴子人，后迁居城壕乡赵湾村。

张建堂出生于农民家庭，父母勤劳，日子殷实。他从小上私塾，在校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尤其柳体字学得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辍学后，在家务农，因他品行端正，不苟言笑，做事稳妥，又乐于助人，颇得村里人喜爱。

张建堂1934年5月参加革命，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赤安县白豹区财政委员、陕甘边区警卫连经济员、边区保卫大队供给员、华池县政府秘书。在此期间，他每到一个单位，都是

认认真真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受到同志们的好评，组织的表扬。

1938年，华池县成立裁判处，组织根据张建堂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为人正派，处事公道的特点，选其任裁判员。为了搞好执法工作，他努力学习党的政策和法律知识，坚持调查研究，强调秉公执法。所以，几年来他审理裁决的案件，都能使当事人和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1945年，张建堂任华池县一科（民政）科长。1948年2月，张建堂被选为华池县县长。在县长任内，他不辞劳苦，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建国后，张建堂先后任庆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兰州市人民法院院长，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定西专员公署、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兼管政法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司法工作做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任定西副专员时，为改变定西贫困落后面貌，发展定西经济倾注了大量心血，也获得了良好效果。

1958年反“右倾”中和“文革”期间，张建堂也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但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默默地为革命奉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建堂衷心拥护、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定西分管政法、劳动人事工作期间，主持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政策。离休后，张建堂仍然继续关心党的工作，为改变贫困面貌，振兴定西经济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985年12月7日15时30分，张建堂终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兰州逝世。

张建堂逝世后，省上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在兰州华林山革命公墓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张建堂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陶兴范）

高 名 山

高名山（1886——1952），字镇五，华池县元城乡高桥村人。他出生农民之家，祖辈以农为业，靠劳动致富。到他父亲手里又重视发展牧业，家业更大。至1929年，他家种地上千亩，积粮数百石，骡马成群，牛羊满圈，人口也增加到150余人，成了百里闻名的大户。

名山弟兄10人，他排行第六。其他9人皆为农民，唯高名山自幼天资聪明，才智过人，深得父母钟爱器重。为使名山出人头地，在他9岁时，家里办了学堂，专门请了名师教名山读书。名山勤学上进，用10年时间，学完了国文课程，阅读了许多文史典籍，且又能书善画，出口成章，一时被当地人誉为“元城才子”。只是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取消，失去了科考的前程，名山感到前途渺茫，非常苦闷。为此，家里出钱为他捐了个“国子监大学士”的头衔。

高名山仕途失意之后，怀着彷徨的心情，离家到各处农村画庙宇、画桌椅、做纸活。通过对社会的广泛接触，高名山目睹了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感受到了社会制度的腐败，从而产生了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步形成了乐善好施的善良性格。

在报国救民思想支配下，名山于1920年春结束了游移生活，回家当掌柜。掌管家务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无偿办学校。名山常对人说：“三辈不念书的人，便是愚人。”他当时认为，社

会黑暗，人民衣食无着，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分人们愚昧所致，所以他立志办学，企图提高青年人素质，培养治国人才。当年秋天他开始在高桥（后迁老庄）办起了私塾，招收学生30多名，他自任教师兼校长。他办的这所学校，免收学费，所有经费由他家解决。学校开设国文、珠算、绘画等课程。名山治学严谨，并且特别重视对学生的道德规范教育。几年后，凡是他教出的学生，大部分品学兼优，深得家长和社会的好评。

1924年，庆阳北部的元城、吴旗、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白豹川一带，土匪蜂起，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保护人民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名山与元城乡赵良子村的李荣贵组编起民团。为使民团得到部分供养和站住脚，队伍番号打国民党庆阳县第八团，李荣贵任团长，高名山任副团长。这个民团组建起后，尽管摊粮派款给群众增加了负担，但在抵御外来土匪和游勇抢掠、保护人民利益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1928年，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侵占元城并将司令部常设元城刘堡子后，将李荣贵的八团强行改编为他的陇东民团第十五营，任命李荣贵为营长，高名山为副营长。谭部进驻元城后，烧杀抢掠，奸污妇女，草菅人命，无恶不做。元城一带怨声载道，叫苦连天。高名山对谭世麟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而又无力扭转局面，便辞去副营长职务，回家务农。

同年，陕甘两省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第二年到处是携儿带女讨吃的饥民。名山在他家的4个居住点（他家人人多，分居在高桥、老庄、店坊、油房嘴4个点上），分别专设窑洞和大灶，招待过往饥民。逢年过节，名山和到此饥民同桌共餐。在过红白喜事时，按照华池的习俗，安排席位只能让外家客坐上席，有地位、有脸面的人才能在第一棚就餐，其他人最后再吃。这个习俗一般不能打破。可是名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认为饥民不是什么下等人，寻吃讨要是社会制度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所以他家

过事，常把过往的饥民同尊贵的客人安在一起吃席。对本地的乡亲和难民，名山采取放粮救济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家的存粮除给无粮户，荒年过后，有粮还粮，无粮赦免。当年后季因他家里开销过大，耗粮过多，他便到悦乐上堡子买庆阳大地主“裕茂隆”糜子270石（折108000斤）运回元城，并在元城街头贴出“凡无米下锅之众乡亲邻，在3天内来元城铺子免费打粮”的公告，放粮3天。粮放完后，名山高兴地说：“我又办完了一件我应该办的事情！”

1930年，国民党庆阳县政府鉴于高名山的才能和在百姓中的威望，委任他为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区政府设在元城子，管辖庆阳县吴家岭子以北，东华池以西，定边县头道川以南，环县曲子以东地区。还在他任谭世麟民团十五营副营长时，刘志丹在谭世麟民团兼任六营营长，他们接触频繁，关系很好。名山任区长后，一次他俩在庆阳又相遇了，志丹习惯称名山为六哥，志丹这次给名山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指出“穷人要翻身，必须跟共产党闹革命”，希望名山同情革命，投靠革命。志丹的教导，使名山茅塞顿开，铭记在心。因此，在他就任区长期间，以他合法的身份，为共产党和老百姓办了好多有益的事情。比如说他以自治区灾情严重，百姓生活贫困为因，取缔了国民党在四区的高税制度，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对此，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另外，他还营救过革命工作者和无辜百姓，给红军传递过不少情报，支援过经费。在处理民事纠纷上，他能调查研究，坚持正义，秉公断案，不畏强暴。他断过的好多案子，不但当事群众心服口服，而且至今还被传为佳话。

1934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的保安游击队由南梁出发，捣毁张廷芝老寨后继续西进。谭世麟闻讯后，急令高名山纠集八团旧部配合谭部阻击红军。高名山以给其父过祭日为由予以拒绝。3月28早饭后，高名山在家（高桥）正招

待客人，刘志丹队伍突然赶到，抄了高名山的家，没收银元9000块，并将高名山及其两个弟弟和前来送礼的谭世麟一个大队长、国民党庆阳县党部两个委员和四区政府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还有元城一带几个地主拉到南梁，其他几个地主经教育释放，高名山直接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他首先利用同学关系，自己花钱在西安为南梁政府买油印机两台，以及军需、鞋袜等。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机关刊物——《红色西北》就是用这两台油印机才办起来的。之后，被安排在边区苏维埃政府印苏币，印币地点设在寨子湾东沟，只有3个工作人员。在技术设备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名山经反复试验，终于就地取材，用手工制成了布质苏币。就是用木板刻制成币额、图案，把它印在白布上，然后再刷上桐油就成了。票面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等。这些苏币的发行，一方面代替了国民党银行伪币、地主的伪贴，银元在苏区的流通，另一方面搞活了苏区的贸易，方便了群众。苏币制成后，名山又被调到南梁政府办的被服厂工作。在被服厂，名山又同工人一起为红军研制出了统一军装。这种军装是把白土布用糜草灰染成灰色，做成八角帽、中山装，军帽上缀有红五角星。1934年11月7日，慕园堡召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军参加大会检阅时，着的就是名山他们制的军装，显得即威武又大方。刘志丹高兴地称赞：“名山是咱们红军里的大能人。”由于名山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曾多次荣获南梁政府颁发的锦旗和奖状。

1935年6月，名山因患重病不能继续留南梁工作，经政府批准后回家休息。7月，接到刘志丹、习仲勋、高岗3人联合署名的指示，即“号称铲共义勇军”的国民党军队10万人入甘，因你身份暴露，恐受其害，故希你及家人迁至西峰暂避。在峰期间，你还可为我党做地下工作。等待革命胜利……8月，名山带全家160多口人离开高桥前往西峰。果然在搬迁途中，谭世麟曾派兵

追捕，但未追上。

1938年，国内和平局面形成以后，高名山一家又搬回老家高桥居住。这时高名山病情也有所好转。

1941年9月，华池县召开二届一次参议会，高名山被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名山任参议员后，不但积极参加政府的大小会议，参政议政，而且在具体工作中起带头作用。1944年元城征兵，群众有顾虑，一时没人报名。名山回家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引自己的三儿子高峭到区政府报名应征。群众一看高名山都引儿子当兵，这当兵肯定没坏处，所以第二天，也都引着孩子去区上报名，不到10天功夫，元城完成了征兵任务。名山一生关心教育事业，这期间，他不但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发展华池教育的好意见好提案，而且亲自在元城乡田嘴子小学搞试点。他亲任校董主任，在他半身不遂期间，还定期骑上毛驴到学校参加会议，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促进教学工作，使这个学校当年一直是华池教育战线上的先进。因高名山热衷教育事业，办学有方，1942年，被任命为县三科科长，只是后来因病未到职。

1946年2月，华池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高名山被选为县政府委员、县参议会副参议长。鉴于他多年来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热心革命和抗战事业，并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所以此次参议会上，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县委奖给锦旗一面。

1947年以后，名山半身不遂病越来越重，后来几乎卧床不起，经多方治疗均无疗效，终于1952年12月17日辞世，享年66岁。

（陶兴范）

张 振 东

张振东（？——1934），陕西省延长县人。1929年夏，陕北大旱，民不聊生，振东背井离乡，挑工糊口于东华池、葫芦河一带。1931年9月，刘志丹收集饥民武装，于平定川的佃水湾组建起了南梁游击队，张振东积极报名入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11月，合水游击队于今华池县豹子川王街成立，张振东经刘志丹推荐担任第一任游击队长。遂一到任，就利用他与东华池民团团头张怀智属“换帖”弟兄的关系，当即收编了这个民团，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1934年春，合水游击队发展到百余人，游击区伸延到杨家坪、蒿嘴铺、太白坝、瓦岗川、拓儿原等地。惩治了地主、豪绅，惊动了反动当局。同年4月，张振东率部于拓儿原太阳寺开展游击活动时，被国民党合水县保安队翟老五（永荣）部设伏抓去，遂即解往合水县城监押。屡受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嗣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在合水县杀害，走完了他那短暂的人生道路。

（曹清珂）

贾 生 财

贾生财（1903——1934），陕西省横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农民。1929年随父逃荒到合水县蒿嘴铺落户，靠给地主拉长工度日。

贾生财聪明能干，由于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压迫，到驻合水城关的陇东民团当兵，时间不长，当了班长、排长。1930年夏，

刘志丹在陇东民团军作兵运工作时，他曾护送过刘志丹，受到刘志丹的教育和影响。10月刘志丹举行太白收枪后，他拉出所在民团的40多人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照城麻义整编时，他的部队编为第四连，他任连长。1931年2月下旬游击队在盘克原张皮家被陈珪璋部队打散，他带领20多人突围到合水山区，利用社会关系当上了合水东区民团团总，以此暂时作掩护，驻在合水蒿嘴铺。刘志丹彬县出狱后，派马锡五到合水找他和赵连璧，马锡五就住在他的团部，专做联络工作。早胜事件后，刘志丹遭受陈珪璋五旅的追捕而逃出合水，就是贾生财掩护并送到赵连璧处才使刘志丹脱离了危险。9月，刘志丹在倒水湾改编游击队时，贾生财将蒿嘴铺民团50多人、30多条枪，以及由他联络好的谷聚山的30多人、几十条枪一起拉出参加了整编。当时，参加整编的有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3支部队共300多人，整编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贾生财任第三大队队长。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并主要活动于华池县的南梁、东华池一带。

南梁游击队经过林锦庙会师后，于1932年元月到达正宁县东北的柴桥子村驻扎。在这里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同盟军辖2个支队，贾生财任二支队第三大队队长。

1934年8月，贾生财部下叛变，他被叛徒杀害于华池县大风川，时年31岁。

（陶兴范）

李 彦

李彦（？——1935），籍贯不详。1933年10月18日，在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下，红四团、照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陕北一支队打开合水县城，释放冤囚，驱挤群众，并向国民党合水县政府职员宣传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及其远大理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时任国民党合水县公安局长的李彦当即宣布起义，率领部下20多人参加红军。李彦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强烈向往革命。嗣后不久，即被陕甘边特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安排他担任领导职务。1934年11月7日，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李彦担任副主席。1935年3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彦被陕甘边区政府任命为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9月，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边区开展“肃反”运动，李彦遂以特嫌罪而被活埋。

1987年陕西省给他平反昭雪。

（曹清珂）

殷 云 山

殷云山（1911——1935），陕西省蒲城县人，共产党员。1932年春，到合水县太白乡黄家沟门罗家洼小学任教。同年4月，与刘志丹派来葫芦河开展革命活动的黄德明相配合，组建赤卫队、成立乡农会，深受当地贫苦农民的爱戴。1933年3月，他与黄德明四处奔走，发展共产党员，着手建立党的秘密组织。9月，中共葫芦河支部于罗家洼小学诞生，殷云山积极参与领导工

作（一说担任支部副书记）。9月，根据工作需要，辞去罗家洼小学教师职务，调往宁县担任平子游击队指导员。1935年9月，调任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月余，安定县游击队长宗文耀、指导员金林叛变，段云山与县委书记谢维俊同时遇害，年仅24岁。

（曹清珂）

赵 生

赵生（1913——1937），合水县杨坪乡赵家原人。由于家贫如洗，自幼没有念过一天书，也没有娶起媳妇，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涯。1931年9月，刘志丹于平定川倒水湾组建起了南梁游击队，正给当地陈姓打短工的赵生，不辞而别，参加了南梁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看他精明强悍，便提拔他当了排长。1933年11月，合水游击队成立，赵生又由红二十六军分拨到游击队为骨干队员。1934年11月，合水游击队已发展到三个中队，赵生任第二中队队长。同年12月，合水游击队第二任队长王志林调任红二十六军骑兵团三连连长，由赵生代理合水游击队长职务。由于他打仗勇敢，颇懂游击战术，曾在赵家原一带开辟了一小块红色区域，还率部处决了太白塬反动民团团头张仲元。1936年2月，于庆阳野狐洼同股匪打仗中受伤4处，从此退出军律，寄居六寸原亲戚家养伤。同年7月，陕甘独立师于曲子县花旗组建，所属红四团不久移驻店子安集堡。赵生闻讯，喜出望外，曾多次拜访了红四团团长黄克秀，并亲自动员附近贫苦青年加入红四团。1937年农历2月，赵生寄居的亲戚张金卯偷了本庄群众的7串干辣椒，遂被户主告发。张金卯受审过程中，欲借赵生的威望，来减轻自己的罪责，遂信口招供辣椒是赵生偷回放

在他们家里的，以致赵生被国民党庆阳县政府抓去监押，蒙受了
不白之冤。后因伤势蔓延，于同年4月屈死于狱中。

赵生的这段革命经历，向来鲜为人知。全国解放后，因为他
家没了亲近人，就从来无人向组织反映，也当然未曾平反。

（曹清珂）

杨 树 秀

杨树秀（1911——1939），合水县肖嘴乡杨家庄人。1936年
3月10日参加红二十八军，并随之渡黄河东征。同年5月，杨树秀
随西征红军右路军到达三边，被部队提升为通讯排长。10月，红
二方面军长征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
军胜利会师，杨树秀被部队按通讯骨干人才推荐编入红二方面军
第四司令部任通讯参谋。1939年8月，红二方面军进军山西，杨
树秀在太原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8岁。

（曹清珂）

何 生 祥

何生祥（1909——1940），合水县店子乡胡家庄人。1932年参
加南梁游击队，曾参加过老合水、西华池、三十里铺、李梁子、
榆林桥、蟒山、直罗镇等多次战役和战斗，先后立功受奖10多
次。1939年10月，提升为三八五旅警七团二连连长。1940年3月，
有一股地方歹徒自陕西黄龙山窜入太白连家砭，劫掠抢物，为所欲
为。针对匪徒的扰乱活动，何生祥奉命带领二连进剿。刚一蹚过
千午岭，就被埋伏在茅草丛中的歹徒击中头部，当即倒地牺牲。

一个连长倒下去，数10个愤怒地战友站起来。没用上半天时间，这股匪徒即被我二连战士一个不留的歼灭了。

（曹清珂）

侯 启 万

侯启万（1908——1941），合水县蒿沟铺乡赵家原人。1939年10月参军，不久即提升为陕甘宁边区骑兵团侦察分队队长。1941年春，在陕西富县槐树庄执行侦察任务时，因他骑的马暴死，遂被敌人抓去。当敌人从他身上搜出的证件中了解到他的职务后，如获至宝，妄图诱降。先以封官软化，后用金钱买心。然而，敌人的这些花招，丝毫也没有打动侯启万对党对人民的忠贞信念，相反更激发了他对敌人的厌恶与憎恨。当敌人的软化伎俩破产后，又遂之采用硬刑逼供。面对敌人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刑具，侯启万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屡经残酷折磨，最后终以“坚贞不屈”的情操回敬了敌人，直至献出他那宝贵的生命。

（曹清珂）

高 满 贵

高满贵（1913——1942），合水县店子乡高家西庄人。1936年4月参加红军，1939年4月编入三八五旅警七团任班长。1940年9月被格提升为三营七连连长。1942年1月6日，驻扎于宁县的国民党军队一九一师五七三团三营，配合国民党合水县保安队700余人，于黎明时分偷袭共产党驻宁边防驻军。战斗到下午3时许，被八路军部队击溃，共歼敌27人，缴获长枪17支，子弹千余

发。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高满贵喜形于色，带领全连战士，仔细搜寻残敌败退时所遗弃之物。当搜罗到一个沟壑拐弯处，不幸被藏匿于水洞里的伪保安队副队长刘兴汉击中头部，当即停止了呼吸。血债必用血来还。刘兴汉这个合水人民的败类，亦被我营长高兆林一刀砍掉头颅，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曹清珂）

梁 培 和

梁培和（1923——1946），合水县柳沟乡郝家湾人。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爱憎分明。1935年10月10日，黄克秀率领陕甘独立师红四团路过合水，年仅14岁的梁培和，得知红四团是工农子弟兵，是专为穷人谋幸福的军队，当即甩掉财东家的羊群，苦苦哀求着参加了红军。1943年4月，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奉命进入大风川开展生产自救，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决定从其他部队抽调一些精壮战士加入大生产行列。梁培和也是被选调的合格者之一。

1946年1月，七七〇团奉命开赴延安。机警灵活的梁培和，就在部队开拔前被授命担任团的侦察参谋。在行军路上，他忽儿远离，忽儿紧跟部队，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不时地了解沿路的乡土民情，为保证部队的安全行军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天夜间，于富县附近的茶坊为部队联络宿营地中，不幸从一高崖掉下，待其他同志发现时，已经停止了呼吸，享年23岁。

（曹清珂）

何 天 贵

何天贵（1910——1946），合水县店子乡何家沟墕人。1935年参加红二方面军教导旅任营长，1945年因患脚气病转业到西华池土产公司工作。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对待工作，毫不拈轻怕重。1946年4月的一天，为给边区军民筹集给养，他携带特货通过国民党宁县南义封锁线时，不幸落崖摔伤，月余，与世长辞。卒年35岁。

（曹清珂）

郭 维 翰

郭维翰（1907——1946），合水县板桥乡柳坪人。其家富裕，拥有土地1600余亩，号称“郭半川”。维翰的父亲郭贵元，为人忠厚，思想进步，向来同情与支持革命活动，是靠驮盐和诚实务农发家的一位开明人士。维翰虽出生于这样的富豪家庭，但受其父亲的影响，自幼就养成了乐为穷人分忧解愁的优良品德。维翰上过县立中山小学，当时在文化落后的合水县来说，还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他于完小毕业后，本可以他当时的文化知识而找到职业，但他与父亲目睹了国民党的腐朽境况，宁愿在家务农，也不去国民党营盘里苟且偷生。1931与1934年之间，他常跟父亲去定边驮盐，曾多次碰上过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红军严明的纪律，给他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就是他后来能够背叛本阶级、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关键所在。1935年9月4日，红二十五军于板桥宿营时，遭国民党马培清骑兵团的突袭，共死伤200余

人，并有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被打散。翌日清晨，维翰到自家杨里翻秋禾，发现一名跑散的红军小战士藏在秋禾棵里。经与父亲商量同意，马上把这位小战士领到家里，管吃管住四、五天，又给做了一套农民衣服，然后打发去了陕北。1938年5月下旬，红军开始西征，那位被救的小战士为了感恩戴德，特绕道来到郭维翰的家里，送给郭维翰的父亲大烟土2两，以感谢郭家救命之恩。那位小战士临别时，郭维翰一直把他陪送到定边，并苦苦哀求着参加了红军，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春，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郭维翰遂请求组织把他转业到地方上工作。3月，调任合水县城副区长。1941年10月，当选为合水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和出席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的候补代表。1942年5月，调任合水县政府建设科任副科长。10月，提任盘马区区长。1943年2月，当选为合水县政府委员和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的议员代表。抗日战争时期，郭维翰将自己家里积攒的百余石粮食无偿捐赠国家，为支援抗战起了表率作用。

1946年4月，郭维翰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返回途中，因饮冷水暴病，刚回到家即逝，享年39岁。

（曹清珂）

赵 武 臣

赵武臣（1903——1946），出生在合水县固城乡小堡子庄一个农商兼营的殷实家庭。

武臣的祖父赵凤鸣为清末武秀才，青年时代曾居西安，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反帝反封建思想强烈，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和影响者。武臣自小又受到祖父思想的影响，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的

种子，为成年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赵武臣小时天资聪颖。1926年进小堡子庄私塾上学，品学兼优，考试经常名列前茅，受到杨振声先生的钟爱和精心栽培。1928年考入合水县立中山中心国民小学后，进步很快，才思敏捷，提笔成文。1927年陇东天旱成灾，学校关门，武臣辍学。

1928年，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以保境安民为由招兵扩军，武臣以为为国效力的机会到了，高兴地投入谭部梁道武、任维珍第三营当兵。后通过观察和亲身体验，他觉悟到谭世麟的军队是化了妆的土匪，并不管“保境安民”，而产生了退伍的念头。1929年9月18日，谭世麟与陈珪璋激战于庆阳，谭军溃败，赵武臣遂返家务农。

是年，陇东饥馑，土匪蜂起，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赵武臣在祖父赵凤鸣支持下，与李增萼收集土枪，组织民众，办起固城镇民团。武臣率众消灭了附近的土匪，使当地百姓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1932年春，陶玉山（陶老三）匪众在合水县店子镇的双柳村劫掠百姓，赵武臣闻讯率民团进剿，陶匪溃逃。民团返回固城时，正值陈珪璋部警卫团团长率部进入固城镇止流村劫掠。赵武臣掉转马头，带领民团出击，李增萼战死，赵武臣被俘，团丁也所剩无几。后来通过陈珪璋部幕云台旅参谋长李玉生（武臣同学）以军队与民团发生误会为由出面说情，武臣才被释放。这次出击，虽然打了败仗，却赢得了百姓的称赞。

赵武臣受挫后，不甘受辱，在祖父支持下，卖地60余亩，筹集军资，于同年秋再次办起民团。赵凤鸣令儿子赵甲璧、赵国璧、赵和璧一同进入民团，壮大队伍。赵武臣为团头，重新树起固城民团的旗号；他祖父赵凤鸣和父亲赵国璧承担了从陕西省宜君县小石咀罗注城民团、黄龙山夏老么民团处购买枪支、弹药等军需的任务。

是年秋末，国民党军队万排长带领10余人途经固城镇，赵武臣率民团乘夜袭击了万排长，缴获枪10余支。此时，固城民团有枪30余支，声威大振。为发展壮大自己力量，提高军事素质，赵武臣率民团进入山后地区驻扎，打土豪筹备军资，扩充军队，训练士兵，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在此期间，他受到刘志丹的影响，逐步倾向革命，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固城民团番号虽仍存在，队伍实际已成为刘志丹游击队的一部分。

1932年，刘志丹游击队一名姓李的在台水县固城镇活动时，介绍赵武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环境特殊，党员之间单线联系，李调走后关系中断。1934年春，赵武臣在甘肃会宁县向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胡立亭、冯世光提出口头申请，要求恢复党籍，但因无证据，党组织决定对他入党问题重新考察。1937年春，赵武臣揭发了特务分子曹品山破坏地下党组织的阴谋，保护了大批地下党员，立了一大功。后季，新十一旅在甘肃静宁县督师北上抗日时，由胡立亭、冯世光介绍赵武臣入党，党龄从1934年春赵武臣提出恢复其党籍时算起。

1933年，甘军的新十一旅旅长石英秀，派第一团新兵营长宋茂亭来陇东招收新兵和收编民团，刘志丹派赵武臣打入该部搞兵运，以加强新十一旅的革命力量。这时，赵武臣才真正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为了迷惑敌人，取得国民党的信任，刘志丹游击队与赵武臣民团在包家寨子进行“激烈战斗”，赵武臣诈败投入国民党新十一旅石英秀部下，在宋茂亭新兵营当了新兵连长。之后，他与石部地下党员杨觉天、陈毅平、朱侠夫、杨定芳、杜陕西等接上了关系。

1935年7月，新十一旅长石英秀在甘肃静宁县，把宋茂亭的新兵营和各地招收的散兵及军官编为第三团，委任杨觉天为团长，杨觉天与赵武臣等策划兵变泄密，第三团被缴械，杨觉天脱险逃走，赵武臣被捕入狱。经地下党员×多谋多方周旋，才以赵

武臣活动是为去住军官学校，并非搞兵变而消除了石英秀的疑虑，后被允许赴天水上军官学校，第三团遂解散编入第一团。

1934年，新十一旅在甘肃会宁县整军时，新兵营取消，赵武臣军校毕业后回新十一旅当参谋，一团长陈国宾见赵精明强干，遂遣去新十一旅一团当副官，赵武臣就与牛化东、赵杰山、胡立亭、冯世光、李树林等共产党员会聚一处，秘密进行地下活动。

1937年春，第一团三连长复兴社特务分子曹品山向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密报，称新十一旅一团营长曹友参、李树林，连长冯世光为共产党员并企图发动兵变。此事被赵武臣发觉便及时报告了地下党组织。后第一团团长陈国宾奉命调查予以否定，撤去曹品山连长职务，委任赵武臣为三连长。

1937年10月，新十一旅调防安边后，赵武臣因和“三边”党组织联系频繁，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怀疑。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赵武臣，驻扎在定边的八路军警三旅贴出标语：“打开安边城，活捉赵武臣！”把赵武臣和反动头子吴芬、史防城等反动军官一样视若仇敌。敌人始知误会，疑虑顿消。

1938年4月，赵武臣以回家探亲为名，专程来到陕甘宁边区的西华池，与当地驻军三八五旅警五团团长安谢秘密会晤。临别时，给该团赠送优等战马五匹，好枪10支，以表示对革命的赤诚之心。

1940年，受上级党组织指示，赵武臣和冯世光在安边公开合资开一“天聚成”杂货店，打着做生意的招牌，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资金，为八路军暗送军费。“天聚成”生意分外兴隆，成为国民党军官抽大烟摆“龙门”的场所，也是地下党组织与外界密传情报的联络点，这在当时的革命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赵武臣打入新十一旅后，内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外倚警三旅的密切配合，和敌人长期斗智、斗勇，度过了一次次阴谋考验，渡过层层险恶关头，把情报送出去，把任务带回来。他时而

是军人，时而是商販，多次巧妙地完成了上级党交给的任务。

战斗在新十一连第一团的共产党员，经过1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控制了第一团，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决定于1945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起义，由警三旅配合接应。正在这时，赵武臣获得情报，吴芬副旅长、史防城团长、张鼎成副团长奉胡宗南密旨，以打野外名义，率史防城第二团将于三、五日内察定边突然袭击，以武力整编第一团，搜捕共产党员。为了应急变化，冯世光亲往警三旅联系，贺晋年司令员指示，争取主动，提前起义。并立即指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领八、九两团和七团一个营由驻地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赵杰三、高昆山等共同决定：由牛化东担任起义总指挥，调兵布阵迎敌。赵武臣率三连冲锋陷阵，镇压首恶分子。10月25日起义成功后，乘胜追击，一举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史防城第二团。

赵武臣在十一旅一团起义当中，工作突出，被上级党组织提升为一团二营营长。

起义不久，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动分子不甘心失败，妄想死灰复燃。骑兵连连长南益民伙同张有让挟按警卫员谋杀赵杰三（团长）、高波（副团长）、赵武臣（营长），准备哗变。又被赵武臣侦破处决，一场隐患被清除。为了阻击马鸿逵部进攻边区，起义部队开赴白泥井西塘驻防。

1946年8月，内战迭起，军事繁忙，赵武臣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38岁。

赵武臣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犹存，功绩常在。

（任守彦）

柳 生 枝

柳生枝（1909——1946），合水县店子乡五张塬人。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青年救国会主任、救国会主席、区后援会主任（即秘密区委书记）等职。1939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摩擦”事件，时任板桥区后援会主任的柳生枝，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面公开登台演讲，用事实揭露蒋介石政府的罪恶阴谋；一面率领自卫军，威逼国民党合水地方当局当众承认制造事端的不是。柳生枝的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合水地方当局的极为不满，遂之安插特务，于一个漆黑的夜晚秘密将他捕去。起初，关押西峰监狱，敌人玩弄花招，要他承认“罪过”，并在供词上签名盖章后，即行释放。无论敌人怎样利诱，都被柳生枝一一顶了回去。同年12月，陇东反“摩擦”斗争取得胜利，敌人为了设置障碍，转移合水县委营救柳生枝的视线，又将他秘密转平凉监禁。翌年2月下旬，国共双方解决陇东事件的谈判破裂，敌人又将柳生枝密解兰州，欲作人质监押。嗣后，中共合水县委经多种渠道营救柳生枝，曾被国民党方面以“早已越狱逃跑”的谎言敷衍过去，使营救工作长期落不到实处。直到1944年11月，敌人在实在取不到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将柳生枝按保外就医释放出狱。柳生枝获释回到故乡后，继续从事党的基层工作，而且不遗余力，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946年10月，柳生枝被5年饥寒生涯致成的疾病夺去了生命，终年37岁。

（曹清珂）

杨 占 清

杨占清（1920——1947），合水县古峡乡郝家庄人。1935年6月参加红军游击队。1936年7月编入红四团，任班长。1945年转入警三旅五团二营六连任排长，不久被提升为六连连长。他出生于贫苦人家庭，富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每到一地驻防休整时，他能很快与当地贫苦农民拉上关系，甚至亲如一家，见活就干，遇困难就帮。凡是上了战场，他常常奋不顾身，抢着冲锋陷阵。1947年元宵节，当他所在的部队拔除宁县堡宁里伪保安队的反动据点时，他抢先登上云梯，与敌哨兵展开白刃拼搏。但因敌哨兵早已子弹上膛，不幸中弹倒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曹清珂）

辛 俊 珍

辛俊珍（1919——1947），合水县定祥乡辛家庄人。1942年2月参军，历任班长、排长。1946年11月提升为警三旅补充营一连连长。1947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军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奉蒋介石命令，指挥四十八、二十四、一四四旅及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和青马八十二师，大肆进犯陇东苏区。3月4日，敌二十四师先遣队抵达赤城，妄图策应四十八旅进攻西华池。即日傍晚，为把持赤城堡寨，与我驻于该堡的补充营展开争夺战。战斗中，辛俊珍身先士卒，带领全连战士奋力拼搏，顽强抗击，致敌一次又一次的攻城计划落空。到了夜深人静时，敌人大队人马到达，终因寡不敌众，城被强敌攻开，辛俊珍在掩护战友们撤退

中光荣牺牲，年仅28岁。

（曹清珂）

郑 振

郑振(1924——1947)，合水县西华池镇杨家沟坊行政村前梁人。1945年参军，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1946年11月，提升为警三旅五团三连连长。1947年3月5日西华池战斗中，郑振所在的连队担负围城打援任务。次日凌晨，战斗进入决战阶段。为了争取时间，不给敌人以丝毫的喘息机会，郑振脱掉上衣，扎紧腰带，亲自带领尖兵班冲入敌群，致大批顽敌死于尖兵班的刺刀之下。正在杀敌起劲之时，迎面飞来一枚弹片，不偏不倚，正中郑振眼球，眼睛受伤，与敌拼搏就没了目标。他略一迟疑，即被敌人刺入心窝。郑振就这样光荣的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却永远留在合水人民的记忆中。

（曹清珂）

高 永 信

高永信(1891——1947)，合水县店子乡幌子畔村人。1937年3月参加红军，牺牲前任八路军警三旅五团某连连长。1947年3月5日西华池战斗打响，警五团打得英勇顽强，给国民党四十八旅以极大杀伤。3月6日，战斗进入决战阶段，高永信所在连队与敌展开了拼刺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高永信凭借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时而带队潜入高号院落，时而只身冲进密集的敌群；时而被敌围困，时而又杀开血路，使敌一倒一大堆。就在他杀敌

正起劲之时，不幸中弹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高永信同志虽为革命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着、记忆着。

（曹清珂）

程 永 新

程永新（1922——1947），合水县何家畔乡盘马行政村程家嘴子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爱憎分明。1939年3月应召入伍后，经过部队精心培养，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都尽快提高。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连续被提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1947年3月西华池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带头冲入敌阵。正与敌激烈厮杀时，终因子弹打完，遂被敌人抓去杀害。卒年25岁。

（曹清珂）

姬 世 福

姬世福（1915——1947），原籍陕西省横山县，1929年随父母逃荒定居合水县太白乡连家砭。1935年10月参加红十五军团，同年11月于直罗镇战役中火线入党。1936年5月提任排长，10月，提升副连长。1946年8月，全国解放战争全面开始，姬世福授命担任教导二旅二营三连连长。1947年3月西华池战斗中，姬世福带领全连指战员，于官庄坡头堵截欲逃之敌。就在捕捉一股持枪匪兵时，由于他的手脚麻利，一下子抢到了最前头。当他“交枪不杀”的喊话刚一出口时，不幸被一垂死挣扎的匪兵抱住了右

腿，又被另一匪兵开枪打死。

姬世福是为革命献身的，但打死他的那帮匪徒谁也没有跑掉，一个个都被姬世福的战友抓获处决。

（曹清珂）

邵 富 堂

邵富堂（1925——1947），合水县西华池镇堡子畔人。1942年参加革命，牺牲时系盘马区公安助理员。其父邵维藩，是西华池原上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人士之一，曾被国民党合水地方当局悬赏通缉过。1947年3月5日，国民党四十八旅于西华池吃了败仗，旅长何奇被我军击毙。为防敌人伺机报复，陇东分区命令合水党政干部及游击队暂时东撤，沿子午岭林区开展游击活动。5月7日，中共盘马区委在接到县委的撤离通知后，遂于当天下午动身，傍晚度过马莲河，摸黑登上西华池原。在夜牧沟圈一个大场畔商议晚间宿营地点时，恰被潜藏在高级地里的国民党特务王范定窃听，并连夜报告了驻于下寨沟的国民党二十二师。翌日凌晨，当游击队与区乡干部在宿营地三環嘴子吃早饭时，突遭敌人包围。在掩护区乡干部突围中，游击队长陈世英、副指导员徐占邦以及其他8名游击队员光荣牺牲，2人受重伤。邵富堂与区乡干部突围后，暂时藏匿于半崖一个水洞里。经过很长时间，听不到任何声息，富堂以为敌人已经撤离，便自告奋勇的上崖打探情况。刚至崖畔，恰逢敌人搜捕，富堂遂被捉去，押至西华池街，敌人先是利诱，后又施以酷刑，逼他招供战友去向。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均被镇定自若的富堂用“不知道”的言词对付了过去。敌人看他年轻，又着便装，还误以为他是农民，正想把他释放，这时，偷遛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店子乡乡长吕三拉马路过，

搭眼就认出了富堂。吕三益当众宣布了富堂的身份，并马上责令敌军把富堂拉至他家磨房杀害。时年仅22岁。

（曹清珂）

陈世英 徐占邦

陈世英（1917——1947），出生于合水县吉岷乡南头湾。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脱产工作。

徐占邦（1926——1947），出生于合水县段家集乡化沟村。1942年9月11日参加革命，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徐俩人都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均对旧社会深恶痛绝，而对共产党感情深厚，忠贞不渝。

1947年3月6日西华池战斗初获胜利，但合水县的整个革命形势仍然处于严峻状态。为了防止敌人反攻倒算，中共合水县委即于4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一批党员骨干分子，以加强对区级武装工作的领导，陈世英遂被任命盘马区游击队长，徐占邦由县政府三科科长提升为该区游击队副指导员（指导员由区委书记兼任）。5月7日，盘马区、乡干部以及游击队全体人员奉命转移于午岭林区，与县委、县政府一起开展游击活动。当天下午出发，傍晚渡过马莲河，摸黑登上西华池原，行至夜牧沟圈一个大杨畔商议夜间宿营地点时，恰被暗藏于高粱地里的国民党特务王范定窃听，连夜向驻扎于下寨沟的国民党二十二师作了汇报。5月8日清晨吃早饭时，敌二十二师突至，很快包围了游击队的宿营地三塆塄子，使游击队措手不及。

三塆塄子，位于西华池城南三华里处的一个沟畔，全村只住了七、八户人家，底下全是悬崖峭壁，庄上又是西华池原边的开阔地带，一旦遇到险情，非得从原面上撤走不可。面对这样的特

殊地形，游击队在当晚宿营时是一概不知的，更没有料到竟会发生如此巨澜。来犯之敌共计50余人，还有机枪和战马。而盘马区的党政干部和游击队员加起来不到30人，携带的武器又只有20多支七九杆子，是远远对付不过强大敌人的。在这万分紧急关头，陈世英、徐占邦当即集合游击队员，马上上崖阻击敌人，掩护区、乡党政干部迅速撤离。然而，区和乡的全体干部安全撤走了，但陈世英、徐占邦等10名游击队指战员却壮烈牺牲了。

陈世英、徐占邦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西华油原的黄土地，他们的英名永远载入合水人民革命的光荣史册中。

（曾清珂）

石廷川 石道发

石廷川（1922——1947），生于合水县肖嘴乡石家老庄村。1945年参加革命，牺牲前任合水县游击队第5支队队长。

石道发（1915——1947），生于合水县肖嘴乡枣卜洼村。1940年参加革命，历任乡党支部书记、城区区长等职。牺牲时任合水县政府一科科长兼城区游击队指导员。

1947年5月11日清晨，合水县游击队于景家原遭甘保一团二中队及八二师骑兵合围。游击队激战失利，石道发在指挥全员撤退中，不幸腿部中弹倒地。敌人狼奔豕突地向他扑去，妄图抓作活的人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本能撞走的石廷川，急速逾垅往救，决意不让敌人抓去。当他刚将道发背起准备迈步时，另一股敌人突然扑来，迎面拦住了他俩，当即五花大绑，解往县城。敌人使尽了软硬兼施的花招，廷川、道发叔侄俩人都没有为之动心，相反的却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敌人气急败坏，遂将他俩剖腹刺心，并将头颅砍下，悬挂城门示众多日。

牺牲时，延川年仅25岁，道发也才32岁。

（曹清珂）

王 三 义

王三义（1912——1947），合水县西华池镇王家堡子人。1939年参军，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1947年3月提升为警三旅五团七连连长。同年5月，转战陕西耀县。在一次战斗中，王三义所在连队肩负运送弹药任务。由于战况紧急，必须从敌人封锁较严的一条夹道捷路通过，才能保证部队的作战需要。面对这样的严酷情形，王三义不惧敌人密集火力的射击，舍死运送弹药到前沿阵地。一次、两次，都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火力点。但在第三次又要通过时，当王三义回头照料其他同志要“快跟上”的一刹那间，不幸头部连中数弹，光荣地献出了他那宝贵的青春。卒时35岁。

（曹清珂）

侯 青 山

侯青山（1914——1947），合水县吉岷乡侯家陡沟人。1938年5月1日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任西华池市北乡乡长兼乡党支部书记。1947年春调任宁工委武工队长。由于他身强体壮，干练豁达，不久便由地方选入部队，开始了戎马生涯。他一入伍，遂被任命为八路军警三旅独立营教导员。同年6月，在庆阳县玄马湾阻击国民党马步芳军队时，他带头冲锋，奋不顾身，不幸中弹牺牲，卒年33岁。

（曹清珂）

朱 向 林

朱向林（1914——1947），合水县店子乡朱家井塬人。1936年1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合水县五区、六区、三区区长。1947年3月，国民党四十八旅于西华池吃了败仗，共被我西北野战军击毙700余人，旅长何奇亦被打死。敌四十八旅亡我之心不死，遂后又多次侵犯合水县境，搜捉革命志士，欲达疯狂报复之目的。6月9日清晨，敌于固城川突至店子原，偷袭了我三区区政府，俘去区长朱向林、秘书吕正邦、管理员胡广、勤杂常崇奎等5人。敌将朱向林解押庆阳县城监狱后，先以金钱诱降，均遭凛然回绝。然后动用大刑，依然没有治服朱向林这位对革命忠贞不二的汉子。敌在软硬兼施均不奏效的情况下，于同年7月8日将朱向林活埋于庆阳县城北吊桥东侧。就义时，他叫骂不绝，以凛然正气揭示了国民党的腐朽没落。

（曹清珂）

朱 德 良

朱德良（1911——1947），合水县固城乡佟家崖窑人。1937年2月5日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长、乡支部书记、游击中队指导员等职。

1947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激烈进行，强大敌人一时得利，合水县委、县政府暂时被迫撤离县境。奉上级“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指示精神，朱德良带领中队游击队员，于7月中旬秘密回到店子原活动。在一个雾气沉沉，细雨蒙蒙的清晨，游击队正

在东安畔村子吃早饭，突遭国民党合水县保安队二中队的包围。由于寡不敌众，游击队惨败，朱德良被捕。在押送西峰途经何家畔乡的浅沟子时，巧遇合水县保安大队长李鸿轩自西峰返往合水秧民。真是冤家路窄啊！李鸿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打问他的部下所押送的4人全系共产党员的情况后，立即下令亲自审问。朱德良得知情况不妙，马上以目暗示其他3个同志作好精神准备，要以共产党员的硬骨头精神对付李鸿轩的问话。

“你叫朱德良吗？”

“正是本人！”

“共产党已经完蛋了，你跟我干行吗？”

“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水、火怎能融为一体！”

“哪你想活，还是想死？”

“我从加入共产党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李鸿轩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的高声吆喝说：“不许无理，我要你立即住口！”

“也不许你无理，你有什么资格审讯共产党员，我也要你立即住口！”

李鸿轩恼羞成怒，随即把手一扬，喝令部下用铁丝绞死朱德良等4位共产党员。

就义前，朱德良、张明、宗文秀、杨正明齐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临危不惧的胆略敲响了反动派的丧钟。

（曹清珂）

刘 秀 贞

刘秀贞（1906——1947），女，合水县老城镇城内人，是合水县较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为人忠诚坦荡，做事泼辣大方，对革命全心全意，忠贞不二。1936年12月，在家乡由红军女战士李学蓉介绍入党并担任城区妇女救国会主任。每逢集日和庙会，她都坚持向广大妇女进行抗日宣传，并带头开展妇女剪发、放足活动，还积极支持她的独生子唐笃友参加地方革命工作。1947年国民党进攻期间，她随合水县委、县政府一起北上开展游击活动。返回不久，终因积劳成疾而病故。合水县政府曾以“妇女抗日救国模范”的光荣称号为她设祭。

（曹清珂）

孙 泰

孙泰（1922——1948），合水县西华池镇宋家堡子人。1936年12月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至12月任西华池市委书记。1947年1月至9月任合水县建设科科长。1948年春，于宁县潘村蝎子被国民党八二师俘去。同年秋，被其兄孙秀保释，因当时合水县委、县政府人员全部转入山后，还未及找到党组织复被国民党搜索队俘去。在西峰监禁期间，屡经拷打，坚贞不屈。不久，被国民党三区专员公署杀害于西峰，就义前骂声不绝，并高呼“共产党万岁”、“埋葬蒋家王朝”等革命口号，殉难时，仅26岁。

（曹清珂）

于 廷 吉

于廷吉（1923——1948），陕西省渭南于家庄人。1948年2月自陇东分区保安处调任合水县政府保安科副科长。4月，赴杨家坪花鸭湾侦察敌情时，被国民党合水县自卫队陶生元部抓去，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后被监押于西峰大狱，屡遭酷刑。有一次，匪徒用铁丝拧他的头颅，强行逼供，仍坚决不供任何情况。而且，他还厉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直到头骨迸裂，脑浆横溢而亡。惨状不忍目睹，年仅35岁。

（曹清珂）

薛 生 华

薛生华（1924——1948），合水县何家畔乡塔底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任盘马区游击队长。1948年4月，合水县游击大队于花鸭湾遭敌突袭，造成重大伤亡。在与敌搏斗中，薛生华凭借一个小峁峁的天然屏障，拼命射击敌人，掩护同志们撤退。打到弹尽被围时，他又奋操枪托揍敌，致3个敌军脑浆飞溅，象死猪般的倒于地上。顽敌气急败坏，呐喊着围拢上来。薛生华明知生命难保，遂将枪托摔坏，尔后跳崖自尽。匪首陶生元，脸面气成茄子色，喝令部下砍下薛生华的头颅，悬挂城门示众多日。

薛生华为革命壮烈牺牲了，年仅24岁。

（曹清珂）

彭 贵 彭振刚

彭贵（1890——1948），甘肃省合水县店子乡彭家庄人；彭振刚（1918——1941），彭贵次子。

1936年12月下旬，陕甘宁省委红军民运工作团派李正廷赴店子原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义勇军。年已46岁的贫苦农民彭贵积极响应，与次子振刚同时报名参加义勇军，投入抗日救亡洪流。次年，彭贵随红四团出征，振刚从事地方工作。1936年，彭贵的四子振江又从军后，彭贵遂由部队转业亦从事地方工作，任店子区救济会主席兼店子民办合作社主任。为办供销社，他含辛茹苦，不遗余力，献出自家土地3亩，树200余株，在店子街盖起铺面7间。

1941年（古历）8月13日，国民党宁县南义镇保安分队于夜间偷袭肖咀区委，时任肖咀区委副书记兼组织科长的彭振刚被俘。国民党保安队长肖文芝令押解宁县诱降，彭振刚手掰门杠，足登门槛，拒不挪动一步，并严词痛斥说：“我生为边区人，死做边区鬼，要杀要斩随你便，要我屈服妄想。”肖文芝气急败坏，遂令匪将彭振刚连击7枪致死，时年仅23岁。1942年10月，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于店子街为彭振刚立石碑一面，以示悼念。

1945年，彭贵的五子振怀自陇东中学毕业，彭贵又令参军。入伍大会上，彭贵登台讲话，“我有五个儿子，振刚牺牲振怀补，再留两个作预备；革命人，吓不倒，杀不完，血债终得用血还！”寥寥数语，赢得台下掌声雷动。1947年8月，国民党占领合水，特、反、劣绅一齐出笼，杀人放火，搜捕革命干部和群众。翌年4月，彭贵在桌子岭被国民党合水保安分队长何天德抓去，监押四峰，百般残害。彭贵胞侄振义探监时，彭贵隔窗叮

喊：“我有死无生，回去告诉振汉（彭贵三子），叫他也去当兵报仇。”时隔不久，彭贵又被转解平凉关押，受尽毒刑，折磨致死。终年58岁。

（曹清珂）

杨 爱 成

杨爱成（1928——1948），合水县段家集乡北头村人。1943年5月9日参军。刚一入伍，他就敢冲敢闯，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且有顽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精神，遂被领导提为班长。加上年龄只有15岁，同志们都爱慕的称他为“儿童团长”。1947年秋，全国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杨爱成又被部队领导破格提升警三旅五团三连副连长。1948年5月下旬，合水县游击大队决定拔除国民党店子乡乡长吕三益所盘踞的吕家堡子反动据点，时从部队请假回家探亲的杨爱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反动战斗。他凭借在正规部队多年的实践经验，主动担当起了把守第一道防线的光荣任务。战斗打响后，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一会儿探头观察动向，一会儿组织战友们拼命阻击敌人。就在游击大队全面发起冲锋时，杨爱成在跳出掩体的一刹那间中弹牺牲了。享年20岁。

（曹清珂）

齐 占 兴

齐占兴（1908——1948），合水县店子乡麻家坑塄人。1935年1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齐占兴，风华正茂，

血气方刚，办事公道，不徇私情。1937年3月，中共合水县委成立，优先于店子地区创建区、乡政权，物色共产党员担任区、乡领导职务，齐占兴即被店子区委推荐出任一乡乡长。刚一上任，他就带领贫苦农民与农会会员，针锋相对的斗争了依赖剥削起家并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户族堂兄齐尚德，并依法分配了他家的土地和浮财。齐占兴的革命行动，引起了齐尚德的极为不满，从此就结下了势不两立的冤仇。1940年2月，齐占兴升任店子区区长，1941年3月，又调任合水县政府建设科副科长，同年12月，又被组织提拔担任县建设科科长。齐占兴的连续升迁，使齐尚德极大的不安。为了达到后法治人的目的，齐尚德便偷偷地逃往西峰，当上了国民党三区专员公署的警察。

1947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激烈阶段。合水县城战斗失利后，我党、政、军机关奉命撤离县境，转移到山后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活动。时隔不久，国民党合水县政府卷土重来，开始了向革命人民施行反革命报复的罪恶活动。誓与合水人民为敌到底的齐尚德，一看报仇的时机已到，遂用重金买通国民党合水县政府，领取了一颗警佐的头衔。

1948年盛夏的一天，当齐尚德密探到齐占兴确于当日回家，并在家留宿的情报后，马上勾结国民党特务白林山，于夜深人静时，翻墙进入齐占兴的住宅，先把齐占兴杀害，又将其11岁的孩子刀断三截。

齐占兴为革命献了身，但恶贯满盈的齐尚德，终久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全国解放不久，即被我合水县人民政府抓获镇压。

（曹清珂）

冯 克 微

冯克微（1913——1948），陕西省临潼县冯家庄子人。

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西安学生也迅速的投入这一爱国运动。此时，正在西安二中上学的冯克微，带头参加示威游行，领喊“保全国土”、“铲除汉奸”等爱国口号。冯克微的造反行动，触怒了国民党陕西省反动当局，遂被列入通缉名单，欲谋捉拿治罪。冯克微经与同窗挚友马吉伯等4人秘密串联，将一名追随反动当局、欲拿他请功领赏的同班同学投入古井，然后很快逃离西安，徒步来到合水县境。在其老师李石僧（时任国民党合水县长，也是陕西临潼县人）的举荐下，当了合水县县立中山小学教员。

1938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陕甘宁省委为合水派来了红军民运工作团。此时此刻，满腔热血的冯克微，如鱼得水，似虎添翼，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紧密配合民运工作团进行革命活动。嗣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合水县抗日救国会（1937年8月改称抗敌后援会）主任。

1939年12月12日，冯克微配合合水县委行动，亲自指挥捉拿了国民党合水县长程大勋。1940年2月23日，合水县正式建立革命政权，冯克微遂由县长高朗亭提名，报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担任了合水县政府教育科长。1942年5月，冯克微调离合水，提任曲子县副县长、环县县长等职。1948年，环县大量流行“出水病”，冯克微不幸于同年7月染病亡故，卒年35岁。

（曹清珂）

赵 廷 元

赵廷元（1922——1948），合水县太蕨乡安集堡人。1939年3月5日参加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1948年2月提任警三旅五团二营七连副连长。同年7月于陕西蒲城战斗中，七连肩负前沿攻坚任务。由于敌人抢占了一个土坎的有利地形，致使七连屡攻不下，而且遭到极大伤亡。目睹倒下去的战友，廷元顿时义愤填膺，决心与敌拼个你死我活。夜幕降临后，廷元自告奋勇地携带5个一束手榴弹，动作麻利地摸到敌人火力点附近……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机枪瞬间变成了哑巴，赵廷元也为革命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赵廷元虽为革命牺牲了，但他那勇敢献身的精神却是永不磨灭的。

（曹清珂）

贾 义

贾义（1920——1948），合水县蒿咀铺乡上柳沟人，1942年10月参加八路军，生前任警三旅五团某连副连长。1948年8月在陕西宜川战斗中，刚开始对阵，连长即被飞弹击伤。在这胜负攸关的非常时刻，贾义说时迟，那时快，一面安排担架队把连长抬往安全地带包扎，一面代替连长职责，迅速组织全连阻击敌人。他镇定果敢的把手一挥，高喊：“同志们，跟我来！”喊声未落，全连指导员便蜂涌而上。经过3小时许的白刃拼搏，以绝对的勇敢制服了敌人。然而，战斗是打赢了，但贾义同志却因劳累

过度而口吐鲜血，当即晕厥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曹清珂）

李 儒 银

李儒银（1924——1948），合水县西华池镇严家沟行政村段家内湾人。

他，自幼精明强悍，办事干脆利落，说话开门见山。因为家贫，他常乐于为穷人分忧解难，抱打不平。1942年正值抗日烽火炽烈，边区处于极端困难之际，李儒银积极响应党的召唤，带头参军当兵，走上革命道路。到了部队，他坚持勤学苦练，不耻下问，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都提高很快。参军不到半年，就被部队破格提拔为排长，并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1948年4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李儒银又被提升为警三旅三营八连连长。9月，他于东华池六坝沟阻击国民党八二师战斗中光荣牺牲，卒年24岁。

（曹清珂）

贾 福 禄

贾福禄（1911——1949），合水县柳沟乡任家湾人。1947年10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合水前沿地区曾被敌人占领。国民党合水县当局看中了贾福禄这位铁打的汉子，曾三番五次派人登门，劝其为他们当差，并许诺给予优厚的薪金，从小就吃尽国民党苛捐杂税苦头的贾福禄，表面搪塞应付，内心却打定了进山寻找合水县委的主意。一天清晨，他借口到陈家河串亲

威，撒腿翻过子午岭，不到天黑就换到了合水县委的临时驻地烟景川。在说明来意后，合水游击大队长石秀山即刻答应将他编入景一中队。

1949年2月18日，合水游击大队配合地方武工队，突袭了驻扎于西华池的国民党合水县自卫队三中队一分队，拔除了合水县境内的最后一个反动据点。在这次战斗中，贾福禄机智勇敢，表现得非常出色，遂被提升为二区游击队长。6月7日，贾福禄带领游击队于西华池街南的营房子执行锄奸任务时，由于哨兵的麻痹大意，突遭国民党合水县自卫队陶生元部的重创。游击队被打散，贾福禄、文世麒、许世珍、王治忠、孙德贤5同志同时阵亡。这就是惨绝人寰的“营房子惨案”。

（曹清珂）

贾 建 成

贾建成（1899—1949），合水县柳沟乡东沟畔人。1936年3月参加红军，牺牲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营五连连长。

1949年8月25日，兰州战役进入最后决战时刻。即日凌晨，三发红色讯号弹升空，担负主攻沈家岭主峰的三十一团发起了全线总攻。在二营的阵地上，战士们用山炮直射敌人的战堡，一发发炮弹，把敌人的一个个碉堡炸得粉碎。敌人的正面工事很快被摧毁了。这时，五连从正面主攻，四连和六连从左右两翼，向敌人的阵地发起猛烈的冲锋。敌人的轻重机枪喷着火舌，子弹象雨点一样，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如电闪雷鸣。贾建成带领英雄的五连战士在敌炮火下，时而飞奔，时而匍匐前进。当部队冲到离敌阵只有十多公尺时，贾建成同营长翟奎忠同时负了重伤。由

于失血过多，贾建成同志不久歿于医院。

（曹清珂）

段 得 喜

段得喜（1927——1949），合水县何家畔乡段家坑塬人。1943年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重机枪连副连长等职。1949年8月兰州战役中，敌人以优势兵力向他所在的重机枪连阵地扑来，段得喜手扣枪机，拼命扫射，打得敌人象乱麦捆似的倒下一堆。当敌人第三次猛攻开始后，段得喜想到，我方伤亡也大，剩下的弹药又不多了，硬拼总不是个办法，他便毅然决然的把敌人火力引向自己，命令其他同志尽快转移。然而，其他同志安全撤离了，但段得喜却中弹牺牲了。

段得喜牺牲时年仅22岁。他的一生是极其短暂的，但革命业绩和献身精神却是永存的。

（曹清珂）

强 占 山

强占山（1914——1949），合水县太蕤乡罗儿原人。1942年4月参加八路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军第二大队司令部炮兵营连长。1949年8月，在兰州沈家岭激战中，占山所在的炮兵营，肩负远程轰击敌人阵地的任务。当他发现本营另一个连遭到敌人阻击时，他深知这个连队的攻击任务是与他的连队息息相关的。这时的强占山，只想到全营整体的胜利，早已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不顾。他及时向营长作了请战汇报，立即奔赴主攻第一线，配合主攻连队指战员，向敌阵地展开了猛

雷不及掩耳之冲锋，一连冲垮了敌人数道防线，摧毁了敌人设置最为精堪的火力点。就在敌人将被我军全歼，战斗将要胜利的关键时刻，占山不幸中弹，倾倒于血泊里牺牲了。

（曹清珂）

黄 金 贵

黄金贵（1924——1949），合水县吉岷乡贺家岭人。1937年7月7日参军，1942年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排、连长，1949年2月提升为警三旅独立团二营营长。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饱尝了黑暗的旧社会的苦头，在心灵深处打下了誓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烙印。1937年7月，当陕甘独立师红四团行军从黄金贵的家门前路过时，虚龄才14岁的黄金贵给家里连个招呼都没有顾上打，硬是跟着红四团去了。1948年12月升任营长。他，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每遇战斗，从来都不顾究生命。1949年在陕西韩城作战中，当子弹打完时，他一下子起身跳出战壕，手持刺刀，向敌群冲了过去，直刺得那些敌兵狼嚎鬼叫，抱头鼠窜，一个个跪地告饶。但当战斗胜利结束，黄金贵终因用力过度，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再也没有爬得起来。他，虽死犹生，浩气常存，永远活在合水人民的心中。

（曹清珂）

杨 青 山

杨青山（1924——1952），出生于合水县柳沟乡窑子头一个穷苦农民家里。在那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杨青山的父母辛苦

一年，到头来仍然养活不了全家10之众。民国十八年遭年馑时，杨青山的三个哥哥先后饿死于襁褓和孩提之岁。实在混不下去，后于1929年迁往西华池定居，干起了卖饭的营生。1936年底，红军民运工作团来到合水。在红军民运工作团和后来的三八五旅警七团的热心帮助下，杨青山与其妹妹杨敏才得到了上学念书的机会。为了报答党和当地驻军的恩情，杨敏在上完陇东中学后，遂于1944年报名参军，成为合水县唯一的八路军女战士（现在北京后勤部任团级医官）。1946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序幕拉开，杨青山的父母于同年8月送杨青山参加地方游击队，1947年2月，编入正规部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西华池、南义井、宜川、西府、电子镇、沈家岭等许多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和战役。1950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给杨青山颁发了“解放大西北纪念章”和“人民功臣”勋章。同年10月，杨青山所在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杨青山被提任志愿军后勤部十大站驻重一营一连副指导员，随即赴朝作战。

1952年7月16日，杨青山于朝鲜平安南道阳德郡与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中牺牲，卒年28岁。

（曹清珂）

杨 培 润

杨培润（1924——1953），又名杨青，合水县西华池镇黄家坑塬人。1929年3月参军，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排、连、营长。参加过西华池、黄龙山、宜川、瓦子街、西府、沈家岭等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和战役，曾荣获过“人民功臣”等勋章。1949年8月解放兰州时，他奋不顾身，英勇杀敌，被弹片炸

掉了左脚腿骨。1950年调任西北空军司令部四队政委后，他拖着伤残而虚弱的身躯，仍兢兢业业的坚持为党为人民工作。有时一天昏倒几次，他也毫不在乎。1953年8月，终因伤势突发而去世，终年28岁。死后，由所在部队征地一分，于西安市小雁塔八里庄建立了烈士陵园，并树有一米高的石碑一面。烈士的独生子晓刚，1970年参军，1972年于宁夏石嘴山翻车身亡，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曹清珂)

许 尚 贤

许尚贤（1884——1958），合水县西华池镇黎家庄子人。自幼家贫如洗，曾给人拉长工、打短工30多年。1936年12月红军民运工作团奉命进驻合水，公开宣传抗日救亡，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筹建党的基层组织。经过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许尚贤由民运工作分团团长赵连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乡救国会主席（乡党支部书记的代称）。1940年2月，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许尚贤当选为县政府委员和县参议会议员。1944年，他响应边区政府“耕二余一”号召，带领全家人开垦了三架山坡的二荒地，当年产粮40余石，成为出名的余粮户。这年12月，当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模代表大会，被评为全边区的甲等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荣获5万元边币的奖金。1947年下半年，西北野战军主力兵团转外线作战，合水县曾被国民党占领，许尚贤遵照上级“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指示精神，坚持开展地下活动，坚持游击战术，与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保、甲吏员在墙壁上贴上“朱、毛二命亡，介石统中国”的反动标语，许尚贤马上请人

写好“朱、毛坐江山，介石快完蛋”的标语，随即覆盖其上，气得敌人拿他没有办法。想捉拿他又有点胆怯，因为他的个头足有一米八几，身体强壮的像头牛，还会两下子拳术，年轻时曾与人打赌扛起过全挂牛车和一根三间房上的通椽。一次，保甲人员勾结国民党八二师捕捉他，被他纵身冲倒三、四个敌人，飞快翻过一条小沟，站在对面山上叫骂敌人。全国解放后，许尚贤听从党的安排，继任乡长、乡支书，工作更主动，革命热情更高，曾于1950年3月出席了甘肃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5年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年已高龄的许尚贤，锐气不减当年，带头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带头用大筐担粪，还同年轻人开展劳动竞赛。

1958年2月24日，许尚贤与世长辞，卒年74岁。

（曹清珂）

文 炳 衡

文炳衡（1913——1958），合水县西华池镇文家峡峁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变工生产、纺织织布、业余文娛活动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被合水县推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194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劳模代表大会。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文炳衡明里出任国民党的保长，暗地却与合水县保安科联系，曾传递过秘密情报。新中国成立后，文炳衡积极参政议政，曾被选为合水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农会副主席，并于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炳衡又在互助合作、植树造林、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新的成绩，于1950年9月出席了西北文艺代表大会。1953年评选为合水县优秀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甘肃省劳模代表大会，并为主席团成员。同年10

月1日，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和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1958年5月28日去世，时年45岁。

（曹清珂）

马 思 义

马思义（1911——1958），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人。

1961年，马思义领导的海、固农民暴动第三次失败后，遂带领200余人于5月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10日到达环县庙儿掌，不久，移驻合水县蒿嘴铺乡的上柳村。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扩充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同年7月，陕甘宁省委调马思义赴延安学习和深造，经过一个时期的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思义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也有大大的长进。在将要毕业的时候，毛主席和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亲自接见和宴请了他，并鼓励他搞好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骑兵团，马思义毕业后，即被任命为团长。马思义的骑兵团，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震惊和嫉恨，他们抓不到马思义，便将马的家属12口人用机枪射杀。敌人的罪恶行径和血腥报复，不但没有吓倒马思义这个革命军人，而且更加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坚定了革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1942年至1943年，思义又奉命两次去延安学习，回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团将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仅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中，他们在合水县太白乡瓦川口开荒种地2600余亩，实现了部队粮、油、菜、肉全部供给。由于马思义革命意志坚定，战功卓著，1945年8月，被光荣的吸收为中国共产

党员。

1946年8月，为迎接王震将军重返边区，马思义奉命担任迎王临时指挥部司令员。1947年8月，回民骑兵团改编为陇东分区回民骑兵团，马思义仍任团长。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了华池县红土峁峁、庆阳县二轱辘原、镇原县马渠、环县甜水堡等许多战斗，并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和指挥工作，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思义先后任定西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委第二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的1968年，马思义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享年67岁。

马思义虽然过早的离开了人间，但他那对革命的忠诚，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及对陇东人民解放事业的突出贡献，至今没有被人们忘记。

(合水县党史办供稿，陶兴范校写)

王 桂 兰

王桂兰（1900——1969），女，合水县青嘴乡胡家嘴子人。1934年春，国民党青嘴镇长刘崇德向她家摊派地丁银60块银元。由于家贫交纳不起，她公爹曾被刘崇德的爪牙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激起了她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1936年冬，新宁县三支队中队长石秀山受党组织的委托，发展王桂兰为地下交通员。王桂兰从此便开始了秘密情报的传递工作。1939年8月，她借去南义迎娘家的机会，探听到了国民党南义镇公所准备夜间偷袭中共青嘴区委的消息，便立即赶回，及

时向组织作了汇报，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1940年2月合水正式建立革命政权后，她仍坚持地下交通活动，兼做地方妇女工作。合水县政府曾授予她“模范交通员”、“支前模范”等光荣称号。1943年正月初5，王桂兰当选为肖塬区妇女主任。腊月，由区政府推荐她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大会，以纺织模范而受奖，并有画家为她画像一幅。

全国解放后，王桂兰永葆革命青春，带头组织妇女学文化，带头参加互助组，带头交纳爱国公粮，一直奔波到暮年为止。

（曹清琦）

唐 风 仪

唐风仪（1912——1978），甘肃省合水县西华池镇唐家老庄人。他，刚悍健壮，胆识过人，心直口爽，立场坚定。少时因家境贫困，常出外拉长工、打短工。成年后，虽经辛勤耕耘，但仍然摆脱不了困境，遂将三子送入。“双十二事变”后，红军民运工作团奉命来到合水，全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培养骨干人才，唐风仪积极投入革命行列，并与民运分团长赵连德建立了革命友谊。1937年9月，全县普遍建立自卫军，唐风仪担任了师家庄乡第一任自卫军连长，并于同一年经唐兴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顽固派制造陇东“摩擦”事件，国民党西华池区公所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共合作，瓦解区、乡自卫军组织。他们假借查禁大烟之名，于10日将师家庄自卫军连的骨干队员罗新贵等人抓去，欲解县城治罪。唐风仪闻讯，请农会主任唐兴财前往区公所辩理，交涉放人，国民党三区区长张志成表面依从，暗中却令区丁将罗等人自后门解走。唐风仪感到事有蹊跷，借口出去小解，尽快了解到了“人已解走”的确切消息。他心急如焚，忙

约集几个自卫军队员急追。追至三里店附近，将罗新贵等人截回。但一进西华池街道，复被张志斌早已布就的保安队劫走。面对狂妄之徒，唐凤仪毫不示弱，他一面严辞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一面派人回去集合全连队员。傍晚，数百名自卫军队员和农会会员，将伪区公所围了个水泄不通。次日凌晨，唐凤仪身先士卒，赤膊挥刀，踩着人梯登上城头，先将哨兵缴械。嗣后，猛扑土门，一刀劈断门杠，众涌似潮，势不可退，敌区长及吏员共5人束手就擒。自卫军共缴枪20余支，并查抄了区公所的所有公文及印信。后经三八五旅警七团团长袁翔与国民党合水县程大勋交涉，双方达成交换被俘人员协议方了。

自1940年起，唐凤仪先后担任二区和五区自卫军营长之职。由于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国民党合水地方当局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多次张贴“三鞭（指二区区长麻永藩、二乡教国会主席邵维藩和五乡教国会主席郭德）一凤（指唐凤仪），格杀勿论”的告示，悬赏缉拿于他。

解放战争开始后，以石秀山为大队长，唐凤仪等为副大队长的合水县游击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在各有关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广泛出击敌人，战绩、名声与日俱增。为颂扬这位英勇善战的游击大队副，当地老百姓曾给他编过这样一首顺口溜。

唐凤仪，是穷娃，百姓爱，敌人怕，立场坚定人人夸；

唐凤仪，不顾家，三九天，练刺杀，专为穷人打天下；

唐凤仪，胆量大，斗地主，降恶霸，敢揪白匪狗尾巴；

唐凤仪，是红煞，神不惧，鬼不怕，阎王见了也躲他。

1947年6月，合水县城战斗失利，中共合水县委、县政府奉命离境转移，国民党刘戡军一个加强营进驻太白，企图占山为王，不让我合水游击大队有回旋余地。7月初，上级党委命令合水党政军机关返回县境，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游击活动。唐凤仪带领80多名游击队员至苗村，与县长胡宗彦所率领的30多名

武工队员合兵一起。由唐凤仪出谋献策，于四面山头架设假炮，在川道燃起堆堆篝火，造成大部队已至假象，使敌望而退却，收复了太白全区。从此，合水县委、县政府和游击大队，扎根太白山区，与驻守前原地区的残敌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拉锯战。

1948年3月9日，唐凤仪、杨云山率领合水游击大队140多人，同店子区委书记吕建周带领的武工队相配合，于大山门痛击何天德还乡团。由于寡不敌众，使战斗打得不尽理想，但也震慑了敌人，显示了游击队敢与强敌拼到底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4月7日，石秀山，唐凤仪率领合水游击大队，于固城川击溃马继援八二师一个辐重连，毙敌2人，伤11人，缴回粮食180余石。

5月上旬，唐凤仪升任曲子县游击大队长。

全国解放初期，唐凤仪任镇原县长。1951年12月任合水县委书记。1953年以后，历任张掖大满公社书记，张掖县县长，张掖专区卫生局长、张掖地委统战部 长等职。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1978年10月11日，因病逝世，终年66岁。

（曹清珂）

杨 正 甲

杨正甲（1883——1945），合水县西华池镇杨家沟老村人。其父系晚清贡生，一生以教书为业。正甲由生在书香门第，但因家境清贫，幼时只跟随父亲读过《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书籍。1902年，他19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衰落，为

了养家糊口，他早起晚睡，一面种地，一面兼做卖板生意。经过7年的辛勤操劳，家中略有积蓄，便在西华池街边的营房子村购买土地五、六十亩，专门从事农业。1917年，杨正甲与父亲的同窗挚友阎麟瑞共谋兴教，将西华池初级小学扩建为高小（今华小之前身），由阎麟瑞任校长。这时，已34岁的杨正甲将自己年龄虚报为20岁，入学发奋读书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受阎之聘留校当教员。1924年，阎麟瑞病逝，群众推举杨正甲接任校长职务并兼任合水三区（西华池）校董主任。此时，他一面勤奋办学，一面兼顾农耕。每日鸡叫起床，穿一身破旧衣裳进城拾大粪，天明换成长袍短褂去学校上课。既培养了人才，又务了庄稼，学校越办越有名气，自己的家庭境况亦日趋上升，不但增购了耕牛，还新打了一辆木轮大车。

杨正甲先生一生乐善好施，凡遇农忙季节，若有人借他的大车用，常常是连套畜一齐借给，也不索取任何报酬；每当他看到一些赤贫户无米下锅时，常常是既给生的，又给熟的，也从不去讨还。1928年至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每遇难民们登门讨饭，正甲总以慈心相待，笑脸相迎，既供吃的，又送穿的，有时竟留宿数日，待恢复元气方让行。因此，赢得了乡邻们的好评，普遍称他是“慈悲为怀”的善人。

杨正甲原是国民党员，1933年西征红军经过合水时，他目睹了红军严明的军纪、热烈的爱国激情和旺盛的战斗力之后，深有感触的向学生们说：“红军必胜！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属于共产党的！”并随之宣布自己再不当国民党员。

1940年2月，共产党在合水正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杨正甲为了表达他对共产党的拥护爱戴，无偿地将西华池城内的一处庄基捐献给区政府办公。4月，他倡导在西华池小学附设了女子分校和成年扫盲班；本人兼任校长和带课教员，对于提高合水妇女的地位和文化素质做出了贡献。8月，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成立，

他作为陇东教育界名流，被当选为常驻议员。1941年9月，合水县参议会成立，他亦被聘为常驻议员，后当选为副议长。这年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光荣地出席了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的边区政府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1942年1月，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致力于合水的经济建设，他将校长职务主动让副校长方士秀代理。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合水县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在会上杨正甲先生即兴做了鼓舞人心的演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

1945年底到1946年初的第三次普选中，杨正甲先生再一次赢得了全体选民的信任，又当选为合水县参议会副议长，并连任边区政府参议员；在1946年4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他再次当选为边区的政府委员。大会向他赠送了边区生产的毛巾、大衣等礼品，正甲先生把这些礼物视为传家之宝，传给他的儿子，儿子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期。

杨正甲先生在边区各级民主政权任职期间，始终与我党同舟共济，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40年8月，他在合水县政府第二届委员会上，率先倡议修筑西华池通往延安捷径中的双柳树和东安畔两个土埝子，并首先捐款捐物。会后组织了建筑委员会，他亲任主任，四处奔忙，动员乡邻集资投工。这一工程完成后，免除了群众行路艰难和运输不畅之苦，不仅造福当时也造福后代。当地人曾树碑纪念，此碑至今仍矗立在双柳树大埝子北侧路旁。1942年，他担任西华池街道建设委员，亲自勘察规划，日夜奔波操劳。这个原来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点，在短短几年里就增加到300多户，沿街道修建起了一百五、六十家商业店铺，一改往昔萧条冷落的景象，成为陇东解放区数一数二的商业重镇，其中多有杨正甲先生的功绩和辛

劳。为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政府发给的校长薪水和粮食他分文不受，全部捐献给政府和学校；还经常带头捐款捐物，解决办学困难。1944年，杨正甲先生就带头捐款5000元，并上门说服动员西华池街道公、私商户集资47万元，为学校添买桌、凳，维修房舍，解决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这年7月，他到延安参加边区政府委员会返回家乡后，又带领群众认真落实边区政府开展文化建设活动的号召，很快在家乡办起了7所农民夜校，当年冬天又转为冬学，组织群众掀起了识字学文化热潮，使不少“睁眼睛”脱了盲。

1946年10月13日，杨正甲先生病逝，终年64岁。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为他赠献了“政教兼优”的黑绸挽联。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刘景范，特派陇东分区专员朱开铨为代表前往致祭；合水县党政军民数千人，在西华池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合水县委、县政府敬献了“早岁兴办教育事业为故里殚精竭智奋斗一生全县百姓共敬仰；晚年参加民主政权与本党合作建设积劳长逝边区万民齐哀悼”的挽联。这就是党和人民对杨正甲先生一生的高度评价。

（曹清河）

焦 怀 兴

焦怀兴(1905——1936)，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人，农民出身。

焦怀兴出生的三嘉原，是陕甘红军早期活动的根据地。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三嘉原打土豪、分田地，开展革命活动。这时就在焦怀兴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派杜宛、李尚勤、杜林治来五顷原发展革命力量，李尚勤主要活动在三嘉一带。在工作接触中，李尚

勤认识到焦怀兴出身贫苦，思想进步，靠得住，成为这里最早的积极分子。李经常给焦怀兴交任务让他多次到歇头西坡一带开展活动。焦怀兴能吃苦，敢担风险，能努力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1934年后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6、7月间，红二十六军在高凤坡战斗失利，有10多名三嘉籍的红军战士被敌冲散，后返回本地。三路游击指挥部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新正县第五支队，焦怀兴担任了指导员。10月间，焦怀兴率五支队配合底庙游击队粉碎了进犯歇头的国民党军的一个骑兵连。不久，五支队又利用一天黑夜摸入车家沟敌据点，歼敌2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

1934年冬，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领导正宁、宁县、旬邑、淳化等地的革命斗争，并向陕西省彬县、长武、耀县一带扩展。焦怀兴与赵红特、秦善秀等利用各种职业为掩护，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开展工作。

1935年，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关中特委派焦怀兴去宁县月明指导开展地方工作，筹建革命政权。他到月明后，及时和在这里活动的李德录、李积成、刘则振等取得联系，他们一起分析形势，确定行动计划，分头开展工作。先后在月明方园的佐家川、九槐、杨园子等村进行活动，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这些地方很快发展了一些革命力量，组织起了游击队。1935年11月新宁县委成立，焦怀兴担任了第一任县委书记，并兼任独立营政委。

1936年初，国民党东北军侵犯边区，其一部进驻正宁县于林子乐兴村。为趁敌立足未稳袭击敌人，焦怀兴率新宁独立营与新正独立营配合，奔袭乐兴驻敌。由于乐兴场是开阔地带，游击队不易隐蔽，于天黑近敌，但被敌哨兵发现，敌人蜂拥而击，反扑过来，战斗中焦怀兴中弹牺牲。他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苏惠民 彭晓东）

张 嘉 伯

张嘉伯（——1936），陕西耀县人，早期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渭华暴动的革命影响下，张嘉伯等人组织了耀县游击队。

1934年，张嘉伯率耀县游击队13人来到正宁县五顷原、三嘉原一带，和第三路游击队汇合，在旬邑、正宁、宜君等地打富济贫，逐步扩充力量，壮大队伍，开辟革命苏区。

1935年，国民党东北军进攻关中，当时新正县是关中的门户，也是通往陕甘边区的交通要道。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遂将新宁、新正、淳化三县分散的小游击队依次编为一、二、三个独立营，张嘉伯任新正独立二营政委。

1936年春，国民党东北军踏进关中部分地区，其一部进驻正宁县乐兴村。为迎头打击敌人，关中特委决定趁敌刚到，地形生疏，情况不清，由一、二两个独立营向敌发动突袭。

战斗中，张嘉伯壮烈牺牲。

（苏惠民 彭晓东）

卢 永 财

卢永财（1910——1936），出生于河南省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家乡遭受特大水灾，千万户穷苦百姓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卢永财的3个弟弟均被饿死，永财无舍可守，逃往异乡，流浪乞讨，来到正宁南邑一带打短工，后来定居在山大沟深的大河

盆村，开荒种地建家立业。

卢永财性情耿直，为人诚实，虽在异乡，但在当地百姓中产生了好影响。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三嘉一带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开创革命根据地。后来，党组织派杜宛、杜林治、李尚勤也来湫头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卢永财和杜宛等取得联系后要求参加革命。由于他的家住在山大沟深，榆林密布的西原大河盆村，离湫头只有几里路，因此，成了游击队和开展地方工作同志的联络点和情报站。为了革命同志的安全，卢永财的妻子，常以做针工汤站岗放哨。他的家便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指挥部。

卢永财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能够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杜宛常把卢永财等10多名青年组织起来，给他们布置任务，让他们秘密串联，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他成长很快，1934年，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卢永财入党后，受党组织的教育，成了斗地主，打土豪的骨干。一天晚上，他按照杜宛的安排，带领赤卫队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连夜到永和于家庄、翠宅两个村子打土豪，没收了很多东西，有牛羊、粮食、银元、衣服、布匹等。赶天亮，他们完成任务回到了五原原。银元作为开展革命的活动经费。牛羊、粮食等分给穷苦百姓。他们的举动打击了地主、富豪，长了穷苦百姓的勇气。

卢永财和郭洪超利用亲朋好友的各种关系，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湫头、山河、寺村等地进行活动，发展关系，与发展的关系配合，装扮成商人或做小买卖的，侦探情况，散发传单，在国民党内部制造混乱。他们还以武装小分队的组织形式，在国民党据点周围鸣枪，虚张声势，使国民党驻军不敢轻举妄动，下乡骚扰群众的行动大为收敛。

1935年，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根据游击队活

动的区域和控制的范围，决定将正宁县、陕西省旬邑县、彬县的一部分，建立革命政权，置新正县。8月，在峁子村召开新正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新正县委员会，卢永财当选为第一任县委书记。

在新正县委领导下，开展了土改工作。卢永财按照关中特委土改训练班和南峰村的试点经验，在特委工作组的指导下，首先在开展土改的乡成立了土地分配委员会，接一区三乡的西头、范家洼、南邑、吕家沟园、洼坡塄、峁子等村开始分配土地。由于组织健全，领导得力，使分配土地的工作进展顺利。接着又在全县扩大了分配土地的范围，在一区的二、四、五、六、七、八、九乡；二区的一、二、三、四乡；三区的一、二、三、四、五乡和刘家店行政村，七乡的恒安州、小义子、束朋3个自然村分配土地，并进行了土地登记、填发了土地证，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还在土改区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量划定了阶级成份。这次土改工作搞的比较彻底，大部分缺地、少地的贫雇农都分得了土地，土改工作的进行，激发了贫苦百姓的革命积极性。

为了保卫新建立的革命政权，扩大根据地范围，卢永财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对敌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同时，他也成为敌人的眼中钉，1936年3月的一天，卢永财在南邑、西渠一带开展工作，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湫头联保处姚秉辉带民团夜间抓捕，杀害于湫头镇。

卢永财参加革命虽仅四年，但为正宁根据地的创建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苏惠民 彭晓东）

寇 金 财

寇金财（1910——1938），原籍陕西省旬邑县。土地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父母兄弟在外流浪漂泊多年，后在甘肃正宁县史家头村落户。寇金财弟兄八人，他最小。

他的父亲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父亲和兄长长年给人拉长工，打短工，起早贪黑，辛勤奔波。

年幼的寇金财，性情耿直，好打不平，颇有点江湖侠气。他在拉长工时期，认识了文乐村的何炳政，他俩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情趣相投，对现实不满，常在一起议论政事，交成了好朋友。

1933年，国民党正宁县政府一帮团丁在文乐村催粮要款，闹得鸡飞狗上墙，村舍不宁。全村的青壮年逃跑躲避，父老乡亲挥泪求饶，这些团丁毫无人性，不但不退让，还扬言要血洗文乐村。一次，国民党县政府的团丁又来文乐村行凶，何炳政不惧强暴，带领10多名青年农民，一气之下杀死了5名团丁，用所得枪支在村北沟里的水围台成立了平子游击队，举起了革命的大旗。此事很快波及周围，寇金财闻讯后，奔赴水围台，参加了游击队。

1934年2月，平子游击队利用亲属关系，做通了国民党峁子联保处保长秦老四的工作。其后，内应外合，一天晚上由寇金财带领10多名游击队员，冲进联保处，缴获步枪2支，子弹数发，离开时，制造了假现场。国民党马鸿逵一部前往联保处增援，一看满地狼藉信以为真。

后来，斗争形势变化，平子游击队被改编为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第四大队。1934年3月，国民党马鸿逵部马瑞卿骑兵营骚扰岷头镇，四支队全体战士和底庙游击队配合，设伏袭击，击毙敌连长1人，缴获战马7匹，步枪3支，余部仓惶逃窜。寇金财在战斗中机智勇敢。4月下旬，马部一骑兵营驻防岷头，对三路游击指挥部造成直接威胁。为了消灭驻敌，四支队、耀县游击队和底庙游击队总体配合，寇金财担负诱敌任务，他带领战士诱敌至南邑塬，使敌陷入包围，打死打伤敌7名，俘虏16名，缴获步枪10多支，给马部以沉重打击。不久，撤离岷头。

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组建红一团，四支队被编为该团一连，寇金财任连长，活动在关中一带。在历次战争中，寇金财冲锋陷阵，当时国统区和根据地犬牙交错，小的战斗时有发生。一次，寇金财率红一连战士，在二支队的配合下，攻克了郭建功（号称七先生）驻守的底庙乡场城，收枪12支。

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以优势兵力，分三路“围剿”关中苏区。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为避敌之锐，保存革命力量，红一团及一、二、三个独立营奉命向陕西富县转移，时受陕甘省委军事部指挥。其后，红一团开赴安定县，归属二十八军，一、二、三独立营编为红三团。寇金财任该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改编后，他率部北上保安承担警卫任务。

1938年，红三团南下，在陕西省龙马高村，围攻敌碉堡。连攻一夜，终因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未克。第二天一早，国民党一个步兵团的兵力，在骑兵、炮兵的配合下，前来援救。寇金财旋即抢占有利地形，与援敌激战，一直战斗到下午，打得激烈残酷。敌后援部队又到，正当寇金财重新组织三团战士奋起反击之际，不幸中弹阵亡！部队只得撤出战斗。

寇金财从一个放羊娃踏上革命征途，在党的培养下，经过血与火的锻炼，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团长，战斗中亲临指挥，直至献

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8岁。 (苏惠民 彭晓东)

屈 则 声

屈则声(1910——1942)，原籍陕西省华阴县。1913年因天灾，一家逃难流落正宁县山河北沟定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河地区早期党的活动者和组织者之一。

屈则声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庄稼汉，在山河定居后，利用家在山河镇这个有利条件，置了一些日用小品，在街道摆小摊，以其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33年，23岁的屈则声除与父亲在山河摆摊外，还常挑担随当地的解红祥、贾富魁到纸头赶集。

当时的纸头一带，已成为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红军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在穷苦人民中纷纷组织赤卫军、贫农团，建立了五顷原乡苏维埃政府。

1934年春，屈则声经郭廷藩介绍，参加了革命。他利用挑担做小生意的身份做通讯联络工作。经过实际工作的考验，同年，屈则声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其后，党组织指示他在国民党重镇山河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屈则声接受任务后，采取亲串亲，朋交朋，物色对象，培养骨干，到秋季，首批发展了解红祥、闻春风、李文玉等4名正式党员，并成立了中共城关支部，屈则声任书记。

中共山河城关地下支部成立后，在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张振襄家中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们以各种身份为掩护，采取多种手段在国民党正宁县党政机关内部打探情况，索取情报，然后及时把情报送给红区党组织。

1934年，山河驻敌企图偷袭月明原，情报得知后，屈则声即派阎登榜将情报送给游击队，地方党组织群众迅速转移，避免了一场灾难。屈则声和张振襄经常接头，他得到的情报多而准，并能即时送给党组织。他还想方设法把游击队的标语张贴在山河城内，甚至撒在国民党县政府的院子里。一次，他通过小学教员张连青，将一份红军的传单放进了国民党正宁县长的办公室。引起全城骚动，但未露出破绽。

同年腊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南下途经月明原，派当地群众赵老九到山河，要见张振襄。张即和屈则声商议，屈派派地下党员阎登榜和解志荣买了2个骡子，驮了煤、红纸、毛笔、肥皂、手电等办公用品和日用品，并在驮物内藏了100发子弹当即送去。刘志丹接到物品后，很感谢他的支援，并回赠黑马一匹。

1937年2月，为适应“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在关中特委指示下，新正县和正宁县通过谈判的形式，划定各自的管辖界限，以减少冲突，消除隔阂，合作抗日。谈判中屈则声组织山河党员，一面做安全保卫工作，一面动员群众，并以防不测，及时了解国民党在正宁县的行动和意图，随时向新正县首席代表郭廷藩汇报情况，保证了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当时斗争的大局。为加强统一战线，动员全县人民团结抗日，1937年7月6日，中共新正县委决定与国民党正宁县联合成立正宁县抗日救国委员会，共同负责地方征兵支前、募捐粮草等工作。为使救国会真正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屈则声事先召开支部全体党员会议，争取共产党员在救国会内部的优势，于是，分头做工作，安排发言人。第二天，大会选举结果，当选的12个人中，10个就是支部预定的或做过工作的人。这是山河支部在友区公共场合的第一次

胜利。

1939年，中共山河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的注意，借口把屈则声扣押起来，但他们抓不住任何证据，又不得不释放他。之后，屈则声请示新正县委统战部，一度减少活动，保证党的力量不受损失。

1940年，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计划占领新正一区八乡张家坪的寺院做驻军营房，并在寺院北面山上修碉堡，假使攻之阴谋得逞，不仅直接威胁八乡政权，而且二乡西头和龙咀子随时都有被袭击的危险，因此，屈则声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新正县，新正县及时组织民兵连夜奋战，把寺院全部拆除，使敌人的计划落空。

1942年，屈则声再次被捕，审讯中他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捞到半点证据，最后还是以重大通共嫌疑犯，残忍地在山河城把他杀害了！

（苏惠民 彭晓东）

张 治 平

张治平（1872——1945），陕西省旬邑县后掌乡雷庄村人。

张治平一生从医，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当地颇受人们崇敬。

张治平经历了国民党的兴衰时期，对国民党的极端腐败愤愤不平，在他的家乡周围发生的事件，对他影响很大，促使其走向革命。1928年，由吕佑乾、许才升等一批共产党员领导的旬邑暴动，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建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权。虽然这次暴动被国民党血腥镇压下去了，吕佑乾、许才升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但是这次暴动为陕甘边人民的革命斗争树起了光辉

的旗帜。

在张治平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旬邑暴动中，张治平在校读书的两个孙子张化民、张化济也参加了。

国民党日趋反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1932年，刘志丹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原，前往旬邑的职田镇、后掌等地宣传革命道理，打开仓库救济贫民，张治平耳闻目睹世俗变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认识到改变黑暗的旧世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成此大事。他决心不仅治病济世，还以他高明的医术和在方园享有的威望为革命效力。

1934年，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后掌、阳坡头一带先后发展了十多支小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配土地活动，是年，还在雷庄第一次组织了秋收竞赛。一次雷庄村20多人在井地收荞麦，国民党部队何高团的一个营长领部队清剿，敌人一踏进雷庄就被游击队组织的秋收小组赶走了。第二天气急败坏的敌人又来到了雷庄，将收秋的人群包围了，拉走贫农团长、赤卫军连长和群众11人。为了挽救群众，张治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前往国民党方面交涉，经他的周旋，拉走的人全被放回。后掌、阳坡头一带是南区根据地的范围，国民党对这一地区很重视，视为“赤匪活动区域”，经常进行骚扰，以共产党嫌疑为名，乱抓、乱捕。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张治平为掩护革命干部，保护群众利益舍生忘死，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治平的革命行动对其家庭有很大的影响，使他的家成为革命的家、光荣的家，土地革命时期他一家参加革命的就有5人。

张治平为南区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42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1945年前季，张治平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同年11月1日，张治平在雷庄病逝。新正

县各界在雷庄隆重举行追悼会，500多人参加致祭，新正县政府送挽匾《革命医师》以示纪念。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后叛党）、习仲勋送了挽联，关中分区副专员杨玉亭代表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关中地委，专程前往致祭。

悼词指出：“张先生爱民爱党，值得每个边区人民学习”。
（苏惠民 彭晓东）

赵 宏 钧

赵宏钧（1910——1948），正宁县三嘉原乡东庄村人。

1933年，中共渭南地下党派党员杜宛、杜林治、李尚勤等在湫头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赵宏钧跟随杜林治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利用他是当地人，情况熟悉，亲朋广泛的有利条件，在三嘉原、湫头原很快串联了数十个穷苦青壮年成为先进骨干分子。由于赵宏钧工作积极，思想认识明确，同年就被组织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4年，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农民赤卫军、贫农团、农民联合会不断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也相继建立。为了开辟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范围，杜宛、张仲良等派赵宏钧同李进荣、郭自发等到宁县柴桥子、月明等地开展地方工作。他们到宁县后，紧密配合游击队，肃清这些地方的反动分子和便衣队，发动群众，组织起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团体，为后来新宁县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不久，赵宏钧又奉命回正宁工作，分配到旬邑县的底庙、彬县的水乐一带活动，向旬邑、彬县发展革命力量。赵宏钧到底庙后，和在那里正在进行地下工作的秦善秀等取得了联系，彼此密

切配合，在这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同时派地下党员到国民党保安团驻地进行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1935年2月18日，国民党陕西省彬县保安团驻永乐镇分团50余人起义，携枪80多支投奔红军，次日到达南邑，后转移三嘉原林家坡，被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四连。

不久，罗沟圈一带的10多名青壮年，自动组织起来，建立了北后游击队，在底庙永乐一带开展斗争，后改编为新正二支队。北后游击队成立后，在赵宏钧、秦善秀的领导下，于5月配合红一团一举收缴了底庙产场郭建功（号七先生）组建保甲的12支枪。后又用这些武器武装了新正七支队。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装力量的壮大，为基层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年秋，底庙区委和区政府成立，赵宏钧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底庙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赵宏钧带领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宣传群众，摧毁国民党的保甲组织，建立革命政权。使底庙区的范围向南扩大到店子河、西到永乐、北到麻院、东到安兴，方圆二三十里。1935年10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决定以底庙区为基础置永红县，赵宏钧任书记，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打通彬县通往边区的通道。

永红县成立不久，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在大敌压境的严峻形势下，永红县驻地底庙被占领，赵宏钧等党政干部转入地下活动。

同年后季，赵宏钧、郭振英在底庙开展群众工作，抓获了国民党底庙镇一捐款委员，经审讯，摸清了底庙的城防情况。于是，二支队十七支队与红二团配合，又收复了底庙城。

1937年春，赵宏钧奉命又着手永红县的恢复工作。永红县恢复建制后，赵宏钧任书记，副书记梁佐周。苏维埃政府主席梁文仪，副主席李振清。1938年，关中地委决定撤销永红县，恢复新正六区，赵宏钧又任六区书记，一直到1939年11月；1940年到

1944年，赵宏钧先后又任新正三区（长舌头）、一区（歇头）区委书记等职。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摩擦，不断挑起事端，向边区派遣特务，进行军事入侵，对边区进行破坏。赵宏钧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革命武装也有了进一步加强，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1948年7月初，赵宏钧在底庙于家庄村召集会议，研究布置工作时被叛徒告密，国民党正宁县王大牙、武金钟、吴得才、张笑通等5个中队分兵包围了于家庄村。在形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赵宏钧立即组织所有人员迅速向南沟突围。经过激烈的战斗，大部分人员突出重围，赵宏钧和少数人员不幸被捕。敌人对赵宏钧施行了残无人道的酷刑，用铁丝从他的两只手腕上穿透，拧成铁索拉回山河镇。

国民党正宁县对抓到赵宏钧这样一名共产党要犯，报以极大的希望，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将地下党一网打尽。县长朱门亲自出马审问，软硬兼施，可是赵宏钧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不但不招供，反而向朱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朱门张口结舌，成了被审问者。敌人恼羞成怒，对赵宏钧施行压杠子、坐老虎凳、抽皮鞭、下烙铁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可赵宏钧始终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残无人道的酷刑迫害，致赵宏钧遍体是伤，血肉模糊，多次死去活来。国民党正宁县气极败坏，但无法治服赵宏钧，决定将他押往平凉。押送途中，在宁县太昌赵宏钧惨遭杀害。

（苏惠民 彭晓东）

郭 存 信

郭存信（1902——1952），正宁县五顷原人。是杜宛、杜林治、李尚勤等在正宁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也是中共在正宁的第一个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

1932年，陕西省委派杜宛、杜林治、李尚勤来这里，和在这里活动的段老六一起开展工作。郭存信等青年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和杜宛、段老六等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走亲访友，秘密串联，活动在五顷原、湫头、三嘉、阳坡头一带。

杜宛是个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郭存信为了做好宣传工作，非常喜欢接近他，常在那里学方法。

同年3月，郭存信、郭廷藩、郭自发等在杜宛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工作。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发动平素熟悉的贫雇农。为了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郭存信、郭廷藩根据平时的掌握，领导贫苦农民首先在寺村原打了几户土豪劣绅，没收了部分浮财和粮食。当场把粮食和牲畜分给穷苦群众。使广大贫雇农及穷苦人民真正看到他们是为穷人撑腰的，他们的言行使群众容易接近他们。工作局面也就打开了。

郭存信在开展革命工作中，积极踏实，斗志坚强，因此，同年7月，首批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的发展，党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到10月，成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郭存信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有党员19名。

中共正宁支部成立后，郭存信充分发挥支部的核心作用，党员的骨干作用，和杜宛、郭廷藩在一起经常活动在湫头、三嘉、阳坡头一带。

他们活动的区域不断扩大，11月间杜宛、郭存信、郭廷藩带

领导游击队在宁县一带活动。在桃树湾诱击了国民党宁县庞明胜民团，打死打伤7、8人，俘虎10多人。还攻击了廖子拿土围子，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摧毁了巢穴，并打通了桃树庄通往上畔子的道路。历次斗争中，郭存信有胆有识，果断勇敢，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1934年2月，郭存信发动党员配合平子游击队利用亲戚关系，与国民党岷子联保处保长秦老田建立了关系，共同创造了联保处被袭击的假现场，获步枪2支，子弹数10发。

春季，张仲良在五顷原、孟家河、龙咀子一带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郭存信带领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土改工作，宣传发动群众，斗争土豪与恶霸地主，保证了土地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保卫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

郭存信在三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党员以各种关系各种形式发展革命力量，使五顷原周围的三嘉、阳坡头等地的十多个村庄。到7月，已发展党员70多名，大部分党员都能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站在斗争的前列。郭自发、何正兴、范新发分别当选为五顷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指导员，挑起了革命重担。

经过艰苦革命岁月的磨炼和锻炼，郭存信立场坚定，斗志顽强，有指挥战斗、领导革命的本领，能担负起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35年，被提任为中共淳耀县县委书记。1941年11月，根据工作需要调回新正县工作，当选为新正县人民政府县长。

在粉碎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障部队供给，支援抗战，郭存信带领全县人民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要求在生产季节，全县各级政府要把领导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奖

励模范人物，改造懒汉二流子，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组织互助合作，扶持移民生产自救等措施。由于各级政府认真负责，领导带头参加劳动，全县掀起了生产高潮。经过三年努力，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群众普遍达到“耕一余一”，机关驻军达到自给自足。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据1941年底在新正三区阳坡头村典型调查，全村38户，其中原有的15户贫农，3户雇农分别达到或接近中农的生活水平。

郭存信还身先士卒，率领全县人民开荒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解放日报》连篇报道宣传。1942年3月5日载：“新正县全县开荒3000亩，运盐1600担”；1943年11月19日又报：“新正县移民居多的马兰区共收获秋粮15523石，人均3石，除缴公粮外，全县夏秋粮达到了“耕一余二”。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1943年，新正县政府抽出一部分公益资金买骡子23匹，成立了驮盐运输队。县长郭存信亲自带领驮盐队到华池驮盐两次。郭存信这一举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解放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在郭存信的带动下，当年群众撤回驮盐资金52800元，1943年元至9月，全县驮盐出动牲口1200头（匹），撤回食盐4500驮，超额完成任务2900多驮。

1943年9月，调任中共山西省晋绥分区归绥县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副书记，直至1952年7月因病去世。

（苏惠民 彭晓东）

郭 进 亭

郭进亭（1913—1964），正宁县涇头乡塘子村人。

郭进亭自小聪明勤快，好学上进。小学毕业时已学到了一定

的文化知识，也悟出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因此，1932年他主动参加了在正宁五顷原、歇头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并在游击队负责人杜宪、杜林浩等人的帮助培养下，很快成为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1933年春，国民党马鸿逵部偷袭红军游击队，因兵力悬殊过大，游击队被围困在宁县金村庙原的山丘上。由于地形熟悉，夜幕降临后，郭进亭亲自带路，游击队集中火力，猛打猛冲，经过几个小时血战，终于冲出重围。为了打击驻歇头镇的马鸿逵骑兵营，郭进亭、郭廷藩带领红军游击队绕道冲入马鸿逵骑兵营驻地歇头阵，在马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击毙了仓惶应战的敌连长，其它敌兵纷纷逃命。这次短暂的战斗，夺得步枪3支，马7匹，彻底打击了马部的嚣张气焰。

1934年10月，郭进亭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6年7月，郭进亭当选为新正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国民党东北军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新正县一度被占领。东北军占领新正后，在新正县的歇头、西城、五顷原、三嘉、刘家店、歇坡头、文家川、阳坡头、职田镇、恒安州等地建立了11处据点。逐村逐户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实行连坐法。与此同时，当地地主、恶霸也纷纷组织还乡团，乘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在革命与反革命较量的严峻形势下，郭进亭同县委密切配合，领导各级党组织、县、区游击队打退了阶级敌人的多次进攻，保住了革命政权，保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936年9月，关中特委在赤水县七界石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顿扩大游击区，在行动上以“集中指挥、分散活动”为原则。并成立关中游击指挥部，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会后，郭进亭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在很短时间内，指挥游击队相继攻克了前马原、丰家沟、五顷原、刘家川、三嘉、西城、文家川等国民党军据点，摧

毁了保甲组织，恢复和健全了当地苏维埃政权。在此同时，发动群众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反水活动，追回了被地主、富农从贫苦农民手中夺回的土地和租子。相应的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第九次会议精神，县上及时纠正了过去几年中，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巩固了农村土改成果。

1936年12月，郭进亭被调到淳耀县工作。

1941年8月，郭进亭又调回新正县任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此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时期。但是，为了保障部队供给，支援抗日战争，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郭进亭同县委领导一道带领和发动全县党政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由于郭进亭等人以身作则，真抓实干，当年开荒，当年受益。仅1941年，新正县不仅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公草261,737斤的任务，而且还超完公粮36石，公草3,737斤，群众自愿卖给政府粮食8000石。基本解决了部队和机关的供给问题，也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

抗战期间，河南、山东、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的贫苦农民，由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大批逃往边区。郭进亭按照上级指示，对来新正的136户、365口难民都进行了妥善安置。为了使难民吃住有靠和恢复生产，1939、1941两年，郭进亭从县粮库给难民拨救济粮170多石，并且他还经常深入到难民中，了解难民的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郭进亭的这些举动，使来新正的难民深受感动。

全国解放后，郭进亭先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焉耆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查厅副厅长等职。1962年病世，终年51岁。

（苏惠民 彭晓东）

赵 德 荣

赵德荣（1913——1966），又名赵铁娃，正宁县三嘉乡锦章村人。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备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对旧社会有着满腔仇恨。他性情刚烈，有胆有识。小时常与同伙越悬崖，走陡壁，跑步爬山，黑夜翻墙，英勇顽强，无人能比，众伙称其“铁娃”。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三嘉原一带活动，赵德荣受其革命影响，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在红二十六军当战士。1934年2月，红二十六军在高凤岐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失利，赵德荣与部队失去联系，返回家乡。后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新正县游击队，同年7月，经乔占财、穆天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他担任新正县游击队队长，一次，赵德荣带领游击队奔袭陕西省的旬邑县城后，连夜急行军，撤往红河，回到三嘉原的南庄子村。他们刚刚落脚，旬邑县反动民团团长万盈山带着40多名团丁追来。在游击队北撤时，又碰上了迎面杀上来的正宁县反动民团。敌人发现游击队仅二三十人，人少力单，又认出了赵德荣，民团头子急了，高声喊叫：“谁活捉赵铁娃赏两千大洋！”，敌人两面夹击，游击队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赵德荣沉着机智，一面指挥队伍同敌人周打周旋，一面谋筹突围的办法。经过一天激烈的交战，到天黑时，双方均已精疲力尽。赵德荣瞅准机会，指挥着疲惫饥饿的游击队员虚晃一枪，把敌主力闪到两面，突然调头猛打猛冲，利用夜色迅速钻进山沟，突出了重围。时隔不久，赵德荣的游击队在底庙产场村抓住了一个下乡摧款的国民党民团团丁，经过审问，得知万盈山来到了底庙镇。他威逼这个团丁带路，又让游击队员装成抗款抗粮的饥民，机智的

叫开城门，擒拿了哨兵，包围了镇公所，活捉了万盈山。这一仗，俘敌30多名，缴获步枪20支，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1935年，关中特委决定组建关中游击总指挥部，赵德荣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正二支队。他指挥二支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三战三捷，威震陇东。一次，他们巧妙地引诱驻在取田镇（今属旬邑县）的国民党中央别动队进入关中游击队总指挥部设置的伏击圈，打死打伤敌人30多名，俘虏30多名，缴获机枪50多件。又一次，他们配合关中红二团二营，在寺村原合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个正规营。时隔不久，赵德荣奉命率支队攻打石家湾子敌碉堡，他们事先与堡内“内线”联系，里应外合，胜利完成了捣毁敌碉堡的任务。是年10月的一个晚上，赵德荣带新正游击队五支队袭击车家沟敌据点，他们瞄准目标，占据有利地形，迅速摸进敌堡，未放一枪，全俘国民党派头联保处自卫队员2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

抗日战争时期，赵德荣担任了关中警备一旅二团武工队队长。在关中根据地开展的“反霸除奸”斗争中，他带领武工队员积极活跃在红河两岸，先后处决了吴崇义、郭相堂、马宏德、豆生禄等大恶霸、地头蛇，既为当地人民除了害，又配合了边区的反“围剿”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赵德荣担任新正县游击大队大队长。1946年8月，国民党旬邑县驻敌一部进犯新正县边寨，赵德荣率领游击队英勇打击，消灭敌一个中队，俘敌53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50余支，子弹4500余发，焚毁手榴弹两箱。1948年春，国民党正宁县保安大队在翰林子马槽沟建起了一个兵工厂，上级命令赵德荣在3日内将其捣毁。赵德荣经过充分的考虑，派游击队员以给兵工厂干杂活的名义，巧妙地深入“虎穴”，摸清了厂子里只有12名机械工人，先子俊带自卫队一个班看守的情况。一天晚上，他和游击队员悄悄摸进了兵工厂，首先杀了先子俊，接着又用同虎

离山之计，骗走看守的自卫队员，然后把机器部件和枪支弹药等用牲口全部驮走。撤离前，又点燃火药库，使工厂顷刻化为灰烬。

建国后，赵德荣历任庆阳军分区警卫团某营副营长，正宁县宫河区、永正区区长，榆林子人民公社社长，永和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及中共正宁县委员会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惨遭迫害，于1966年7月5日含冤去世。终年53岁。

赵德荣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屡建战功。他的英雄事迹一直为陇东人民所称颂。曾受到中共关中特委表彰奖励2次，荣立大功2次。五十年代摄制的故事影片《红河激浪》和同期出版的中篇小说《红河丹心》就是以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写成的。

（苏惠民 彭晓东）

李 银 清

李银清（1911—1980），陕西省旬邑县底庙乡郭村人，农民出身，共产党员。

1932年，李银清参加了底庙区游击队，活动在底庙、永乐、三嘉一带。

1935年，陕甘边南区党委决定撤销新正六区（底庙区），以底庙为中心成立永红县，向长武、彬县一带扩展。李银清是永红县创建人之一。永红县一成立，他担任了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当时条件相当困难，县办公地点就设在李银清家里。永红县成立起来时间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攻陕甘边区，永红县党政机关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李银清以熟悉地理的有利条件，组织积极分子，秘密开展工作，依靠地头地下支部发展壮大党的

力量，动员骨干青年参加武装斗争，传递情报消息，护送来往行人，活跃在彬县、永乐一带，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1937年，永红县恢复，李银清继续担任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8年夏季，李银清患病回家，1980年病故。

（苏惠民 彭晓东）

郭 树 庭

郭树庭（1902——1984），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原回民乡南邑村人。

1933年参加革命。他参加革命正处在陕甘边区初创时期，党的一切活动还在地下秘密进行。由于刘志丹率部在正宁一带开展过革命活动，国民党对这里严加防范和控制，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年青的郭树庭认准了革命的路子，他坚信红旗能在子午岭上飘扬，为了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常常在生死线上冲闯。

1934年冬，陕甘边南区党委、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此期间，郭树庭担任秘密交通员积极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搜集、传递情报，他一身虎胆，经常孤身去北极、彬县一带。彬县是通往宁夏、平凉、兰州整个西北的交通要道，这里国民党部队云集，累有重兵把守。到彬县跑交通、搞情报，犹如龙潭虎穴之险。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和陕甘边区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挑重担，闯险关，搞回了大量重要、准确的情报，及时传送到领导机关，为南区党政组织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做了很多工作。

1935年，郭树庭先后任南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没收科长，新宁县财政科长等职。这一时期正值国民党东北军大肆进攻关中和陕甘边区，在大兵压境下，新宁县除三道川外，全境被国

军占领。严峻的形势致使陕甘边区各县财政陷于极端困难。由于东北军的严密封锁和占据，切断了政府和群众的直接联系。党、政权机关转移外线，郭树庭因家居南邑，地理条件特殊，奉命和留下的一部分同志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就地游击活动。他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和其他群众一道钻峭林，爬沟壑，和国军周旋，经常是风餐露宿，野果充饥。

1936年前季的一天晚上，新宁县县委书记秦善秀和老崔（县工作人员）外出，在康家原开展群众工作时，不料被国民党宁县庞明胜民团发现，于次日晨，突然袭击，秦善秀、老崔壮烈牺牲。郭树庭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冒着生命危险，买棺收尸，掩埋了烈士。同年后季，郭树庭调回关中特区政府工作。

1937年3月，郭树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关怀培养下，他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到来，更加积极为党工作。翌年，边区为减轻群众负担，精减机构，新正县政府与关中专员公署合并办公。郭树庭任新正县二科科长，兼任一科科长。他身兼二职，工作完成的仍很出色。

1938年，郭树庭受组织委派，赴延安中共党校学习。同年毕业后，回关中任淳 耀县二科科长，翌年又调任关中专署二科科长。

1946年，关中机关公署迁往马兰。郭树庭任专署 税务局局长，兼任银行行长，不久，又任关中贸易公司保管科科长、人事科长。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边区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尽职尽责，坚决执行中央和边区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多方增收节支，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

解放后，郭树庭任陕西三原贸易分公司副经理，1951年调任西北贸易公司人事科科长，1952年又代职去党校进修，毕业后，先

后在西北贸易部、陕棉一厂任副厂长，西北科学院兼备处任办公室主任等。1958年因病休息，1983年病逝。

郭树庭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信革命，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生活俭朴，为人正直，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苏惠民 彭晓东）

潘 远 志

潘远志（1911—1987），陕西省旬邑县张洪镇人，石匠出身，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中共党员吕佑乾、许财升领导下，发动了旬邑暴动，国民党旬邑县县长被处决。与此同时，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和渭北游击支队。

旬邑县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恐慌，彬县公署派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李到任后，首先带领军警、民团、土豪劣绅向革命政权进行反扑。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刘兴汉、郭金科等叛徒。因此，领导暴动的吕佑乾、许财升等一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暴动最终失败。

受旬邑暴动的影响，次年，潘远志参加了刘志丹的部队，并在陕甘边一带活动。

之后，潘远志同马明方等赴苏联学习，抗战初回到延安。不久，受组织派遣前往关中视察工作。在关中后，潘远志常随同新正县委政府机关在新正一带活动。

1938年4月，潘远志调任新正县委员会宣传部长。同年7月，新正县和关中专员公署合署办公，关中分区党委决定设中共新正县工作委员会，领导新正地区的革命工作，潘远志任宣传部

长。

陕西省属宜君县的双龙、上珍子两区，是关中通往中共店头办事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必经邮路，为了便于活动，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决定将此两区划归新正县属，设中心区隶属关中分区直辖，潘远志调任区委书记，在这里开展地方工作，更重要的是保卫这段邮路，保护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出入中共办事处和延安的安全。

1945年1月，新正县政府恢复办公，潘远志调任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科长。同年11月，他又提任新正县委员会副书记。

1948年11月，潘远志任新正县委书记。他根据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积极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为迎接全国的解放而努力。是年，国民党占领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距新正县边境仅数里的太峪镇，在一个早晨，食盐每斤由原来的一万元涨至一万五千元；棉花每斤由原来的四、五万元涨至七、八万元。为了排除其对新正的影响，稳定物价，新正县指示土产公司根据市场需要，及时组织了5个盐摊，3个棉花批发货场，以成倍低于国统区市场的价格出售或批发给当地商贩，使新正的市场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同年8月下旬，关中专署发出驱逐敌币的命令，潘远志配合县政府积极协助关中银行和贸易公司在边境集镇成立驱逐敌币委员会和辑私队，宣传、禁止群众使用敌币，并组织市镇商人拒用敌币，使边币流通量在市场上占到70%以上。

同时，以潘远志为首的新正县委、县政府，在解放区及时抓紧文化教育工作，及时恢复了旧学校，使其尽早开学。1948年，全县共恢复民办初小14所，公办完小1所，在校学生达到175人。

在全国解放的前夜，全力以赴支援战争，是革命形势的需要。潘远志发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支前工作，设立支

前动员委员会，具体负责战勤动员和组织工作。根据当时全县的情况，合理摊派，有人出人，有畜出畜，有物出物，有钱出钱。除负担繁重的临时差务外，各乡村都备有短期和长期担架队、运输队。一有战事，召之即来，随军服勤。号召和发动全县人民群众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支援前线。1948年4月，共出动担架130副，720余人，驮畜70头（匹），随西北野战部队出击宝鸡，参加西府战役。5月中旬，参加西府战役和陇东战役的西北野战部队集结马检地区整训，潘远志又发动全县干部群众全力以赴为部队运送粮草、碾米磨面、砍柴担水、护理伤员、缝洗衣服。10月，又出动担架41副，共324人，驮畜19匹，随主力部队参加陕西澄（县）、合（阳）等战役，服勤达半年之久。除此而外，还出动临时运输队先后向宜君、潼关、双龙镇、彬县运送军粮5500石。

1949年，先后出动担架70副，共350余人，驮畜40多匹，随西北野战军参加解放西安、陇南、兰州、青海等战斗的支前工作，为西北的解放作出了努力。

同年3月，潘远志患病不能继续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休息。1987年病故，终年76岁。

（苏惠民 彭晓东）

王 忠 信

王忠信（1912——1988），新正县一区八乡（秦家店子）人，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他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长期坚持地方斗争，凭着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1943年受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通令嘉奖，被命名为“神枪手”光荣称号。

王忠信，家境贫苦。自幼护禾狩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1931年刘志丹的革命活动给他心灵里播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拿起枪杆子，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贫苦老百姓打天下。

1933年，王忠信在父亲的支持下，参加了革命，当了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王忠信英勇善战，斗志坚强，曾先后任秦家店子赤卫军大队长，新正特务队战士、班长、民兵连长，一区自卫军营长等职。带领广大战士坚守在斗争第一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创下了不少的英雄业绩。

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乘中央红军主力东征之机，调遣优势兵力围攻关中苏区，新正县党政机关奉命转移。苏区被敌人占领后，到处编制保甲、拉伕抓丁，实行惨无人道的反动统治，闹得鸡犬不宁。

王忠信的家乡刘家店子就是国民党正宁县安插在苏区边沿的第一个联保处所在地。

一天，王忠信随部队从陕北转战回到新正吕家沟圈，这里下坡就是他的家乡刘家店子。晚上，他为了打探消息准备回家去一趟。当他摸黑回家后正碰上敌保公所抓丁编保甲。王忠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以“投诚”为名混进保公所抓来的18个小伙堆里，关在保公所一间房里。王忠信趁夜静更深，向大伙说明来意，串通大伙杀死了哨兵，抢夺了弹药枪支，一口气奔回吕家沟圈，18个人枪齐备，参加了部队，立了一大功。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故意制造摩擦，不断蚕食新正苏区。为了保卫苏区，打击敌人，新正县奉命在各区成立区游击队，王忠信被派任一区游击队长，活动在国民党正宁县和新正县交界处的湾子、秦家店、解家川一带。由于两军对峙，地形犬齿交错，大小摩擦不时发生，仅2至6月，先后发生大小战斗160多次，王忠信带领

一区游击队多次挫败顾国深，使之未能向苏区推进半步，边界群众免遭其害，王忠信被誉为“四大天王”之一。

1947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以3个旅的兵力“合围”关中，1月28日，新正县完全处在敌“合围”之中，情况异常严重。警一旅二十一团奉命集中山嘉前马原，准备向子午岭转移。这时，胡宗南一个团跟踪尾随。为了使解放军部队安全转移，新正县武工队奉命担任牵制敌人任务。王忠信当时在武工队，全队仅12人。

武工队隐蔽在敌人将要经过的一个险峻的隘口，队长李树森要求大家不能乱放枪，不能暴露目标，要凭借有利地形，做到弹无虚发，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任务交给王忠信执行，借着朦胧的夜色，王忠信隐蔽在暗处，等待敌人到来。当敌人到来时，王忠信施展开他百发百中的枪法，加之敌人目标大，队伍集中，他便一枪撂倒一个，搅得敌人懵头转向，一夜之间竟向武工队守卫的阵地发起6次进攻。但敌终因地势险峻，目标不明，情况不清，冲不上去，又摆脱不开武工队的袭击，最后只得发疯似的乱报销一阵弹药而龟缩一起等待天亮。

待到天亮，敌人攻上山头时，武工队早已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串山钻入丛林，这时警一旅二十一团也早已转移进入了子午岭山区。这一夜，敌人一个团败在了王忠信等12名武工队员手下，死伤在王忠信枪下竟达20多人，而武工队员却无一伤亡。敌人气得暴跳如雷，但没有一点办法。

.....

王忠信这个出身贫苦的壮汉子，聪明勇敢、机智灵活，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中，他凭着一颗忠心，一手精湛的枪法，有胆有谋，屡建奇功。在战争年代他的事迹曾在中央所在地延安被绘制成图片、连环画，挂在展览厅里、大街上，被广泛宣传赞颂，影响很大。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王忠信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曾悬赏一千块银元，通缉捉拿。捉拿不到，又采取抄家的卑鄙手段，毒打他的妻子和老父亲，妄想制服他。然而都丝毫堵没有削弱王忠信的斗志和旺盛的革命激情，只能使他心中对敌人仇恨的怒火越烧越旺。

全国解放后，他转业回家。虽然放下了手中钢枪，但仍担任着生产队、生产大队基层干部，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直到1988年逝世，终年76岁。

(苏惠民 彭晓东)

梁 文 汉

梁文汉，甘肃省正宁县永和乡罗沟圪村人，生卒年月不详。

1932年，梁文汉参加底庙游击队，在三嘉、南坡头、店子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1935年，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情况下，关中地委为了进一步向彬县一带扩展，决定撤销新正六区（底庙），10月以底庙为中心成立永红县，梁文汉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6年春，国民党东北军大肆进攻关中，在严峻的形势下，永红县工作转入地下活动。1937年，永红县恢复正常工作，梁文汉继续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至1938年永红县撤销。

解放后，梁文汉病故。

(苏惠民 彭晓东)

张有财 樊生奎

张有财（1906——1936），祖籍宁县南义寨子河，后迁居宁县金村瓦磨子居住。自小家穷，跟随父亲（人称张木匠）学做木活。1933年跟随刘志丹部当红军，后回家。1935年11月，宁县成立十八支队，张有财出任队长。

樊生奎（1913——1936），祖籍宁县湘乐镇南仓村，后迁居湘乐小塄子。1934年参加宁县一支队，历任班长、代理队长职务，中共党员。

1936年2月7日，张有财、樊生奎（时任宁县一支队队长）等5人组成便衣队奉命到湘乐南仓捕捉国民党保长余××（人称蛇头），与“清剿”苏区的国民党东北军遭遇，激战中，张有财、樊生奎等5人壮烈牺牲，时张、樊二人分别为30岁和23岁。

（杨有升）

崔 瑞 山

崔瑞山（1911——1936），生于宁县金村乡崔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辈手里，还在湘乐狼眼湾佃种当地大地主张寅（人称“半架川”）家的地。1935年入党，11月共产党在金村组建宁县十八支队，他参加该支队并担任指导员。1936年又调任宁县一支队队长。

1936年5月，一支队配合南路军（即曹力如率领的富县独立营）去合水县店子原攻打大土豪于连喜家的寨子，由于敌调来了国民党部队，在崔瑞山率部向安吉寨撤退时，又和一股敌人遭遇，

崔指挥队伍朝寨子南边沟里撤。撤到半山坡，寨墙上敌人不断打冷枪，崔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杨有升)

王 明 堂

王明堂(1902——1936)，生于宁县南义乡王家崖村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给人放羊、做工。1931年贩卖瓷器，于华池怀安结识刘志丹，并参加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底党在宁县组建第二十支队，王明堂任队长。曾参加过攻打麻子掌堡子、王乡的堡子、武进忠堡子、小石崖罗连城堡子及莲花池等几次战斗。1935年因东北军“进剿”苏区，环境险恶，支队暂时停止活动后，王明堂带领队员化妆成赶场农民，去陕西割麦，返回时沿途袭击了几个联保处，缴获许多枪支。1936年5月，王明堂带领支队攻打武洛堡国民党地方民团时身负重伤，于同月15日辞世，时年34岁。新宁县政府特命名三区(湘乐)为“明堂区”，以志纪念。

(马兴文)

王 占 义

王占义，(1910——1936)，宁县平子镇惠堡村南王沟圈人，少年时入私塾读书两年，青年时随父学过篾箩手艺。1934年秋，同刘永培、杨兴才等组织发起丰教暴动，后投奔红军被编为宁县三支队，不久加入共产党。1935年9月，同村一恶霸为霸占财产，扬言要向国民党告发王占义参加革命等情，被王占义带游击

队处死其父兄。同年新宁县政府成立，调任县警卫队队长。1936年初为反击国民党东北军的“清剿”，他调任宁县二十支队指导员。

1936年6月，在九岷康家原与国民党别动队（队长姓康）遭遇，战斗中腹部受重伤。战士用临时做成的简易担架抬他撤退时，他为了使其他战士迅速撤离战场，几次下令“不要管我！”并从担架上滚下。后敌人追来，支队撤退，王占义躲到路旁梢林中隐蔽。因流血过多，加上当晚一场暴风雨而壮烈牺牲，时仅21岁。为纪念烈士，新宁县政府命名一区（九岷）为“占义区”。

王占义死后，同村恶霸王占彪（国民党民团成员）施行阶级报复，带领民团包围王家，并杀王占义父兄二人。1939年冬，新宁县游击队除掉了作恶多端的王占彪，为烈士一家报了仇。

（杨有升）

柴 正 祥

柴正祥（1916——1938），宁县金村乡牌楼村人。1932年刘志丹率领陕甘工农红军途经金村原时他参加部队，曾在攻打合水老城关战斗中冲锋陷阵，立下战功。后升任陕甘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连连长。1938年耀县焦家坪战斗中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

（杨有升）

卜 风 鸣

卜风鸣（1911——1938），又名卜岁牛，宁县焦村乡西卜村人。年轻时务农。后因生活所迫，入冯玉祥部当兵，曾任连长。

1934年因不堪忍受上司的欺侮与虐待，遂带领部分士兵起义，投入红军，任陕甘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第三支队队长。作战勇敢，常深入敌占区活动，影响很大。1936年在宁县石鼓乡万原村邵家拓山养病时，被敌人探悉，遂遭包围，突围时负伤被俘，惨遭杀害，并将其头颅悬挂正宁县山河镇城隍示众，时年25岁。

（马兴文）

孟 玉 娃

孟玉娃（1907——1936），宁县平子镇孟家老庄人。1933年8月参加平子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游击队队长。1936年在小石川反“围剿”斗争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马兴文）

刘 玉 宝

刘玉宝（1907——1936），生于宁县平子镇半坡村一个贫农家庭。为谋生路，1930年曾在冯玉祥部一军当兵。后因不满其军阀作风，仍回家务农。1933年参加革命活动，同年8月在何炳正领导下组成平子游击队，并任班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编入红二团，先后任排长、连长等职。同年8月率部返回平子镇，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地方税官康辑奎等2人，为当地除去一害。1936年在陕西保安县作战时英勇牺牲，时29岁。

（杨有升）

乔 占 财

乔占财（？——1937），陕西旬邑县职田镇墪下人，（出生年月不详）。1934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关中特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两月后分配到新宁县任宁县一支队指导员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该支队编红军正规部队，乔占财即担任关中特区司令部独立营教导员。1937年春转入地方工作，任中共旬邑县保安大队副，不久在攻打梁庄战斗中光荣牺牲。

乔占财是一位年轻有为、机智勇敢的指挥员，他为创建和发展宁县的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在宁县工作的两年中，正值国民党加紧“围剿”苏区，战事频繁，环境十分险恶。在1936年时，宁县一支队先后4任队长都不幸阵亡，不少队员思想情绪低沉，有的甚至动摇，也有的产生急躁蛮干情绪，游击队面临着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乔占财强忍着与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牺牲的悲痛，沉着冷静，机智顽强地带好队伍，与后来的新任队长王秉祥一起同甘共苦，一起研究策略，汲取教训，瞅准时机主动袭击敌人。在观音、地儿庄、九坝桥子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从而使原来仅有13人的武装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敢打敢拼，地方士绅闻风丧胆的拥有200余人的游击队，终于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站住了脚。这与他和王秉祥的正确指挥、英勇善战是分不开的。

（杨有升）

刘 玉 财

刘玉财（1907——1937），宁县平子镇半坡村人。1933年参加平子游击队，任分队长。同年经张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随游击队编入红一团一连，任该连连长。1937年9月带领部队在陕西省黄陵县上珍子与耀县保安队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30岁。刘玉财作战勇敢，纪律性强，对战士关怀备至，深受大家爱戴。

（马兴文）

杨 宝 堂

杨宝堂（1911——1938），宁县观音乡观音村前咀人。1931年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欺侮，带头痛打了催粮款的狗腿子后投奔红军，在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当兵，历任班长、排长、中队长等职，1938年在马兰石门关战斗中光荣牺牲，时27岁。

（杨有升）

卢 希 宝

卢希宝（1914——1938），宁县湘乐镇瓦窑村纸坊人。1933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任关中分区第二团一连连长。1938年在陕西淳化县战斗中光荣牺牲。卢希宝牺牲后，2名八路军战士冲上去拉尸体，亦被打死。同乡老战友崔兆善将卢就地掩埋。

（杨有升）

杨 士 义

杨士义（1919——1941），又名杨义仓，宁县太昌乡申明村人。1937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军团二师二团三连当兵，同年8月随部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三营，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39年9月任冀鲁豫支队某部排长，在山东、安徽一带驻防。1940年任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团三营排长，驻防江苏盐城一带。1941年2月，在某独立团任连长，驻防盐城县岗门镇，担任警戒、训练任务。因士兵成份复杂，发生哗变，被叛变士兵杀害，时22岁。

（马兴文）

王 占 奎

王占奎（1911——1942），宁县金村乡崔家原人。1934年于湘乐入伍，后编入八路军留守陇东部队三八五旅，任该旅运输大队副大队长，1942年于延安失踪。1987年被宁县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杨有升）

杨 端 印

杨端印（1915——1943），宁县平子镇惠堡村人。1933年参加革命，曾任红三团战士、副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部队编

入八路军某部。1943年在安徽省阿角山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

(马兴文)

孟 爱 桂

孟爱桂(1920——1943)，又名孟兴元，宁县平子镇孟家老庄人。1933年8月因不堪忍受当地恶霸的欺辱，毅然离家，参加陕甘工农红军三路指挥部第四支队(平子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与游击队在平子镇活动，处决了在该镇收税的范老二等。曾先后在新正、新宁游击队当队员。1936年随游击队编入红三团，1937年8月编入八路军一〇五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三营，驻防陕北张家畔，绥德等地。先后任医务负责人及某营副营长等职。1943年东渡黄河赴抗日前线，同年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时23岁。

(马兴文)

栗 彦 功

栗彦功(1905——1943)，宁县石鼓乡董家村人，1935年7月于新宁县参加红军，后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部，任骑兵团某营教导员。1943年于陕西宜川战斗后失踪，时38岁。1987年被宁县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杨有升)

王 积 旺

王积旺（1901——1944），宁县石鼓乡铁王村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宁县独立营第三连副连长，1944年1月4日，带该连去春荣一带执行侦察任务，破坏敌人通讯设施，在割了敌人的电线准备撤离时同国民党宁县自卫队遭遇，战斗中胸部中弹牺牲，时43岁。

（杨有升）

付 侯 群

付侯群（1917——1945），又名付庚群。宁县良平乡尚新庄村付家河人。因家境贫寒，从少年时起给同村一豪绅家放羊。1936年红军游击队来当地打土豪，开展革命活动时，即参加红军，先后在红三团任班、排、连长，作战勇敢，深受战士尊敬。1945年在湘乐南仓颉子指挥战斗时不幸牺牲，时28岁。

（杨有升）

王 四 宝

王四宝（1914——1945），宁县春荣乡宁春村人。1936年9月在春荣参军，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某连连长。1945年在山西抗日战场上失踪，时31岁。1987年被宁县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杨有升）

杨 兴 才

杨兴才（？——1946），宁县平子镇巩家村人，1934年8月参加半坡暴动，遂为宁县三支队队员，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三支队队长。1936年初升任关中特区军事部独立一营（即新宁县独立营）营长，后该营改编为红三团，他编余后仍回新宁再任独立营营长，后在新宁县政府工作。1946年8月迎接王震的平子战斗中，县府派杨兴才、刘菊子、贾炳衡、刘德耀4人去半坡搞子弹，返回途中与敌遭遇，惨遭杀害。

（杨育升）

刘 治 兴

刘治兴（1916——1946），宁县盘克乡任掌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红二团任过副连长，1946年在阳坡头战斗中牺牲，时年30岁。

（杨育升）

邵 培 田

邵培田（1915——1947），1947年国民党派重兵“围剿”边区，时马家部队在地方土顽的配合下，对宁县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农历二月的一天，中共新宁县保安大队邵德察参谋、武工队队长邵培田等奉命在翻乐一带侦

察马匪活动情况，并追捕敌暗探一个说书老汉（张某，陕西乾县人）。当他们一行在湘乐纸坊村的三合沟活动时，被敌人包围在商德才家里。邵培田指挥战士封锁窑门，英勇还击，打得敌人不能近前，只能在院外嗷嗷嚎叫：“缴枪不缴枪”？邵培田站在门内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舍命不缴枪！”当武工队员子弹打完后，邵培田守住窑门口，准备以死相拼。敌人不敢近前，就往门内扔手榴弹。扔进第一颗，邵培田顺手抓起甩出门外，反而把敌人炸死了。当邵培田再去抓第二颗冒烟的手榴弹时被炸成重伤，昏了过去。敌人乘势一拥而进，邵培田和躲在炕食囤背后的其它几个武工队员不幸被俘。待邵培田苏醒后，发现自己落入敌手，仍骂不绝口。惨无人道的马家兵砍下他的头颅，背到宁县城挂在城门上示众。

邵培田小名兵娃，生于湘乐贺家台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个子不大，却十分精干。少年时靠卖柴草、牵棒度日。遭坏人抢劫后走投无路，于1934年参加了宁县三支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新宁县组建独立营，他担任第二连指导员。后独立营改编为红三团，他任一连连长，在瓦窑堡保卫过中央机关，较长时间在宁县坚持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因没文化而转到关中分区搞生产，到固统区卖大烟为革命筹集经费。陇东战争爆发后，他又调任新宁县保安大队侦察参谋，武工队队长。

他虽然过早的离开了人间，但他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杨有升）

田 德 奎

田德奎（1913——1947），宁县春荣乡昔家沟人。1945年参加革命，后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宁县工作委员会（即宁工委）武工队指导员。1947年收麦时节，田德奎带武工队在春荣一带活动，被孟生华（后被镇压）告密，国民党自卫队杨志平部抓获后杀在春荣官路上，时年34岁。

（杨有升）

王 玉 兴

王玉兴（1902——1947），宁县湘乐镇欠湾村东队人。1935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曾任新宁县第一区（九峡）区委书记，新宁县二中队队长，新宁县游击大队长等职。解放战争中局势紧张，他奉命撤驻马兰防守，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马兰城，战斗中王玉兴中弹从城上落下光荣牺牲，时45岁。

（杨有升）

杨 占 奎

杨占奎（1916——1947），小名同学，宁县石鼓乡万原村人，1934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先后在新宁县独立营、红三团一连当兵。1936年9月该连由连长尚清荣带领叛变后投靠了驻南义的国民党刘铁山部，7天后杨偷跑回来，寻找组织要求归队。

先在宁县地方上帮助一段工作，后归队到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一连当排长，解放战争开始后升任副连长。1947年8月九晚战斗中，他奉命率部在西北边阻击敌人。马匪从四面包围，该连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杨占奎也光荣牺牲，时31岁（撤尸时从身上找出一枚私人印章才确认）。

（杨有升）

杨 培 义

杨培义（1923——1947），宁县盘克乡罗候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警一旅三团一营副营长等职务。1947年在马兰战斗中牺牲，时24岁。

（杨有升）

陈 德 山

陈德山（1918——1947），祖籍陕西淳化，1928年大年懂中逃荒到宁县盘克乡前渠村董咀子落户。1937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三团某营教导员，1947年在山西省立阳县木通沟战斗中光荣牺牲，时29岁。

（杨有升）

赵 宗 岐

赵宗岐（1916——1947），又名赵补生，宁县新庄乡高马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工委武工队队长，率领武工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灵台县一带开展活动，宣传群众，影响很大。1944年12月8日晚，率领武工队打入肖金镇，没收该镇顽匪子收的大量现款。10天后又在西兰公路截获1辆国民党军车，缴获许多棉布和子弹，并顺利送回边区。1945年，武工队编为地下军，赵宗岐任副总指挥兼第一支队队长，活动于灵台、长武、麟游、凤翔等县山区。1947年冬，在收缴敌一军官的枪支时，与敌交火，撤退时不幸落崖致成重伤，抢救无效而牺牲，时31岁。

（马兴文）

宋 继 成

宋继成（1916——1947），宁县春荣乡三曹村人，共产党员。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宁县游击队指导员。1947年在春荣执行任务中同敌人遭遇，不幸牺牲，时年37岁。

（杨有升）

崔兆军

崔兆军（1920——1947），宁县湘乐镇小场村董家垣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曾任新宁县警卫队队长。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二营教导员，后调驻马兰任独立营营长，1947年在保卫马兰城的战斗中，该营与国民党军队激战几个昼夜，伤亡重大，退至新宁县象桥子时被俘，叛徒王得宽劝他投降，并封官许愿。崔坚贞不屈，遭敌杀害，时27岁。

（杨有升）

胡治德

胡治德（1922——1948），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在庆阳地区宁县一带广泛的流传着。这位战场上的大学生，具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

胡治德，出生于宁县登克乡胡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共产党员。小时在本村私塾和国民小学读书，1942年新宁县第二完小毕业后考入陇东中学，毕业后又于194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6年毕业。先后分配到边区供给处，关中师范工作，后又调回新宁县第三科（教育）当科员，1947年春战局紧张，调任新宁一支队指导员。象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边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但胡治德处处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决服从革命需要，组织分配到那里也就去那里，到那里就把那里的工作干好。

学生时期的胡治德，就以学习用功，尊敬师长，爱护同学而

受到人们的称赞。上小学时，他对同学亲如兄弟，乐于助人，十分和气。一次午睡，几个顽皮同学趁他睡熟时把他脸画得五麻六道，他醒后只是微微一笑了之。直到他上了抗大，还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本色与谦和温良的性格，见人一笑不说话，举止文雅而又落落大方，英气勃勃。战争开始后，他毅然穿上军装，上了战场，担任新宁县一支队指导员。这位大学生出身的指导员，爱护士兵亲如兄弟。他常说：“爱兵才能打胜仗”。一次有两个战士患病，医生诊断后说“急需青霉素，不然有危险”。当时边区极缺这种药，较近的白区正宁县城才有。为了抢救战友，他不加思索，当夜即带两名战士化妆成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翻沟到山河镇买青霉素，治好了两名战士的病。胡治德这种对群众，对战士实心实意的爱，真可以说是人民的“牛”。正因为他热爱战士，所以战士就更加拥护他。打仗时只要他一声令下，大家都奋不顾身的往前冲。新宁县一支队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新宁县地方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创造出显著的成绩，这与他 and 队长王君政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胡治德对人民忠诚宽厚如“牛”，在敌人面前他却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尤如猛虎。每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头。1947年夏，上级提出保卫夏收，他奉命带领一支队到白虎村伏击敌人。中午时候，敌保安队300余人进入一支队的射程内。一声号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双方展开激烈交战。关键时刻，只见胡治德从一战士手中夺过机枪，奋力向敌人射击。由于指挥得当，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12名，俘虏4名，缴枪15支，而一支队却无一伤亡。胡治德受到关中分区司令部的嘉奖。

1948年1月31日，新宁县一支队和十三支队奉命在盘克原打击敌人。晚上他们断了碗头幌子，南下到湘乐北川的李家庄宿营。不料当晚天下大雪，第二天早晨大雾，能见度很差。不知什么时候马家部队进了川。当房东女主人出门外抱柴禾时，发现敌人马

队已经进了村，转身惊呼“马队来了，赶快起来！”胡治德闻讯拉一挺机枪架在院外阻击，趁敌人向外退的间隙，一支队边打边往外撤；刚撤至王大岭的时候，又被从侧面迂回上来的敌人包围。胡治德指挥战士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受伤后被俘！丧失人性的马匪把胡治德五花大绑拖在马后，由王大岭拖到湘乐，又从湘乐拖到宁县，最后直拉到西峰。当时在湘乐有人见，胡的双脚已成血块，头上无帽，身上无衣，裤子仅留下个档；第二日有人在宁县东山见胡已成赤体血人，脚部磨完了，剩下个血疙瘩，面目不清，血淋淋的惨不忍睹，在西峰，胡治德被押在马家队伍的师部。敌人几次提审他，他虽遍体血肉模糊，但革命烈火仍在胸中燃烧，不论敌人怎样酷刑拷打，他都不供一词。敌人最后一无所获，便下毒手将他活埋于西峰，时在1948年2月16日。

胡治德牺牲时年仅26岁。他遇难的第二日，敌人还将“血报”贴到他家大门上。

（杨有升）

贾 生 玉

贾生玉（1921——1948），宁县九岘乡左家川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宁县游击支队队长，1948年2月29日在瓦子街战斗中牺牲。

（杨有升）

崔 连 城

崔连城（1911——1948），又名崔三宝，宁县南义乡寨子河崔家堡人。1935年冬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1945年任关中军分区司令部特务队指导员，1946年任旬邑县独立营营长，1947年任关中警一旅三团二营营长。1948年2月29日在著名的瓦子街战斗中，英勇牺牲，时37岁。

苏 德 荣

苏德荣（1920——1948），宁县石鼓乡苏家城人。1938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曾在新宁县保安队当班长、司务长、副官等职。后保安队整编为警一旅二团，部队北上山西，他与十几名病号留当地休养，康复后他将其带回关中，经当时在二团任二营教导员的陈德才推荐，苏德荣升任第二连指导员。1948年3月1日，在郃县的雨落坪战斗中光荣牺牲，时28岁。

（杨有升）

赵立贤 付得宪

赵立贤（1910——1948），宁县盘克乡衙西人。1943年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共产党。先任新宁县四区（盘克）合作社主

任，后任新宁县二科（财政）科长，最后调任县土产公司经理。

付得亮（1919——1948），宁县金村乡付家庄人。1935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宁县政府生产科科长。

1948年3月8日，赵立贤、付得亮、谢得理3人在金村的平道川香绣花楼一座烂庄子里结帐，被国民党马家兵包围，赵立贤组织3人突围，但出门不运，赵、付不幸中弹牺牲，谢因跑得快，跳进了3丈多深的水旋坑，上有蒿草遮掩，敌未找见而幸免遇难。

（杨有升）

王 三 绪

王三绪（1904——1948），宁县石鼓乡铁王村人。1934年参加宁县三支队，后改编为红三团，在三连一排任排长，并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开始后，任警一旅三团一连连长，参加九岷西岷战斗时，跳崖负伤。1948年3月8日，该部奉命在陕西白水县城南塔梁作战。因一连俘虏兵占百分之七十，士兵成份复杂，在战斗失利撤退时被自己队伍中的俘虏兵打死。当时全连除11人外，全部阵亡。

（杨有升）

刘 兆 德

刘兆德（1917——1948），宁县盘克乡段堡村刘家塔地人，小时务农，后参加当地赤卫军（民兵），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参加工作，先后任新宁县四区（盘克）形尺乡乡长，一区（九峴）保安助理员，四区民兵连长。1947年3月调任新宁县第十三支队（队长贾德寿）指导员。1948年4月12日，新宁县地方武装几个游击队同马匪骑兵在盘克燕介湾遭遇。因战斗失利，在向黄栗背后撤退时，警卫员马德周陷进稀泥里出不来，刘兆德返回拉时不幸中弹，肋骨断裂，不能行动，遂将手中双环马步枪交给胡兴普，令其撤退。敌骑兵冲到跟前用马刀在其头上砍，他用手掩护，十指被砍完，光荣牺牲，时31岁。

（杨有升）

雷 长 有

雷长有（1915——1948），生于宁县金村乡崔村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辈住在观音乡夜香沟，靠租种杨茂元的地度生。长有曾被国民党观音保长乔天彩以每月3斗麦的报酬叫去当保甲。1935年宁县一支队摧毁了观音保甲，雷被收编到宁县一支队当兵，不久，又调新宁县三区（湘乐）当民兵营长，后来自行回家。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雷长有参加合水县游击队，任一中队队长，其间，亲手并杀了肉祖哥老会张老九。1948年5月3日，在打合水县店子原于连喜寨子时，被国民党合水县保安队李鸿轩部打成重伤，在送往五亭子的途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时35岁。翌年11月，堂弟雷贵有掘回尸骨，葬于南堡子北畔。

（杨有升）

贾 得 全

贾得全（1917——1948），宁县金村乡原乐村人，共产党员，1936年2月参加宁县十八支队，同年4月转到宁县一支队，后改编到警一旅三团，先后担任排长、连指导员。1947年3月，为拔除驻扎在正宁山甲细咀子敌人据点，他率部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去“增援”取得胜利，智歼敌63人，活捉6人，缴获弹药十多箱。后升任该团一营营长并代理副团长职务。1948年7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攻克黄龙山观音桥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杨有升）

杨 志 清

杨志清（1926——1948），小名玉娃，宁县石鼓苏家城人。学生出身，聪明精干。1950年时杨志清不满14岁就到新宁县当兵，后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来新宁县开会，杨从此到马兰给习仲勋当警卫员3年，并加入了共产党。解放战争开始后升任关中分区警一旅二团二营二连指导员。1948年8月在宝鸡战役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仅22岁。解放后，习仲勋还给杨志清家写信慰问。

（杨有升）

雷 德 胜

雷德胜（1921——1948），又名雷江桥。宁县平子镇蒋邑村人。1946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地方游击队、红二团当兵。曾任红二团某连连长。为人忠诚老实，作战勇敢。1948年在宁县九岘阻击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7岁。

（马兴文）

王 世 祥

王世祥（1906——1948），宁县盘克乡街东村上店子人。共产党员，1933年参加革命，曾任过村主任、四区保安助理员、区长等职。1947年10月17日下午，王国李村他送公粮，当晚与区秘书闻生堡住在上店子祠堂里。18日吃早饭时，国民党班北镇公所镇长张彦虎带领16多人，勾结国民党合水县保安团李鸿轩部百余人，突然包围了上店子祠堂。听见枪声，闻出门看时，堡子上已站满了敌人。王世祥打了一枪，赤脚冲出院门，翻墙下到沟渠，因脚下全是悬崖，无路可走，被敌人抓住后杀害，并剥去衣服。

（杨有升）

张 树 成

张树成（1914——1949），宁县石鼓乡石鼓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曾在新宁县第五区（宇村）任区

长，后任新宁县统战部部长。1949年2月4日，被叛徒陈兴虎（解放后镇压）出卖，于金村平道川番绣花楼被马匪杀害。临死时，张树成视死如归，将自己的遗言写在一张纸上，交马匪贴在祖乐街上。敌人照办了，张的亲属因此得讯而搬回烈士遗体。

（杨有升）

张 登 华

张登华（1916——1949），宁县湘乐镇柏树底村常沟门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先后在新宁县保安队、新宁县游击大队第三中队任分队长、中队长等职。1949年4月29日，张登华三中队的30余人在石鼓乡干沟池与国民党宁县自卫队杨广明部发生激战。张登华指挥部队奋力抗击，腿部受伤后坚持不下火线，仍英勇作战，他说“有人就有阵地在！”但因敌骑兵来援，张腹部中弹，肠子都露出来了，待给一排长陈政华交待完战斗任务后就牺牲了，时33岁。

张牺牲后，陈政华指挥部队从石岭子方向撤走。他的遗体由佛堂群众王盼贵当天抬到洼子村，后由三中队战士转送到家中。

张登华在战争年代，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是新宁县游击大队部最得力的干部，他的死，给游击大队带来了很大损失。

（杨有升）

张 举

张举（1908——1949），宁县九岷乡川口人。1938年参加革命，在部队担任连长等职务。1948年在河南洛阳战斗中光荣牺

性，时40岁。

（杨有升）

权 镛 鼎

权镛鼎（1885——1953），宁县县城东沟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家庭较富裕，有地100余亩，但他不坐享其成。除种地外，还自学成为小炉匠，后来也兼做一般铁活，走乡串户给妇女做锥程子、捻线陀螺、纺线的锭子等，人都称他“权铁匠”，远近有名。儿子名叫积存，从小也学父亲的手艺，能修理“洋戏匣子”。这是一种新兴的玩艺，当时还不多，能修这种“洋”玩艺，手艺就算很不错了。由于这父子俩有这副好手艺，连国民党宁县政府及其保安团队的枪支坏了，都时常找他们修理。

权镛鼎性格开朗、豪放、随和。每年正月闹社火，他都积极撑撑子，乡下社火队进城，常常在他家聚会落脚，他都热情招待支应，帮助联系有关事宜，从不推辞。他还鼓励自己的女儿化妆参加社火表演，自己也常象个孩子一样放鞭炮烟火助兴。由于他是个热心肠人，所以人们都乐于和他交往。

1938年，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留守陇东的八路军进驻宁县城。从此权镛鼎与八路军指战员有了交往，受到宣传与影响，逐步懂得了爱国抗日与革命的道理，思想渐渐倾向革命。这种交往越频繁，他的思想越进步；越进步越接近八路军官兵，以至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在行动上也由开始为八路军修枪，转而发展到通报讯息，传送情报，由是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开始对他进行迫害。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陇东掀起两次反共摩擦高潮，在

当年12月发生的“宁县事变”中，国民党重兵将八路军三八五旅警七团三营包围在县城东山，情况十分危急。权镛鼎冒着生命危险，乘雨夜直奔上齐家，向陕甘宁边区新宁县政府报告了情况；新宁县政府又急报关中分区，派来了救援部队，三营才得以突围。在八路军撤退时，权镛鼎预知顽固派必将对他施加报复；同时更表示追随共产党、八路军的决心，便携带子女和工具，弃家随军一起撤走了。于是国民党当局抄了他的家，家具全部被砸烂，房屋被烧毁，树木被砍光，卧病在炕上的妻子也被顽固分子用枪托活活打死！儿子积存偷偷回来看望母亲时又被逮捕，后来幸被八路军救出才免遭一死。

从此，他们父子3人彻底成了革命的人，随军专门为部队修理枪械。他和儿子干技术活和重活，女儿就帮他们拉风箱烧火，还炼火硝做炸药，用火柴头做火炮等。遇有战事转移，部队就用骡马给他们驮运修理工具；情况紧急来不及驮运，他们就肩挑背扛随军行走，就连女儿腰间也插满了没来得及修的手枪。他们随部队10余年，踏遍了陇东、关中好些地方，停住时间最久的是合水、华池、太白、三嘉原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三八五旅的首长如耿飇、袁洲、汪祖美等以及地方上的很多领导干部都与他们有来往，关系如同一家。1945年在太白附近的刺沟驻地，一天权镛鼎和儿子面对面修枪，不幸枪走火，刚刚24岁的积存被打死。权镛鼎强忍悲痛，继续与女儿一起为部队修枪，有时忙得通宵达旦，汗湿衣衫。

宁县解放后，权镛鼎带着女儿回到老家，父女相依为命重新务农。1953年2月16日去世，享年68岁。为了不忘记这一家人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新编《宁县志》为他立了《传》。

（刘凤阁据《宁县志》改写）

何 聚 财

何聚财（1903——1975），宁县九岷乡桃树庄人，出身贫苦。何聚财于1934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35年2月参加宁县三支队，历任班长、代理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宁县成立后，任白区工作部长和警卫部长，奉命到平凉川、巴原、石鼓等地开展地方工作，筹建基层革命组织，为根据地的开创做了不少工作。后调任新宁县三、四区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他是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对工作认真负责，勇敢坚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多次率领游击队和支前民兵配合主力作战，奋不顾身。194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县，黄龙之前，他亲自在新宁县组织了200付担架，并和张兴华等同志一起将支前队伍送到马兰，受到关中分区领导的表扬。1949年夏，他又在地方武装力量小，问题复杂的情况下，果断的派罗金财等人去山河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宁县临近解放时，他在那家沟组织县、区、乡干部学习党的有关进城政策，任命了新区干部。6月27日宁县城解放，接到通知后他同县长罗金财率领新宁县全部党政军人员开赴宁县城，一方面安定民心，一方面着手有组织有计划地接收旧政权工作，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稳定了社会秩序。之后，又出色的领导了宁县的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他没有文化，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能领导好全县的各项运动，确实不易。1953年何聚财调任甘肃省农村部干部处处长，省农牧厅人事科长，兰州奶牛繁殖场场长，1965年编外休养，1975年3月去世，享年72岁。

（杨育升）

张 荣 德

张荣德（1906——1977），宁县九峁子房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张荣德是193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的。1939年因回家而脱党，1943年在关中分区贸易公司重新入党。张荣德一生对革命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和群众打成一片。历任九龙川党支部宣传委员，新宁县一区（九峁）苏维埃政府主席，新宁县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关中分区贸易公司运输队长，新宁县政府生产科长等职。建国后曾在中央党校西安分校学习，后分配到白银市筹备委员会农村局负责工作，1957年12月因年老体弱申请辞职回家。1977年病逝，享年71岁。

（杨有升）

王 立 成

王立成（1904——1983），宁县良平乡王新庄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靠给人放羊，卖柴度日。193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组织科长、区长、县长、县委书记、专署副专员、专员、地委副书记、书记、政协甘肃省常委等职。

王立成是一位生活俭朴，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久任公职而不失农民本色的党员干部。他参加革命后，曾为中共关中特委与陕西省委之间互相联系的地下交通员，常通往敌人活动中心——西安。因胆大心细，机智勇敢而一次次通过了敌人封

战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成为一名忠实可靠的革命者。1943年他任盘克区区长，一次去潘村征粮，一杨姓群众把他请去吃了顿羊肉，然后请求他给减少任务。王立成并不象别人那样“吃了人的嘴软”，反而坚定地说：“你家既有羊，就有粮，再加二石，如不按期交纳还要加。”他在新宁当县长时，一次给干部们分白布，每人一身，量到最后剩下不足2尺了，他笑着说：“能缝个袜子，算我的份。”由于王立成任职廉正，体恤百姓，故在建国后离新宁县长任之日，城乡民众欢送数里，一农民拦马哭道：“王县长，你是清官，你不能走……”；1963年恶狼为害，一次他去镇原路遇一幼儿被狼撕破面孔，奄奄一息，他急抱车内送医院抢救。他对下级要求严格并关怀备至。解放初“打老虎”时，庆阳专区某工厂一位厂长被斗争后押在狱中，当时王立成在外地住党校，归来后得知其冤，遂亲提审问。当证实其无辜后，王立成当即亲自解下该人的脚镣放在自己桌下，令其回狱听候处理。1965年夏，赤城、何家畔等地受雹灾十分严重，他赶到现场亲自组织救灾，调去36台拖拉机给群众无偿抢种，还解决了口粮和籽种，灾民感激地说：“共产党是救命恩人！”。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常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游击队掩护干部群众撤退。在1946年的平子“迎王战斗”和1947年的西华池战斗中，他领导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保障了物资和人力的供应。由于“积极负责，艰苦耐劳”，受到关中地委通令嘉奖。他身为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从不给予特殊照顾，坚决按原则办事。晚年，他常常感念老区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常说“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所以他经常解囊招待或资助远乡来访的战争年代的故旧。

王立成虽无文化，但他言谈风趣，说话爱用比喻，形象生动。“文革”中因用比喻解释阶级斗争，被人抓住“把柄”，无限上纲，受到批斗。“文革”后离休，1983年7月病逝西峰，享

年79岁。 (杨有升)

付 振 琪

付振琪(1905——1987)，宁县金村乡付家庄人。因其在弟兄中排行为三，人称付老三。家庭农民，本人终生务农。

付家是当地的富裕户，四十年代拥有70余口人，以“人财两旺”名闻东山。刘志丹率领的陕甘工农红军初在宁县东区活动时，曾受到付家的资助，付老三也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思想不断进步。在长期的战争年代，设在金村梁掌的新宁县政府和县委机关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封锁，经费十分困难。为了帮助政府度过难关，付老三除支援钱物外，还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为政府用“特货”换取所需物资，并将自家12条骡子编了个运输队到定边驮盐为政府筹集资金。西华池战斗后，他家去了3个人6条骡子随军转战到榆林、沙家店等地，时达半年之久，后骡子被敌抢去，付拒绝接受政府的赔偿。

付老三及全家为革命贡献大，事迹突出，当时边区和关中报纸上多次报导表扬过。他的母亲因持家有方，也受到边区政府表彰。1941年，新宁县政府实行“三三制”，付被选为县参议员及县政府财政科长，他因“家业大，又要管运输队”而未赴任。1946年8月平子“迎王战斗”中，他家设兵站，腾出窑洞8孔专为伤兵住宿。这次共接待伤兵百余名，全家几十人为此操劳。因炸弹走火，付家这次死2人伤3人。在支前工作中，他家每年交军粮几十石，军鞋上百双。机关人员或军队战士，间以整营整连的住其家食宿。付家当时编了个民兵排，先后有8人参军，2人阵亡……这些贡献，当然是作为家长的付老三领导组织得好。

建国后付一直在家劳动。为解决其晚年生活上的困难，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给安排了吃粮问题，给了生活补助费。1987年正月去世，享年83岁。

（杨有升）

孙 成 林

孙成林（1916——1936），环县洪德乡梁岔村人。少年时代在当地一私塾读书。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环县后，在红军的感召和宣传下，他毅然参加了革命，被组织分配到住在环县河连湾的陕甘宁省政府工作，不久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由于他工作积极认真，同年8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在执行任务途中被土匪杀害于洪德乡董家沟门，年仅20岁。

（明 生）

李 桐 英

李桐英（1921——1936），出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母早年投身革命，都是共产党员，因而他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1934年初，年仅13岁的李桐英，担任村里的儿童团长，他组织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干得十分活跃。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向吴堡县苏维埃区域发动了疯狂的反革命“围剿”，吴堡县的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坚持革命斗争。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李桐英仍积极投身于这血与火的斗争。他充分发挥自己年龄小、地形熟、不引人注目的有利条件，经常出没于敌人封

镇村镇，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不久，他就加入了青年团，是年冬又被破格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1935年二、三月间，李桐英担任了吴堡县团委儿童工作部部长，由于工作积极，儿童工作搞的出色，吴堡县被陕北团省委誉为儿童工作模范县。翌年2月，陕北团省委调李桐英到瓦窑堡学习，准备参加开辟新区的工作。李桐英到瓦窑堡后，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鉴于他的身体状况，组织安排他到吴堡县养病，而他坚决不肯，一再要求随军西征，参加开辟新区工作。在李桐英一再要求下，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李桐英就这样翻山越岭，步履艰难地来到甘肃，被分配到环县担任县团委儿童工作部长。

当时的环县，是红军主力西征新开辟区域，要做的工作很多，为了宣传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年仅15岁的李桐英不畏环境艰险，走乡窜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深得党组织信任。

1936年冬，土匪赵老五骚扰苏区，李桐英不幸被捕。在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活埋，时年15岁。

（民生 海明）

吕 风 山

吕风山（？——1937），环县洪德乡赵洼子村吕家湾人。1936年参加革命，时任胡家涧子区游击队队长。1937年2月，区游击队在哥老会反动分子张土奎、张风山的煽动下，于环城张北壕叛变，吕风山和县委军事部长王三才同时遇害。

吕风山虽然只参加革命一年多时间，但他带领游击队在胡家

洞子区境内清剿土匪达十余次，群众的财产得到了保护，政权得到了巩固。仲夏，正是羊羔膘肥体壮的时机，一天深夜，一伙土匪来抢羊羔，游击队正在开会，闻讯后，吕凤山立即组织前往埋伏，等土匪赶羊经过时，一阵排子枪，队员们高喊：“杀呀！打呀！”土匪吓破了胆，弃羊仓惶逃命，游击队乘胜追赶，土匪因天黑路生，有的摔坏了腿，有的蹭破了皮，拼命逃窜了。除此，吕凤山还遵照区委、区政府的安排，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老百姓过日子，使土豪劣绅再不敢为虎作倀。

吕凤山的革命活动在当地留下了很多的传说，人民群众对他的革命精神称颂不已。

（张海明）

王 宏 宝

王宏宝（？——1937），陕北人，约于1935年前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36年6月，随西征红军地方工作团来环县开展工作，时任山城区委书记兼红军山城兵站站长。1937年4月环县土匪赵老五率部偷袭兵站时，王宏宝为保护兵站物资而英勇牺牲。

（张世锋）

白 富 山

白富山（1908——1937），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乡高杰村人。1934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长等职，1937年10月在洪山县石湾与敌作战时牺牲。

（孙明生）

汪 思 学

汪思学（1917——1938）环县小南沟乡许家掌村人。1936年参加虎洞区游击队，曾任分队长。1938年4月，赵老五令其匪部缪福录、耿开帮率100余匪偷袭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河连湾。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保安队、警卫队大部分队员掩护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向东山转移，汪思学及少部分队员留下抗击土匪。战斗中汪思学不幸牺牲，年仅21岁。

（孙明生）

张 俊 录

张俊录（1902——1938），生于甘肃环县洪德乡新集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代，他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生活。进入青年时期他那豪爽、倔强性格从不屈服于别人欺侮，也下定了为穷人报仇雪恨的决心。1936年环县解放后，他毅然离开家人，参加了革命，开始在洪德区游击队工作。1937年9月环城区游击队同洪德区游击队合编为县警卫队后，张俊录任县警卫队队长。在此期间，他率领50余人的警卫队员担负着保卫县级机关，伺机出击小股土匪，打击其破坏活动，帮助建立区、乡政权的艰巨任务。1937年11月以县警卫队的一部分人员为主组建了环县保安中队，张俊录任中队长。这一时期张俊录带领保安中队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土匪、民团的破坏活动，为保卫区乡政权和人民群众安全生产做了一定工作。

1938年4月12日，盘踞在甜水堡的土匪赵老五命令其部下缪

张俊录、耿子平率100余名匪徒奔袭驻河连湾的县政府机关。敌人到河连湾后，先包围了县委、保安科和保安队，并放走了在监狱关押的百余名犯人。这时，由于敌情不明，大部分工作人员向东山撤退，只留下保安中队同敌战斗。由于敌众我寡，在弹药已尽情况下，保卫中队多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被匪徒围逼到几间房子里，匪徒在院子里又是打枪又是喊话，让他们交械投降。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被围队员视死如归，最后匪徒仅用柴禾和煤油将房子点着，张俊录等5名同志被活活烧死，他，时年36岁。

为了纪念环县人民优秀儿子张俊录，经环县政府批准，曾将他所在的新集子乡改为俊录乡，后又恢复原名。

（孙明生）

（孙明生）

黄 德 堂

黄德堂（1915——1938），陕西绥德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任环县保安中队指导员。在此他同保安中队长张俊录带领全体保安队员为保卫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打击土匪破坏活动做了一定工作。1938年4月，赵老五（赵思忠）匪部袭击驻河连湾的环县县委、县政府，他在同匪徒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5岁。

（明 生）

王 生 烈

王生烈（？——1938），陕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任环县保卫中队副中队长。

1938年4月12日，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赵思忠（赵老五）令其部下耿开帮、缪福录等100余名匪徒，从甜水堡出发，偷袭驻河连湾的环县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王生烈等人组织保安中队积极阻击敌人，赢得了时间，使县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安全转移，可是，王生烈等三人都壮烈牺牲。

（孙明生）

杨 贵 生

杨贵生（1915——1938），女，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有四人，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她们全家长年累月挣扎在饥饿之中。后来，父母双双得病无钱治疗，先后离开了人世。此时只留下她姊妹二人，相依为命。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她的家乡，点燃了她的心头之火，她就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踏上了红军长征历程，当时她只有18岁。1935年当红军长征路过固原地区时，由于她身体负伤，已饥劳成饥，组织决定留她在地方工作。1936年环县建政后，杨贵生调到环县妇联工作。翌年春她同环县保安科看守所所长王世兰结为伴侣。1938年4月，赵老五（赵思忠）令其股匪100余人偷袭环县县委、县政府驻地河连湾，她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转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19岁。

（王双位 孙明生）

高三德

高三德（1904——1938），环县洪德乡凉水湾人。1936年参加革命，初任胡家洞子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任虎洞区区长，1938年任洪德区自卫军营长。

高三德参加革命后，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克服重重困难，使防匪、打土豪等各项工作走在前面。1938年12月31日夜，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赵思忠（赵老五）率众300余人，从甜水堡南下环城，企图趁元旦之机袭击环县县委、县政府机关。高三德闻讯后，迅速派人急往二十里沟口指挥自卫军阻击，自己单身往附近的店房给县委写信报告情况。信还未写成，赵老五人马已冲将下来，包围了店家小院。高三德临危不惧，掏出手枪占据店房伺机射击敌人，赵匪不敢擅自攻入，在门外又是劝降，又是威逼。被高三德擦倒两个后，敌人恼羞成怒，一齐向内射击，高三德身中数弹，不幸牺牲。

高三德虽然牺牲了，但他和他的自卫军有效地进行了阻击，拖延了时间，这对保卫县委、县政府机关起了重大作用。

（张世锋）

王 佑

王佑（1920——1940）陕西省人，幼年时代，家境贫寒，饱尝了人间世道的辛酸。1937年考入陕甘宁边区师范学习达两年之余，他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尊敬师长，深得老师和同学喜欢。

1939年7月，王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奔赴陇东老区环县参加教育工作。当时被分配到陕甘宁省政府帮助建立的河连湾普小任教。艰险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使他退缩，而且激发了他为改变环县文化落后面貌的决心。王佑除了在校教学外，还担任冬学、夜校辅导教员，组织广大群众识字学文化并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使当地群众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1940年元旦拂晓，国民党委任的环县保安大队副赵恩忠（赵老五）率100余名匪徒袭击洪德区委和区政府驻地河连湾。王佑不幸落入魔掌。这伙穷凶极恶的土匪追问区干部去向，王佑拒不回答。匪徒施以酷刑要他变节投降，王佑大义凛然，痛斥众匪，宁死不屈。赵匪恼羞成怒，遂用铁丝拴住王佑的两根锁子骨，系于马尾，纵马狂奔，将王佑从河连湾一直拖到二十里沟口，致使他鲜血淋漓，肢离骨折，其状惨不忍睹，当地群众见状群集营救，赵匪竟令匪徒用乱刀将王佑砍死，并恫吓说：“谁要给共产党干事，就这样杀死他。”这位热血青年就这样被夺取了年仅20岁的生命。王佑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于1940年3月12日刊载题为《悼一位模范小学教员——王佑同志》的文章，记叙了他的英雄事迹。

（明生 双位）

朱 文 寿

朱文寿（？——1940），祖籍湖北人，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西征红军经过陇东时，朱文寿由部队留到陕甘宁边区环县开展地方工作。1938年9月任环县耿湾区区长。在当时武装斗争不断发生的艰险岁月里，朱文寿带领耿湾区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地方土匪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盘踞在当地的

一些匪徒屡遭失败后，还想作最后挣扎。他们一面造谣惑众，一面乘隙拉拢腐蚀自卫军战士。1940年1月，耿湾区自卫军终于叛变。他们首先杀害了自卫军营长，然后又去袭击区政府。当场绑架了区长朱文寿，老朱痛斥他们的叛变行为，这伙“恶狼”便用铁矛将他戳倒在地，肠肚流了一大堆。叛匪追问：“你还要不要粮了？还要不要兵了？”回答：“还要！”“你死了没有？”答：“没死！”。于是这伙叛匪就用棍棒将朱文寿活活打死。

（明 生）

李 嘉 诚

李嘉诚（1903——1940），四川省人，1936年随西征红军经过陇东时被留环县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至1940年1月任环县县政府二科科长。1940年1月，李嘉诚根据县委指示前往车道乡搞粮、扩兵工作。在完成任任务返回环县途中，遭地方土匪张廷杰俘虏。面对敌人利诱与种种酷刑，他立场坚定，宁死不屈，终被杀害，时年37岁。

（王双位）

黄 秉 治

黄秉治（1920——1944），环县合道乡周湾村人。1936年6月参加革命，曾任警三旅八团骑兵连连长。1944年2月在陕西定边与敌作战时牺牲，时年24岁。

（明 生）

田 雨 雷

田雨雷（1926——1947），祖籍河南人。他少年时代，由于家乡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战乱不止，加之灾荒肆虐，只得背井离乡，随母讨饭流落于陕北，后又乞讨到陇东合水县落户，靠拉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

1935年，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南梁一带活动时，红军宣传革命道理，处处为穷人谋利益的行为点燃了田雨雷心头的希望之火。只有参加革命，才是穷人的唯一出路。于是他投奔刘志丹参加了革命，经过党组织培养，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曾担任排长、连长等职。1942年组织派他到三八五旅教导营学习，同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在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他积极带头奔赴大风川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劳动竞赛中，田雨雷曾创造了一天开荒2.3亩的好成绩，被部队称为群英中的出色人物。1946年组织分配他到环县人民武装大队任副大队长。当时，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县武装大队主要任务是一面保卫群众生产，一面加强备战。为了解决武器短缺的困难，田雨雷负责熬硝，配制炸药，制造地雷。经过辛勤努力，终于试制成功，创造了自制地雷的奇迹。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陇东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根据县委安排，田雨雷率领一支以县人民武装大队人员和区、乡干部组成的50多人的游击队深入到县西北车道、毛井区开展游击活动。一次他们在车道区第三乡豆城子一带做群众工作时，突然遇到地方土匪张廷杰伙同国民党固原县自卫大队长海吉祥率匪300余人

的袭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田雨雷果断命令大部分队员向安全地带转移，而他亲自带领10多名游击队员占领了一个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击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10多人，掩护了大部分游击队员安全撤离。但他却身负重伤，当战士们要背他撤退时，田雨雷命令战士们：“不要管我，立即撤离……”当游击队员全部安全撤离后，他却含笑离开了人间，时年只有27岁。

（孙明生）

张 仲 海

张仲海（1911——1947），环县洪德乡私盐路村人，1936年8月参加革命，曾在环县保安中队任中队副。1947年任环县游击大队分队长。同年国民党马家军进攻环县，根据县委指示，他带领游击队流动作战，4月间在虎洞区半个城与敌遭遇，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明 生）

杨 贵 清

杨贵清（1905——1947），环县八珠乡安家沟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八珠区合作社主任，1942年8月任八珠区长。1943年春季，他组织了“运输合作社”，即动员群众有驴的出驴，有人的出人……然后依股分红，这个办法的实施，提高了运盐效率，增加了群众收益，活跃了农村经济。对此，陇东分区马锡五专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1936年4月任曲州市长时，他积极领导群众辛勤劳动，努力生产，一年时间，使全市人民吃粮基本自给，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由于杨贵清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工作，使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直至1947年4月随曲子县党政机关移住八珠时，病故途中。

（张海明）

李 向 华

李向华（？——1947），环县天池乡天池村小陡坡人。1935年7月参加革命，历任天子区自卫军排长、营长。1946年11月任八珠区区长，翌年4月任中共本钵区委书记。

李向华任自卫军排长、营长时期，多次领导自卫军打击来犯之敌，维护了地方治安，使人民生命、财产免遭重大损失。在任区长、书记期间，组织当地人民积极发展生产，较好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和游击队长李建成密切配合，遵照县委指示，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就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给了马家军严重的打击。5月10日，本钵区游击队与八珠区游击队在八珠原汇合开会时，因消息走漏，会场被马军包围，李向华与李建成在掩护游击队突围时陷入绝境，最后，他俩双双自尽于山沟的水洞里。

（张世伟）

李 建 成

李建成（？——1947），四川人，192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某部班长、排长。1935年10

月，红军长征路过环县时因病转业本林。1947年1月任曲子县本林区游击队队长。

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青海马鸿逵部八十一师侵占了曲子县，李建成与李向华奉上级命令，率领本林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打击马家军及地方反动武装的搜山活动。5月10日，本林游击队在八珠原杏树沟与八珠区游击队汇合开会时，消息走漏，游击队陷入马匪的包围之中，李建成率队突围时英勇牺牲。

（张世锋 张海明）

赵 廷 杰

赵廷杰（1911——1947），环县小南沟乡天子渠人。1941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环县毛井区自卫军连长、营长，1946年任环县人民武装大队部参谋。

赵廷杰在加入革命队伍后，曾领导区、乡自卫军平息匪乱，发展生产，保卫革命政权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受当地人民拥戴。1947年4月，国民党马鸿逵部占领了环县。为保存革命力量，便于同敌迂回作战，环县县委指示，将县武装大队分组四支游击队。赵廷杰协助县委副书记王保民领导环城区游击队。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整整清野，断绝马军粮草供应，瞅住机会，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保卫县委、政府机关安全。不幸的是5月10日，环城游击队在本林殷家掌开展工作时，被叛徒告密，遭马部一个背包团，突围时赵廷杰英勇牺牲。

（张海明）

秦 应 江

秦应江（1924——1947），环县洪德乡张原村人，1940年参军，先后在八路军警三旅、教导旅当战士，1947年2月任环县环城区游击队长。

同年5月间，马鸿宾部占领环县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领环城区游击队和县委副书记王保民、县游击大队参谋赵廷杰、县统战部副部长秦明等一起坚持地下斗争。5月10日，游击队在木钵股家掌开展游击活动时，被叛徒告密，游击队被马鸿宾部一个营重重包围，在突围中，秦应江光荣牺牲。

（张海明）

东 治 成

东治成（？——1947），河北人，西北野战军三八五旅侦察参谋。1947年5月在收复环县战斗中与宁马八十一师马敦静部激战时牺牲于环县城东原。

（张世锋）

苟 成 福

苟成福（？——1947），庆阳县土桥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任土桥区区长，1947年8月率土桥区游击队在蔡口集与国民党保三团吴丕玉部激战时英勇牺牲。

苟成福任土桥区长期间，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多次筹措粮食救济灾民，深受当地人民好评。1947年8月，蔡口集战斗打响后，土桥游击队虽处于被动局面，但在苟成福的正确指挥下，杀伤敌兵10人。最后，终因敌众我寡，战斗失败，苟成福在反击中英勇牺牲。

（张世伟）

赵儒恭 张宏斌

赵儒恭（1896——1947），环县环城乡鸳鸯沟村姚庄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洪德区委书记和环城区委书记等职，1947年任中共耿湾区委书记。

张宏斌（1916——1947），环县秦团庄乡王团庄村张富咀人，1941年参加革命，历任耿湾区自卫军连长和环县独立营三连连长等职，1947年任耿湾区游击队队长。

1947年9月29日早晨大雾，赵儒恭、张宏斌率区游击队在大寺原进剿土匪敬明君部时，遭敌包围，二人在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

（张世伟）

张 德 全

张德全（1915——1947），环县洪德乡赵洼子村人，1936年10月，红军西征途经环县时参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八五旅班长、排长等职，194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八五旅五团三营七连连长。

在解放大西北的各个战斗中，张德全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47年在陕西丁字房战斗中，参战的解放军某部一时陷入被动状态，上级决定立即转移，并令张德全率领七连担任掩护任务。张德全和他的战友坚决服从命令，拿出了全部看家本领，吸引了敌人的重型火力，保证了大部队安全转移。“当完成任务准备撤出战斗时，张德全却受重伤，英勇献身，时年32岁。

(张海明)

张 广 有

张广有（1916——1947）环县合道乡辛坪村人。1936年参军，曾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等职。1947年在庆阳驿马关同国民党马家军作战时牺牲，时年31岁。

(明 生)

吴 朝 怀

吴朝怀（1916——1947），环县芦湾乡大堡条村马王庙人。1936年参军，1939年任环县保安大队二中队队长。

1939年12月31日夜，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赵老五（赵思忠）率300余匪，从老巢甜水堡长驱直入环城南关，趁元旦之机偷袭环县县委、县政府。翌日拂晓，赵老五兵临城郊，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吴朝怀立即指挥二中队迅速进入碉堡反击。赵匪仗着人多势众，疯狂地向碉堡发起冲锋，吴朝怀沉着指挥，等敌人再进时，命令战士们抛出手榴弹，跑在前面的匪徒被炸得血肉横飞。后面的匪徒仍喊着叫着，向碉堡冲来，突然，赵老五的乘马

又被击倒，扑倒了兩下就死了。这时匪首赵老五怯阵，敌匪顿时大乱。吴朝怀趁势高喊：“弟兄们 冲啊！”随着喊声，他第一个跃出碉堡，率领战士们杀向敌群，一阵猛冲猛打。赵匪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中队战士乘胜追击至河连湾附近。这次反偷渡战斗有力地挫伤了赵匪锐气，并毙伤匪徒30多人，缴枪10余支，子弹300余发。之后，环县保安大队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通报嘉奖，并授予“保卫环县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环县保安大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警三旅，吴朝怀任警三旅七团二营五连连长。吴朝怀率领五连跟随大部队南征北战，在多次战斗中荣立殊功。1947年，在攻打淳化的战斗中，吴朝怀连队担任主攻任务，他组织火力炸掉了敌人的几座碉堡，为主力部队前进扫清了道路。但正当部队向前冲锋时，座落于一个小山岭半腰的暗堡射出了疯狂的子弹，敌人的几挺机枪隐蔽于其中，交叉向冲锋部队扫射，部队冲锋霎时受阻，吴朝怀十分焦急。这时上级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端掉碉堡，以保证大部队迅速占领淳化。吴朝怀率领两个战士，冒着密集的子彈，向敌碉堡匍匐前进，突然身上中弹数发，血流不止，英勇献身。

（张世锋 张海明）

崔 世 雄

崔世雄（1912——1948），环县甜水乡甜水街人。1941年参军，1948年2月在陕西瓦子街战役中与敌作战时牺牲。时任西北野战军某部连长。

（张世锋）

苏 近 明

苏近明（1915——1948），环县车道乡元柳村人。1939年参军，曾担任班长、排长等职。194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三旅七团三营八连连长。同年10月，参加了韩城、宜川战斗。1948年3月1日参加了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的瓦子街战役，在近八个小时战斗中，全体将士英勇作战，共歼敌3万余人。苏近明就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明 生）

朱 维 汉

朱维汉（1923——1948），生于环县洪德乡河连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3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洪德区自卫军连长、游击队分队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带领自卫军、游击队同赵老五（赵思忠）、敬明君、李阳珍等股匪进行过大小数次较量，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区、乡革命政权做出了一定贡献。1948年5月他随同环县县政府工作团赴罗山乡大树原动员群众开展征粮工作时，被股匪李阳珍部下用枪击伤后，再用枪柄活活打死，时年25岁。

（孙明生）

崔 学 仁

崔学仁（1914——1948），环县车道乡陈掌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镇原县游击队班长、连长等职。在当时艰险的斗争环境下，他带领游击队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做了一定工作。1943年6月他带领游击队在镇原殷家城一带活动时，被敌杀害，时年34岁。

（明 生）

马 宇 民

马宇民（？——1948），祖籍河北人。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陇东独立团、陇东十三团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48年3月，马宇民带领十三团一营与曲子县二中队密切配合，在庆阳桐川同国民党桐川乡自卫二大队王世五部进行战斗，毙伤、俘敌4名。同年10月根据陇东分区指示，陇东十三团等部队向环县西北部毛井进发，消灭驻扎在毛井区高家洼国民党卡德荣部。当部队行至车道乡王西掌一带集结时，侦察人员报告，敌人已窜到苦水掌、赵家渠一带。于是马宇民同部队其他负责人经过周密分析、商讨，决定当晚给驻扎在赵家渠之敌以重创。部队经过30余里急行军，深夜已到达目的地，马宇民带领一营担任主攻。他们首先包围窑湾子之敌，经过四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敌军100余名，缴枪10余支，但马宇民不幸阵亡。

（明 生）

吕 文 光

吕文光（1915——1948），出生于环县洪德乡赵洼子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6年参加红军，曾担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

1937年7月，吕文光所在的八路军三八五旅五团三营在镇原县太平镇与当地土匪发生战斗，不经一击，土匪便溃逃而去，但在途中将正在独自执行任务的三营通讯班长柳如去了。在这紧急关头，吕文光急中生智，和几个战士装成农民模样，背筐里装着苹果，下面藏着武器，他们转悠到土匪休息的地方，土匪见了苹果自然高兴得很，便大吃起来，吕文光和几个战士迅速拿起武器，朝敌群开枪，当场击毙了几名敌人，剩下的仓惶逃跑，救出了通讯班长，受到了部队嘉奖，吕文光也荣立一等功。同年3月，在陕西永寿战斗中，吕文光作战顽强，又荣立二等功。

1948年4月25日，西北野战军一、二纵队在攻占了旬邑、职田、肃清了长武、淳化之敌后，向宝鸡发起进攻，宝鸡守敌在七十六师师长徐保指挥下顽抗，等待援军。经过一昼夜激战，终于攻克了宝鸡，这次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师长徐保被击毙，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吕文光在这次战斗中率领七连担任突击攻城任务，表现顽强，战绩辉煌，再立一等功，被团部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1月25日，西野主力向国民党七十六军发起攻击，首先歼灭了洛河两岸桥头堡的国民党二十四师，解放大军顺利到达永丰镇，并很快歼灭了外围敌人。28日，敌七十六军被重重包围于永丰城内，而近邻与七十六军配合的国民党九十军早已逃之夭夭，七十六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抓住战机，全歼敌人，解放

军遂向敌人发动强大攻势。在这次战斗中，敌军长李日基被俘，吕文光不幸牺牲。

（张海明 张世锋）

王 正 智

王正智（1917——1948），环县曲子乡楼房子村碾子沟人，1936年7月参军，曾任西北野战军某部三旅五团三营八连指导员。

1948年11月25日，西北野战军顺利到达永丰镇，向永丰周围国民党军各据点发起进攻。28日，国民党七十六军被包围于永丰城内，王正智所在部队在史银璐率领的曲子担架队的配合下，挖地下通道，准备云梯和木板，为正式打城做好了准备。28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利用黑夜，将永丰镇西门北侧的城墙炸开，攻入城内。但王正智在激烈的巷战中，不幸被敌射中，光荣牺牲。

（张海明）

马 万 召

马万召（1918——1948），环县芦家湾乡小堡条村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曾担任过独立五团炮兵连连长，1948年在陕西五亭子与敌作战时牺牲，时年30岁。

（王双位）

常 如 斌

常如斌（1924——1949），环县何坪乡沈家岭村人。1942年3月参加革命，曾在环县人民武装大队任分队长。1948年担任环县游击大队机枪排排长。1949年3月他带领机枪排在小南沟乡一带执行任务返回途中，与土匪敬明君、汪兴明率领的300余名众匪相遇，常如斌指挥游击队员同匪众进行了数小时战斗，打退了敌人进攻，但常如斌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明 生）

刘 怀

刘怀（1925——1949），环县环城镇十五里沟村人。1943年入伍，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总指挥下，向盘踞在兰州的国民党马步芳等部发动强大攻势。刘怀当时担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某团团长，他率领全团将士在攻打狗娃山之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明 生）

宁 良 仓

宁良仓（1922——1949），甘肃环县环城镇宁老庄人。192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9年5月参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班长、连指导员等职。1948年参加了著名的太原

战役，由于他作战勇敢，荣立“二等功”。1949年8月宁良仓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役。当时担任某部七团三营三连指导员的宁良仓，同连长亲密配合，率领全连战士英勇作战，攻下了敌人一道道堡垒，尤其在攻打沈家岭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战斗中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7岁，后被该部队追记为“特等功”。

（明 生）

常 廷 栋

常廷栋（1923——1949），环县虎洞乡高龚原村人。1942年1月参加革命，曾任连长等职。1949年12月于临夏韩家集作战牺牲，时年26岁。

（孙明生）

吴 生 华

吴生华（1925——1949），环县翟水乡何原村人。1936年7月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跟随八路军曾参加过大小数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八五旅某营营长。1949年国民党青（海）马八十二师侵占东华池、元城等地，吴生华奉命率领全营战士前往华池阻击，在当地民兵的积极配合下同马家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在作战中中弹牺牲，时年24岁。

（明 生）

虎 居 堂

虎居堂（1915——1949），环县东道乡魏注村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曾在环县保安队、游击队工作。1948年甘工委和陇东地委决定成立海固工委游击队，虎居堂任游击队副队长。1949年他带领游击队在固原王洼子剿匪时牺牲，时年34岁。

（明 生）

杨 生 荣

杨生荣（1896——1960），女，出生于环县耿博乡虎儿坪村一个农民家庭。17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本县环城镇十八里村青年农民杜万忠。1933年西征红军解放环县后她参加了革命工作，始任环城区二乡妇代会主任，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群众举为环城区十八里村村长。1943年10月当选为环县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又被群众推举为优抗委员。作为环县第一位女党员和女村长，她对革命事业一丝不苟，对人民群众满腔热情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推崇。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环县不仅自然条件十分艰苦，而且传统势力也相当落后；就妇女放脚一事，与民国初的剪辫子相比其难度阻力之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帮助广大妇女冲破封建陋习，她便从自己家庭带头做起，她同儿媳首先放了脚，孙女一概不缠脚。在她的带领下，环城区十八里村的妇女普遍放了脚，女孩子不再缠脚。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她积极响应县、区政府号召创办冬学、夜校，组织群众开展扫盲识字活动。她的次子杜学

功就是经过冬学、夜校扫盲后考取陇东中学的，她本人经过参加冬学也识了许多字。

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杨生荣率先响应，仅1942、1943两年内，他家就开荒地50余亩，加上历年分得的20亩地，共种粮田70余亩。在种好庄稼的前提下，她还带领全家发展养殖业和多种经营生产。1943年羊只发展到80多只，还饲养着4头大家畜，并养有猪、鸡等畜禽。杨生荣在自己发展农副业同时，还带领全村群众发展副业生产。她所在的十八里村大力发展养鸡，曾受到环县妇女联合会的表彰。杨生荣出色的工作成绩和模范行动，赢得了党和人民赞誉。1943年她家被环城区委树立为“勤劳致富户”，同年，她本人也被中共环县县委和中共陇东地委授予“模范党员”和“模范妇女”光荣称号。翌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全边区妇女向杨生荣学习，《解放日报》曾撰文报道了她的模范事迹。从此，这位“生产能手”、“模范妇女”的光荣事迹在陇东乃至边区广为传颂。

党和政府的表扬和奖励，促使她日后更加勤奋工作。用她自己话说：“县委、县政府花钱买东西奖励我，真不敢当。日后我要更加劲工作，用劲生产，使光景过得更好。今年政府发动我们生产，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大家要勤奋才成。”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援前线，杨生荣动员全村妇女仅为部队做军鞋300余双。

全国解放后，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杨生荣虽不在担任村长职务，但她当年为人耿直，能说会道的行为仍被当地群众所尊崇，仅担任村里的“义务民事调解员”。1960年4月，杨生荣病逝，享年70岁。

（孙明生 康秀林）

苏 明 升

苏明升（1896——1960），生于盐池县惠安堡乡狼布掌村，祖籍甘肃环县。幼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寒，被卖至丁家，并改姓丁。以后虽用祖姓，但人皆称“丁老十”。

苏明升少年时，家境尚好，10岁进入一家私学念书，到12岁辍学。青少年时代爱好文娛活动，每年冬闲时，都跟上民间的戏班子演唱秧歌戏，扮小旦。

进入青年时期以后，苏明升家贫如洗，生活艰难。第一房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后得病夭折。为了维持父子两人生活，他学会了做鞋和给牲口治病的本领，走乡窜户，浪迹江湖。1929年，他与同心县韦州乡太阳山一贫苦农民之女张月英结婚。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6月5日甜水区 蔚城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时，苏明升被民众选举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妻子张月英双双走上了革命道路。6月中旬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任预旺县政府粮食主任。

1937年3月，定环县成立后，苏明升调任定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2月又赴庆环分区党校学习，此后曾在延安行政干部培训班、西北党校等地学习，使他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1938年4月，土匪赵老五部袭扰驻河连湾之环县党政机关，时任环县妇联主任的张月英，为了掩护同志，保护党的机密文件而英勇牺牲，苏明升悲痛之余，化仇恨为力量，继续革命。

从1938年到1949年间，苏明升先后担任过区长、县委、县政府秘书等职务。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兢兢肯干，吃苦耐劳，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深得领导和同志赞誉。在他任区长时，一次，有一个地主与别人闹土地纠纷，给区长送来10元钞票，请他

在解决问题时“关照”。在处理问题大会上，苏明升将钞票拿了出來，当场揭穿了地主的丑恶罪行。

1949年8月兰州解放，苏明升随军进城，先后在共青团甘肃省团委担任总务科长，后又在全省人民银行担任人事科长等职务。虽然工作环境变了，但他那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1960年8月病逝，终年64岁。

(明 生 双 位)

苏 玉 梅

苏玉梅(?——1936)，女，祖籍陕西省咸阳市人，1926年她随西征红军北上，在解放预旺县后，留地方工作。先后任预旺县、定环县、环县妇联干事。1937年冬她在环县耿湾区做妇女工作时，被匪徒绑架，敌人软硬兼施，企图从她口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情况，苏玉梅巧扮为一个讨饭的，智斗匪徒，蒙哄过关。1938年她以讨饭为名，经常深入敌匪集结之地，侦察敌情。一次她得知土匪史彦芳勾结百余名匪徒要袭击庙儿掌区我独立五营驻地，苏玉梅不顾天黑路远，只身一人跑了二十多里路向独立五营二排排长付广俊汇报了情况，部队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全国解放后，组织安排她休息，1926年病逝。

(明 生 海 民)

蔺 桂 兰

蔺桂兰(1916——1980)，女，出生于四川省南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她家乡时，蔺桂兰报名参加

了红军。同年，在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战斗中腿部负伤，但她没有因此而掉队。1935年红军到达宁夏预旺时，她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搞妇女工作，曾担任县、区妇联副主任、主任等职。1939年她由环县妇联调到耿湾区做妇女工作。她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剪发、放足、做军鞋等，使这个区的妇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40年1月，耿湾区自卫军在赵老五等股匪煽动下叛变，高桂兰不幸落入魔掌，叛匪将她押至赵老五老巢甜水堡地窖子里。敌人扬言要从高桂兰口里“倒红水”，这伙穷凶极恶的匪徒妄想从她口里得知耿湾区委、区政府负责人和共产党名单，采用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但最终一无所获。敌人见软硬不行，就决定把她继续关押起来，慢慢逼她屈服投降。1940年2月16日，八路军警备二团、独立五营奉令进剿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赵老五匪部。3月7日，赵匪经营多年的老巢被捣毁，高桂兰才被解救。1942年2月组织又分配她任环县抗日妇女联合会副主任，1944年离职休息，1989年去世。

（明 生 海 民）

杨 国 秀

杨国秀（1910——1985），女，出生于四川省名山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将她买给一姓江的地主家当童养媳。后来由于无法忍受地主一家的欺凌和侮辱，又逃回老家。1934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杨国秀家乡，她同本村12名青年妇女一同参加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她曾担任妇女班长。1937年杨国秀从部队退伍，到当时陕甘宁边区曲子县参加农业生产。1956年她同曲子周围几户农民联合办起了曲子第一个生产农业合作社并担任合作社副社长。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位

女英雄不减当年志，工作积极肯干，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1964年庆阳地委曾奖励给她一套上面绣有“红妈妈——杨国秀”字样棉衣，以表示对这位革命长辈慰问。1972年她随丈夫迁至河南定居。1985年病逝，终年75岁。

（明 生 双 位）

张 礼

张礼（1916——1947），庆阳县玄马乡贾桥村罗家坪人。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只上完了小学就辍学务农，但在这贫困的穷山沟，也算得上一名“先生”了。

1937年冬，随着各地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庆阳县新堡区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张礼积极参加后援会的工作，任后援会土地委员，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张礼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更加认真负责，1938年被提拔为庆阳县工会科长。1941年调庆阳县政府任保安助理员，不久又调县政府保安科工作。1943年任庆阳县公安局局长。张礼认识到庆阳县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处在对敌斗争最前哨，深感自己的工作重要，所以总是兢兢业业，勤奋不息，为维护地方秩序，保卫陕甘宁边区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庆阳被敌占领，县委、县政府向华池撤退。张礼组织群众疏散后，随机关撤至玄马樊老庄。夜间又遭敌袭击。在转移中因天黑不识路径，不幸坠崖牺牲，年仅31岁。

（徐小平）

徐 明

徐明（1912——1948），出生在庆阳县南庄乡东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9岁起就开始给地主拉长工。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地主豪绅盘剥和压迫，在他的心中自幼便播下了仇恨旧社会的种子。

“双十二事变”后，中央红军教导师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工作团进驻庆阳，庆城及各区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以充沛的精力积极参加救国会的各项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徐明工作非常出色。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培养这位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1937年8月派遣他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3月毕业，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保安科工作。1946年开始任该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在任职期间，徐明工作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几次被评为优秀公安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1947年3月，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庆阳沦陷，徐明被编入庆阳县河东游击队，在中共庆阳县委书记杨富祥的率领下，在南庄、玄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948年4月下旬，陇东分区及三边分区主力部队集结庆阳二转驷原，牵制敌人，配合西府战役。5月1日，敌增援骑兵与中共庆阳县委工作队在南庄乡东原村甘嘴沟与马继援的骑兵遭遇，激战中徐明不幸英勇牺牲，时年36岁。

（补 记）

孙 昆 山

孙昆山（1912——1948），庆阳县熊家庙乡人（原属驿马乡）。少年时的孙昆山家境贫寒，只上过几年私塾。而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一边劳动一边自学，终于成才，并当上了本乡小学的“先生”。

1938年，中共庆阳县委、县抗敌后援会组织全县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孙昆山白天教书，晚上积极参加救国会的工作，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各项活动。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4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孙昆山更是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先后任庆阳县驿马区七乡乡长、驿马区司法助理员。1944年又调任庆阳县司法处推事。

1947年初，蒋介石调兵遣将，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庆阳县沦陷后，孙昆山随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并负责保管县政府财物。1948年5月1日，在宿营地庆阳东坑庙巷被敌突然包围。为了不使政府经费落入敌手，他携款突围，不幸腿部中弹受伤。敌人抢劫财产时，他死死抱着携款的包袱不放。惨无人道的马匪军对准他的头部连击数枪。孙昆山为了人民的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徐小平）

王 德 财

王德财（1916——1949），庆阳县册铺乡阜城村人，家庭贫农。是共产党解放了他的家乡，抗日民主政府使他家过上了新生活，他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为了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这个年近三十的农民于1945年10月毅然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四团一营三连当战士。在部队，他除积极参加作战训练外，还刻苦学习文化，短短两年时间即由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变成能读书读报的“先生”。1947年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瓦子街战斗中，作战英勇，荣立战功，战斗胜利结束后，被提升为排长。不久又被提为副连长。

1949年8月兰州战役中，王德财所在团负责进攻马继援一〇〇师防御的沈家岭主阵地。8月23日发起总攻之后，敌人利用其坚三险要的工事顽固反抗，战斗进展很不顺利。王德财为了完成战斗任务，他在阵地上几次召集全连的“诸葛亮”会，商量克敌致胜的好办法。经过两天浴血奋战，解放军于25日终于攻破敌人主阵地。但输急了眼的敌人拼命反扑，他们晃着大刀冲了上来，王德财和战士们上起刺刀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他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后，终因力量耗尽被敌人砍倒在血泊中。边区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王德财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3岁。

（徐小平）

王 俊 财

王俊财（1916——1949），庆阳县南庄乡庙花村人。兄弟8人，他排行为二。幼年时期家里十分穷苦，缺衣少食，王俊财从9岁开始就给地主放羊，受尽了剥削和压迫。

1945年11月，驻陇东警三旅扩编征收新兵，王俊财和本村侯继清等人踊跃报名入伍，被分配到五团一营一连当战士，后又改编入二营四连。1947年3月，陇东战争爆发，他先后参加了西华池战斗，望宁堡战斗，连道战斗。11月随警三旅转战陕北，在陕西韩城战役中因作战勇敢荣立特等功，任五团二营四连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王俊财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更严格要求自己，战场上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韩城战役后又随军在宜川、榆林等地数次参加战斗，三次荣立战功，被提升为二营六连副连长。

1948年初，警三旅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1949年8月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战斗中二营六连组成全团突击队，王俊财任突击队长。他率领突击队连克敌人两道防线，正当他们突破第三道防线时，王俊财不幸中弹，子弹穿出腹部，肠子流出，当场牺牲，时年仅23岁。

兰州战役胜利后，王俊财被追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十一师战斗英雄。

（杨 斌）

（平小波）

强 占 山

(李金峰)

强占山(1916——1949)，名全堂，字占山。生于庆阳县赤城范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兼做铁工活。弟兄四人，他排行第四。少年时期，因生活艰难，曾随父兄移居赤城黄家子、周庄、华池县悦乐的马蹬原、朱家峁峁等地，靠佃种地主土地和铁匠手艺聊以糊口。

1936年12月“双十二”事变后，共产党来到庆阳，在乡村组织群众抗日救亡、减租减息、反恶霸、反压迫。占山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穷人才有出路。1937年底，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开赴庆阳驿马、赤城一带驻防，他立即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在三八五旅警备七团当战士。八年抗战中一直驻防陇东及三边分区。在部队他认真学习军事技术和文化、政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受到领导和战友的好评。194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强占山在警三旅五团二营四连当班长。在宁县南义井堡宁侯战斗中因作战机智勇敢荣立二等功，被提升为排长。1947年3月边区自卫战争爆发后，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陇东、陕北。1947年10月随部队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后又南下黄龙。在宜川、韩城等战斗中，又立战功，升任副连长，1948年初任连长，1949年5月在陕西咸阳一带与马步芳部队战斗中，因作战勇敢又升任副营长。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直逼兰州。在解放兰州的战斗中，强占山所在四军十一师担负进攻兰州外围狗娃山敌阵地的任务。进攻发起后，马匪负隅顽抗，部队伤亡很大，加之阴雨连绵，战斗十分困难，经过几天浴血奋战，强占山所在部队终于

逼近敌核心阵地。为勘察清楚进攻路线，强占山不顾危险，多次走出工事侦察，在一次侦察中，头部胸部多处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徐小平）

张 正 明

张正明（1921——1949），庆阳县桐川乡张旗村人。兄弟6人，排行为四，6岁丧父，家境十分贫寒。靠二兄张正禄夫妇节衣缩食供养读完了小学。他于1937年11月参加了八路军，在庆阳第三八五旅旅部电话班当战士、班长。从1938年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陇东制造了多次摩擦事件。在反摩擦斗争中，张正明带领电话班战士坚守岗位，日夜工作，圆满地完成了通讯联络任务，反摩擦斗争胜利后，被提升为旅部通讯连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张正明被编入警备第三旅，任五团通讯连连长。1947年3月，边区自卫战争爆发后，张正明随部队先后转战陇东的华池、合水及陕北等地。后来又随军挺进大西北，并参加了解放西北重镇兰州的战役。当时张正明在西野第四军十一师五团任通讯连长，担任主攻敌人防守最严密的沈家岭的任务。经过六天六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和兄弟部队一起夺取了敌人阵地。在追歼残敌的冲锋中，张正明和五位战友不幸踩响敌人埋设的地雷而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徐 境）

黄 润

黄润（1914——1983），原名黄长润，庆阳县卅里铺乡黄家坪村人，家境较为富裕。他幼年读过私塾，当过羊倌。1929年父母双亡，14岁的黄润即开始务农，独立生活。他从小吃苦耐劳，奋发向上，思想活跃，爱好文艺。1942年10月参加革命，任卅里铺乡农会会长，同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4年1月，陇东地委宣传部组织庆阳、华池、环县、合水、镇原、曲子6县社火队在庆城汇报演出，黄润自编自演的社火小剧《二五减租》获首奖。同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在延安召开，黄润率领庆阳县卅里铺乡社火队代表陇东分区赴延参加汇报演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赞扬，并获得物质奖励，为陇东人民赢得了荣誉。

此后，黄润又历任卅里铺区宣传科长、自卫军营长、区委书记，1947年奉命做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任政和区长。在此期间，他为发展和巩固地方政权，壮大地方武装，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做了很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润又历任新堡区委书记、董志区委书记、西峰区委书记、庆阳县委组织部长，庆阳县委副书记，西峰拖拉机站党支部副书记，柔远木材分销处主任，西峰农具厂厂长，庆阳县面粉厂厂长，庆阳县商业局局长，1983年病逝，终年69岁。在解放后30多年的革命历程中，黄润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了党组织和群众的好评。

（时志军）

樊 富 银

樊富银（1916——1940），甘肃省镇原县殷家城乡白沟围村人。他不满周岁时，父母便相继去世，靠亲戚抚养。12岁就给地主扛长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非人生活。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征解放了富银的家乡，成立了革命政权，他积极参加了自卫军，站岗放哨，盘查坏人，打击敌人。

1939年8月，富银正式参加了革命，任三岔区自卫军副营长。同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挑起摩擦。一次在宁夏彭阳县虎家小园子与国民党固原县保安队魏文明部作战中，他一人毙敌数人。富银吃苦耐劳，积极肯干，除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和本职工作外，利用业余时间教自卫军识字、读报和学习进步书籍、刊物；抽空给战友们缝补衣服、打草鞋，帮助群众割麦、送粪、挑水等。

1940年1月26日，组织上派富银到殷家城执行征兵任务时，被自卫军内部的叛徒出卖，富银惨遭杀害，时年24岁。

（李义平 祁世昌）

王天林 徐万恩 陈三星 康希业

王天林（1920——1940），乳名元郎，镇原县平泉镇阴沟村人；徐万恩（1910——1940），乳名天恩，镇原县平泉镇南徐什字人；陈三星（1910——1940），乳名仁甫，镇原县中原乡高胜村人；康希业乳名金善，号虎臣，镇原县南川乡罗湾村人。4人均出身农民，除王天林家有田产外，其余3人家庭都很贫

寒。他们基本处于相同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相同的年华，养成了相同的革命性格，走完了共同的英雄道路。

因出身贫寒，且处于穷乡僻壤，他们都没有读过书。然而他们都不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仇恨地方官吏、地方军队和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都富有自发的反抗斗争精神。王天林自幼便受叔父王子厚影响，养成了敢抑不平、行侠仗义的性格。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转战北上，途经镇原南三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们4人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受到影响，开始萌发革命意识；1937年刘伯承率援四军驻防镇原县，所属三十一军在南三镇一带宣传抗日，开展民运工作，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并先后入了党，成为当地农村第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王天林任村党支部书记，农民自卫军中队长，徐万恩任村农会委员，陈三星任村党支部书记，康希业任村农民自卫队队长。

1939年后季，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在镇原县南三镇酝酿制造第二次摩擦事件，取缔抗日救国会、自卫军及其他抗日群众组织，禁止群众集会及其他抗日活动，捕捉抗日救国运动骨干。为了制止和反击顽固派反共倒退的行为，南三镇的地下党员和群众2000余人，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于11月19日开进县城，向国民党镇原县政府发动请愿活动。农民们高呼口号，冲进县衙，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在南三镇的特务活动。恢复南三镇的各抗日群众组织及其活动自由。县长孙宗濂如临大敌，惊慌失措，提出让请愿群众选出代表进行谈判；群众公推王天林、徐万恩、陈三星、康希业等人为代表与之谈判。孙宗濂迫于群众压力，当场不得不签名全部答应群众的合理要求，但请愿群众散后，则立即变脸，自食其言，开始在南三镇搜捕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4人先后被捕。

4人被捕后，押于西峰市国民党第三行政公署监狱，遭到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顽固分子往他们指甲里钉竹签，鼻孔里灌辣椒水，眼睛里揉石灰，逼他们供出党的组织和“同谋”。他们或据理驳斥，或缄口不语，坚不吐实。顽固派把他们押了几个月，软硬兼施，一无所获，最后于1940年6月13日将他们活埋于西峰镇西门外。临终前，王天林在坑内破口大骂，挣扎上爬，被砍掉双臂；徐万恩、陈三星视死如归，高呼口号；刽子手假惺惺问康希业：你还很年轻，写不写家信？有没有遗囑？康希业怒目痛斥道：“人民会给我报仇的，国民党不得好死！”刽子手用马刀对他连砍，他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

时王天林只有20岁，三位大者也才将及30之畔！

4人入狱期间，党的组织及亲属、乡邻虽四处奔走呼号，花去巨额现钞、白银，但顽固当局只收银钱，终不放人。罹难后，乡亲们冒生命危险赴西峰搬尸，又以重金相赎，仍不允。所以英雄的尸骨至今仍埋在西峰西门外黄土下。所幸，他们从事的抗战大业早已胜利，反动的蒋家王朝早已覆灭，全国的老百姓早已获得解放，如今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若英雄们九泉之下有灵，该早已瞑目了！

（刘凤阁据镇原县党史办单行材料综合）

郑 八 娃

郑八娃（1918——1943），甘肃省镇原县方山乡蒲河村人。八娃出身穷苦，童年时代，因家境困窘上不起学，在家帮大人干零活、打杂，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辛酸生活。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八娃的家乡，他便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娃随部队开往山西抗

目前线，在一二九师十团四连先后任班长、排长职务。由于八娃作战勇敢，带头拼杀，前后随部队打过10多次大小胜仗。1942年11月又升任一二九师十团四连连长。1943年10月，在山西省中条山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5岁。

（李义平 祁世昌）

姚 呈 琪

姚呈琪（1918——1946），甘肃省镇原县孟坝镇内城村人。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三岔、孟坝等镇原北部地区，呈琪家分得了土地、牛羊和粮食，全家人十分感谢共产党。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积极参加了自卫军，在革命斗争中，他革命觉悟提高很快。1939年12月，又毅然离开家乡，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他苦练杀敌本领，从严要求自己，进步很快，于1942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其梦寐以求的夙愿。1943年他担任排长职务。由于呈琪作战勇敢，到1945年5月，又升任连长职务。

1946年夏，陇东警三旅在庆阳驿马关与国民党顽军作战。呈琪所在连担负了攻克驿马关敌碉堡的艰巨任务，他深感自己担负的任务重大。当战斗打响后，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出战壕，攻向敌堡。在战斗即将结束时，他中弹牺牲，时年28岁。

（李义平 祁世昌）

陈耀祖 张三成

陈耀祖（1907——1946），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渠口村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调任太平区游击队队长。

张三成（1908——1946），甘肃省镇原县孟坝镇王湾行政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调任太平区游击队指导员。

内战爆发后，耀祖、三成率领太平区游击队，在与敌接壤的边界地区，巧妙地开展对敌斗争。1946年12月22日晚，中共镇原县委工作组和太平区游击队，分别住在兰庙范埡边的群众家中。由于叛徒告密，午夜时分被国民党太平镇公所保安队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耀祖、三成立即带领游击队，从两个方向对敌人发起攻击，牵制住敌人，掩护县委工作组突围，向解放区转移。当县委工作组转移后，他俩率游击队杀出敌人的包围圈，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解放区撤退。在战斗中，他俩英勇牺牲。时年，耀祖39岁，三成38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先烈，镇原县人民政府改埡边乡为耀祖乡，王湾乡为三成乡。

（李义平 张德杜）

杨 廷 俭

杨廷俭（1915——1947），镇原县新城乡东庄行政村人。1944年1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任马渠游击队队长职务。在任游击队长期间，他带领游击队员，积极开展镇奸反霸、打击敌

人的破坏活动。1947年2月国民党马维援部进攻边区时恶霸地主杨维泉将他出卖，被敌杀害在他们家乡新城东庄村。

（索国栋）

李 义 海

李义海（1898——1947），甘肃省镇原县小峁乡惠沟行政村里沟自然村人。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镇原县党组织与平凉、固原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工作，经常往来于平凉、华亭、固原、镇原之间，传达党的指示，传递情报。

1945年春节前夕，固原城阳虎家湾贫苦农民虎志渊，准备将省吃俭用的粮食磨了过年，被地主发现，硬逼着还了债，全家人为此抱头痛哭。义海得知后，前去劝说，将自家的粮食带了些给虎家，让其全家过了团圆年。正月，义海拿上礼品，专门到虎家拜年，启发虎志渊的阶级觉悟，使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义海担任平东游击队中队长，坚持在平凉、固原、镇原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保护党的地下工作者。1947年2月，在马渠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抓去，杀害于三岔杏家山，时年49岁。

（史德智、张德社）

白 如 贵

白如贵（1916——1947），甘肃省镇原县开边乡白马寺行政村洞子沟自然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在陕甘宁边区镇原县警卫队任战士、分队长等职，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陇东军分区成立独立营，镇原县警卫队大部分被编入独立营，如贵任一连排长。1946年10月，陇东分区独立团成立，独立营被编为第一营，如贵任一营一连副连长，驻守孟坝。

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陇东解放区，陇东分区独立团在镇原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掩护中共镇原县委、县政府机关向大、小方山转移。3月初在方山三台堰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如贵英勇作战，光荣牺牲，时年31岁。

（李义平 张德柱）

席正春 王宗义

席正春（1921——1947），甘肃省镇原县王寨乡席老庄村人。194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王寨自治区游击队战士、分队长、队长等职。

王宗义（1917——1947），甘肃省镇原县王寨乡岳庄村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王寨自治区游击队副队长、指导员等职。

正春、宗义参加革命后，积极参加游击队军事训练，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摩擦的行为作斗争，为王寨自治区的建立，为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贡献，曾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

解放战争开始后，正春、宗义带领王寨游击队，经常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配合地下工作者和武工队开展地方工作。1947年9月，国民党青马八十二师驻西峰一个连，窜到王寨搜捕中共地下工作者，情况十分危急。为掩护区、乡干部和地下党员安全转移，正春、宗义迅速率领游击队赶到王寨原，阻击敌人，与数倍之敌展

开激战。当区、乡干部和地下党员安全转移后，正春、宗义命令游击队由副队长带领转移，他仍留下来掩护，最后同时壮烈牺牲，时年，正春26岁，宗义30岁。

全国解放后，为了缅怀先烈，镇原县人民政府改王寨乡为正春乡，岳庄乡为宗义乡，以志纪念。

（李义平 张德杜）

虎 殿 元

虎殿元（1917——1947），甘肃省镇原县殿家城乡白家川村人。1939年11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历任陕甘宁边区镇原县孟坝区组织科员、柳州区区长，县政府建设科会计、科长等职。

1947年12月，他在一次侦察敌情时，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劝其投降，虎殿元痛斥道：“我活着是共产党员，死了是共产党的鬼，想叫我和你们同流合污，办不到。要杀要斩随你便，刀架脖子志也不屈。”恼羞成怒的敌人面对这个英雄汉子，无可奈何，便将其残忍地屠杀于殿家城踏踏岭，时年30岁。

（祁世昌）

段 志 富

段志富（1916——1948），镇原县三岔镇安岔村人。1942年3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任镇原县政府二科副科长。

志富出身贫寒，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穷苦生活。尽管这样，父母仍负责供他读私塾数年，使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小知识分子。1936年8月，红军西征解放了他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

志富家同其他贫苦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和牛羊，他怀着对革命无比感激的心情，同红军战士一道宣传革命道理，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当地党组织看志富是棵好苗子，1946年秋陇东中学成立后，抗日民主政府又送他去学习深造。1947年3月毕业后，分配到孟坝完小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认真备课和批改作业，教学效果比较明显。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和学生一块参加学校劳动，搞勤工俭学，美化校园环境，工作做得很出色。

1945年春，延安鲁艺学院音乐家李焕之带领工作组来孟坝办冬学，志富主动参加。他白天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晚上便深入村头开展扫盲活动，工作卖力，曾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受到陕甘宁边区镇原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后来组织又推荐他到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学习，结业后又回镇原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志富随县委、县政府转移在环县大小方山一带。1948年2月，他到方山岔口腰峁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敌逮捕，杀害于西峰，时年仅32岁。

（祁世昌）

许 守 仁

许守仁（1920——1948），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五里沟行政村高山自然村人。194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入伍，曾任八路军战士，陇东分区独立团排长，十三团二营三连副连长等职。

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陇东解放区大部沦陷，但是，陇东分区地方武装，坚持人民游击战争，在陇东大地上四处游击，打击和消灭敌人。1948年4月，陇东地

方部队集结于环县合道川一带进行休整。遭到国民党青马部队骑八旅、一〇〇旅和地方两个保安团的袭击。19日，在掩护部队转移的环县胶泥峁战斗，战斗中，许守仁所在十三团二营三连，担负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予敌人以坚决阻击。战斗中许守仁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李义平 张德杜）

魏 德 荣

魏德荣（1911——1948），陕西省米脂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任陕甘宁边区镇原县自卫军大队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等职。

1936年夏，红军西征时解放了陇东的环县、曲子、镇原的部分地区，为加强新区工作，党中央从红军部队和陕北老根据地抽调了一批干部，分配到新开辟区开展工作。德荣作为其中的一员，来到了镇原县，被分配在马渠区抗日救国会（实际是秘密区委）负责自卫军工作。他到职后，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加自卫军。

1939年镇原县自卫军大队成立，魏德荣任大队长，他狠抓各级自卫军的组织建设，落实训练时间和内容，并深入各区乡，广泛地发动和宣传群众参加自卫军，扩大了自卫军队伍，很快使全县区区有自卫军营，村村有自卫军连。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镇原县委和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政府将全县武装力量整编为一个游击大队，德荣任副大队长，他积极协助大队长做好游击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还多次带游击小分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掩护武工队开展工作。

1948年4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战斗中，镇原县游击大队配合陇东分区十三团作战，在阻击增援的敌人时，德荣不幸身负重伤，光荣牺牲，时年33岁。

（张德杜）

胡 正 明

胡正明（1910——1948），甘肃省镇原县马渠乡张湾湾村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镇原县马渠区抗敌后援会主任，中共孟坝、新集区区委书记，县政府民政科科长等职。

1938年，正明任马渠区后援会主任时，因斗争坚决，工作出色，深得群众的拥护。但被国民党伪镇长焦玉种盯上，借故将他逮捕，送到伪县府上刑后，又押解到伪泾川县监狱继续审讯。他把国民党法庭变成了痛斥顽固派讲台，痛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们不抗日，反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专门从事破坏团结抗日的勾当……”敌县长理屈词穷，难以对答，又惨无人道地给他上老虎凳，往鼻孔灌辣椒水……他还是丝毫没有吐露党的机密。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敌人无奈，但坚不放人。后在驻镇原县城民运科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交涉下，敌人才把正明从泾川释放了回来。

后来，胡正明任区委书记，当时边区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带领干部开荒种粮，减轻群众负担。下乡总是拿着生产工具，边工作边参加劳动。他还经常带领游击队、武工队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他任县民政科科长时，柳州区有一烈属因无籽种和牲口下不了种，全家人心急如焚。正明了解到此情况后，很快和区上协商解决了这一

问题。隔了几天，他还专程到这家去查看耕种情况，使全家人非常感动。

1948年5月，胡正明带领支前队支援屯子镇战斗，不幸身负重伤，在平凉医院动手术时，因伤口感染而死亡。

（祁世昌）

周 玉 琢

周玉琢（1922——1948），镇原县孟坝镇何范村人。1939年11月参加革命，在镇原县保安科警卫队当战士，后整编到三八五旅。他入伍后苦练杀敌本领，作战勇敢，被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连副连长。1948年5月在陕西省乾县瓦坡陵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6岁。

（索国栋）

焦 树 池

焦树池（1918——1948），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榆杨湾行政村沟圈自然村人。1940年8月参军，在八路军三八五旅四团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留守陇东期间，树池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出色完成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各项战斗任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3月，为了响应国共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驻守边区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三八五旅警备四团、七团并入警备第三旅，合编为警三旅五团，树池任该团二营五连连长。1948年8月，五团在合水与青马八十二师骑兵团的一次战斗中，树池率领五连英

勇作战，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0岁。

（李义平 张德社）

张 希 明

张希明（1922——1948），马渠乡花儿岔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4年春抗大毕业后，张希明仍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担任石佛区助理员，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张希明当时任石佛区区长兼区游击队队长，他坚持开展“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游击战争，掩护群众整壁清野，组织游击队，消灭小股敌人。1948年农历5月11日，镇原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区、乡、村长在马渠镇某村召开秘密会议，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将张希明抓去，装在黑毛口袋内拴在马尾巴上，一直拖到孟坝镇，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次日，因伤重而牺牲，时年26岁。

（李义平 索国栋）

阎 生 甲

阎生甲（1922——1949），镇原县新城乡阎阳庄行政村人，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

生甲性情耿直。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剥削和贪官污吏的压榨，在生甲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复仇的种子，立志长大成人后，学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穷富济贫，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放羊时在腿肚上绑上沙袋练硬功夫，当地人称

他是“飞毛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活动在他的家乡平凉、镇原、固原三交界地带，对生甲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他积极寻找党组织，帮助地下党组织搞秘密通讯联络。1945年，生甲同中共平凉工委取得联系，以商贩作掩护，来往于平凉至镇原解放区之间，传递情报，进行联络，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平凉梨花乡乡长马良弼是个“地头蛇”，经常伙同自卫队，抢劫群众财物，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生甲恨之入骨，决心除掉这个“地头蛇”，为民除害。1946年11月，中共平东游击队指导员孙克禄、队长李万福、副队长杨希江来到阎阳庄，住在阎生甲家里，向地下党员传达了工委关于除掉马良弼的指示，大家分析了执行任务的形势。生甲一再向组织请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在漆黑茫茫的夜晚，生甲带着两颗手榴弹，从阎阳庄出发，一路发挥“飞毛腿”的本领，翻越三个原，跨过大路、小路两条深沟，直奔梨花乡公所。趁夜深人静，踉踉跄跄到马良弼门口，谎说给他送来了大烟土。该马开门后，生甲发现墙上挂着一支步枪，抢先一步，夺枪在手，将马良弼击毙，跑出乡政府。枪声惊动了自卫队，顿时乱喊乱叫，生甲飞快跑进原上路壕，闪身跳越壕后，随之将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敌人惊得昏头转向，霎时，喊杀声、枪声、狗吠声混成一片，生甲乘机逃跑。次日消息传开，梨花原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1948年10月，经中共甘肃工委批准，就地处决伪新城镇镇长李应凯，游击队几次行动均未抓获，经研究将任务交给英勇机智的“飞毛腿”阎生甲。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不畏艰险，亲自做伪自卫队长刘占昌的工作，使占昌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详细侦察了解，决定利用李应凯去镇原县城开会之机，将其处决。

占昌把李开会的时间报告阎生甲，生甲即汇报镇固工委。工委决定由杨希江、吴兰乾和阎生甲3人去执行截击任务。他们3人化妆成农民，在新城镇监视了两天。第三天，李应凯骑着毛驴由占昌护送去镇原县城开会。他们在半坡埋伏，当走到平凉原头骆驼脖项时，杨希江、吴兰乾、阎生甲3人猛扑上去，将李应凯从驴身上拉下来，一枪毙命，为人民除掉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害。

1949年元月，中共平东工委书记张可夫、副书记李义祥，委员张友三和阎生甲，在土谷堆群众家里开会，商量对敌人作分化瓦解工作。生甲说：“我和平凉县自卫队长段祥麟拜过八字，通过做工作，可以争取过来。”工委决定由张友三协助阎生甲完成这一任务。次日到平凉，生甲去找段祥麟，返回后，给张友三汇报了情况，二人走到船舱街，段祥麟领着便衣队，七手八脚将生甲捆绑、用衣襟蒙头抓走。

生甲被捕后，被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残无人道的敌人对阎生甲使用老虎凳、火钳、鞭抽等各种残酷的刑法，更为残忍的是把铁铤烧红放在他的肉体上烙，浑身被烙的血肉模糊，生甲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敌人用冷水激活，如此反复多次，但生甲坚强不屈、守口如瓶，敌人没有捞到什么东西，无奈，又将昏迷状态的阎生甲交给敌八二军集中营，马匪援匪军贼心不死，再次进行折磨，阴谋仍未得逞。1943年元月将阎生甲残无人道地屠杀，时年27岁。

1951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甘肃日报》、《新平凉报》发表了悼念阎生甲烈士的文章。

（镇原县委党史办）

李 玉 清

李玉清（1920——1949），化名李明，甘肃省镇原县小峁乡惠沟行政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凉县高平区副区长等职。

他于1937年就参加了抗敌后援会，曾给张可夫、高俞修等领导人当交通员，经常来往活动于平凉、华亭、庆阳一带。

1946年2月2日，玉清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抢劫，他和几个小弟弟、侄儿被敌抓去，敌人为了从玉清口中掏出情报，便把他们吊在房梁上毒打，以后又关押了5个月时间，玉清受尽了敌人的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拒不吐实情。敌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他释放回家。回家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平凉、华亭一带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国民党保安大队获知李玉清是共产党员后，便再次抓去毒打后吊起3天，威逼要枪，要情报。玉清拒不吐实，后来经党组织进行营救获释。同年4月奉上级指示，玉清赴甘肃工委教育队学习。10月又入延安西北党校继续深造，在学校他克服文化低的困难，刻苦钻研，虚心求教，经常抽空读书、看报，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学习结束后，玉清在平凉高平区任副区长，1949年在平凉剿匪中不幸牺牲，时年29岁。

（李义平 史德智）

张 占 明

张占明（1902——1972），甘肃省镇原县马渠乡花儿岔行政村人。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党支部委员、书记、乡长、副区长、区长等职。

占明入党后，担任乡党支部宣传委员，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发动群众参加自卫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使马渠乡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942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占明积极响应，努力搞好生产，踊跃上交公粮，支援抗日战争。1943年秋被评为陕甘宁边区镇原县劳动英雄。11月初，出席了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为分区乙等劳动英雄。11月底，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1945年10月，占明任马渠乡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减租减息，查田定产工作，组织全乡党员、干部开展三查整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成绩优异。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镇原县委、县政府实行战略撤退，占明因保存武器有功，受到县委的奖励。

新中国建立后，占明先后担任三岔区孟原乡乡长、马渠区副区长，他积极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积极办学，动员帮助贫苦农民子女上学念书，努力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两次受到县上奖励。1950年，占明出席了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并特邀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1954年8月，占明进入省党校学习，他努力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1956年7月，省党校毕业

后，他任镇原县马渠区区长，以更高的革命热情勤奋地为党工作，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努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1959年，他响应党的精减整编号召，报名退职回家务农。1972年因病去世，终年70岁。

（史德智 张德杜）

孙 久 德

孙久德（1916——1973），又名孙长贵，陕西省子长县西一区阎家河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初中文化程度。

1935年春，孙久德经组织推荐在秀延县委进行短期培训，结束后任该县中区四乡团支部书记，少先队中队长。嗣后在秀延县政府任经济员、总务处长等职。1936年6月，在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受训，后分派到定边县财政部，陕甘省参政部工作，是年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7年在合水县店子村帮助工作。

1937年3月，在镇原县委任巡视员；同年8月，任镇原县南三镇中心区委组织科长；1938年9月到1940年初，先后任镇原县委秘书、电子镇区委书记，尔后又到张城镇帮助工作。在此期间，他除开展正常工作外，还帮助南三镇党组织发动党员、群众千余名，去县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众抗战，取消民众团体，破坏国共合作等罪行，坚决要求自由！要求抗战！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一定胜利。1940年初，孙久德先后任镇原县马渠镇镇委书记、石佛区委书记兼区长。1941年5月调任中共镇原县委组织部长。1946年3月，任中共镇原县委副书记兼任游击大队副政委。在此期间，他为开展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整党、整风、整顿干部作风，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47年5月27日，孙久德同县委书记

记刘文山等赴土桥区野狐沟参加地委会议，被国民党政府军包围俘虏，关押在曲子。随后，西北野战军解放悦乐、西华池，进逼曲子时，敌人仓惶逃跑，孙久德及其被俘人员得以归队。

1947年8月，孙久德任中共镇原县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政委。在敌占区，积极进行地下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倒算、反匪、反特工作。并且积极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发动群众做军鞋、筹粮草，支援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县游击大队与国民党中央军、青马部队及甘保三团进行了多次战斗，解放了镇原县北部的三岔、新集、方山、王寨、马渠、庙渠等地，并恢复了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区乡政权。1949年8月，孙久德调任陇东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950年8月起，孙久德先后任岷县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常委、武都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常委、武都地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武都地委书记等职。1958年8月，任甘肃省委财贸部副部长。1959年3月，任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12月，任甘南州委第一书记。1964年4月，任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5年在兰州病逝，终年60岁。

（史德智 任志岗）

孙 应 邦

孙应邦（1917——1978），甘肃省镇原县庙渠乡孙寨村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战争年代，应邦历任本村党支部书记、自卫军队长、中共镇原县孟坝区委书记、平东工委游击队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

建国后，历任甘肃省工业厅、交通厅人事科副科长、国家劳动部保卫科科长、中共辽宁北票矿务局自营公司委员会书记，中共辽宁南票矿务局委员会副书记、代理书记、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孙应邦是镇原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他在任村党支部书记和自卫军队长时，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坚持训练自卫军，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任孟坝区委书记时，组织成立武工队、游击队，侦察敌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生产和地方安全；任平东工委游击队政委时，经常带领游击队员昼伏夜出，一个晚同行军百二十里，与敌人正规军周旋，声东击西地打击和消耗敌人。在十几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应邦仍保持和发扬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58年在国家劳动部工作时，生活、工作等条件都很优越，可他不贪图安逸享受，坚决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在矿务局工作时，和职工住同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下矿和工人同坐小火车，坚持在第一线参加生产、指挥生产。他所领导的单位，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曾3次被辽宁省、1次被国家煤炭部树立为先进集体，受到表彰和奖励。

文化大革命中，应邦被批判挨斗，并错误地夺了他的权，但他坚信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总有一天会给自己落实问题。同他有个领导干部因思想转不过弯而产生死的念头，他知道后诚恳地说：“我们应该经得起考验，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在他的教育开导下，这个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他被结合为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工作样样走在前面，深入矿井检查安全，和工人一道参加生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祖国的煤炭生产和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6年秋天，应邦从辽宁回老家探亲，他不顾旅途劳累，第

二天一早就看望和他过去一块战斗过至今仍在家乡的老干部、老党员，对其中生活特别困难的，他慷慨解囊，一二十块、三五十块的给钱相助，并向当地政府建议多照顾这些老同志。嘱咐家属要遵纪守法，好好参加生产劳动，不能以他的旗号和招牌向组织要这要那。在家一月余，给本村干部群众、庙渠公社机关单位、学校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7次，获得人们的好评和赞扬，这充分表现了他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

1977年初，孙应邦因病从辽宁南票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离职休养，1978年病故于沈阳市，终年61岁。

（祁世昌）

李 宪 章

李宪章（1914——1980），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米家川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战争时期，李宪章曾先后任曲子县苦水草土产公司、镇原县三岔土产公司经理，陇东贸易公司副经理，庆阳土产公司经理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岷县县委书记，国家粮食部西北粮食公司副经理，甘肃省粮食厅副厅长，中共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

宪章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生活比较安逸、舒适。孩提时期读私塾时，他就能同情帮助穷人家的孩子，看哪个同学没钱买笔墨纸张，他就解囊相助，或把自己的纸笔给他们用；发现哪个同学没吃的，就把自己的馍馍送给同学吃。还常从家中拿来自己穿过的旧衣服、鞋、袜接济可怜的学生，因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

1930年8月，西征红军解放了三岔，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革命政权。宪章受人民政府宣传革命道理的影响，说服了家中老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事商业工作。从1939年参加革命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商业战线一搞就是10年。那时解放区经济特别困难，但他始终以搞好工作为己任，身先士卒，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边区财贸工作总方针，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发展镇原和陇东地区的商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以后，宪章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虽有多次变化，但他一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1958年他从中央党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条件最困难的西藏那曲地区工作。他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农牧民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参加生产劳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密切了党、政府和农牧民的血肉联系，为那曲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1980年10月，李宪章在平凉病休期间，因病情恶化去世，终年66岁。

（邦世昌）

李 廷 序

李廷序（1913——1981），江西省零都县人，1929年11月在江西参加革命，1930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廷序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零都县西北区游击大队宣传员，江西零都县红色警卫营宣传员，红军零都独立第三团宣传员、政治处政治干事，红军第三军团第七军二十师六十团政治处干事，胜利县桥头区委宣传科长，县委宣传委员，胜利县补充团政委，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副部长。

红军第三补充师指导员、教导员、土地工作科长。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廷序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秘书。前敌委员会管理排长。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历任西北中央局会计科长，陕甘宁边区庆阳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县的马渠、三岔、方山、新集等地。廷序率地方工作团来到镇原、固原解放区，领导当地贫苦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肃清地方反动分子。10月，在三岔建立了中共秘密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廷序兼任区委书记。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组织群众抗日救国会，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受理民事纠纷，保护群众权益，扩大了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1937年6月，廷序和王平水来到镇原县城，接收援西军民远郡开创的地方工作，正式成立中共镇原县委，廷序任县委书记。从此镇原县各级党组织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进一步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7年8月，廷序任固原县委书记（县委驻三岔）；12月，任庆阳县委书记、陇东特委委员；1938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1942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组织科长，为党组织在陇东地区和整个西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廷序历任中央赴东北干部大队副大队长，吉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吉林省委长春工作团团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等职，为开辟东北解放区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廷序历任江西省吉安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赣南区党委委员，宁都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江西省委委员、南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长办副主任、长办顾问等职。1980年当

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为地方政权建设和长江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1年12月21日，李廷序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68岁。

（张德杜）

张彦儒

张彦儒（1910——1984），镇原县张砚子行政村人。14岁入初小读书，后考入镇原县第一高小，毕业后在环县、镇原、平凉等地任教。

从1938年开始，张彦儒利用在孟原等解放区教课的身份，帮助和参加地方各种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初，任陕甘宁边区镇原县（以下简称镇原县）马渠区小学校长。1941年10月被选为镇原县参议会参议员，同时，被任命为镇原县政府三科科长兼完小校长。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改革私学，实施国防教育，大办夜校、冬学，开展扫盲运动。《解放日报》曾以“镇原县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为题，介绍了他的办学事迹。1943年调任陇东专署建设科副科长。1947年10月在延安大学行政班学习；1948年7月任陇东后勤运输第四兵站办事处副处长。并在华池元城，经王子厚、胡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2月，张彦儒在镇原县任副县长，当时镇原县没有全部解放，所以，在国统区他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动员各方力量，扩大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在解放区，他组织群众进行反霸、反匪、反特、反倒算运动，并实行减租减息，支持农民努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为了支援前线，配合解放军西进，他不但积极发动群众做军鞋、抬担架，而且还两次带领慰劳团，

到野战部队进行慰问，对革命将士鼓舞很大。1949年8月，张彦儒任镇原县县长。在任期间，他为革命政权的巩固，全县乃至西北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0年7月，张彦儒任渭源县县长、1952年12月任定西县县长、1954年在甘肃省人事厅工作、1956年起在省饲料公司任经理、省粮食厅监察室主任、山丹粮食学校校长、省粮食厅直属仓库主任。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于1978年元月，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

1984年8月28日，张彦儒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终年74岁。

(史德智 任志岗)

刘 文 山

刘文山（1900——1987），陕西省绥德县义乌镇寺圪里村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文山曾任陕西省绥德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子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刘文山先后调任固原、西峰、庆阳县委书记，陇东地委秘书长，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在任期间，他为陇东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党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镇原县委书记。当时，正是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疯狂时期，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革命环境和形势处于险恶状态。为此，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领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坚决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一面率领

武工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和敌人采取正面斗争，常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和地方安全；一面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机关单位、干部、党员以至群众隐蔽、疏散和转移，使革命事业和党的各级组织免遭大的损失。

1948年刘文山任人民解放军第六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民运部副部长，为全国解放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文山先后任酒泉专署专员、省财政厅副厅长、省粮食厅厅长、省农业厅副厅长、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厅顾问、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共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甘肃省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人大代表。

刘文山在近4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工作变动频繁，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总是一心一意把党交给自己的工作搞好。就是在“文革”被批斗、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时，他仍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到晚年，还抱病到全省各地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直至重病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亲自抓养鱼事业的试点工作。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刘文山于1987年10月8日在兰州病逝，终年76岁。

（祁世昌）

杜云程

杜云程（1878——1946），又名登霄，甘肃省镇原县孟坝镇杜塄村人。其父梅亭，系清朝优廪生员，国子监太学。

云程天资聪明，上学后发愤读书，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五泉书院”（即甘肃学院，兰州大学的前身）。1918年，他被

选为甘肃省第二届议会议员，以后还任过省实业厅秘书。因其对时局不满，加之父母年迈多病，遂辞去职务，回家务农。

云程当时是五坝一带颇有文化的人，加上他平时办事热心认真，附近乡亲为让子女上学读书，推荐他当老师，他便欣然答应。用自家4孔窑洞办起了学校，方圆七、八里的数十名孩子前来就学。对家境贫寒的孩子，他免费让他们上学，他教学认真，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学生越来越多，学校愈办愈好，因而得到学生和家长的称赞，也引起当时旧镇原县政府的重视。县长宋运涛亲自看望过云程，对其大加赞扬，并给学校赠送书籍数百本，还令各乡镇以云程为例，兴办教育。

1928年，县长奉省教育厅令，要大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因云程办学有法，县上任命他为筹款委员。他率先倡导，慷慨捐款，又不辞劳苦，到富户人家做宣传、说服工作，动员他们踊跃捐款献物。经过一番艰辛的工作后，款物基本筹齐，他又以身作则，带领群众修建起一座当时堪称最漂亮的学校（镇原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即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镇原县孟坝完小）。新学年招收学生就100多名。因其领导捐款筹物，修建学校有功劳，受省府金质奖章奖励。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政府从马渠搬迁孟坝，云程耳闻目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深受启发和教育。因而思想比较进步，倾向共产党，倾向革命。后在党组织教育帮助下，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威望，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1年10月2日至5日，陕甘宁边区镇原县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云程被当选为副议长。他感激地说：“共产党冤家大量，仁义治国，我也有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了，组织相信我，人民选我，我一定把大家的事办好。”从此以后，他尽职尽责，和共产党真诚合作，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杜云程因病在家去世，终年68岁。

（杨世昌）

聂 万 财

聂万财（1911——1937），西峰市什社乡任岭行政村人。1934年3月参加革命，曾任陕北红军七十一师三团一营一连连长，1937年在山西省石楼县与阎锡山部队作战时牺牲，时年26岁。

（李怀珍）

顾 登 玺

顾登玺（1908——1939），男，汉族，甘肃省西峰市彭原乡人。幼时聪颖好学，才思过人。早年在私塾和县立小学完成学业，后考入平凉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彭原教书。

1937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驻防驿马关、彭原义门一带，军团民运部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民众运动。顾登玺在军团民运部干部马兆祥、高明榜的启发下，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协助民运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起来搞抗日募捐。在中共驿马关中心区委和十五军团民运部对他的帮助和引导下，不久经马兆祥、高明榜介绍，顾登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他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暗地里发展党员，发动和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面目。1937年春，中共驿马关区委派他去延安学习，回来后，他便筹建了中共义门区委，并担任

区委书记职务。

他主持区委工作期间，经常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完成上级组织交给他的工作任务，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区委力量。因区委是秘密组织，所以他活动时经常在深更半夜。1938年4月，为方便工作，驿马关县委决定由他参加国民党彭原乡乡长竞选，由于他群众基础好，结果当选。从此他利用公开身份为党工作更方便了，但不幸的是同年端午节晚上，因叛徒出卖，他被逮捕，关押在国民党西峰看守所。

在狱中，他和同狱被从宁县、会水等地抓来的共产党员一起，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越狱斗争，有3名共产党员逃出监狱。而顾登玺出于斗争需要，却决定自己仍留在狱中。在狱中，敌人多方威逼利诱，残酷折磨，给他十指上钉满竹签，鼻孔灌辣椒水，上烙铁，他始终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的严刑折磨下，顾登玺于1939年10月惨死在狱中，终年仅31岁。

（左明希）

祁 正 年

祁正年（1912——1942），字正富，男，汉族，甘肃省西峰市彭原乡人，祖籍河南。早年在私塾读书，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

1936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被压迫人民翻身闹革命的斗争，已在陇东大片土地上蓬勃展开，青年时期的祁正年，朦胧地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他主动接近党组织，经常掩护地下党员顾登玺同志开展工作，最后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3月，经马兆祥（少共译马关县委书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加入党组织后，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到国民党统治区搜集情报，向穷苦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出色的工作成绩，使党组织更加信任他。1937年春，中共驿马关中心区委派他到延安学习。回来后，在中共义门区委当组织干事。

义门区委是建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发现后，竭力要破坏它。1938年端阳节的晚上，祁正年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西峰看守所。在监狱虽遭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后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940年1月保释出狱。出狱后，任中共驿马关区委书记。1942年5月的一天，又因叛徒出卖，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用刑更残酷，他的表现也更坚决。特务们将竹签钉满他的十指，将辣椒水灌进他的鼻孔，用烧红的铁铲烫烂他的全身。他几次昏倒在地，但从没有吐露半点有关我党组织的情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无所得的情况下，最后将祁正年杀害在西峰城里，时年30岁。

（清静远）

（左明希）

朱 秉 才

朱秉才（1914——1984），男，汉族，甘肃省西峰市什社乡人。小时家境十分贫寒，给地主拉长工。1933年正在合水扛长工的朱秉才，遇到了合水红军游击队，在游击队启发教育下，他毅然逃出虎口，参加了合水游击队，不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并任一连三班副班长，后任排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同骑兵团的战士一道，转战于陕北苏区和陇东苏区，打击

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地方顽匪。1933年5月，参加了陕北劳山 赤乐镇战斗。1937年5月以后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骑兵团一连连长。他和骑兵团的战士一块保卫着陕甘宁边区。1945年10月以后，任晋绥军区骑兵旅一团副团长。1946年2月以后，任晋绥军区骑兵旅一团团长。1949年3月后，任华北军区骑兵一师副师长。整个解放战争中，他指挥的骑兵师团，转战于祖国的大西北战场上，参加了1945年的集宁战役，1948年的平绥战役。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曾3次负过重伤，经受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是我军一名优秀的战斗员和指挥员。

全国解放初（1951年8月后），他又任西藏十八军骑兵一师师长。1952年9月，进西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并担任该中学党支部书记。1955年4月后，任云南军区大理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7月，经贺龙、邓小平同志批准，授予朱秉才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4年3月29日病逝，终年70岁。

（李海金）

（左明希）

· 名 录 部 分 ·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李学忠，男，广东肇庆市高要县人，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2年毕业于肇庆分校，1985年毕业于肇庆分校。

华 池 县

李学忠：五较乡茂原行政村人，1910年生，1933年1月参加革命，1933年4月在环县洪堡子作战中牺牲。

安明山：山庄乡车延行政村人，1904年2月生，1933年1月参加革命，南梁游击队战士，1934年2月在华池县牺牲。

蔡调勤：悦乐镇大原村人，1910年3月生，1933年7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班长，1934年2月牺牲。

赵兴录：五较乡五较行政村九条沟门人，1910年1月生，1934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二十六军三团战士，1934年3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杨德海：定边乡庄湾行政村西沟人，1918年11月生，1933年4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班长，1934年5月在陕西省吴旗县作战中牺牲。

杨得华：定边乡庄湾行政村西岔沟人，1908年4月生，1933年7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34年5月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杨海：柔远镇城关行政村杨庄子人，1915年7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战士，1934年8月在陕西省靖边县作战中牺牲。

王生华：温台乡人，1913年8月生，1933年1月参加革命，保安游击队战士，1934年10月失踪。

黄德贵：庆阳县玄马乡人，1912年12月生，1933年7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35年2月在华池县五较作战中牺牲。

黄三毛：紫坊畔乡古窑洼人，1900年2月生，1935年5月参加

革命，保安游击队战士，1935年6月在陕西省志丹县作战中牺牲。

张朝东：林镇乡范台行政村人，1911年3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班长，1935年8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武光银：定汉乡庙湾行政村人，1913年1月生，1933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排长，1935年8月在陕西省富县作战中牺牲。

张武银：悦乐镇上堡子行政村人，1904年3月生，1933年8月参加革命，红十五军团一团某班班长，1935年10月在陕西省崂山作战时牺牲。

徐克存：桥川乡黄蒿掌行政村人，1902年7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华池县二区五乡四村村长，1935年11月因公牺牲。

潘生金：定汉乡庙湾行政村龙木庄人，1900年8月生，1933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庆阳县游击队给养员，1933年7月在华池县牺牲。

罗汉贵：林镇乡黄渠行政村人，1900年12月生，1934年5月参加革命，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队队员，1935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杨生财：庙巷乡李庄行政村人，1903年12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二团战士，1935年在合水县固城作战中牺牲。

张双宝：乔河乡张岔行政村人，1918年4月生，1935年2月参加革命，庆北游击队战士，1936年4月在华池县作战时牺牲。

黄清翰：悦乐镇上堡子行政村黄老庄人，1914年2月生，1933年7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36年5月，在陕西省吴旗县作战中牺牲。

李 发：悦乐镇店坪行政村田洼人，1910年1月生，1933年5月参加革命，庆华游击队班长，1935年5月在华池县作战牺牲。

高生信：柔远镇刘沟行政村人，1916年8月生，1933年2月参加革命，华池县军事部秘书，1936年7月牺牲。

杨青海，元城乡杨老湾人，1918年11月生，1934年1月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独立师二团班长，1936年7月在环县作战时牺牲。

王兆才，紫坊畔乡高庄行政村大榆山人，1916年6月生，1934年10月参加革命，赤安县警卫队战士，1936年7月在陕西省吴旗县作战中牺牲。

杨 翠：温台乡张桥行政村人，1914年3月生，1935年2月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四团某班班长，1937年2月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赵生华，五蛟乡刘阳圪行政村人，1912年7月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庆环分区独立二营战士，1937年4月在环县因公牺牲。

黄万子，悦乐镇上堡子行政村黄老庄人，1911年6月生，1933年7月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二团战士，1937年9月在庆阳县牺牲。

白光耀，庙巷乡西河坪人，1906年12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华池游击队战士，1937年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杨生贵，乔河乡窑渠人，1912年1月生，1933年3月参加革命，陕北红军独立师战士，1938年12月牺牲。

任学仓，庙巷乡杨岔行政村南湾人，1914年3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38年在庆阳县驛马作战中牺牲。

刘世财，定汉乡庙湾行政村西岔沟人，1901年生，1938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华池县温台区六乡除奸主任，1939年5月因公牺牲。

晏会杰，桥川乡胡岔圪塄人，1908年1月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39年7月在庆阳县牺牲。

李兴荣，乔河乡高山畔人，1917年3月生，1935年1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39年8月在山西省作战中牺牲。

康金元，紫坊畔乡杨道坡人，1915年1月生，1937年10月参

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0年2月在庆阳县牺牲。

李成升：庙巷乡田河行政村人，1916年8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华池县水泛区（今属陕西省吴旗县）干部，1940年9月牺牲。

李凤明：温台乡大沟门人，1918年3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华池县警卫队战士，1940年在环县曲子因公牺牲。

周生魁：桥川乡胡岔圪塔人，1901年4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华池县元城区助理员，1942年牺牲。

王生彦：紫坊畔乡唐河人，1918年4月生，1935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团给养员，1943年3月在华池牺牲。

张 杰：温台乡雷阳沟人，1911年9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旅部通讯员，1943年10月在庆阳县牺牲。

安占斌：上里原乡安岸人，1908年4月生，1942年8月参加革命，华池县李良子区四乡干部，1944年4月因公牺牲。

何发财：悦乐镇寨园人，1918年1月生，1934年4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某班班长，1944年7月牺牲。

刘志清：紫坊畔乡唐河人，1917年4月生，1938年4月参加革命，华池县警卫队班长，1944年7月牺牲。

何兴才：定汉乡庄科行政村人，1920年8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4年在陕西省定边县牺牲。

牟成林：悦乐镇马登原人，1921年3月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5年11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张文翰：城壕乡中原行政村人，1928年3月生，1944年8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5年11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张占刚：王咀子乡郭原人，1914年12月生，1934年10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班长，1945年在河南省作战中牺牲。

徐占奎：乔河乡打扮行政村徐山人，1913年6月生，1940年10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6年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王明连：蔡坊畔乡郭畔人，1910年3月生，1934年3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班长，1946年8月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章聚昌：桥川乡老庄人，1922年9月生，1943年4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通讯营战士，1946年8月在陕西省吴旗县因公牺牲。

秦得福：上里原乡墩沟畔人，1927年3月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二团战士，1946年9月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高德仁：怀安乡曹峁子人，1920年4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华池县警卫队班长，1946年11月在华池县因公牺牲。

李生福：白马乡王沟门行政村东掌湾人，1907年9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6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杨生玉：怀安乡阳坪行政村人，1921年7月生，1939年1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旅部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延安市牺牲。

任旺银：桥川乡禾草渠人，1926年3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郑举强：城壕乡中原行政村人，1928年10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卢生义：王嘴子乡夏畔人，1917年2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贺明山：桥川乡龙嘴人，1927年生，元城区六乡民兵，1947年2月因公牺牲。

黄世安：元城乡黄庄人，1930年1月生，1946年6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旅部警卫连战士，1947年3月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永振：王嘴子乡陈家原人，1917年7月生，1934年7月参加

赵志成：元城乡赵南掌人，1928年9月生，1947年5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纵队八旅六团通讯连战士，1947年10月在陕西省清涧县作战中牺牲。

刘德全：柔远镇张阳洼人，1922年6月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新四旅一团战士，1947年11月在陕西省清涧县作战中牺牲。

安毛胎：上里原南庄人，1914年5月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11月在陕西省吴旗县牺牲。

梁生荣：白马乡梁岔人，1926年4月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11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田得湖：温台乡高河行政村人，1911年9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班长，1947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郑世华：上里原乡杨洼人，1921年3月生，1940年4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某排排长，1948年3月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侯培英：元城乡杨沟人，1923年12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野四纵队三旅警卫连战士，1948年3月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朱正明：紫坊畔乡庙沟人，1922年10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3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刘万梨：柔远镇大掌人，1917年5月生，1939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纵队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4月在陕西省白水县黄龙山作战中牺牲。

黄帮富：上里原乡杨掌人，1908年1月生，1937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陈兴元：上里原乡南庄人，1927年8月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8年4月在陕西省佳县作战中牺牲。

李岁娃：悦乐镇王桥人，1928年10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杨占堂：元城乡大庄科人，1928年10月生，1947年1月参加

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正功：五蛟乡王庄人，1926年8月生，1947年5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某班班长，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生岳：白马乡庙掌人，1923年3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凤杰：李良子乡谢掌人，1927年2月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4月在正宁县作战中牺牲。

傅长明：李良子乡庙嘴人，1928年7月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旅部战士，1948年4月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王得宽：桥川乡胡前庄人，1922年1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二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王翻生：柔远镇张湾人，1930年9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二团战士，1948年4月在陕西省白水黄龙岗作战中牺牲。

赵德发：柔远镇屈堡子村人，1916年3月生，1938年10月参加革命，西北野战军四纵队三旅二团战士，1948年4月在陕西省白水黄龙岗作战中牺牲。

鲁富功：五蛟乡马湾人，1931年1月生，1948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5月在华池县牺牲。

张怀庆：城壕乡张前山人，1918年7月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某排排长，1948年5月在陕西省白水县作战中牺牲。

郭满：温台乡刘沟人，1921年4月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5月在正宁县榆林子作战中牺牲。

杜春太：白马乡寺儿掌人，1918年7月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六团战士，1948年7月在陕西省白水县作战中牺牲。

徐鸿云：桥川乡徐背台行政村人，1928年3月生，1948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7月在华池县牺牲。

何南北：桥川乡胡岔圪塔人，1929年3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7月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张正西：城壕乡小沟门人，1906年3月生，悦乐区四乡民兵，1948年8月在陕西省合阳县牺牲。

郭佰子：悦乐镇南沟门村人，1930年1月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8月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贺忠仁：柔远镇城关村人，1925年4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一五团战士，1948年8月在陕西省壶梯山作战中牺牲。

李全福：紫坊畔乡唐河人，1914年4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华池县白马乡刘坪乡文书，1948年8月牺牲。

白培财：柔远镇张阳洼人，1920年2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某班班长，1948年9月在陕西省澄县作战中牺牲。

赵玉周：五蛟乡柳河庄人，1921年3月生，1946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8年10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封定仓：城壕乡转嘴子人，1932年3月生，1944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通讯营战士，1948年10月在华池县牺牲。

李 贵：城壕乡马掌人，1925年7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某班班长，1948年10月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张有治：定汉乡范沟人，1921年5月生，1939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某班班长，1948年10月在华池县牺牲。

段希耀：李良子乡道子掌人，1911年2月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11月在华池县牺牲。

张明孝：白马乡张兴庄人，1921年6月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庆阳专署党校管理员，1948年12月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张 祥：温台乡张桥原人，1927年3月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侦察排排长，1948年12月在陕西省白水县作战中牺

牲。

杨宽天，怀安乡人，1930年生，元城区七乡一村干部，1948年12月在元城因公牺牲。

韩村贵，元城乡老庙咀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营战士，1948年12月在元城高沟门牺牲。

程元慕，山庄乡大庄人，1924年生，1948年7月参加革命，高台兵站炊事员，1948年12月牺牲。

高岗，元城乡老庙咀行政村人，1889年生，元城区七乡一村农民，1948年12月因公牺牲。

高秀山，柔远乡蒋湾人，1914年4月生，柔远区五乡民兵，1948年在陕西省合阳县作战中牺牲。

杨禄，怀安乡高石砭人，1927年12月生，怀安乡民兵，1948年在陕西省合阳县作战中牺牲。

乔继山，紫坊乡庙沟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8年8月参加革命，华池县白马区担架队员，1948年因战牺牲。

刘生荣，乔河乡乔庄子行政村人，1920年8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9年1月在华池县牺牲。

张喜忠，悦乐镇建沟门人，1928年6月生，1947年8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9年5月在环县牺牲。

曹治元，城壕乡火连湾行政村人，1925年8月生，1948年6月参加革命，华池县温台区四乡文书，1949年8月牺牲。

赵希科，五蛟乡九条沟门人，1926年5月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9年7月在陕西省高宁县作战中牺牲。

吴举奎，李良子乡周岭子人，1923年4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排长，1949年7月在陕西省眉县作战中牺牲。

张耀武，上里原乡甘旗人，1927年5月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后勤助理员，1949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李世邦，悦乐镇建丰村人，1936年5月生，1945年参加革命，西野一纵队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作战中牺牲。

王先亮，桥河乡打扮行政村人，1928年11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班长，1949年8月在青海省作战中牺牲。

强生安，桥川乡章桥人，1908年4月生，元城区六乡民兵，1949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高春华，山庄乡雷圪塔人，1902年9月生，1935年3月参加革命，白马区粮食助理员，1949年8月牺牲。

曹生宽，五蛟乡田台人，1930年2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十四团警卫班班长，1949年9月在宁夏固原县作战中牺牲。

徐广武，桥川乡郑掌村人，1936年7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西野一纵队八旅六团司号员，1949年9月在陕西省清涧县作战中牺牲。

王生科，五蛟乡田台人，1918年4月生，1943年11月参加革命，九五四二部队给养员，1949年10月在武威牺牲。

曾清海，定汉乡西沟人，1914年2月生，1937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五团副班长，1949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韩智礼，桥河乡深峡峁人，1926年8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战士，1951年2月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增补：

宗文秀，1924年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供给处粮食股长，1949年3月在合水县何家畔牺牲。

李明有，1911年3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马登原村村长，1947年6月在马登原因公牺牲。

合 水 县

阮大顺：固城乡高台村人，1887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刘志丹二支队司务长，1934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吴太发：太蕤乡黑木村人，1909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骑兵连战士，1934年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丑雄才：段集乡王庄村人，1928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陕北红军游击队战士，1934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薛玉山：何家畔乡姚圪塔村人，1915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志丹游击队排长，1935年在直落作战中牺牲。

郭康才：青嘴乡青嘴村人，1916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35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杜 锁：太白乡葫芦河村人，1933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35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杨德清：杨坪乡杨坪村人，1917年生，1936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胡应元：店子乡连家庄村人，1904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班长，193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士发：固城乡董家寺村人，1919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庆阳独立营战士，193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贾世成：蒿咀铺乡陈河村人，1909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警备七团一营战士，1938年在山西省作战中牺牲。

田玉才：西华池镇师家庄人，1910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五团三营战士，1938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田有才：固城乡董家寺村人，191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红五团班长，1938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阎丑子：段集乡王庄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陕甘宁边区游击队战士，1938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李生贵：固城乡高台村人，1903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红军五团九连班长，1939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李生春：西华池镇杨沟地村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39年在山西省作战中牺牲。

杨发春：固城乡固城村人，193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四连战士，1939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宗才：固城乡人，191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独立营七连战士，1940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李占彪：西华池镇黎庄子村人，1913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0年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段玉山：西华池镇段家川人，1912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1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冯生武：固城乡新村人，1914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警七团五连战士，1941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胡桂林：城关镇寺原村人，1915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警备七团三营副班长，1941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黄存和：太白乡连砭村人，189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警备七团三营八连班长，1942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石廷藩：青嘴乡老庄村人，1914年生，合水县五区四乡支书，1942年在宁县南义因公牺牲。

孙 贵：唐子乡双柳树村人，1916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庆阳独立团战士，1942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严长信：何家畔乡显头村人，191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警备七团三营战士，1942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赵海林：何家畔乡盘马村人，1903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八路军五团二营七连战士，1943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

牲。

李智信：固城乡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四连战士，1943年病故于合水县。

柳佐治：何家畔乡人，1913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4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范月娃：固城乡高台村人，192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志丹游击队战士，1944年失踪。

郝书堂：肖嘴乡卓堡村人，1935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4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周俊杰：吉峁乡侯家咀村人，1926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5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段文堂：何家畔乡人，192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县保安科班长，1945年在战斗中牺牲。

曹广治：西华池镇严沟围村人，190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佐占魁：吉峁乡罗家畔村人，1906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二营五连排长，1946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张天保：西华池镇人，1911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民兵战士，1946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何百荣：固城乡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四连战士，1946年病故于庆阳县。

张生发：吉峁乡九岭湾村人，1919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杨生荣：柳沟乡人，1916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6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徐永仁：段集乡化沟村人，1916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班长，1946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邵岁丑：西池华镇三里店村人，1918年生，合水县地方游击队队员，1946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孙永贞：固城乡固城村人，1919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孙炳信：何家畔乡何家畔村人，1921年出生，三八五旅五团二营战士，1946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如旺：西华池镇严沟圪村人，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6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生辉：肖嘴乡肖嘴村人，1922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李林瑞：肖嘴乡肖嘴村人，1925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庆阳独立五团四连排长，1946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谢文举：杨坪乡人，1927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春荣游击队队员，1946年在陕西省宝鸡作战中牺牲。

张彦子：吉岷乡九岭湾村人，1927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丁育兴：肖嘴乡肖嘴村人，1928年生，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6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石遵元：肖嘴乡老庄村人，1931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6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彭 贵：店子乡人，1889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店子区后援会主任，1947年牺牲。

高凤岐：太装乡黑木村人，1893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高永新：店子乡李沟圪村人，189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

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县自卫军战士，193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鸿玉：太莪乡北掌村人，189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刘 义：城关镇寺原村人，1901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侯清山：吉岭乡丑家川村人，1902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庆阳独立营排长，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高治发：固城乡董家寺村人，190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高文岳：店子乡李沟圈村人，1903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五连副排长，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吕 栋：店子乡双柳树村人，1903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任富旺：肖墙乡肖墙村人，1906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合水县五区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枣园战斗中牺牲。

康 贵：何家畔乡人，1911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班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权拴富：吉岭乡人，1913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杨占山：何家畔乡郭庄村人，1911年生，陕甘宁边区独立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王三义：西华池镇严沟圈村人，1912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田玉春：西华池镇师家庄村人，1912年生，1947年参加革

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张金堂：西华池镇黎庄村人，1912年生，合水县支前民兵，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明德：太莪乡黑木村人，1913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刘生清：吉峒乡吉峒村人，1913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独立营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冯家有：店子乡双柳树村人，1913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县支前民工，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马保印：固城乡新庄村人，1914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游击队战士，于1947年失踪。

焦孟有：店子乡连庄村人，1915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明天福：柳沟乡人，1915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排长，1947年在临洮县作战中牺牲。

叶生财：定祥乡寺家岭村人，1915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四军十师二十八团战士，1947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胡彦德：固城乡固城村人，1915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六连班长，1947年在酒泉县作战中牺牲。

鄢永南：西华池镇黎庄子村人，1916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史春才：固城乡高台村人，191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野战军后勤部战士，1947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辛俊珍：定祥乡西庄村人，1916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补充班班长，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胡述林：肖嘴乡寨子村人，1916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合水五区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党彦林：固城乡北川村人，1917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合水自卫军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延安作战中牺牲。

吕锋革：段集乡化沟村人，1917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徐永德：段集乡化沟村人，1917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何治财：西华池镇唐旗村人，1919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孙永堂：固城乡固城村人，1919年生，合水县三区六乡担架队队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陈庆彦：太莪乡北掌村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正宁县作战中牺牲。

李长发：西华池镇郑家庄村人，1920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严生华：吉岷乡人，1920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独立营二连二排战士，1947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刘 淮：太莪乡人，1920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担架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玉亮：肖嘴乡铁赵村人，192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合水五区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邵丑娃：西华池镇三里店村人，1921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合水二区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富兴：肖嘴乡肖嘴村人，1921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庆阳独立五团四连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明发：肖嘴乡铁赵村人，1921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十三团二营七连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郭 让：西华池镇严沟园村人，1921年生，合水县地方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杜廷有：固城乡高台村人，1921年生，合水支前民工，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陈庆珍：固城乡高台村人，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五连战士，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文付清：肖嘴乡肖嘴村人，1922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一营二连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周建华：固城乡新庄村人，1923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丑百虎：吉砚乡吉砚村人，1923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班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丑雷：太蕨乡太蕨村人，1924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陈庆华：太蕨乡人，1924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民工，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光华：何家畔乡盘马村人，1924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独立营机枪排战士，1947年作战中牺牲。

马学有：陕西省三原斗家堡人，192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政府警卫队班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孙彦贵：西华池镇孙寨沟村人，192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寿景：柳沟乡阳洼村人，1924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十三团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李玉魁：西华池镇严沟圪村人，1924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唐生荣：何家畔乡人，1924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合水六区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段茂元：太蕨乡罗儿原村人，1924年生，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王世荣：段集乡人，1925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独立营七连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光顺：何家畔乡人，1925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班长，1947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曹贵娃：固城乡新村人，1925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民工，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嗣海：肖嘴乡肖嘴村人，1926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黄金贵：吉峒乡黄寨子村人，1926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张步发：段集乡化沟村人，1926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保娃：定祥乡梁庄村人，1926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三营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良祺：肖嘴乡铁赵村人，1926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二营通讯员，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姚述福：肖嘴乡卓堡村人，1926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庆阳独立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杨银堂：固城乡王昌寺村人，1926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区五乡担架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占鳌：何家畔乡人，1926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六区游击队班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乔德才：吉峒乡丑家川村人，1927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五连战士，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孙继泰：板桥乡店房村人，1927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新华社电台报务员，1947年在陕西省延安作战中牺牲。

薛元虎：何时乡人，1927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班长，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李正民：何家畔乡人，1927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新兵营战士，1947年在作战中牺牲。

王登堂：何家畔乡何家畔村人，1927年生，合水县六区担架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仲岐：何家畔乡柳家川村人，1927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六区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 平：柳沟乡窑子头村人，1928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任平安：肖嘴乡肖嘴村人，1928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团子：肖嘴乡底庄村人，192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二团二营一连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乔维娃：太莪乡罗儿原村人，1928年生，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存娃：蒿咀铺乡蒿咀铺村人，1928年生，三八五旅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唐 忠：何家畔乡人，1929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警三旅武工队队员，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吉有善：何家畔乡人，1929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陕甘宁独立团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 月：西华池镇人，1929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战士，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邵有才：西华池镇严沟圈人，1947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八旅战士，1947年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汪华汉：太白乡太白村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张明贵：肖嘴乡寨子村人，1931年生，合水县地方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高 免：西华池镇杨沟地村人，1933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罗元福：陕西省双龙人，1943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医院护理，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王具明：城关镇东关人，1937年参加革命，七团二营战士，1947年病故。

王进贤：板桥乡锦坪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有三牛：太白乡安坪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陕西省富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唐秀文：板桥乡曹原村人，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通讯员，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孙 财：西华池镇孙家寨沟村人，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三拴：西华池镇唐旗村人，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西华池镇作战中牺牲。

谭辉毛：段集乡北头村人，合水县游击队排长，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崇林：段集乡北头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张步荣：段集乡北头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地方游击队排长，1947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郭志长：何家畔乡产白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警备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丑士华：吉岭乡丑家川村人，1902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营五连副班长，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唐生枝：柳沟乡人，1911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1948年在

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孙长发：老城镇寺原村人，1913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一营三连班长，1948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田玉明：西华池镇师家庄村人，1913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潘建功：店子乡人，1916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战士，1948年在作战中牺牲。

郭世贵：何家畔乡产白村人，1917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地方游击队队员，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丁长荣：肖嘴乡肖嘴村人，191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曹德成：何家畔乡柳家川村人，1919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六连战士，1948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贾 义：蒿咀铺乡陈河村人，1920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警备七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高儒岳：段集乡宜川村人，1920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庆阳独立团三营七连班长，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杨伯举：太蕨乡黑木村人，1921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陈贵安：店子乡吕峁子村人，1921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段贵珍：段集乡人，1923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陕甘边警五团八连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文士治：西华池镇师家庄村人，1924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卞正华：何家畔乡人，192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三团战士，1948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张金荣：何家畔乡截马村人，192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六区游击队队员，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牛富兴：何家畔乡峁子梁村人，1924年生，庆阳县五团六连班长，1948年在六盘山作战中牺牲。

杨月堂：城关镇水沟村人，1925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合水县警卫队战士，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文昌：段集乡塔胡人，1926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警五团五连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杨爱成：段集乡化沟村人，1926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三营战士，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雷七斤：吉岷乡吉岷村人，1926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解放军独立十三团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谭有亮：西华池镇杨沟地村人，192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杨爱成：段集乡化沟村人，1927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杨德义：定祥乡段家峁子村人，1927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廖林堂：西华池镇三里店村人，1927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侦察排排长，1948年在平凉作战中牺牲。

刘富民：柳沟乡人，192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野战军五团五支队战士，1948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郑殿明：太白乡太白村人，192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班长，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段德贵：段集乡王庄村人，1928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警五团五连排长，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李如林：太白乡苗村人，193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合水县保安队战士，1948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丁元惠：肖嘴乡肖嘴村人，1931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赵定华：段集乡北头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班长，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余 庆：蒿咀铺乡蒿咀铺村人，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六连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郑希荣：杨坪乡王湾村人，1948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张 明：西华池镇黎庄村人，1904年生，合水县地下工作者，1949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杨正家：段集乡宜州村人，1905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9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任世峰：何家畔乡峁头村人，1908年生，庆阳独立团一营三连排长，1949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王兴海：西华池镇黎庄村人，190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县游击队排长，1949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牛天华：固城乡高台村人，1912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二营六连司务长，1949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许世珍：西华池镇师家庄村人，1912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合水县二区组织科科长，1949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孙德贤：西华池镇黎庄子村人，1913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队员，1949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强峻山：太莪乡罗儿原村人，1914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9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何孝发：城关镇孟家沟村人，1916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

西北野战军三十一团一营排长，1949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王占豪：固城乡高台村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红军三团战士，1969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鲁拴娃：西华池镇严沟圪村人，1918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高满贵：固城乡新庄村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9年因公牺牲。

张金秀：西华池镇邵庄子村人，1920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公安队排长，1949年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徐占帮：段集乡化沟村人，1923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大队班长，1949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牛德廷：太白乡连砭村人，1924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合水县游击队班长，1949年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杨云山：吉岷乡罗家畔村人，1928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四连战士，1949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赵怀礼：何家畔乡人，1929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五团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裴希武：太白乡柳坪村人，1931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解放军二九团通信员，1949年在牛源因公牺牲。

王景贵：定祥乡田窑村人，1915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志愿军独立五团战士，1950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韩银学：吉岷乡黄寨子村人，1926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武威部队战士，1950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李万杰：西华池镇黎庄村人，1932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独立二团战士，1950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王中孝：固城乡北川村人，191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51年在四川省成都作战中牺牲。

徐拴录：段集乡段集村人，1921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中

国人民解放军家属队队长。1951年在上海因公牺牲。

杨生林：青嘴乡人，1925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合水独立团二营六连战士，1951年在合水牺牲。

李德录：店子乡人，1926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兰州市警卫团战士，1951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郑国基：店子乡人，1931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一〇九师五六九团战士，1951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赵兴雷：柳沟乡窑子头村人，1888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52年在合水县因公牺牲。

曹德忠：吉岷乡吉岷村人，1903年生，西北野战军第一骑兵团班长，1952年在青海省作战中牺牲。

王德发：吉岷乡王嘴村人，1918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志愿军一九二师炮团战士，1952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杨清山：西华池镇华市村人，192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2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李永益：店子乡连庄村人，1923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3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薛占玉：何家畔乡郭庄村人，1930年生，第一野战军独立四师骑兵团警卫员，1953年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郭 富：何家畔乡产白村人，警备三旅五团战士，1953年在甘南作战中牺牲。

徐治贵：太白乡葫芦河村人，1891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陕甘宁边区医院医生，在华池县东华池因公牺牲。

正 宁 县

冯德娃：三嘉乡响台行政村人，1900年5月生，1932年参加革命，三嘉赤卫军队员，1932年在永和作战中牺牲。

随狗月：榆林子乡中巷行政村人，1907年7月生，1932年1月参加革命，当地苏维埃政府游击队队员，1932年在南庄作战中牺牲。

吴 玉：猴头乡荀仁行政村人，1909年9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新正县一区六乡青年主任，1933年5月在永和被捕牺牲。

袁三宝：永和乡上南行政村人，1891年生，1932年4月参加革命，赤卫军战士，1933年7月在永和作战中牺牲。

赵政娃：猴头乡荀仁行政村人，1913年7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队员，1933年在陕西省淳化县铁王村作战中牺牲。

赵地功：猴头乡荀仁行政村人，1917年6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基部战士，1933年在陕西省旬邑县清水原作战中牺牲。

李林瑞：永和乡下南坡头行政村人，1898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永和乡粮食委员，1933年被捕牺牲。

李 立：永和乡上南坡头行政村人，1907年10月生，1932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战士，1934年8月在下南坡头作战中牺牲。

李双娃：永和乡下南坡头行政村人，1910年10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队员，1934年8月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彭彩合：五顷原西头行政村人，1912年8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战士，1934年在安兴作战中牺牲。

陈太保：五顷原南邑行政村人，1912年8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陕甘苏区第三路游击指挥部战士，1934年在宁县军邑庙作战牺牲。

刘三成：宫河乡北堡子行政村人，1913年4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战士，1934年在华池县豹子川作战中牺牲。

赵天成：榆林子乡马家行政村人，1914年7月生，1934年3月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战士，1935年2月在合水县柳村原作战中牺牲。

高发林：榆林子乡前文乐行政村人，1902年10月生，1935年元月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五支队班长，1935年3月在南庄作战中牺牲。

代启娃：永和乡上南坡头行政村人，1912年5月生，1934年2月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战士，1935年4月在陕西省耀县寺沟作战中牺牲。

王柱子：永和乡堡子行政村人，1917年5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一团预备连战士，1935年4月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作战中牺牲。

第 白：永正乡纪村行政村人，1919年7月生，1935年2月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情报员，1935年11月在山河被捕牺牲。

穆政积：榆林子乡前文乐行政村人，1906年9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分队长，1935年在罗川被捕牺牲。

徐 中：三嘉乡林家坡行政村人，1905年11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地游击队队员，1935年在陕西省淳化县作战中牺牲。

郭树卫：祖头乡张村人，1911年12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地游击队队员，1935年在南邑被捕牺牲。

赵 运：月明乡柴桥子行政村人，1912年7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陕甘苏区第三路游击指挥部战士，1935年在宁县盘克作

战中牺牲。

赵崇养：湫头乡碾庄子行政村人，1915年11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赤卫军队员，1935年在永和被捕牺牲。

秦 田：五顷原西头行政村人，1917年6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队员，1935年在宁县早胜作战中牺牲。

张银举：湫头乡双佛堂行政村人，1903年2月生，双佛堂村贫农团团长，1935年在本村被捕牺牲。

李喜财：湫头乡张村行政村人，1916年10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三团战士，1936年4月在陕西省套同原作战中牺牲。

赵百姓：榆林子乡坊庄行政村人，1900年9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队员，1938年7月在宁县早胜被捕牺牲。

何满富：榆林子乡前文乐行政村人，1911年生，1933年8月参加革命，平子游击队战士，1936年10月在陕西省旬邑县北崖头作战中牺牲。

魏治成：山嘉乡陈家川行政村人，1914年9月生，1931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八支队班长，1938年在三嘉黄柏作战中牺牲。

巩书贵：永和乡安兴行政村人，1900年4月生，1933年5月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一团二连战士，1936年在陕西省安定县作战中牺牲。

梁国珍：湫头乡梁沟圈行政村人，1900年6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正一区统战干事，1936年在西安被捕牺牲。

郑自成：山河乡王阁行政村人，1908年9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排长，1935年在王阁村被捕牺牲。

姜应财：五顷原龙庄子行政村人，1910年7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1936年在湫头被联保主任姚秉辉杀害。

范月娃：五顷原龙头行政村人，1916年11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陕甘苏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战士，1936年在陕西省且巴寨子作战中牺牲。

文金等：永和乡过庄行政村人，1918年6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某班班长，1936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雷根学：五顷原南邑行政村人，1911年12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新正县一区青年主任，1936年在揪头被揪头联保主任姚爱辉杀害。

谭贵芳：山河乡半川行政村人，1919年7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陕甘苏区第三路游击队战士，1936年在宁县芝牛坡作战中牺牲。

文金禄：三嘉乡陈家川行政村人，1917年4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二支队战士，1936年在永和作战中牺牲。

魏生福：揪头乡双佛堂行政村人，1902年6月生，双佛堂村贫农团团长，1933年在本村被捕牺牲。

李广权：永和下南坡头行政村人，1917年4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新正县六区青年干事，1937年7月在陕西省旬邑县底庙被捕牺牲。

党占鳌：榆林子乡傅家崖窑行政村人，1916年7月生，1934年4月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班长，1937年11月在三嘉作战中牺牲。

党印明：正宁县榆林子乡党家西壩行政村人，1917年4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排长，1937年在陕西省小石崖作战中牺牲。

萧善祥：揪头乡葫芦沟行政村人，1905年4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陕甘宁边区保卫队战士，1937年病故于陕西省安吴。

李文秀：周家乡李家咀行政村人，1921年9月生，1937年参

加革命，八路军某部班长，1937年在山西省孝义县作战中牺牲。

刘岁娃：五顷原峁子行政村人，1918年10月生，1937年12月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战士，1938年2月在湫头作战中牺牲。

张五开：宫河乡张家咀头行政村人，1917年4月生，1936年10月参加革命，红一方面军某部班长，1938年6月在河北省易县作战中牺牲。

杜宗富：湫头乡杜家堡行政村人，1915年7月生，1934年8月参加革命，红二十六军某部战士，1938年7月在陕西省清水原作战中牺牲。

任有清：三嘉乡刘家店子行政村人，1911年3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班长，1938年11月在旬邑县作战中牺牲。

巩殿奎：湫头乡双佛堂行政村人，1907年9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战士，1938年在热河作战中牺牲。

魏长春：罗川乡南山行政村人，1910年7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战士，1938年在罗川被捕牺牲。

赵进德：三嘉乡南庄子行政村人，1919年11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战士，193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张永儒：山河乡刘家畔行政村人，1908年10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排长，1938年在石家庄作战中牺牲。

崔昌子：西坡东新庄行政村人，1900年7月生，1937年12月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战士，1938年在三嘉作战中牺牲。

任琪昌：榆林子乡小寺头行政村人，1922年7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正县保安大队战士，1938年在彬县牺牲。

李文成：月明乡赫家嘴子行政村人，1915年10月生，1933年8月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战士，1939年3月在陕西省富平县牺牲。

高东耀：罗川乡城关行政村人，1918年3月生，1936年11月

参加革命，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一营二连战士，1939年9月在庆阳县赤城作战中牺牲。

李毛月：三嘉乡松树坪行政村人，1916年9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班长，1939年在涇头梁沟圈作战中牺牲。

代蜜子：涇头村西城行政村人，1918年7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新正县保安大队班长，1939年在陕西省马兰作战中牺牲。

刘启启：五顷原峁子行政村人，1920年7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正游击队排长，1940年3月在陕西省且巴寨子作战中牺牲。

梁世红：涇头乡梁沟圈行政村人，1920年3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班长，1940年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秦有娃：五顷原西头行政村人，1908年11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战士，1940年在延安因公牺牲。

屈则升：山河乡人，1909年3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1941年10月被敌杀害。

宾德仁：山河乡五顷行政村人，1921年4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正一区六乡党支部组织委员，1942年2月因公牺牲。

胡万海：山河乡杜家坪行政村人，1910年5月生，杜家坪村贫农团团长，1942年3月在杜家坪村被捕牺牲。

秦 泰：山河乡秦家店子行政村人，1917年8月生，1942年1月参加革命，关中分区司令部特务连二排副排长，1942年11月在陕西省马兰作战中牺牲。

路政财：涇头乡张村行政村人，1918年4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排长，1942年在陕西省安定县作战中牺牲。

张文德：涇头乡莫刺行政村人，1915年6月生，新正一区肃反委员，1942年在涇头新庄子被捕牺牲。

巩银玲：西坡尖角行政村人，1915年10月生，1937年参加革

命，保安队战士，1943年5月在刘家店子被捕牺牲。

景生发：月明乡碾子坡行政村人，1919年6月生，1938年11月参加革命，陕甘边区警一旅三团一营战士，1943年在陕西省旬邑县清水原作战中牺牲。

艾兴财：山河乡店子行政村人，1916年7月生，1939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关中分区红三团一营一连战士，1943年在陕西省旬邑县作战中牺牲。

康自成：三嘉乡康原子行政村人，1911年9月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二十六军某部排长，1944年在陕西省爷台山作战中牺牲。

康居禄：三嘉乡康原子行政村人，1918年9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八路军某部排长，1944年在陕西省爷台山作战中牺牲。

秦光元：五顷原吕家沟围行政村人，1924年8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卫生员，1944年在作战中牺牲。

路俊发：三嘉乡下五河行政村人，1909年3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排长，1944年在陕西省耀县药王山作战中牺牲。

袁灵海：湫头乡苜蓿岭行政村人，1910年2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新正县保安大队班长，1945年在湫头作战中牺牲。

惠西杰：月明乡人，1927年2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马兰贸易公司战士，1945年在月明牺牲。

杨秉义：月明乡杨台行政村人，1915年4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新宁县独立营机枪班班长，1945年在陕西省旬邑县作战中牺牲。

巩兴勤：湫头乡崖窑行政村人，1920年8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陕甘宁边区警一旅三团三营班长，1945年在陕西省淳化县作战中牺牲。

陈书勤：五顷原南邑行政村人，1925年3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关中分区独立营战士，1945年在五顷原作战中牺牲。

郭生财：湫头乡南郭子行政村人，1911年3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排长，1946年6月在宁县九坝作战中牺牲。

马兆龙：五顷原五里桥行政村人，1926年9月生，1940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战士，1948年在固西县作战中牺牲。

龚进财：西坡瓦窑沟圈行政村人，1920年3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关中分区三团二营二连排长，1946年在高家渠作战中牺牲。

关继光：三嘉乡响台行政村人，1907年4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47年1月在东坡头被捕牺牲。

高树贤：湫头乡张村行政村人，1932年7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战士，1947年3月在永和湫池沟作战中牺牲。

龚志清：西坡乡高家渠行政村人，1909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宁一区统战科科长，1947年4月牺牲。

赵九思：湫头乡新庄子行政村人，1908年10月生，1933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关中分区财税干部，1947年5月在半川被捕牺牲。

郭印才：湫头乡南郭行政村人，1906年11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正县一区三乡治安委员，1947年5月在北屋被捕牺牲。

龚善功：五顷原西头行政村人，1919年6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战士，1947年5月在作战中牺牲。

雷自霄：五顷原五里桥行政村人，1917年10月生，1935年8月参加革命，教师，1947年6月在王家渠被捕牺牲。

苏发财：月明乡湫沟地行政村人，1919年5月生，1938年参加

革命，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1947年8月在黑水寺作战中牺牲。

何聚海：月明乡杨台行政村人，1931年10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四区六乡民兵，1947年9月在安家垣因公牺牲。

赵天中：三嘉乡林家坡行政村人，1918年11月生，1939年11月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战士，1947年12月在陕西省旬邑县西原子作战中牺牲。

田掌土：湫头乡后庄子行政村人，1927年4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班长，1947年在张村作战中牺牲。

赵恩春：山河乡秦家店子行政村人，1917年9月生，1940年3月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通讯员，1947年在陕西省旬邑县作战中牺牲。

刘志远：榆林子西坡头行政村人，1911年4月生，1932年参加革命，1947年在习作因公牺牲。

赵思泰：湫头乡王郎坡行政村人，1909年4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排长，1947年在龙嘴子作战中牺牲。

贾治：西坡东五畔人，1919年4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二团一连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石底子作战中牺牲。

焦启瑞：山河乡秦家店子乡人，1920年3月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1947年在陕西省淳化县作战中牺牲。

马华彦：五顷原孟家河行政村人，1917年10月生，1940年12月参加革命，湫头区政府助理员，1947年在永和牺牲。

丁治荣：永和乡安兴行政村人，1912年2月生，1941年参加革命，关中分区三团一营二连排长，1947年在赤水县何家庙作战中牺牲。

李凤梓：三嘉乡响台行政村人，1914年6月生，1941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班长，1947年在关中作战中牺牲。

邱正儒：西坡乡三里原行政村人，1919年5月生，1946年12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陕甘宁边区警一旅二团一营二连机枪班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黄陵县上峪子作战中牺牲。

雷六兴：湫头乡湫东行政村人，1922年4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二连战士，1948年1月在三嘉梁子原作战中牺牲。

李世华：月明乡李家川行政村人，1923年7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班长，1948年3月在陕西省凤泉作战中牺牲。

孙富元：五顷原西渠村人，1924年5月生，1948年12月牺牲。

张万玉：湫头乡双佛堂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马兰分区青年主任，1948年在陕西省米脂县牺牲。

徐狗豆：三嘉乡林家坡行政村人，1918年9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正县独立营战士，1948年在镇原县屯子镇作战中牺牲。

王明军：五顷原龙嘴子行政村人，1924年11月生，1942年3月参加革命，曾在延安空军司令部工作，1948年在延安作战中牺牲。

赵镇娃：月明乡李家川行政村人，1924年1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员，1948年在碾子坡牺牲。

秦善谋：五顷原西头行政村人，1924年5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八路军某部军医，1948年在山西石门庙作战中牺牲。

李贵林：月明乡月南行政村人，1930年9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陕甘宁边区警一旅三团战士，1948年在宁县桂花园作战中牺牲。

蔡如银：月明乡张安子行政村人，1921年5月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陕甘宁边区警一旅二团一营一排三班战士，1948年

在陕西省张洪作战中牺牲。

王有金：湫头乡马嘴头行政村人，1925年6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宜君县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杨保山：月明乡党家沟圈人，1926年7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五支队战士，1948年在宁县芦芭庄作战中牺牲。

陈进合：五顷原南邑行政村人，1922年9月生，1941年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三原作战中牺牲。

杨来堂：西坡尖角行政村人，1922年9月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新正县政府管理员，1949年在宁县桂花园作战中牺牲。

张兴摩：罗川长口子行政村人，1929年10月生，1948年6月参加革命，新正县游击队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旬邑县麻园作战中牺牲。

魏忠堂：三嘉乡陈家川行政村人，1905年6月生，1933年参加革命，新正县二区助理员，1949年在陕西省旬邑县杨店子作战中牺牲。

路兆海：永正乡堡住行政村人，1931年1月15日生，1949年7月10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五九团二营四连战士，1952年3月17日在朝鲜临江河战斗中失踪。

袁 秉：永正乡纪村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6年2月参加革命，红一团骑兵连战士，后失踪。

李耕图：周家乡周家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后失踪。

王思兴：永正乡堡住行政村人，1910年生，1935年3月参加革命，后赴朝抗美援朝失踪。

宁 县

李拴才：盘克乡阔家沟行政村人，1911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某排长，1933年在合水县板桥战斗中牺牲。

刘双才：九坝乡左家川行政村人，1933年参加革命，九坝区游击队队员，1934年在南岔战斗中牺牲。

张贵海：九坝乡桃村庄人，1908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三支队队员，1934年在九坝街战斗中牺牲。

刘永慈：平子镇半坡行政村人，1891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宁县游击队队员，1934年在早胜镇被敌杀害。

雷顺银：石鼓乡高寺行政村人，1892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宁县游击队队员，1934年在石鼓上珍战斗中牺牲。

刘光明：金村乡南庄行政村人，1905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二团某排排长，1935年在金村被敌人杀害。

范新顺：平子镇范家行政村人，1907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某班班长，1935年在合水县柳沟战斗中牺牲。

李双鸾：平子镇惠堡行政村人，1912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35年在九坝乡瓦子场战斗中牺牲。

李金才：观音乡萝卜咀人，1909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35年在洛川战斗中牺牲。

段兴纪：九坝乡老庄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35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孟富元：平子镇修果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新宁县独立营战士，1936年在九坝战斗中牺牲。

王喜存：平子镇平子街人，1916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

新宁县三支队队员，1936年在石鼓战斗中牺牲。

王鹏子：南义乡马户行政村人，1912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某班班长，1936年在华池县悦乐川作战中牺牲。

张多成：湘乐镇张岭行政村人，1903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36年在瓦窑堡作战中牺牲。

朱大奎：金村乡老庄行政村人，1916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三支队战士，1936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朱德定：九坝乡桃树庄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36年在华池县悦乐川作战中牺牲。

朱膏正：九坝乡桃树庄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36年在盘克作战中牺牲。

谢德耀：湘乐镇付家山行政村人，1904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三路游击区宁县一支队班长，1936年在合水县磨子原吕家堡作战中牺牲。

刘玉保：平子镇半坡行政村人，1907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二团某排排长，1936年在保安县金鼎山作战中牺牲。

马顺子：湘乐镇方村行政村人，189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宁县一支队队员，1936年在湘乐镇南仓战斗中牺牲。

雷岁丑：石鼓乡雷家川行政村人，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三团某排排长，1937年在南梁作战中牺牲。

崔兆宣：湘乐镇崔家寺行政村人，1893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宁县一支队队员，1937年在南仓作战中牺牲。

孙祥娃：湘乐镇瓦罐窑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36年在九坝许家垣作战中牺牲。

刘积彦：石鼓乡刘家垣人，1918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红三团警卫员，1938年在石鼓战斗中牺牲。

苏瑞举：石鼓乡铁王行政村人，1902年生，1933年参加革

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三团某排排长，1938年在旬邑县杨坡头作战中牺牲。

孟树兰：平子镇孟老庄行政村人，1906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本村党小组组长，1939年在老庄执行任务时牺牲。

勾发财：早胜镇勾家行政村人，191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1年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

雷占荣：平子镇蒋邑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某排副排长，1941年在陕西作战中牺牲。

张别子：观音乡嘴头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马兰警卫团副班长，1941年在九嵕作战中牺牲。

王来子：平子乡惠堡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某班副班长，1942年在平子芦子头作战中牺牲。

张崇堂：观音乡嘴头行政村人，1912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新宁县游击队队员，1942年在九嵕作战中牺牲。

任双成：湘乐镇新庄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原红二团战士，1942年在湘乐作战中牺牲。

王驹骞：石鼓乡万原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警一旅三团九连班长，1943年在九嵕作战中牺牲。

郭建奎：湘乐镇柏树底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警一旅二团某班班长，1943年在湫头作战中牺牲。

张根梓：湘乐镇张嘴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游击队员，1943年在春荣作战中牺牲。

苏兴玉：石鼓乡铁王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独立营三连某排排长，1943年在宝鸡作战中牺牲。

苏培德：石鼓乡苏家城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保安队战士，1943年在九嵕作战中牺牲。

胡述英：观音乡胡家梁行政村人，1914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安保安三中队班长，1943年在西安作战中牺牲。

罗治春：观音乡豆家湾行政村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马兰警备团战士，1943年在马兰因公牺牲。

张改成：湘乐镇西门人，191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保安队战士，1944年在铁王村作战中牺牲。

石道升：湘乐镇任家圪坨人，1927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二中队战士，1944年在方寨子作战中牺牲。

冯德昌：石鼓乡苏家城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1944年在宫河作战中牺牲。

任付民：盘克乡街东行政村人，1908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合水游击队队员，1944年在合水县肖嘴作战中牺牲。

赵彦仑：盘克乡街东人，1890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4年在正宁县西坡战斗中牺牲。

雷全有：石鼓乡董家行政村人，1909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一旅二团战士，1944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马长雪：湘乐镇方村行政村人，1924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5年在吉林省岩台山作战中牺牲。

李佐汉：湘乐镇常家沟门人，1921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在马兰军分区教导处任班长，1945年在陕西省爷台山战斗中牺牲。

王有娃：石鼓乡铁王行政村人，1924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5年在马兰作战中牺牲。

刘拴娃：石鼓乡铁王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5年在山西省平型关战斗中牺牲。

李佐成：观音乡萝卜嘴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新

宁县警卫队副排长，1945年在万原作战中牺牲。

门全昌：观音乡嘴头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红二团二连副排长，1945年在正宁县西坡作战中牺牲。

豆亮瑞：观音乡东庄人，1922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延安防空队战士，1945年在延安因公牺牲。

付庚群：阜平乡尚新庄人，1915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5年在湘乐作战中牺牲。

王治兴：童乐镇宁村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5年在正宁县西头作战中牺牲。

杨让荣：米桥乡安子行政村人，1914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担架队队员，1945年在平子支前中牺牲。

刘树贵：新庄乡兴户行政村人，190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新宁县游击队队员，1949年在宁县城内作战中牺牲。

豆文才：观音乡东庄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延安警卫一团战士，1946年在宁县猴头沟作战中牺牲。

段义娃：盘克乡段堡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澄城作战中牺牲。

刘玉胡：平子镇半坡行政村人，1904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宁县三支队队员，1946年在正宁县榆林子被敌杀害。

付占财：平子镇老庄行政村人，1909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独立营某班班长，1946年在平子朱家桥作战中牺牲。

徐生彦：盘克乡徐家堡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警一旅二团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旬邑县杨坡头作战中牺牲。

胡崇银：盘克乡胡家堡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警一旅战士，1946年在正宁县西坡作战中牺牲。

赵保振：盘克乡街西人，1925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陕西澄城县中队通讯员，1946年在澄城县作战中牺牲。

齐春福：观音乡夜返沟人，1924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7年在宁县观音作战中牺牲。

贾镇子：平子镇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米脂县作战中牺牲。

何富有：平子镇下原行政村人，1915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47年在山西省作战中牺牲。

贾秉时：平子镇街南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7年在陕北作战中牺牲。

王德元：米桥乡常邑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7年在米桥乡安子塄作战中牺牲。

刘宝子：盘克乡任掌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关中警备团战士，1947年在山西省作战中牺牲。

李剑雄：盘克乡国家沟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耀县战斗中牺牲。

李兴贵：盘克乡国家沟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一旅二团战士，1947年在合水县店子原作战中牺牲。

杨自秀：盘克乡寨嘴子人，1909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十三支队班长，1947年在寨子掌作战中牺牲。

胡良兴：盘克乡任掌行政村人，1915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关中警备二团某排排长，1947年在米桥作战中牺牲。

裴富根：盘克乡寨家嘴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形义侦察敌情时遇难。

侯列成：盘克乡国家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延安保安队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南泥湾作战中牺牲。

李明子：盘克乡同家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警一旅战士，1947年在马兰战斗中牺牲。

李怀有：盘克乡任掌行政村人，1941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7年在任掌作战中牺牲。

吴大狗：盘克乡武洛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7年在马兰作战中牺牲。

赵发贤：盘克乡街西人，190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1947年在正宁县西坡作战中牺牲。

韩德三：观音乡黄沟圈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十五支队卫生员，1947年在观音乡杨老庄被敌杀害。

丁万发：观音乡丁家嘴 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某班班长，1947年在石鼓万原作战中牺牲。

罗万兴：观音乡罗家畔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延安保卫团战士，1947年在延安作战中牺牲。

李三友：观音乡豆家湾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7年在正宁县杨坡头作战中牺牲。

王自顺：石鼓乡铁王村人，1916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1947年在陕西省黄龙山作战中牺牲。

苏暖牛：石鼓乡佛堂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政府通讯员，1947年在湘乐菜花梁执行任务中遇害。

侯青喜：春荣侯家峁子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一支队班长，1947年在平子蒋邑执行任务中牺牲。

宋继成：春荣宋家畔行政 村人，1910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新宁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春荣作战中牺牲。

邵金财：金村乡南堡行政 村人，1920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一旅某班副班长，1947年在陕西省黄陵作战中牺牲。

陈先海：金村乡老庄行政 村人，1919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7年在金村作战

中牺牲。

付德文：金村乡付家庄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一旅三团某班班长，1947年在陕西省黄陵作战中牺牲。

赵殿发：九嵎乡赵台人，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军某部排长，1947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兰宝财：金村乡兰庄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新宁县独立营排长，1947年在陕西省旬邑县阳坡头作战中牺牲。

陈世财：南义乡马泉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47年在内蒙古作战中牺牲。

袁满仓：南义乡东畔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7年在支前中牺牲。

米德臣：湘乐镇付家山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1947年在九嵎战斗中牺牲。

朱显亮：湘乐镇朱家人，1920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三团战士，1947年在山西省作战时牺牲。

马正川：湘乐镇柏树底行政村人，1914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某班班长，1947年在九嵎瓦子塄作战中牺牲。

于银堂：湘乐镇字村人，1927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五支队队员，1947年在九嵎瓦子塄战斗中牺牲。

杨治国：太昌乡申明胡同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军三九〇团七七营某排排长，1947年在板桥作战中牺牲。

王本子：平子镇下原行政村人，1911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二支队班长，1948年在盘克乡王大岭作战中牺牲。

张恒秀：平子镇下原行政村人，1910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一支队战士，1948年在盘克乡王大岭作战中牺牲。

朱占山：平子镇北堡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7年参加革

命，新宁县一支队班长，1948年在盘克乡燕介湾战斗中牺牲。

宋德梁：石鼓乡芦家沟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在石鼓作战中牺牲。

王生录：石鼓乡铁王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红二团某排排长，1948年在宝鸡作战中牺牲。

刘伍儿：石鼓乡万原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一旅二团某班班长，1948年在陕西省黄龙山作战中牺牲。

豆恩海：石鼓乡黑庄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马兰专区通讯员，1948年在马兰作战中牺牲。

雷有文：平子镇蒋邑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红三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乾县作战中牺牲。

于茂亭：金村乡九曲人，1917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8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王德才：九坝乡鲁甲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一支队队员，1948年在盘克坝头作战中牺牲。

庞中奎：湘乐镇庞川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警一旅一团二连排长，1948年在翠盘山作战中牺牲。

付恩荣：湘乐镇付家山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延安保卫队战士，1948年被敌杀害于湘乐。

唐思有：湘乐镇久湾行政村人，1908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1948年在金村庙被敌杀害。

李生弟：盘克乡潘村行政村人，1904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马兰警备团担架员，1948年在泾川五都庙作战中牺牲。

段兴娃：盘克乡段堡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一支队战士，1948年在南义李家庄作战中牺牲。

吴存喜：盘克乡武乐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合水县八支队担架队员，1948年在西华池作战中牺牲。

胡德治：盘克乡前梁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6年参加革

命，担架队队员，1948年在镇原县屯子镇战役中牺牲。

吴广才：盘克乡罗侯行政村人，1916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马兰独立营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土桥作战中牺牲。

赵殿发：盘克乡街东行政村人，192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8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刘德功：盘克乡任掌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8年在宁县城作战中牺牲。

李茂华：盘克乡阎家沟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8年在盘克乡潘村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

豆彦华：观音乡观音庙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新宁县十三支队担架队队员，1947年3月在西华池战斗中牺牲。

李含昌：观音乡沟圪人，193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三团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杨广运：石鼓乡上齐行政村人，1924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新宁县警卫队班长，1948年在铁王村作战中牺牲。

李有祥：盘克乡阎湾行政村人，1908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宁县十三支队战士，1948年在当地吕家窑子被敌杀害。

段成儒：盘克乡段堡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1949年在陕西省长武县作战中牺牲。

刘王俊：平子镇老庄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长武县中队管理员，1949年在陕西省长武县作战中牺牲。

陈帮珠：观音乡常家畔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洛川军分区文书，1949年在洛川战斗中牺牲。

柴正义：金村乡牌楼人，1914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新宁县独立营战士，1938年因故被杀，1983年被宁县政府追认为烈士。

环 县

李廷贤：芦家湾宋掌行政村人，1911年5月生，1935年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36年8月在固原县大涝坝作战中牺牲。

刘福海：合道乡梁坪行政村人，1900年生，1936年4月参加革命，合道乡唐台子游击队战士，1936年6月在西安因公牺牲。

苏汉德：山城乡赵源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36年7月在环县南派因公牺牲。

沈帮贵：合道乡朱家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6年7月参加革命，合道游击队战士，1936年10月在环县曲子果子原作战中牺牲。

李生堂：芦家湾乡宋掌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36年10月在环县庙儿掌因公牺牲。

黄立忠：天池乡大庄台行政村人，1899年1月生，1936年6月参加革命，环县合道游击队队员，1936年11月在环县演武作战中牺牲。

徐三岐：洪德乡苏长沟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6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游击队战士，1936年在环县南派因公牺牲。

曹仲华：西川唐原行政村人，1914年7月生，1936年4月参加革命，红二团战士，1937年3月在镇原县三岔病故。

张定祥：虎洞乡人，1914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9月在延安作战中牺牲。

陈全贵：毛井乡红糜湾行政村人，1895年生，1930年5月参加革命，红二方面军战士，1937年在陕西省同心县因公牺牲。

吕文清：洪德乡赵洼子行政村人，1910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洪德自卫队排长，1938年1月在环县南墩因公牺牲。

李玉清：樊庄乡樊庄行政村人，1910年2月生，1936年11月参加革命，曲子游击队排长，1938年7月在环县裴大岔作战中牺牲。

李万荣：八珠乡人，1918年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38年8月在宁县盘克作战中牺牲。

耿荣善：环城乡红星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游击队通讯员，1938年在环县环城作战中牺牲。

吴万君：罗山川乡陈渠子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环县保安队战士，1938年在合水县吉岷作战中牺牲。

殷天祥：木林乡人，1913年生，1937年5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39年2月在陕西省鸡先镇作战中牺牲。

李占儒：罗山川乡陈渠子行政村人，1917年6月生，1936年6月参加革命，环县司法处秘书，1939年2月在环县耿湾作战中牺牲。

林有岳：秦团庄乡贾原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庆环分区保安科巡事员，1939年8月在环县耿湾因公牺牲。

葛元俊：八珠乡八珠原行政村人，1923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39年11月在环县虎洞作战中牺牲。

李占祥：罗山川乡大树原行政村人，1905年9月生，1936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城区助理员，1939年12月在环县大树原因公牺牲。

詹效益：虎洞乡人，1909年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39年在陕西省志丹县作战中牺牲。

张维发：辛德乡新渠子行政村人，190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洪德乡新渠子行政村除奸主任，1939年在

环县新泉子因公牺牲。

李富栋：毛井乡砖城子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环县毛巾自卫军战士，1940年2月在环县砖城子因公牺牲。

黄贵荣：西川乡龚湾行政村人，1918年2月生，1937年8月参加革命，环县保安队战士，1940年5月在环县苦水寨作战中牺牲。

高生发：芦家湾乡盘龙行政村人，1899年2月生，环县盘龙行政村主任，1940年7月在环县盘龙因公牺牲。

贾守宽：环城乡十五里沟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保安队战士，1940年在环县火连湾作战中牺牲。

王占奎：曲子镇宋家原行政村人，1912年生，1936年4月参加革命，独立师骑兵旅某排排长，1940年在包头东关作战中牺牲。

郇三荣：天池乡人，1918年4月生，1938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1年在华池县大风川牺牲。

周玉芳：吴城乡大方山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41年在环县何庄湾病故。

陈志范：虎洞乡金庄原行政村人，1904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红二团某排排长，1941年在环县耿湾汾水岭因公牺牲。

王金义：木钵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16年4月生，1938年3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四团某班班长，1942年9月在延安因公牺牲。

漫俊山：环城镇人，1911年3月生，1938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2年11月在山西省牺牲。

汪盈碧：虎洞乡刘解掌行政村人，192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延安留守兵团战士，1942年在环县刘解掌病故。

苏汉章：车道乡元塄行政村人，1903年9月生，1989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元塄供销社主任，1948年5月在环县元塄因公牺牲。

念岁科：木钵乡韩油子行政村人，1928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5年5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韩德录：曲子镇孟家寨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环县税务局干部，1943年11月在环县庙儿掌因公牺牲。

薛凌霄：环城乡张尚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环县保安队战士，1943年在延安因公牺牲。

常秀科：虎洞乡常北台行政村人，192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保安科管理员，1943年在环县半个城因公牺牲。

郑清楼：秦团庄乡王团庄行政村人，1911年生，1981年2月参加革命，红二团三连一排排长，1945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郑领帮：洪德乡社路行政村人，1915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南川区大树原乡文书，1944年4月在环县大树原因公牺牲。

万永志：耿湾乡熊家掌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9年5月参加革命，红一团二营四连战士，1944年9月在陕西省瓦窑堡病故。

郝万虎：演武乡人，1914年5月生，1936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班长，1944年在宁夏固城乡作战中牺牲。

耿荣祖：洪德乡耿原畔行政村人，1915年11月生，1943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营二连战士，1944年在环县刘家湾因公牺牲。

郑仲武：曲子镇西沟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3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一营三连战士，1945年3月在庆阳县白马铺作战中牺牲。

王兴义：八珠乡人，192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某部连文书，1945年7月在庆阳县刘家寨作战中牺牲。

郭治庄：曲子镇人，1927年生，1943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5年8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黄元满：小河口乡李原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3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警备五团二营战士，1945年8月在合水县南义城作战中牺牲。

慕士斌：环城乡城东原行政村人，1911年2月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城区秘书，1945年9月在环县高楼峁因公牺牲。

王兴业：八珠乡白家原行政村人，192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三旅五团三营七连文书，1945年在庆阳周家寨子作战中牺牲。

王治贵：曲子镇西沟行政村人，1915年生，1937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八连战士，1945年在镇原电子镇作战中牺牲。

赵文彩：环城乡城东原行政村人，1919年5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环县保安科侦察员，1945年在环县马坊川作战中牺牲。

黄文孝：洪德乡李原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5年在延安因公牺牲。

何自发：演武乡沙地洼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特务连通讯员，1945年在庆阳县病故。

梁天举：山城乡人，1921年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3月在陕西省延长县作战中牺牲。

郝帮元：山城乡郝掌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3月在陕西延长县作战中牺牲。

刘三祥：曲子镇刘阳洼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2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一营二连战士，1946年4月在合水县张家山作战中牺牲。

李天和：洪德乡李原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6年参加革

命，环县保安队排长，1946年8月在镇原县马渠作战中牺牲。

苏存祥：车道乡三角城行政村人，1926年7月生，1940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9月在庆阳县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张鸿文：八珠乡人，1919年3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10月在庆阳县马岭牺牲。

郭殿成：木林乡人，1928年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1946年牺牲。

刘登杰：车道乡人，1920年3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南泥湾作战中牺牲。

突雄智：甜水乡人，1924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何家畔牺牲。

汤文学：合道乡人，1926年生，1944年5月参加革命，1946年在合水县望牛堡作战中牺牲。

李长富：吴城子乡人，1917年生，1940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6年在河南省洛阳作战中牺牲。

段宝珠：洪德乡苗河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陇东司令部独立团战士，1946年在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王成仁：樊家川乡人，1926年9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1月在陕西省关中牺牲。

王满富：小南沟人，1919年生，1944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1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赵国有：合道乡人，1913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1月在华池县牺牲。

秦有吉：天池乡四合掌行政村人，1908年8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天子游击队通讯员，1947年1月因公在环县合道乡岳掌牺牲。

郭满江：环城乡五里屯行政村人，1924年8月生，1938年5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某部排长，1947年1月在宁县南义作战中牺牲。

张天智：西川乡西川行政村人，1916年4月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某班班长，1947年1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陈广仁：木林乡人，1915年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县彭滩牺牲。

武治华：八珠乡人，1929年4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关中牺牲。

张仲山：合道乡人，1914年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2年在华池县牺牲。

王占业：八珠乡梁沟滩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8年1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三营七连排长，1947年2月在草滩铺作战中牺牲。

苏润祥：合道乡陶洼子行政村人，1939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三营八连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苏万荣：何坪乡常峪峁行政村人，1927年4月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7年2月在合水县西华池作战中牺牲。

黄东子：天池乡大庄台行政村人，1923年5月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七连某排排长，1947年2月在华池县豹子川作战中牺牲。

韩德山：曲子镇人，1913年生，1937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班长，1947年3月在庆阳县赤城牺牲。

段正芳：樊川乡长城原行政村人，1916年11月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七连排长，1947年3月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任太光：樊川乡长城原行政村人，1919年3月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四营三连排长，1947年3月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杨学德：木钵乡木钵行政村人，1923年生，1939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3月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张治国：木钵乡井儿岔人，1927年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机枪班战士，1947年3月在庆阳县赤城乡作战中牺牲。

严进珠：山城乡刘口子行政村人，1945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作战中牺牲。

贾壁祥：虎洞乡贾群行政村人，1917年8月生，1939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三团二营侦察班班长，1947年3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王 宣：曲子镇马家原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定边独立八团某班班长，1947年3月在陕西省定边县南门滩作战中牺牲。

李明亭：曲子镇刘旗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一营三连战士，1947年3月在庆阳县赤城乡作战中牺牲。

范恒泰：环城镇人，1915年1月生，1937年4月参加革命，某部管理员，1947年4月在环县被敌杀害。

吕文亮：洪德乡人，1915年7月生，1936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卫队队员，1947年4月在虎洞半个城作战中牺牲。

马生华：何坪乡人，1916年生，1944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4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余正堂：八珠乡纸坝沟行政村人，1903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曲子粮食仓库主任，1947年4月在环县毛井园公牺牲。

秦应江：洪德乡张原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3年12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排长，1947年4月在环县合道乡作战中牺牲。

王荣科：曲子镇高李湾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6年8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二营八连战士，1947年4月在陕西省定边县南门滩作战中牺牲。

许生贤：环城镇许家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在陕西省五亭子战斗中牺牲。

袁鸣杰：曲子镇宋家原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4月在陕西省定边县南门滩作战中牺牲。

赵银德：天池乡四合掌行政村人，1905年11月生，环县天子区担架队队员，1947年5月在陕西省保安县病故。

许生合：木钵乡人，1915年生，1947年5月参加革命，担架队队员，1947年6月在陕西省花麻城病故。

闵铭俊：樊家川乡人，1918年7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6月探亲时牺牲。

慕文治：樊川乡慕家河行政村人，1916年7月生，1944年1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十三团五营四连某班班长，1947年6月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李俊科：西川乡人，1920年3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担架队队员，1947年7月在陕西省合阳病故。

张红兵：秦团庄乡人，1916年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担架队队员，1947年7月在陕西省甘泉县作战中牺牲。

万建才：合道乡人，1918年生，1936年4月参加革命，某部炊事员，1947年7月牺牲。

黄俊元：何坪乡人，1910年生，1947年5月参加革命，担架队员，1947年7月在陕西省榆林作战中牺牲。

李生芳：秦团庄乡白原畔行政村人，1914年生，担架队员，1947年7月在陕西省甘泉县作战中牺牲。

李生五：曲子乡刘旗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一营三连战士，1947年7月在合水县太白镇作战中牺牲。

段正贵：八珠乡人，1919年11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8月在宁县盘克原牺牲。

慕文吉：樊川乡慕家祠行政村人，1918年9月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三营三连战士，1947年8月在陕西省安塞县作战中牺牲。

李考民：吴城子乡大方山行政村人，1911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曹李川三乡二村主任，1947年8月在环县大方山因公牺牲。

张盘德：吴城子乡大方山行政村人，1896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天池区曹李川乡干部，1947年8月在环县大方山因公牺牲。

郭廷瑞：八珠乡太白原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5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话务员，1947年10月在陕西省李家川作战中牺牲。

道义财：八珠乡人，1922年3月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12月在陕西省黄庄牺牲。

王德智：环城镇人，1914年7月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7年在江西省牺牲。

张广有：甜水乡人，1916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徐林生：罗山川乡人，1921年7月生，1946年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米脂县牺牲。

杜彦珍：虎洞乡人，1919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某部班长，1947年在环县二十里沟口作战中牺牲。

许风山：许家河乡人，1924年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某

邵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八盘岭牺牲。

都仁祥：合道乡人，1922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某单位担架员，1947年在庆阳县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刑正华：合道乡人，1919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在环县白草原作战中牺牲。

郭怀德：木钵乡韩洼子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8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八连某班班长，1947年在陕西省白水县作战中牺牲。

都俊杰：环城镇红星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三旅通讯员，1947年在陕西省宝鸡因战牺牲。

梁天喜：洪德乡梁岔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某部排长，1947年在镇原县太平镇作战中牺牲。

王百珍：木钵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四营三连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赤城作战中牺牲。

孙海成：吴城子乡城子行政村人，1947年牺牲。

乔生广：虎洞乡刘解掌村人，1920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施家河作战中牺牲。

杜彦珍：虎洞乡沙井子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班长，1947年在环县什里沟口作战中牺牲。

胡广财：合道乡尚西坪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7年3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三营七连给养员，1947年在华池县二将川作战中牺牲。

沈玉珍：环城镇人，1928年4月生，1946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黄庄牺牲。

王百富：许家河乡张湾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5年参加革

命。曲子县中队排长，1948年1月在庆阳县刘家庙作战中牺牲。

汪军智：小河口人，1916年生，1945年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赵生甲：合道乡人，1917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刘志兴：合道乡人，1926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梁俊平：合道乡人，1931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李秉信：吴城子乡人，1929年2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医院护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牺牲。

马孝清：曲子乡孟家寨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王仲兴：八寨乡马莲掌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三营某班班长，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叶战财：合道乡杨坪沟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王安福：木林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6年8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某班班长，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马生荣：洪德乡寇河行政村人，1928年2月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2月在环县洪德作战中牺牲。

郑奎华：许家河乡流房屋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西北野战军七一四团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肖奎锁：演武乡吴家原行政村人，1931年生，1946年9月参

加革命，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司号员，1948年2月在陕西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谢有恩：演武乡黄家山行政村人，1946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三营某班副班长，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李廷选：演武乡路家原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韩宝贵：曲子乡孟家寨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一营三连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陈满奎：何坪乡赵台行政村人，1922年5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团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陈万杰：何坪乡寨子坪行政村人，1946年6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三营三连通讯员，1948年2月在志丹县王高庄作战中牺牲。

李秉智：毛井乡大户掌行政村人，1926年3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环县保安队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乔文煊：耿湾乡万家湾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4年1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团二营四连某班班长，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刘秉富：西川乡天池行政村人，1919年4月生，1942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七连某排排长，1948年2月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李正甲：八珠乡人，1930年7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3月在陕西省富平县牺牲。

南登礼：南墩乡人，1921年3月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3月在陕西省富平县牺牲。

杨正川：何坪乡人，1929年3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袁德荣：曲子镇人，1921年生，1944年3月参加革命，某部炊事员，1948年3月在西安东关作战中牺牲。

王家住：，许家河乡人，1928年生，1946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3月在宝鸡市谢家庄牺牲。

王发科：曲子乡高李湾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一营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王发杰：曲子乡马家原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文俊岐：天池乡天池行政村人，1926年3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三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任登银：樊川乡马驿沟行政村人，1921年7月生，1943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十三团一营一连某班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宁正荣：环城乡宁老庄行政村人，1931年5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二营五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李志科：洪德乡耿原畔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二营三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景文秀：许家河乡董家原行政村人，1912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曲子县二中队战士，1948年3月在华池县病故。

沈廷献：小南沟乡丰台岔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十三团某班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峁作战中牺牲。

白尚才，虎洞乡沙井子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某班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梁鸿发，环城镇十五里沟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土特产公司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何天仁，演武乡路家原行政村人，1913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张秉英，演武乡黑泉河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苏玉海，吴城子乡碾盘岭行政村人，1929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独立营三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郑学虎，吴城子乡三沟渠行政村人，1926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某排排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苏登霄，何坪乡赵台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三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郭东樞，木钵乡高楼原行政村人，1932年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陇东分区老七团九连战士，1948年4月在陕西省岐山县作战中牺牲。

孙雄崇，许家河乡小庄子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8年3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王俊玺，许家河乡董家原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曲子县二中队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野狐沟作战中牺牲。

贾生锁，虎洞乡贾驿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十三团某排排长，1948年4月在镇原

县三岔作战中牺牲。

郭光明：曲子乡宋家原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5年4月参加革命，曲子游击队排长，1948年4月在庆阳县阜城因公牺牲。

沈守保：西川乡唐原行政村人，1928年8月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环县保安科战士，1948年4月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郭文义：木钵乡人，1911年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作战中牺牲。

周兴庄：木钵乡人，1921年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作战中牺牲。

郝保铸：樊家川乡人，1928年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牺牲。

袁富荣：天池乡人，1927年3月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5月在陕西省三合县作战中牺牲。

王世祥：演武乡人，1930年5月生，1948年5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5月在陕西省南大山牺牲。

孙兆成：曲子乡西沟行政村人，1937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作战中牺牲。

刘恩孝：八珠乡塔儿嘴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十四团三营七连某班班长，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作战中牺牲。

魏铎喜：八珠乡马连掌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作战中牺牲。

王彦玉：木钵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原作战中牺牲。

韩正杰：木钵乡韩洼子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三营九连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站镇

原作战中牺牲。

高荣秀：秦团庄乡贾原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陇东分区五十三团某班班长，1948年5月在华池县东沟作战中牺牲。

慕王成：樊川乡慕家河行政村人，1919年9月生，1944年1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十三团五营四连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毡镇原作战中牺牲。

慕夏章：樊川乡慕家河行政村人，1925年2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十四团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二毡镇原作战中牺牲。

杨永发：许家河乡张湾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二毡镇原作战中牺牲。

胡民奎：许家河乡小庄子行政村人，1926年11月生，1942年8月参加革命，曲子县保安科警卫队警卫员，1948年5月在陕西省柞水县因公牺牲。

杜长贵：虎洞乡沙井子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通讯员，1948年5月在庆阳二毡镇原作战中牺牲。

谢仲文：何坪乡常峪峁行政村人，1929年5月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某班班长，1948年5月在环县毛井作战中牺牲。

赵巨秀：西川乡杨庙掌行政村人，1921年12月生，1939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5月在环县杨庙掌病故。

田栓子：合道乡人，1935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6月在陕西省罗渠镇作战中牺牲。

杨治海：西川乡赵原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6月在华池县元城子病故。

杨岁星：天池乡苏兆仓行政村人，1917年4月生，环县天子区担架队员，1948年6月在陕西省罗渠镇作战中牺牲。

黄宝珊：合道乡人，1921年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7月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襄九仁：合道乡尚西坪行政村人，1928年2月生，1943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分区老五团战士，1948年7月在镇原县黑渠口作战中牺牲。

慕文广：樊家川乡人，1917年生，1944年9月参加革命，担架队员，1948年8月在陕西省安塞县作战中牺牲。

慕天科：八珠乡人，1928年12月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通讯员，1948年8月在山西省牺牲。

张全景：甜水乡人，1928年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通讯员，1948年8月在陕西省永丰镇牺牲。

潘维义：天池乡人，1918年1月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担架队员，1948年8月在陕西省安塞县牺牲。

黄仲科：八珠乡陈旗行政村人，1922年生，1938年3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某排排长，1948年8月在陕西省黄龙镇作战中牺牲。

道林秀：八珠乡苟家原行政村人，1932年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三营七连战士，1948年8月在华池县怀安病故。

张文信：环城镇张境行政村人，1931年生，1948年5月参加革命，环县公安局战士，1948年8月在环县十八里因公牺牲。

李春阳：木钵乡人，1902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担架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王贵廷：木钵乡人，1932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担架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王仲能：木钵乡人，1914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担架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念宗科：木林乡人，1927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慕宏彦：樊家川乡人，1928年生，1947年8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永丰县作战中牺牲。

张元治：八珠乡人，1922年3月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郑自英：八珠乡人，1918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班长，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黄廷全：木林乡高楼原行政村人，1929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户九玉：木林乡高楼原行政村人，1894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王万珍：木林乡水坝滩行政村人，1897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代玉德：木林乡韩洼子行政村人，1926年生，四军十一师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黄廷杰：樊川乡李腰峡行政村人，1922年4月生，1943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二连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黄国清：八珠乡陈旗原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西北野战军四纵队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永丰镇作战中牺牲。

周存社：八珠乡侯家湾行政村人，1932年生，二纵队九旅三十七团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刘生秀：木林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16年8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九旅七团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刘富杰：木林乡韩洼子行政村人，1924年生，四军十一师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刘善奎：木钵乡井儿岔行政村人，1916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王天时：木钵乡郭西掌行政村人，1915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张向人：木钵乡井儿岔行政村人，1908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王仲时：木钵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30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尚仲奎：合道乡尚西坪行政村人，1928年2月生，1946年6月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社曲镇作战中牺牲。

李 攻：木钵乡郭西掌行政村人，1904年生，陇东担架队队员，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王彦江：木钵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永丰镇作战中牺牲。

豆新民：木钵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15年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二纵队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白贵清：演武乡杨家洼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7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永丰镇作战中牺牲。

黄登贵：天池乡大庄台行政村人，1906年4月生，1939年3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四团某班班长，1948年9月在陕西省延安因公牺牲。

王凤华：樊川乡蕨家河行政村人，1918年2月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三旅十三团某排排长，1948年10月在镇原县三岔作战中牺牲。

黄宗潘：八珠乡八珠原行政村人，1929年生，1947年参加革

命，野战军四纵队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10月在陕西省富平县作战中牺牲。

马占库：车道乡红台行政村人，1920年2月生，1948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10月在环县车道乡作战中牺牲。

马占斌：车道乡红台行政村人，1928年10月生，1946年1月参加革命，某部军医，1948年10月在环县车道乡作战中牺牲。

杨维明：车道乡樱桃掌行政村人，1923年1月生，1945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10月在合水县太白镇作战中牺牲。

赵明德：天池乡大庄台行政村人，1931年3月生，1948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8年11月在环县赵渠作战中牺牲。

慕守棠：樊家川乡人，1927年11月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12月在环县樊家川病故。

穆有富：环城镇五里屯行政村人，1928年6月生，担架队员，1948年12月在陕西省西王庄作战中牺牲。

杨生景：天池乡苏尧岔行政村人，1906年10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四军七团三营九连战士，1948年12月在陕西省旬邑县作战中牺牲。

郝文祥：吴城子乡三合渠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1年7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龙文弟：曲子乡五里桥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二营通讯员，1948年在合水县朱家镇作战中牺牲。

龔广仁：樊家川乡人，1918年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牺牲。

吴世昌：车道乡人，1913年生，革命群众，1948年在车道乡苦水掌被敌人杀害。

梁桂荣：耿湾乡人，1914年10月生，1943年3月参加革命，某部班长，1948年在陕西省牺牲。

贾怀全：罗山川乡人，1927年6月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宜川牺牲。

秦明吉：天池乡人，1911年5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8年在华池县大风川牺牲。

赵世武：天池乡人，1930年7月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某部通讯员，1948年在陕西省保安县牺牲。

白成富：演武乡人，1916年2月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1948年牺牲。

高维仁：曲子乡双城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庆阳县驿马土产公司会计股长，1948年在庆阳县小南沟因公牺牲。

王汉富：天池乡梁河行政村人，1922年2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陇东分区十一师三十二团三营八连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永丰镇作战中牺牲。

姚万广：木林乡木林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直属营炮兵连战士，1948年在冯原镇作战中牺牲。

王彦广：木林乡坪子原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一营三连某班班长，1948年在清华镇作战中牺牲。

张俊茂：木林乡高寨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环县游击队战士，1948年在环县洪德作战中牺牲。

孙满山：洪德乡寇家河行政村人，1927年5月生，1941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通讯员，1948年在陕西省蒲城县作战中牺牲。

杨文尚：洪德乡耿原畔行政村人，1908年11月生，1943年11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十三团二营二连战士，1948年在环县洪德病故。

马万召：车道乡小堡条行政村人，1918年2月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独立五团大炮连排长，1948年在五冠子作战中牺牲。

罗如瑞：吴城子乡三沟渠行政村人，1911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黄龙镇作战中牺牲。

常富玉：虎洞乡半个城行政村人，1929年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倪俊帮：吴城子乡三沟渠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虎生发：吴城子乡三沟渠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王兴平：演武乡人，1934年3月生，1947年5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耀县牺牲。

李秉智：洪德乡李原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3年2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49年1月在华池县元城乡病故。

王九智：许家河乡金村寺行政村人，1913年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曲子二中队排长，1949年3月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田俊运：许家河乡金村寺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曲子县二中队战士，1949年3月在庆阳县孙家湾作战中牺牲。

耿文科：合道乡赵原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第四野战军战士，1949年3月在甘肃省夏河县作战中牺牲。

杨治义：西川乡杨角掌行政村人，1918年7月生，1947年10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9年3月在环县杨角掌因公牺牲。

张永生：小南沟乡李原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49年4月在环县曲子镇黄岔病故。

李天云：天池乡人，1927年3月生，1948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4月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陈明江：洪德乡张原行政村人，1926年2月生，1948年3月参加革命，环县甜水游击队战士，1949年4月因公牺牲。

张生祥：天池乡乔家原行政村人，1936年2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分区十三团战士，1949年5月在庆阳县驿马作战中牺牲。

李恒忠：环城镇张塄行政村人，1936年7月参加革命，武都军分区战士，1949年6月在甘肃省武都病故。

孙守俊：曲子镇人，1911年4月生，1947年5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7月在华家岭牺牲。

余通清：演武乡沙地洼行政村人，1938年生，警三旅五团担架队队员，1949年7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李银贵：演武乡佛堂行政村人，1906年生，警三旅五团担架队队员，1949年7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牛生琪：演武乡路家原行政村人，1909年生，警三旅五团担架队队员，1949年7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杨士保：吴城子乡曹李川行政村人，1907年生，陇东环县担架大队队员，1949年7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杨生林：西川乡杨庙掌行政村人，1930年8月生，1942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司号员，1949年7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郝廷富：西川乡西川行政村人，1920年3月生，1946年7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二营三连某排副排长，1949年7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殷万库：木钵乡人，1932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贾明彦：虎洞乡人，1926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某部排长，1949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王永发：合道乡陶洼子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某班班长，1949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张五珍：芦家湾乡王庄行政村人，1930年3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车道六乡青年书记，1949年8月在环县盘龙因公牺牲。

赵乃命：吴城子乡曹李川行政村人，1907年生，环县担架队队员，1949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朱清财：吴城子乡碾盘岭行政村人，1929年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步兵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四连通讯员，1949年8月在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孙九恩：曲子镇孙家河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营某排排长，1946年8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徐三礼：罗山川乡刘吊庄行政村人，1932年7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西北第一野战军骑兵第二旅四团战士，1949年8月陕西省陇县病故。

王维贵：芦家湾乡盘龙行政村人，1919年11月生，1937年10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8月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徐兆林：木钵乡高寨沟行政村人，1898年生，担架队员，1949年9月在陕西省潼关作战中牺牲。

樊生贵：樊川乡李堰坝行政村人，1928年4月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十一师三十一团七连某班班长，1949年9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张守甲：吴城子乡碾盘岭行政村人，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三营八连战士，1949年8月在宁县作战中牺牲。

王培海：天池乡人，1933年3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在陕西榆林牺牲。

道文金：曲子镇西沟行政村人，1922年生，1938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战士，1949年在环县曲子病故。

张举平：樊川乡张湾行政村人，1933年9月生，1948年7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作战中牺牲。

郝保君：八珠乡马连掌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黄荣祥：八珠乡白家原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三旅五团三营七连某排排长，1949年在兰州市沈家岭作战中牺牲。

殷万民：木钵乡殷家桥行政村人，1933年生，1946年4月参加革命，某部战士，1949年在兰州狗娃山作战中牺牲。

张有俊：洪德乡许旗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6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某班班长，1949年在作战中牺牲。

陈根保：洪德乡苗河行政村人，1931年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警备团战士，1949年在兰州市甘草岭作战中牺牲。

何登治：合道乡唐台子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陇东分区老五团战士，1949年在兰州市作战中牺牲。

赵兴荣：洪德乡赵洼子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一营卫生员，1949年在兰州沈家岭作战中牺牲。

许凤廷：许家河乡小庄子行政村人，1931年生，担架队员，1949年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刘秉考：虎洞乡张湾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延安留守兵团战士，1949年在临洮县作战中牺牲。

乔万清：虎洞乡刘解掌行政村人，1913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49年在环县姚米湾病故。

韩发斌：演武乡黄山行政村人，1913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陇东十四团战士，1949年在环县赵渠作战中牺牲。

乔贵成：演武乡刘坪行政村人，1932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环县演武游击队员，1949年在作战中牺牲。

巨学儒：演武乡黄山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十一旅三十一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东瓜山作战中牺牲。

尚登科：吴城子乡曹李川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某团四连战士，1949年在陕西省关中作战中牺牲。

郭仁祥：合道乡辛坪行政村人，1925年生，驿马关担架队队员，1949年在庆阳县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杨治勤：四川乡肖川行政村人，1930年2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队员，1949年在固原县固公牺牲。

杨志忠：虎洞乡魏家河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3年1月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战士，1950年1月在环县半个城作战中牺牲。

张学昆：芦家湾乡花儿掌行政村人，1920年7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毛井区委秘书，1950年4月在环县毛井因公牺牲。

李兴时：虎洞乡贾驿村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环县游击队排长，1950年7月在环县姚米湾作战中牺牲。

许凤清：许家河乡许家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四军司令部警卫员，1950年8月病故。

王占魁：环城乡张滩滩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50年在陕西省镇巴县作战中牺牲。

苏乃栋：合道乡陶洼子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陇东十三团战士，1951年在兰州病故。

杨志旺：八珠乡塔儿嘴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警二旅五团战士，1952年2月在六盘山作战中牺牲。

魏玉芳：虎洞乡魏家河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8年9月参

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某部排长，1952年8月 在平凉因公牺牲。

杨德景：丰道乡元滩行政村人，1922年8月生，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野战军某排副排长，1952年在陕西省澄城县作战中牺牲。

薛凌玉：西川乡赵原行政村人，1918年1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甘南驻军指挥部一营某班班长，1952年6月在甘南作战中牺牲。

彭占富：西川乡常原行政村人，1929年5月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保安大队三中队战士，1952年6月在兰州病故。

田世宽：合道乡赵原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十四团某排排长，1952年7月在西藏作战中牺牲。

张兴忠：环城乡红星行政村人，1930年6月生，1948年7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骑兵团某排排长，1958年在甘肃省玛曲县作战中牺牲。

常玉林：环城乡十五里行政村人，1924年8月生，1945年参加革命，九五三三部队政治处助理员，1960年10月在西藏查路山口作战中牺牲。

庆 阳 县

姬润财：安家寺乡人，1918年5月生，1936年3月参加革命，延安留守处炊事员，1936年7月在延安市因公牺牲。

封吉堂：庆城镇封家原行政村人，1922年8月生，1935年9月参加革命，陕北游击队战士，1937年2月在宁县望宁堡作战中牺牲。

张仲财：赤城乡黄家行政村人，1911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二营某班班长，1938年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张元清：冰林岔乡贾山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镇原保安科战士，1940年在镇原县马聚作战中牺牲。

田生发：玄马乡柏树坑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8年6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1年在庆阳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黄清贤：南庄乡永丰行政村人，1920年7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运输队战士，1942年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刘远达：庆城镇西大街人，1922年12月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陇东中学学生，1944年4月在西峰镇因公牺牲。

何 云：赤城乡赤城行政村人，1911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独立团排长，1944年在宁夏六盘山作战中牺牲。

武清财：玄马乡老庄行政村人，1910年生，1937年12月参加革命，陕北红军战士，1944年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王梅贵：驿马镇太乐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8年10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4年在山西省平型关因公牺牲。

张升堂：安家寺乡人，1915年8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司务长，1944年在山东省作战中牺牲。

马占魁：桐川乡郭旗行政村人，1919年10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4年在镇原县孟坝作战中牺牲。

高万忠：赤城乡万胜堡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0年1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二营战士，1945年4月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包世甲：蔡家庙乡西王原行政村人，1922年4月生，1939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五九旅五营文书，1945年8月在镇原县太平作战中牺牲。

张掌仑：玄马乡柏树原行政村人，191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5年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黄志英：马岭镇马岭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6年6月参加革命，曲子县保安科战士，1945年在曲子县因公牺牲。

何其文：赤城乡埽子行政村人，1919年生，1939年3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二团战士，1946年1月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李 祥：赤城乡顾旗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庆阳县保安科战士，1946年5月在庆阳县安家寺作战中牺牲。

尚满智：崔河乡梨树梁行政村人，1912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一营战士，1946年8月在平凉作战中牺牲。

程玉俊：崔河乡崔河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6年8月在六盘山作战中牺牲。

褚有才：庆城镇十里坪人，1912年生，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三旅五团二营六连排长，1946年9月被甘保三团俘后，饿死在平凉监狱。

边 结：马岭镇马岭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6年11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双学录：驷马镇上关行政村人，1910年生，1937年9月参加

革命，三八五旅二团战士，1946年12月在镇原县太平作战中牺牲。

李 岳：马岭镇宗颜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6年12月在镇原县太平作战中牺牲。

沙占锦：熊家庙乡花园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6年11月参加革命，曾任庆阳检查站排长，1947年2月在庆阳县驿马关作战中牺牲。

王立本：熊家庙瓦窑咀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47年2月在庆阳县葛峪岭战斗中牺牲。

张善信：卅里铺乡营旗行政村人，191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定边县南门滩作战中牺牲。

王 林：玄马乡柏树原行政村人，1932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李彦财：马岭镇程官寨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6年8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田学海：熊家庙乡何家原行政村人，1912年3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作战中牺牲。

陈文进：马岭镇董家滩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2年1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7年2月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安其革：马岭镇安增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安永宁：马岭镇岳原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7年2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安凤山：玄马乡老庄行政村人，1910年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7年3月在定边县南门滩作战中牺牲。

王兴怀：庆城镇五里坡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7年3月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周尚斌：赤城乡三里店行政村人，1916年生，1936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庆阳地区保安处地下党工作者，1947年3月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郭连奎：赤城乡王畔行政村人，190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庆阳县保安科战士，1947年3月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王 忠：南庄乡六村原行政村人，1927年9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庆阳县杨原乡文书，1947年4月在庆阳县老虎湾作战中牺牲。

张祖贤：南庄乡肖原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47年4月8日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史永怀：马岭镇安塔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4月在延安作战中牺牲。

田庆龙：庆阳镇钟楼巷人，1926年4月生，1942年3月参加革命，庆阳县公安局战士，1947年5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吴秀珍：桐川乡郭岔行政村人，1916年5月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三营战士，1947年5月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芮富善：桐川乡小原行政村人，1925年5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47年5月在庆阳县高坡原作战中牺牲。

苏庆芳：熊庙乡瓦窑咀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1年4月参加革命，庆阳县政府一科科长，1947年6月在庆阳县张沟地作战中牺牲。

屈正科：庆城镇西街人，1917年3月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47年8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孙佰治：驛马镇苟家梨行政村人，1924年5月生，1943年5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二营战士，1947年8月在陕西省蒲城县作战中牺牲。

韩治财：马岭镇琵琶寨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8月在陕西省澄城县作战中牺牲。

尚生成：土桥乡杨河行政村人，1927年10月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9月在环县天池作战中牺牲。

张良选：赤城乡顾旗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2年11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工兵团战士，1947年10月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傅云：赤城乡顾旗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韩城作战中牺牲。

孙昆山：熊家庙乡熊家庙行政村人，1915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地下工作者，1947年在庆阳县因公牺牲。

雷正发：玄马乡桑里原行政村人，1917年生，193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黄龙县作战中牺牲。

范真：高楼乡苏店行政村人，1914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宜君县作战中牺牲。

贺宏斯：高楼乡高楼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宁县九岘作战中牺牲。

于振邦：驛马镇涝池行政村人，1928年2月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解放军0031部队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宜君县作战中牺牲。

豆化清：柳川乡高庄行政村人，1925年9月生，1946年1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三营某排排长，1947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郭成文：桐川乡高庄行政村人，1915年2月生，1937年3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7年在镇原县孟坝作战中牺牲。

王 统：土桥乡王原行政村人，1926年12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团战士，1948年3月在淳化县作战中牺牲。

崔生贵：玄马乡夹庙行政村人，1929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卫生员，1948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罗相龙：卅里铺乡王家桥行政村人，1922年8月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8月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翟相俊：翟河乡程家河行政村人，1926年2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白土岗作战中牺牲。

龙文明：土桥乡杨河行政村人，1923年4月生，1947年11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独立营战士，1948年3月在庆阳县二砭滩原作战中牺牲。

李东宝：马岭镇西掌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警三旅八团战士，1948年4月在镇原县孟坝作战中牺牲。

董文范：马岭镇琵琶寨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5月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蔡志凤：南庄乡六村原行政村人，1920年11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6月在合水县作战中牺牲。

赵喜华：冰林岔乡新兴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7月在陕西省宜川瓦子街作战中牺牲。

贺占彪：翟河乡店户行政村人，1916年生，1945年参加革

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7月在陕西省洛南县作战中牺牲。

徐道忠：马岭镇官亭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5年4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三营秘书，1948年8月在陕西省黄龙县作战中牺牲。

韦怀昌：驸马镇韩老庄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基排排长，1948年8月在陕西省宜君县作战中牺牲。

时宝山：赤城乡王畔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48年10月在庆阳县张沟塄作战中牺牲。

方兴成：桐川乡竟腰峁行政村人，1928年11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三营战士，1948年10月在陕西省韩城县作战中牺牲。

孙生俊：蔡家庙乡蔡家庙行政村人，1921年5月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8年11月在陕西省吴旗县作战中牺牲。

任家祥：玄马乡贾桥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11月在庆阳县桐树原作战中牺牲。

开选满：赤城乡范村行政村人，1936年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8年12月在泾川县作战中牺牲。

杨一聪：蔡家庙乡北岔沟行政村人，1920年3月生，1938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庆阳游击队战士，1948年12月在合水县杨岔作战中牺牲。

郭元俊：冰林岔乡小河咀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战士，1948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蔡一科：南庄乡庙华行政村人，1920年4月生，1947年参加

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榆林县作战中牺牲。

高仲元：南庄乡永丰行政村人，1927年11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黄龙县作战中牺牲。

贾 典：南庄乡永丰行政村人，1918年10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在环县作战中牺牲。

刘银江：南庄乡永丰行政村人，1928年3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黄龙县作战中牺牲。

李广钱：赤城乡顺旗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庆阳县保安科战士，1948年在华池县作战中牺牲。

时立近：赤城乡王畔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三营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洛南县作战中牺牲。

徐岁霖：马岭镇马岭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任正彦：葛崾峁乡赵坪行政村人，1913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正宁县井村庙作战中牺牲。

贾举财：葛崾峁乡辛龙口行政村人，1916年生，1937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8年在河南省作战中牺牲。

毛生贵：马岭镇黄崾峁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庆阳游击队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兰田县作战中牺牲。

郑生荣：马岭镇琵琶寨行政村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曲子县保安科战士，1948年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温生杰：赤城乡塄子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宜川县作战中牺牲。

赵兴山：庆城镇西原行政村人，1892年9月生，1934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庆阳县高边区四乡文书，1948年在

庆阳县因公牺牲。

麻得学：高楼乡丁堡行政村人，1928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镇原县电子镇作战中牺牲。

贾生义：南庄乡新庄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7年6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定边县作战中牺牲。

曹炳林：卅里铺乡卅里铺行政村人，1931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合水县葫芦河作战中牺牲。

肖玉宽：马岭镇纸房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8年在环县胶泥峡作战中牺牲。

梁俊章：马岭镇岳原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5年2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8年在镇原县电子作战中牺牲。

胡义顺：马岭镇贺旗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4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曲子县保安科战士，1949年3月在庆阳县作战中牺牲。

贾雄忠：庆阳县人，1923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警卫员，1949年7月在陕西省眉县因公牺牲。

耿前光：庆阳县人，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某班副班长，1949年7月在陕西省眉县因公牺牲。

张耀武：庆阳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战士，1949年7月在陕西省眉县作战中牺牲。

程克久：卅里铺乡十五里铺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文书，1949年8月在兰州市狗娃山作战中牺牲。

向国泰：太白梁乡杨湾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某排排长，1949年9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朱 学：马岭镇涝池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49年9月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黄德祥：熊家庙乡花园行政村人，1933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八团三营通讯员，1949年10月在河南省作战中牺牲。

王九德：翟河乡店户行政村人，1918年4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9年10月在陕西省吴旗县作战中牺牲。

李述岐：桐川乡党腰峁行政村人，1922年11月生，1948年9月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9年11月在陕西省吴旗县岔顶山作战中牺牲。

贾雄志：南庄乡永丰行政村人，1924年6月生，194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警卫员，1949年12月在陕西省扶风县作战中牺牲。

温生金：赤城乡赤城行政村人，1931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某排排长，1949年在延安作战中牺牲。

高生义：赤城乡三里庄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战士，1949年在兰州作战中牺牲。

郑国义：冰林岔乡小河咀人，1921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五团战士，1949年在镇原县太平乡作战中牺牲。

任维邦：玄马乡贾桥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65军193师579团战士，1951年5月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苏贵荣：庆城镇人，1934年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部测绘员，1951年7月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余 庆：马岭镇董家滩行政村人，1932年1月生，1949年9月

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1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吴正义：赤城乡老庄行政村人，1934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三八五旅五团战士，1951年在兰州皋兰山作战中牺牲。

苟生芳：冰林岔乡新兴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警三旅七团战士，1952年在四川省效村因公牺牲。

安三元：马岭镇安增行政村人，1911年生，1934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2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杜 岐：马岭镇马岭行政村人，1926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甘肃省夏河县干部，1955年2月在夏河县因公牺牲。

何源财：玄马乡房里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志愿军242号10支队战士，1955年6月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杨生福：蔡口集乡高原行政村人，1931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5年在朝鲜作战中牺牲。

瞿光耀：翟河乡胡家岭行政村人，1930年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华池警卫队战士，1957年在华池县因公牺牲。

赵世兴：高楼乡丁堡子行政村人，青海省玉梅军分区战士，1957年在青海省玉梅县作战中牺牲。

杨焦忠：蔡口集乡蔡口集行政村人，1932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机械师，1980年在辽宁省营口市因公牺牲。

镇 原 县

梁生芝：王寨乡赵川行政村人，1914年生，1937年3月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战士，1937年秋在河南某地与敌作战中牺牲。

米可成：三岔镇米家川行政村人，1920年生，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38年4月在合水县清水沟战斗中牺牲。

葛生樨：新集乡王峁子行政村人，1915年8月生，1935年10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通讯班战士，1938年10月在老河口与日本侵华军作战中牺牲。

刘清怀：平泉镇秦铺行政村人，1915年生，1937年3月参加革命，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39年10月在镇原县城作战中牺牲。

李永治：王寨乡蛟堤行政村人，1918年7月生，1938年8月参加革命，八路军某部独立团战士，1939年在延安与敌作战中牺牲。

姚爱命：孟坝镇王湾行政村人，1922年6月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一营三连战士，1939年在东华池县大风川与敌作战中牺牲。

葛永贵：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孟原乡何峁行政村人，1910年生，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革命，曾任乡农会主任、三岔区仓库主任，1940年1月20日在股家城工作时，被敌杀害。

罗建章：平泉镇马埭行政村人，1902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平泉区农会主任，1940年2月被国民党镇原

县政府逮捕。后活埋于西峰。

赵崇玉：平泉镇南徐行政村人，1913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平泉区农会主任，1940年8月被国民党镇原县政府逮捕，押于西峰活埋。

郭晓棠：三岔镇庄门行政村人，（出生时间不详），1937年8月参加革命，任三岔区青年主任，1940年8月在三岔执行任务中，被敌杀害。

徐连钧：新城乡孙庵行政村人，1905年3月生，1935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新城区委后援会委员、农会主任，1940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活埋于平凉南河套。

张世贵：南川乡桃园行政村人，1908年生，1939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兵连长，1940年在黑渠口被敌活埋。

常岳先：庙渠乡四合行政村人，1917年5月生，1939年4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警备二团战士，1941年在东华池牺牲。

杨茂春：孟坝镇冉坝行政村人，1921年10月生，1939年2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三营九连战士，1943年在山西省与敌作战中牺牲。

刘显宗：开边乡白马寺行政村人，1920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马渠区青年书记，1944年9月在郭原执行任务时被敌杀害。

何兆福：孟坝镇何范行政村人，1918年9月生，1935年9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三营司务长，1944年因战牺牲。

张存孝：三岔镇米家川行政村人，1924年3月生，1942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3月在合水县武亭牺牲。

李春华：孟坝镇刘城行政村人，1929年4月生，1942年11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通讯员，1945

年4月在庆阳县与敌作战中牺牲。

李国英：马渠乡赵渠行政村人，1914年3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三连战士，1946年8月在黑渠口战斗中牺牲。

刘广财：孟坝镇刘城行政村人，1929年4月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七团通讯员，1946年10月在华池县元城战斗中牺牲。

谢建国：孟坝镇谢河行政村人，1924年5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绥德作战中牺牲。

席治银：孟坝镇宽展湾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五营战士，1946年在田家河作战中牺牲。

何发孝：马渠乡牡丹坝行政村人，1930年10月生，1942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十三团战士，1946年在蟠桓川折家台病逝。

朱联甲：孟坝镇大寨行政村人，1920年7月生，1948年9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副排长，1947年2月7日在孟坝段沟畔战斗中牺牲。

张富华：新集乡唐原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二营五连副班长，1947年2月在庆阳县赤城战斗中牺牲。

李积唐：方山乡方庄行政村人，1927年8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2月在孟坝白沟圈战斗中牺牲。

杨永吉：郭原乡西杨行政村人，1926年3月生，1946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2月在镇原县城被敌杀害。

席生海：庙渠乡慕原行政村人，1919年10月生，1944年10

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2月在西华池战斗中牺牲。

李吉才：三岔镇青原子行政村人，1927年9月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3月在陕西省蒲城永丰镇作战中牺牲。

李国章：三岔镇周庄行政村人，1929年生，1944年8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3月在合水县武亭子战斗中牺牲。

赵联孔：庙渠乡文夏行政村人，1926年生，1944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三营战士，1947年3月在西华池战斗中牺牲。

姚前进：新集乡永丰行政村人，1928年4月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三营九连战士，1947年3月在陕西省耀县战斗中牺牲。

陈久林：方山乡蒲河行政村人，1921年4月生，1943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一营三连战士，1947年3月在陕西省耀县战斗中牺牲。

李秉爵：孟坝镇郭合行政村人，1928年2月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3月，在三岔高湾战斗中牺牲。

刘怀宗：开边乡白马寺行政村人，1923年1月生，1936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一旅三团二连排长，1947年3月在陕西省关中马安战斗中牺牲。

张守智：方山乡蒲河行政村人，1930年3月生，1945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3月在华池县悦乐执行侦察任务中牺牲。

李廷富：三岔镇周家庄行政村人，1924年3月生，1942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3月在合水县武亭牺

性。

郭应怀：新集乡唐原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0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七连战士，1947年春在庆阳县赤城战斗中牺牲。

李之聪：新集乡新庄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3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二连战士，1947年春在合水县与敌作战中牺牲。

张世贵：孟坝镇王地庄行政村人，1924年10月生，1945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二营四连通讯员，1947年4月在合水县执行侦察任务中牺牲。

白献荣：三岔镇肖原子行政村人，1911年5月生，1937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4月在陕西省泾县米家镇战斗中牺牲。

段志安：三岔镇安岔行政村人，1915年生，1941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二营三连战士，1947年3月在华池县战斗中牺牲。

白秀仓：三岔镇肖园子行政村人，1923年6月生，1936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岔区政府文书，1947年8月在三岔炮山梁执行任务中被敌杀害。

刘登银：孟坝镇塔李行政村人，1921年9月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二团战士，1947年7月在华池县鸡家山战斗中牺牲。

张登霄：庙梁乡常埧行政村人，1911年生，1940年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8月在孟坝战斗中牺牲。

李正清：孟坝镇塔李行政村人，1920年9月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二营四连战士，1947年9月在华池县庙湾战斗中牺牲。

唐丕常：新集乡中心行政村人，1917年1月生，1944年12月

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三营九连战士，1947年10月在合水县武亭作战中牺牲。

李永来：王寨乡腰峁行政村人，1899年10月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寨自治区村代表，1947年11月在王寨执行任务中被敌杀害。

任世宽：孟坝镇西壕行政村人，1922年10月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战士，1947年在陕西省耀县白马铺战斗中牺牲。

李世龙：孟坝镇刘城行政村人，1921年1月生，1938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通讯员，1947年在山西省作战中牺牲。

张志芳：殷家城乡白家川行政村人，1929年4月生，1944年8月参加革命，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在新集苜蓿地战斗中牺牲。

席维军：临泾乡席沟圈行政村人，1916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排长，1947年在延安玉林庙战斗中牺牲。

李铭章：三岔镇榆杨湾行政村人，1923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马永宽：新集乡刘大岔行政村人，1922年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二营五连战士，1947年在宁县九岘与敌作战中牺牲。

席国谨：孟坝镇王地庄行政村人，1916年1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白马铺战斗中牺牲。

朱纯业：新集乡中心行政村人，1920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一营五连战士，1947年在庆阳县赤城与敌作战中牺牲。

限治业：孟坝镇段沟畔行政村人，1907年9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游击队干部，1948年2月在孟坝执行任务中被敌杀害。

刘长德：三岔镇杨湾行政村人，1925年4月生，1943年1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2月在庆阳县二轱辘原战斗中牺牲。

王生福：三岔镇轂子湾行政村人，1927年5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战士，1948年2月在陕西省作战中牺牲。

郭奎奎：马渠乡周庄行政村人，1931年2月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二连战士，1948年2月在庆阳县二轱辘原战斗中牺牲。

俱志和：马渠乡油坊沟行政村人，1929年8月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通讯员，1948年2月在庆阳县二轱辘原战斗中牺牲。

姚治仓：庙渠乡常埧行政村人，1923年4月生，1939年4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排长，1948年2月在庆阳县二轱辘原战斗中牺牲。

李廷佩：孟坝镇王湾行政村人，1930年2月生，1944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贾存祥：孟坝镇王山行政村人，1920年7月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八路军陇东独立团四营四连副排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刘国正：方山乡贾山行政村人，1926年12月生，1942年参加革命，八路军陇东独立团二营六连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张廷瑞：孟坝镇港河行政村人，1925年12月生，1943年9月

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二营四连二排排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杜荣祥：新集乡永丰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3年2月参加八路军，陇东独立团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周希礼：曙光乡开城行政村人，1913年生，1944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七团二营五连副班长，1948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瓦窑街战斗中牺牲。

唐治清：孟坝镇董河行政村人，1925年8月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团二营四连二排副排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李崇荣：三岔镇周家庄行政村人，1922年4月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八路军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俱兆玉：三岔镇榆杨沟行政村人，1918年2月生，1943年1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连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白玉忠：殷家城乡寺山行政村人，1928年11月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张廷玺：开边乡张沟行政村人，1923年8月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罗积福：庙梁乡黎明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3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团一连副排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牺牲。

张凤联：孟坝镇董家塬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3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峁战斗中

中牺牲。

何德长：三岔镇寺庄湾行政村人，1915年9月生，1930年10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3月在环县牺牲。

李应甲：孟坝镇王湾行政村人，1925年2月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一排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战斗中牺牲。

白得发：方山乡高粱行政村人，1922年5月生，1946年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班长，1948年3月在环县胶泥峡战斗中牺牲。

柳治瑞：方山乡方庄行政村人，1913年6月生，1946年5月参加革命，陇东军分区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牺牲。

刘邦治：方山乡王湾行政村人，1919年11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4月在庆阳县何峒子战斗中牺牲。

白启荣：殷家城乡白沟圈行政村人，1929年9月生，1944年1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5月在环县木钵战斗中牺牲。

刘治元：高渠乡四合行政村人，1921月生，1942年1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战士，1948年5月在庆阳县牺牲。

常来州：马渠乡花儿岔行政村人，1924年7月生，1947年4月参加革命，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8月在孟坝镇徐王什字战斗中牺牲。

沈发海：马渠乡花儿岔行政村人，1924年5月生，1939年2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7月在环县红土峡战斗中牺牲。

王永恩：平泉镇上刘行政村人，1908年5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地下共产党小组长，1948年8月

被国民党平泉镇公所逮捕杀害。

韩生清：殷家城乡张老庄行政村人，1922年9月生，1943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副班长，1940年9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永平镇战斗中牺牲。

白彦荣：殷家城乡桑树塬行政村人，1919年8月生，1939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副班长，1948年9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永平镇战斗中牺牲。

唐清河：新集乡唐原行政村人，1918年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二连二排战士，1948年9月在陕西省富平县康庄镇作战中牺牲。

任俊国：方山乡王湾行政村人，1921年4月生，1945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三营八连副排长，1948年9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永平镇战斗中牺牲。

赵 绪：孟坝镇何范行政村人，1923年9月生，1939年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三营九连排长，1948年9月在陕西省蒲城县牺牲。

牛治国：庙渠乡牛原行政村人，1924年生，1941年4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一营三连班长，1948年10月在环县赵渠战斗中牺牲。

尤汉斌：开边乡花岔行政村人，1929年5月生，1944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11月在三岔高湾战斗中牺牲。

白银库：殷家城乡桑树塬行政村人，1921年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战士，1948年11月在三岔高湾战斗中牺牲。

董天景：孟坝镇冉塬行政村人，1923年4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四连通讯员，1948年11月在环县金掌川

战斗中牺牲。

李和智：孟坝镇三门咀行政村人，1908年7月生，1942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独立团一营一连二排排长，1948年11月在三岔战斗中牺牲。

杜玉林：小峁乡惠沟行政村人，1927年11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12月在华池县元城子执行任务时被敌杀害。

焦存信：新集乡新庄行政村人，1925年1月生，1942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五团三营七连战士，1948年在宜川与敌作战中牺牲。

杨正发：孟坝镇醴家场行政村人，1919年2月生，1944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一营战士，1948年在陕西省蒲城县永平镇战斗中牺牲。

张兴克：小峁乡曹城行政村人，1925年7月生，1948年3月参加革命，镇原县游击大队队员，同年在环县战斗中牺牲。

张希荣：庙梁乡黎明行政村人，1926年生，1939年12月参加革命，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排长，1949年1月在宁县春荣镇牺牲。

王兴邦：三岔镇石咀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4年12月参加革命，镇原二区四乡村长，1949年1月在三岔石咀子被敌杀害。

贾秉玉：孟坝镇刘城行政村人，1907年5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游击队队员，1949年2月在镇原县城被敌杀害。

秦彦武：三岔镇肖园子行政村人，1914年8月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任三岔三友客栈经理，1949年2月在三岔周家庄执

行任务时被敌杀害。

刘俊发：上肖乡北庄行政村人，1907年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军某部副□长，1949年4月在陕西省麟游县战斗中牺牲。

杨树植：庙渠乡慕原行政村人，1923年3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陇东军分区军医，1949年5月在军分区病故。

兰仲田：孟坝镇渔河行政村人，1916年8月生，1940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武工队队员，1949年5月在孟坝镇醴塄执行任务中被敌杀害。

王乃玉：开边乡开边行政村人，1922年10月生，1948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排长，1949年5月在陕西省黄龙战斗中牺牲。

马国海：方山乡马湾行政村人，1900年6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武工队队员，1949年5月在方山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

白九金：殷家城乡桑树塄行政村人，1928年9月生，1946年5月参加革命，陇东独立团二营六连排长，1949年5月在庆阳县驿马关战斗中牺牲。

朱有德：方山乡王湾行政村人，1928年7月生，1946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保安科战士，1949年6月在孟坝镇什字与敌战斗中牺牲。

乔有川：方山乡张大湾行政村人，1919年生，1949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在孟坝执行任务中被敌杀害。

张积成：孟坝镇原口行政村人，1929年8月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三营九连战士，1949年7月在宝鸡牺牲。

王万才：郭原乡王咀子行政村人，1918年5月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宁夏固原县王塄区武工队队员，1949年8月在王塄剿

匪中牺牲。

賈应太：唐渠乡文夏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4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一营三连排长，1949年12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永平镇作战中不幸牺牲。

姚世发：方山乡高渠行政村人，1923年8月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三旅五团二营四连班长，1949年在陕西省耀县作战中牺牲。

焦宏义：孟坝镇渣河行政村人，1922年8月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司号员，1949年在三岔战斗中牺牲。

焦鸣义：孟坝镇渣河行政村人，1929年3月生，194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九连司号员，1949年7月在陕西省扶眉战斗中牺牲。

姚生连：三岔镇石咀行政村人，1917年6月生，1944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镇原县民兵副班长，1945年在三岔执行任务中牺牲。

韩世孝：小峁乡米原行政村人，1926年7月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平凉军分区警二团三营八连二排副排长，1950年4月在平凉蒿店剿匪中牺牲。

朱世杰：郭原乡寺沟行政村人，1932年生，1949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凉军分区警二团三营八连战士，1950年4月在平凉蒿店剿匪中牺牲。

雷殿英：小峁乡米原行政村人，1923年5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平凉军分区警二团三营八连二排副排长，1950年4月在平凉蒿店剿匪中牺牲。

路秉孝：郭原乡景家原行政村人，1920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平凉军分区警一团三营排长，1950年4月在平凉蒿店剿匪中牺牲。

巨万海：小峁乡巨寨行政村人，1916年10月生，1949年平凉年8月参加革命，平凉军分区警二团三营八连战士，1950年4月蒿店剿匪中牺牲。

王廷钰：平泉镇坪边行政村人，1929年11月生，1949年7月参加革命，平凉军分区警二团三营八连战士，1950年4月在平凉蒿店剿匪中牺牲。

郭万祥：城关镇丰台行政村人，1925年1月生，1948年参加革命，镇原县民政科科长，1950年12月在镇原县中原执行任务时牺牲。

沈得位：新城乡沈咀行政村人，1924年3月生，1949年7月参加革命，甘肃省军区警二团八连战士，1950年在平凉蒿店剿匪中牺牲。

马志财：电子镇四殿行政村人，1921年9月生，1936年3月参加革命，在西南铁路工程局工作，1951年3月在四川重庆铁路局因公殉职。

魏国禄：太平乡石泉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8年7月参加革命，共青团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二师五七四团三营九连战士，1951年5月在朝鲜鹰峰山战斗中牺牲。

王国祥：小峁乡曹城行政村人，1930年3月生，1949年5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平凉军分区警二团三营通讯员，1951年6月在平凉县因公牺牲。

刘贵善：城关镇莲池行政村人，1925年1月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七四团二营机枪连副排长，1951年8月在朝鲜鹰峰山战斗中牺牲。

尤世兴：开边乡花岔行政村人，1922年12月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辑重四团三营一连排长，1951年10月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李凤寿：中原乡何曹刘行政村人，1923年12月生，1949年

7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三军一九八师五六六团二营五连战士,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李玉邦:马渠乡固坪行政村人,1928年4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陇东分区十三团警卫连排长,1951年在武都烧炭中牺牲。

张进田:开边乡贾前庄行政村人,1929年2月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一九二师五七四团二营战士,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白清元:孟坝镇西垭行政村人,1925年6月生,1946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司令部警卫员,1951年在临洮执行任务中牺牲。

姚儒煊:孟坝镇王湾行政村人,1930年8月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三八五旅警备五团三营八连战士,1951年在陕西省牺牲。

郑学敏:南川乡川郑行政村人,1925年12月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共青团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八八师五六三团班长,1952年1月在朝鲜开城战斗中牺牲。

段万金:南川乡沟卢行政村人,1917年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八八师五六三团战士,1952年1月在朝鲜开城战斗中牺牲。

席国民:曙光乡曹路行政村人,1927年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七四团七连副排长,1952年2月在朝鲜马良山战斗中牺牲。

韩怀儒:湫池乡虎泉行政村人,1928年2月生,1948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某部战士,1952年2月在河南省执行任务中牺牲。

孙述先:庙渠乡孙寨行政村人,1916年2月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警卫团排长,1952年4月

在兰州因公殉职。

白海义：平泉镇黄岔行政村人，1925年5月生，1949年7月参加革命，平凉军分区战士，1952年4月在固原离店剿匪中牺牲。

路生彩：曙光乡曹路行政村人，1927年2月生，1945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三团驾驶员，1952年5月在朝鲜执行任务中牺牲。

刘邦泰：上肖乡梧桐行政村人，1929年3月生，1949年10月参加革命，平凉军分区警卫团副排长，1952年6月在平凉执行任务中牺牲。

王占元：彭阳乡石崖行政村人，1926年5月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一四部队二十二大队战士，1952年6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常维汉：三岔镇寺庄湾行政村人，1920年7月生，1944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甘南指挥部一营三连排长，1952年7月在夏河县执行任务中被土匪暗杀。

杨世纪：小岭乡朱原行政村人，1930年9月生，1949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四〇部队炮兵连战士，1952年9月在朝鲜上甘岭战斗中牺牲。

白志能：殷家城乡寺山行政村人，1925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陇东分区警卫团一营三连班长，1952年10月在甘肃省夏河县剿匪中牺牲。

杜治玉：孟坝镇原口行政村人，1932年9月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平凉军分区警备二团战士，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徐荣夫：新城乡孙淹行政村人，1928年9月生，1947年9月参加革命，甘肃省军区警二团三营战士，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

牺牲。

郭克太：电子镇北川行政村人，1920年8月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铜重四团三营一连排长，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董世钧：中原乡姜白行政村人，1921年3月生，1949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王久福：方山乡曹湾行政村人，1926年4月生，1946年5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骑兵一团班长，1954年2月在临潭县执行任务中牺牲。

董有铭：电子镇董川行政村人，1929年10月生，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青海省建设银行干部，1958年7月在青海剿匪中牺牲。

1948年4—5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在镇原县电子镇与敌作战中牺牲的部分烈士（105名）：

田文波	田 夫	智满银	冯振林
刘生奎	刘对娃	王仲斌	李希雄
刘选顺	刘玉林	封小邱	徐海元
刘三亭	赵清恩	薛 斌	郝志增
高鸿彦	吴定邦	刘显荣	刘义臣
李广庆	郭孝德	韩其章	石盘玉
代希全	冯元万	刘茂栓	朱启云
董国儒	朱树林	高同仁	韩元合
胡志年	李金昌	雷世奇	李灵云
刘早栓	包福东	赵明月	刘 锐
陈文祿	王世才	刘 郎	刘 喜
王 斌	张双会	张瑞勤	刘全柱
梁玉贵	王耀东	吴明占	张振和

西 峰 市

何守玉：彭原乡上河行政村人，1911年生，1936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5年4月在镇原县作战中牺牲。

王宗堂：后官寨乡人，1918年4月生，1938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战士，1946年在山西省牛家堡作战中牺牲。

王建国：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作战中牺牲。

申伏龙：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申德明：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刘金顺：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刘宝有：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刘桂芝：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张桂山：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邵有福：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吴化保：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范承德：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赵兴德：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徐凤佳：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耿吉瑞：西峰市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阎锦德：青金镇人，新四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米脂县镇川堡牺牲。

吴治业：显胜乡蒋河行政村人，1923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队长，1947年10月在镇原县孟坝镇牺牲。

邵满德：彭原乡邵家寺人，1929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战士，1944年在广河牺牲。

甘新出019字总270号(95)055号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

中共华池县委员会

甘肃省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 字数45万

印数1—2000 工本费：9.90元

(内部资料)